

跟影子摔跤

Emanuel 贝一明

自传体小说



跟影子摔跤

版权 2021

跟影子摔跤

摘要 第 7 页

 导言第 17 页

第 1 章 第 33 页

第 2 章 第 85 页

第 3 章 第 133 页

第 4 章 第 173 页

第 5 章 第 201 页

第 6 章 第 225 页

第 7 章 第 267 页

结论 第 287 页

附录 附录

伊利诺伊大学提案

摘要

2000 年 4 月，伊利诺伊大学新近任命了伊利诺伊大学助理教授

贝一明（Emanuel 贝一明），当时他正在寻找研究和/或写作的机会。远程学习为他提供了与亚洲学术同行合作的机会，这给帕斯特里奇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他开始集思广益。几周之内，他就提出了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与东亚主要研究机构之间共享在线课程、联合研究和其他机构合作的建议：东京大学、首尔国立大学和北京大学。虽然这些亚洲大学通常不会将伊利诺伊大学视为合作伙伴，但这个想法非常新颖，而且伊利诺伊大学的技术非常先进，因此贝一明决定投入到这个项目中。

贝一明在接受培训时就掌握了中文、日文和韩文，而且他与日本、韩国和中国这些著名大学的高层管理人员都有私人关系，这使他能够迅速推进自己的计划。

到 2000 年 6 月，贝一明用三种语言完成了复杂的提案，这些提案都是根据各大学的需求和关注点量身定制的。他在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工程学院、法学院、农学院和商学院等不同院系中培养了广泛的支持者。这些学术单位为他提供了绰绰有余的资金，让他能够访问亚洲讨论该提案，并从当年秋天开始通过一系列在线研讨会来实施这一计划。

但是，这个项目出了大问题。帕斯特雷奇所在的东亚语言与文化系主任和文学学院院长突然拒绝为他的亚洲之行提供资金，甚至拒绝在 6 月之后与

他讨论这个提议，尽管他们之前一直是他的大力支持者。这种反对完全没有道理。

尽管如此，贝一明 还是设法获得了必要的资金，于 7 月前往韩国、中国和日本，他的提议受到了所有三所学校的欢迎。首尔国立大学的热情最高，其次是北京大学和东京大学。

贝一明 回到伊利诺伊大学后，本以为自己的成功会受到英雄般的欢迎，并讨论远程学习项目的下一步计划。然而，他发现他的系主任在接受校报关于这次旅行的采访时，一反常态地提出了批评。此外，他甚至拒绝在帕斯特雷奇从国外回来后与他会面讨论这个项目。

东亚研究系反对一项得到伊利诺伊大学整个校园以及三所亚洲主要大学支持的提案，这是毫无道理的。事情另有蹊跷。

帕斯特里奇认为，也许院长嫉妒工程学院的权力，而工程学院本可以在该项目中发挥重要作用；也许他并不急于让一位初级教授得到如此多的关注。但这些设想似乎都不符合他的性格，也难以令人信服。

事实是，帕斯特雷奇陷入了一场远远超出他工资等级的斗争。他的部门主管的反对意见是由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的一个小组开展的一项机密非法行动所要求的，与他个人无关。

这次行动是在特殊情况下发起的，目的是摧毁这项提案，必要时还会毁掉贝一明的职业生涯，以确保他关于美国与亚洲合作的想法和呼吁永远不会见光。

贝一明 的提案不仅包括互联网学习的建议，还包括解决朝鲜统一和美国与中国关系等地缘政治问题的综合方案，这些方案得到了这些国家许多决策者的共鸣。中文、日文和韩文版本已在这三个国家广泛传播。

这些建议对美国的某些政客和军事策划者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他们（恰恰在克林顿总统试图与朝鲜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时候）决定，他们将不遗余力地确保朝鲜被视为敌人，中国被视为永远不可能成为可靠伙伴的潜在敌人。

这场战役被认为是维持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和支撑美国与其东亚盟国之间不平等关系所必需的。这关系到数千亿美元的利益。

一个来自联邦调查局的秘密小组，在中央情报局（也许还有国家安全局）的协助下，被派往帕斯特雷奇，从四月份开始巧妙地破坏该项目。

军事工业综合体中的强大势力（不是现役军人，他们对该项目持同情态度）无法阻止该项目的发展势头，因为该提议令人兴奋，可能有利可图（远程学习最终将成为一个数十亿美元的产业），而且实施该项目的最初步骤是由韩国、日本和中国的团体采取的，美国特工人员几乎无法控制这些团体。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小组终于粉碎了这一提议，但也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

从 2000 年 8 月起，该小组直接或暗中明确指示教师和管理人员远离 贝一明。他的系主任奉命采取一系列措施，将他与同事们隔离开来。随着五角大楼内部（支持和反对与朝鲜和解倡议）斗争的白热化，帕斯特里奇成为华盛顿特区关注的焦点，而他当时并不知情。

2000 年 12 月，在灾难性的大选之后，军方的一个右翼派别夺取了政权，事情因此变得扑朔迷离。这一行动在一定程度上与帕斯特雷奇的努力有关。针对帕斯特雷奇的行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大学里几乎没有人愿意与他见面或交谈。

当布什政府任命极端分子担任军方和情报部门的要职时，他们准备对帕斯特里奇采取严厉措施，以警告政府和学术界的其他顽固派。

他们在等待合适的时机。

2001 年 2 月 24 日，一家中国报纸发表了贝一明撰写的一篇文章，倡导在东北亚建立一个新的和平机制，这一刻到来了。这个以中美伙伴关系为基础的共同社区愿景，成为 "中国威胁论 "游说集团的最后一根稻草。帕斯特雷奇被下令立即 "自杀"。尽管小布什据说是这一命令的来源，但布什个人对帕斯特里奇并无敌意。他别无选择，只能响应军工企业各派系的要求。

如果不是科林-鲍威尔等人据理力争，帕斯特里奇很可能已经遇害。最后，那些想毁掉帕斯特里奇的人不得不满足于让他在四年里不断受到死亡威胁和低级骚扰（并限制他一生的职业机会），以儆效尤。

贝一明 的父亲二月份来探望儿子，他听说儿子患有精神疾病。他的父亲被引导相信，儿子告诉他的所有问题都是他多年前切除脑瘤后的妄想行为造成的。他为亲朋好友精心编造了一个童话故事。

贝一明 的父亲赶到医院时，贝一明 被拖到医院，未经任何医疗检查就被证明患有精神疾病。他被迫接受不必要的治疗，包括服用抗精神病药物，却没有经过任何医疗评估。

在他与医院指定治疗他的神经科医生会面时，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医生对他的健康状况完全不感兴趣。相反，他问他对美国安全未来的看法，甚至要求看他描述自己想法的论文。

与神经病学家的会面变成了地缘政治简报会，然后扩大到讨论如何应对布什政府的极权统治。到 2001 年 4 月，帕斯特里奇提出了如何恢复美国法治的建议，并在许多方面成为有组织地反对布什政府的核心人物。该组织在慢慢夺回控制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准备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采取下一步行动。

帕斯特雷奇不知道他向哪些人提出了意见，但他确实偶尔有机会与重要人物交谈。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与大学和美国的每个人都完全隔绝。

他既被软禁并受到死亡威胁，同时又被视为美国国内和国际政策的重要人物，这种处境十分怪异。

从 2001 年 2 月到 2002 年夏天，帕斯特雷奇因精神疾病休病假。2002 年 4 月之后，他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尽管很少有人愿意与他见面。2003 年，他被允许再次任教（在 18 个月的伤残期之后）。2004 年，他再次获得终身教职审查的机会。

2003 年，贝一明 有机会发表演讲，2004 年甚至获得了去日本进行两个月研究的机会。一时间，他似乎走上了事业复兴之路。

然而，2004 年大选的非法停摆使许多帕斯特里奇的维护者离开了政府。尽管帕斯特雷奇不再受到死亡威胁，但他还是被伊利诺伊大学拒绝终身教职（尽管他有很强的资格），并于 2004 年 12 月被开除。

贝一明 申请了数百份工作，包括重点大学的教职、社区学院的兼职以及与亚洲有关的公司和非政府组织的其他工作。他没有获得一次面试机会。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的申请从未得到确认。

但有一个例外。中情局以书面形式向他提供了一个情报官员的职位。

中情局是美国唯一一个有能力对抗布什政府的机构，因此他才有可能获得这份可能并不严肃的工作。这个工作机会足以让帕斯特雷奇决定搬到华盛顿特区，因为他认为那里可能比伊利诺伊州的农村地区有更好的机会。

他在华盛顿特区失业了两个月，工作机会也不可避免地落空了。他把家人送到韩国，和岳父母住在一起，自己则住在表兄家的小房间里。

2005 年 2 月，当 贝一明 意外受邀在国会山发表演讲时，韩国大使馆的一名外交官和一名韩国记者找到了他，说他们会努力说服新任韩国大使聘用他。

贝一明 最终在韩国大使馆（在法律上并不属于美国领土）获得了一个低薪职位，并在华盛顿特区工作了两年，勉强度日。

最终，他在美国找不到其他工作，同意于 2007 年在韩国的一所小大学任教。

在经历了艰难的起步之后，他重新成为一名学者，并于 2011 年转入更为著名的庆熙大学。然而，他从未获得终身教职。他更喜欢为大众读者写书，为报纸写文章。2014-2016 年间，他曾一度在韩国相当成功，但从未在美国获得认可，也未受邀参加会议。偶尔申请美国的工作也完全被忽视。

2018 年，当 贝一明 显然无法获得庆熙大学的终身教职时，他搬到了韩国一所规模较小的大学。为了满足家人的愿望，他计划从 2019 年起返回华盛顿特区。

他在 2019 年夏天搬了回来，在韩国大使馆和韩国经济研究院（KEI）获得的合同工作不足以让他在弗吉尼亚州北部昂贵的环境中生活下去。

随着 Covid-19 危机的爆发，他与韩国大使馆的合同被取消，他又一次失业了，这次他失业了两个月，甚至找不到翻译工作。

他被迫返回首尔，在那里至少还有就业的希望。五个月后，他才重新有了收入。

在此过程中，他与妻儿分离，被迫负债累累。

2020 年 2 月，帕斯特雷奇在华盛顿特区宣布自己为总统独立候选人，以回应他再次遭受的极端政治迫害。

他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如果想活下去，就必须迈出这意想不到的一大步。

闲暇之余，他撰写并发表了一系列演讲，勾勒出美国经济和安全政策的革命性转变。

虽然这场运动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受到美国秘密法和机密通知的阻挠（就像他的大多数活动一样），但帕斯特里奇还是设法在韩国媒体上获得了一些报道，在越南媒体上也有少量报道。他的十五次演讲都经过精心制作，演讲稿给美国许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最终，根据这些演讲内容编写的韩文书籍在首尔出版（随后在墨西哥城出版了西班牙文版本）。日语、中文和越南语版本也已发行。

帕斯特里奇写了更多的演讲稿，他还为《全球研究》（唯一愿意发表他的文章的媒体）撰写了有力的文章，赢得了大批追随者。

他用仅有的资金将自己的书翻译成德语、土耳其语、法语、波斯语、波兰语、罗马尼亚语、俄语和其他语言，并为自己的竞选活动建立了一个精心设计的网站 贝一明 prez.com，帮助他在世界各地赢得了广泛的追随者。

此外，在乔-拜登模棱两可的当选之后，帕斯特里奇还撰写了一篇文章，以平衡的方式为唐纳德-特朗普辩护，帮助他赢得了更多读者。

从 2021 年 3 月起，他以全新的认真态度投入到竞选活动中。2000 年和 2001 年，他曾在亚洲各地为他的美国领导力愿景建立支持基础，而这次则是史无前例地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竞选活动。然而，到了秋天，这场战役的规模已经势不可挡，威胁也十分严峻。帕斯特雷奇采取了下一步行动，于 2021 年 6 月建立了美国临时政府，并于 2021 年 8 月成立了国际革命党，这将成为他继续战斗的核心机构。

无论如何，在这二十年间，除了贝一明本人之外，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要求讨论美国对贝一明所做的事情，更不用说要求进行调查了。

导言

二十一年后的今天，我可以以一种超然的、甚至略带嘲弄的眼光来回顾始于 2000 年 7 月的那场风波。当然，我要讲述的故事涉及 2000 年与亚洲和美国的人们讨论教育的未来时发生的一系列奇怪的巧合和不寻常的事件，这些讨论出乎意料地将我推向了地缘政治的前线，使我走上了从未想过的对抗之路。

我开始相信，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某种对抗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是我性格的某些特点所决定的。同时，我觉得我可以轻而易举地证明对我采取的行动的严重非法性和不道德性，以及同事、朋友和家人对这一过程的可耻参与。

我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一种奇怪的看法。我感兴趣的是改变整个系统，而不是对现有机构进行渐进式修改，而且我是一个喜欢程序、容易与官僚和行政人员交朋友的人。我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和薪酬也不感兴趣。我假定，如果更大的任务取得成功，我会得到照顾。

我所传达的基本信息是激进的变革，但与此同时，变革也要尊重我周围的人所做的工作。这种做法意味着我不会轻易被视为狂热分子或梦想家，同时也让许多渴望真正体制变革的人感到好奇和兴奋。换句话说，在伊利诺伊大学这样一个沉睡而封闭的机构里，我有能力真正改变现状。

2000 年，我对待事业的方式出现了根本性的问题。我想做一些与众不同的事情。我不想追求某个特定的职业目标，也不想努力达到某个特别崇高的职位。我甚至不想与伊利诺伊大学最有权势的人打交道。相反，我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在一所相当普通但却相当强大的大学里创造出

一些独特的东西。光是这种做法就足以让我成为一个严重的威胁--尽管我需要六个月的时间才能搞清楚发生了什么。

2000 年的一个早晨，我坐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东亚语言文化系的**办公桌前**，开始起草一份关于大学在互联网时代的未来的建议书。在我的脑海中，世界变成了一个充满可能性的潮汐池。我从自己的研究领域--亚洲研究开始，为修复我国的教育体系制定了一项长期计划。在这个计划中，我提出了新的规则、新的文化标准，甚至是国际关系的新方法。我对大学未来的构想很宽泛，但对远程学习潜力的描述很有说服力，而且我能够很容易地将其传达给其他人。

虽然我从来没有因为这个建议而得到金钱和荣誉，但我发现，正是因为我不要所有权，所以潜力无穷。大卫-麦卡洛（David McCullough）的《哈里-杜鲁门传》（我在 1999 年读过）中引用了哈里-杜鲁门总统经常使用的一句话，让我记忆犹新："如果你不在乎功劳归谁，你所能取得的成就是惊人的"。虽然后来我才知道杜鲁门并不像我所了解的那样是个圣人，但这些话还是给了我最初的启发，为我在 2000 年夏天制定战略奠定了基础。

不幸的是，作为一个雄心勃勃的美国年轻人，这并不是你应该采取的行动方针。你应该追求自己的目标，成为既有体制内的知名人士。在我的领域，这意味着成为哈佛大学的教授、院长，如果我选择从政，甚至可能成为参议员。在没有为自己带来直接利益的情况下，将自己投入到最一般意义上的政策中是不符合逻辑的。这种做法意味着，在伊利诺伊大学，

在美国，我在政策和规划领域占据着广阔的空间。我独自一人试图通过各级应用的渐进政策，以积极和合乎道德的方式应对互联网的指数式发展。

像（伊利诺伊大学或美国）校长这样的人本该做这项工作，但他们的重点是培养关系，以推进自己的目标，并确保退休后富甲一方。随着工作的进展，我开始意识到，作为一名日本文学助理教授，我所能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

我把时间投入到更大的利益中，并坚信最终会得到丰厚的回报。有些人参与了战略规划，但他们的总体目标始终是赚钱和扩张。一开始，我在学术政治方面并不特别娴熟，但这些经历会让我在最后变得相当有能力。至于我的得失，就留给读者去评判吧。我只想说，我既相信我的想法是变革性的，也相信这些想法会被我的上司采纳并付诸实施（无论是否有我的功劳）。我没有想到，我自己会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同时也成为人们谈论的禁忌话题。

自信

霍滕斯-科汉的雄心壮志是推动我走上这条奇特轨迹的第一个因素。霍顿斯-科汉是我的祖母，是我早期生活的主要力量，尽管我与她相处的时间并不多。当然，我也从母亲和父亲那里学到了很多，母亲是一位

深思熟虑的女性，具有艺术才能，对人性有着深刻的理解，而父亲则是一位专注的管理者，他以出色的效率管理着复杂的组织。

但是，正是我的祖母对她的家庭，尤其是对她的子孙们，抱有令人难以置信的雄心壮志。可以说，在她的孙辈中，她把我锁定为未来的关键。

我的祖母是曼尼-科汉（Manny Cohan）的女儿，他是一位自命不凡、白手起家的元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经营金属电镀生意，并成功积累了一小笔财富。他在 20 世纪 50 年代取得了成功，但不久之后，他的大部分财富都化为乌有。我的祖母是一个思想相当成熟的人，她的更大目标是让家族更上一层楼。她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来培养她的三个儿子取得成功，但最重要的是她的大儿子彼得-帕斯特里奇，也就是我的父亲，他从小就展现出了巨大的潜力。

霍滕斯-科汉相信，我的父亲是不可战胜的，而且天赋异禀。她鼓励他努力做到最好，他也积极响应。1955 年，16 岁的他被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录取，即使在布鲁克林雄心勃勃的犹太少年中也是罕见的。尽管我父亲

是犹太人，而且与古老的家族没有联系，但他还是努力证明自己是一个有能力的人，是一个有建树的美国白人。偶尔，他也会让自己成为文化和政治意义上的核心人物。他最初担任圣路易斯交响乐团的执行总监，后来担任旧金山交响乐团的首席执行官，成为交响乐管理领域的核心人物。他还博览群书，是一位出色的作家和高效的演说家，我小时候被他吓倒并不是因为他的言辞尖刻（虽然他也有这样的表达能力），而是因为我认为自己永远无法达到他那样的能力。

作为长子的长子，我自然是祖母关注的对象。我与父亲有着某些共同的重要性格特征，尤其是对自己的职业生涯、人际关系的建立和制度的构建有着系统规划的习惯。无论真假，祖母都认为我非同一般。祖母对我说话时严肃认真，言语中充满了对我可能取得的成就的期待。就好像我在执行一项任务，而她是我的领导者。她希望我广泛阅读，深入工作，成为世界的中心人物。我经常见不到她并不重要，因为我知道她对我充满信心。

我的祖母并不是唯一对我产生这种影响的人。我母亲的姐姐让娜-鲁夫（Jeanne Rouff）很早就鼓励我树立雄心壮志，努力工作，争取更多。让娜-鲁夫（Jeanne Rouff）成为了卢森堡第一位女律师、女法官和最

高法院法官，这是她在保守社会中与无数障碍进行的长期斗争的一部分。她还把我看作是我们这一代人中将来得与她类似成就的孩子，并明确地这样说过。珍妮姨妈有一个习惯，她会严肃地问我一些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问题，然后像对待法官或教授一样认真倾听我的回答。我想，她是想让我觉得，我有资格被认真对待，我有义务勤奋工作。多年来，珍妮姨妈的事业一直是我的楷模，让我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成功。

这两位女士给了我如何规划自身发展的具体提示，我从未回头。我申请耶鲁大学完全是按照自己的计划进行的，几乎没有得到家人和朋友的帮助，我的策略也是学习中文，然后是日语和韩语，以便在国际社会向东方倾斜时，在美国发挥关键作用。在律师事务所找到一个好职位或赚钱对我来说并不重要。我的重点是我的职位。即使作为一名年轻的大学生，我也在思考世界应该朝着什么方向发展，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计划，这些计划超出了政治家或外交官所花费的时间。

祖母对我的完全信任，以及父母在我年幼时对我的信任，造就了我不易动摇的自信。后来，我对美国的未来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并长期在没有任何强化或社会认可的情况下追求这些目标，因为我对自己的判断力非常自信。孤立和恐吓我的努力没有奏效。

死亡率

在我向你们讲述这个故事的整个过程中，我必须独自做出许多决定，其中一些决定非常冒险。这些决定对我的事业和安全都有风险。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我和我的家人受到的死亡威胁是真的，还是仅仅是骚扰，但这些威胁在当时看来是真实存在的。多年来，我一直生活在“我可能活不了多久”的恐惧之中。然而，多次的死亡威胁并没有让我放慢脚步。无论是与家人和朋友断绝联系，还是受到恐吓，都无法阻止我执行自己的计划。

事后看来，我很感谢那些痛苦的经历，因为它们让我变得更坚强、更有创造力。但我当时的行为也有些奇怪。随着威胁等级的飙升，我眼睁睁地看着同事和家人抛弃了我。但我却无动于衷。我并不特别害怕那些让我周围那些在繁荣稳定的美国长大的人感到恐惧的风险。

在 2000 年的美国社会中，有些东西让我与其他受过教育的中上层专业人士不同。我想，那就是我对自己的死亡有了深刻的认识。我在小学时就有点病态。我喜欢阅读关于死亡和毁灭的阴郁书籍，我沉浸在死亡之中。无论是大屠杀，还是德国在斯大林格勒的战役，我都把自己

埋在书里。

我自己的死亡是一个让我着迷的话题。这是有原因的。在我五岁的时候，有一天父母不由分说地带我去了医院。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次探望。在我母亲感觉到我的腹部有一个突出的肿块之后，我与专家进行了多次会面，最终接受了手术。我接受了一系列检查，包括痛苦的脊椎穿刺。这次就诊变成了过夜，然后是准备手术。我从来没有得到过解释。对五岁的我来说，这种经历是陌生的，手术的想法也是陌生的。

我的脊柱上有一个肿大的神经节，但结果显示没有癌变。我的父母被告知，癌症肿瘤的几率要高于良性肿瘤。

我在医院的五天假期有点模糊，但我意识到出了大问题。我对手术技术方面的理解很模糊，但我感觉到发生了非常重要的事情。时至今日，我仍然相信那次经历改变了我对世界的认知。

当时没有人知道，我脊柱上的神经节并不是问题的全部。我的右脑额叶上还有一个肿瘤。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但很可能是在同一时间。

几十年来，脑瘤一直没有发作，我也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直到 1995 年，31 岁的我在韩国留学时，才开始有了奇怪的经历。我在下午睡着后

会做一些生动的梦。这些梦很短暂，但许多梦似乎是我童年时代遥远的记忆，否则我就会完全忘记。做完这些梦后，我感到一阵奇怪的恶心。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梦境越来越多。我父亲把我介绍给一位专门研究梦的心理学家，她给了我一个精彩的解释。然而，她并没有暗示我的经历可能有神经方面的原因。

1999

年春天，在伊利诺伊大学任教的第二年，我去看医生做定期检查。就诊结束时，他问我是否还有其他问题需要讨论。我提到我偶尔会做一些奇怪的梦，他建议我第二天去做脑电图检查。结果显示我的脑电图不正常，于是他给我做了核磁共振检查。

扫描完成后，神经科医生把核磁共振成像图贴在显示屏上给我看，并非常肯定地宣布我的右颞叶上长了一个脑瘤。听到他的话，我感到有点头晕，不得不坐下来。在日本服用了一个学期的抗癫痫药物后，我于1999年8月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院接受了脑部手术。我的外科医生是一位年轻的韩裔美国医生，他师从著名的米切尔-伯杰（Mitchel Berger），我父亲与他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以便我能够得到最好的治疗。我的手术最终获得了成功，但在此之前，我深知手术可能会导致我死亡或

残废。由于手术很顺利，医生决定第二天就让我出院。虽然我有些失眠，但我的状态很好，第二年 9 月就开始在伊利诺伊大学任教了。生活似乎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我没有想到，我的这次死亡经历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但它确实改变了我。我的目的和目标开始转变。我并没有放弃野心，但金钱和地位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我更加关注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的角色。

由于脑瘤无法完全切除（它与我对协调至关重要的运动通路相邻），所以留下了一小块，提醒我自己的死亡。多年来，我的睡眠模式一直被打乱，偶尔全身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那种感觉就好像我在以一种全新的、相当陌生的方式感知世界。此外，我还失去了耐力。运动时耐力下降。

2011 年后，我发现自己的右脚偶尔会麻木，此后协调能力慢慢下降。医生告诉我，手术留下的疤痕组织已经变硬，开始影响我的协调能力。此后，协调能力继续缓慢下降。

我的健康状况促使我决定面对这个故事中描述的危险力量。我愿意一再将自己置于相当危险的境地，因为我已经决定，即使我被虐待、边缘化、羞辱甚至杀害也无所谓。我认为，在布什政府接手时，我愿意承担风险，这在学术界或一般从事国际关系的个人中是罕见的。

我在本文中描述的 与军方和情报界的

互动，并不是因为我特别想进入这一领域。相反，它们是整个受过教育的中上层美国人阶层的怪异失败的结果，他们甚至不愿意为了透明的治理而承担最低限度的风险。时至今日，我仍无法确定自己为何与同事们不同，但我一直怀疑自己的患病经历和深刻的死亡感是诱因。

还必须指出的是，部分复杂性癫痫发作本身可能有助于我在制定基于互联网的教育计划及其实施过程中采用不同寻常的推理方法。部分性复杂性癫痫发作会促使大脑中原本没有互动的部分之间产生互动，并可能导致意想不到的结论或推理。此外，这种发作还可能使人产生一种神秘的目的感或愿景感，这种感觉可能是鼓舞人心或令人信服的。我不想过分强调癫痫发作对我的项目的影响，但它们很可能是一个因素。

中国、日本和韩国古典文学研究

精通任何一种亚洲语言的美国人都很少，更不用说精通两种或两种以上亚洲语言的人了。虽然我认为自己远非母语，但在 2000 年春天

开始起草网络教学

提案时，我的中文、日文和韩文水平已经相当高了。其次，由于我对 18th

世纪文学的比较研究方法，我与中国、日本和韩国的重要学者关系密切。

当我开始介绍我的提案时，我能够向主要大学的学者发送电子邮件，在邮件中我用这三种语言描述了项目及其意义。这些邮件还包括对文化和当代政治的复杂讨论。由于我精通这三种语言，因此能够定制信息，这对我的项目推广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别人说我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日语和韩语时，我常常感到恼火。我觉得学习语言从来不是我的目标，而只是我从内部和整体上了解亚洲的一个

结果。从一开始，熟练掌握亚洲语言就是我战略的关键要素。

1979

年对我的人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年，因为我决定搬到旧金山与父亲同住。我认为那里的教育机会更适合我，特别是因为我父亲的经济状况更稳定。这意味着我有可能上一所更好的大学。在新家安顿下来后，我开始在洛厄尔高中学习。这所公立学校竞争非常激烈，他们在将学生送入常春藤大学

方面做得很好。我把我送进这所学校要归功于我的父亲。虽然在洛厄尔学习一门亚洲语言也是一种选择，但我当时还不太感兴趣。不过，我有很多熟悉亚洲文化的好友，因为我所在的高中有 70% 是亚裔美国人。亚洲文化对我的家庭来说是陌生的，但通过社交，我对它变得相当熟悉。这些经历意味着，这不仅仅是我后来才对异域文化产生的迷恋。

1983 年，我在耶鲁大学的第一个学期选修了法国文学课。我的父母都曾学习过法国文学，我在高中时也选修过法语预修课程。奇怪的是，耶鲁的这门课对我来说相当困难。不仅因为阅读量大，还因为我没有动力。如果我坚持学完这门课，我相信我最终会达到自己的目标。我想做一些与众不同的事情，但不知道做什么。

我决定放弃这门课程，于是在晚饭后开始翻阅课程目录中的所有课程。我仔细阅读了课程介绍，并列出了一些有趣的课程清单，最后我认为最吸引我的课程是“中国古典文学翻译”。这门课的主讲人是孙康一，她是一位非常热情的年轻教授，刚从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这是她在斯蒂芬-欧文（Stephen Owen）任教的第一个学期，欧文当时刚刚调到哈佛大学（后来成为我的导师）。孙教授鼓励我选修这门课，并鼓励我学习中文。她还抽出时间和我一起阅读各种中国古诗词，讨论中国哲学的细节。

学习中文让我感觉完全正确，就好像这是赋予我的使命。耶鲁大学为我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环境。中国文学专业的学生很少，教师们有时间和

我们在一起。我开始对自己的工作有一种使命感，仿佛自己将成为下一代亚洲问题专家，我经常去办公室与教授们见面，学习中文。

中文课程的负责人是一位杰出的女士，名叫陆慧文，她也花了很多很多时间来帮助我学习汉字和中文。她出身于 20 世纪 50 年代来到美国的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家庭，她一眼就看出我是一个有潜力的中文学者，所以她不放过我。很快，我就利用一切空闲时间自学了越来越多的中文词汇。

我使命感的转折点来自于我在暑假期间阅读的一本书，书名是《1587：雷-黄（Ray Huang）所著的《无足轻重的一年》（*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一书。这本书的作者选取了明朝一系列重要的知识分子，展示了他们为改革明朝臃肿的官僚机构所做的英勇努力是如何受挫并最终失败的。

那本书中的 1587 年这个日期在我脑海中停留了多年。Hwang 认为，叱咤风云的明朝的关键转折点是 1587 年，这一年明朝的制度开始瓦解。1987 年，我正准备从耶鲁大学毕业。不知何故，我感觉到在事物的表象之下，美国存在着与明朝同等规模的严重问题。读完这本书后，我开始看到表象之下的变化。

但我也对中国人印象深刻，他们对自己的文化和制度如此自信，却无视西方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鸦片战争之前的崛起，而鸦片战争让这个伟大的帝国蒙羞。我不知道这次是否会发生相反的情况，西方人会沉迷于中

国人提供的鸦片，而西方知识分子则不会努力认真地了解亚洲。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美国人必须精通中文，对中文了如指掌。

几年来，我一有空就痴迷于学习中文。通过与一位中国文学教授的交流，我考上了台湾国立大学，并夜以继日地自学中文。我从一开始就落后了。虽然一开始我的中文水平并不高，但我强迫自己把所有时间都花在中文上，避开美国人。我把字典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还尽可能多地阅读书籍和文章。到了年底，我已经达到了很流利的水平，并用中文写了几篇文章。

学习中文对我来说不是一种爱好。我觉得这是我的人生使命和道德责任。虽然我会成为一名亚洲文学教授，但我认为为国家服务是我的终极目标。

大四从台湾回到耶鲁后，我开始学习日语。当时，日本的经济正在起飞，我说服自己，我的角色不仅是中国问题专家，更是亚洲问题专家。日语与中文差别很大，日语课对我来说非常困难。在台湾，我学会了如何掌握语言，为了尽快掌握日语，我把自己逼到了极限。

1987年，我作为东亚语言文学专业仅有的四名学生之一从耶鲁大学毕业。暑假我去了米德尔伯里学院（Middlebury College），在那里我得以进入日语系三年级学习。我努力让自己进入大学间中心，这是一个由美国主要大学联合为日语专业学生开设的为期一年的语言课程。

我想留在日本，掌握日本的语言和文化，最终在平川广介教授的引荐下，成为东京大学比较文学系的一名研究生。我再次强迫自己只说日语、

只读日语，并把所有时间都花在与日本人打交道上，在 18 个月的时间里，我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经过一年多的学习，我最终被硕士课程录取，并完成了硕士课程和博士课程第一年的学习，包括一篇用日语撰写的硕士论文。

我决定回到美国，到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我在那里学习的大部分课程都是中国文学，尽管我也选修了日本文学课程。一路上，我遇到了许多从事韩国研究的优秀学生，我想我也应该努力学习韩语。我的导师斯蒂芬-欧文（Stephen Owen）同意了我的想法，并帮助我获得了去韩国学习一年的奖学金。在哈佛学习了一个学期的韩语后，我前往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学习一年。

我的论文最终是关于中国乡土叙事在日本和韩国的接受情况，我使用了这三种语言的许多资料。我觉得我必须学习这些语言，而且必须学好。问题不在于文学研究，而在于为地缘政治的下一个时代做好准备，届时亚洲对美国而言将变得至关重要。

然而，当我于 1998 年开始在伊利诺伊大学任教时，我立刻被那里缺乏讲亚洲语言的机会所震惊。事实上，我只是被当作资金不足的人文学科中的另一位地区专家。考虑到亚洲对全球经济的重要性，亚洲语言在一所重点大学中被视为边缘语言，这让我深感不妥。

后果

我的成长经历给了我自信，我的祖母和我的父母对我充满信心，再加上我自己的死亡意识，给了我一种独特的使命感和勇敢，这种使命感和勇敢将决定我的命运。专注于东亚语言的决定使我能够广泛地表达自己的愿景，这一点很少有美国人能做到。

同样重要的是，我毫不畏惧将自己的整个学术生涯，以及任何可能晋升哈佛大学的机会置于风险之上，提出了一项复杂的多国建议，既是为了国际研究合作，也是为了全球治理。我周围的资深教师坚持认为我应该担心终身教职问题，但这对我的行动影响不大。我以前的经历给了我信心，让我能够遵循自己的直觉。面对人身威胁，我甚至愿意继续努力。

第 1 章

远程学习计划和我付出的代价

2000 年 3 月，我在工作的伊利诺伊大学外语楼偶然看到了远程学习班的部分演示。当时我还是一名日本文学助理教授，刚到伊利诺伊大学两年，刚刚开始了解大学是如何运作的。这次演讲让我大吃一惊。在这里，我看到了远在伊利诺伊州农村的学生在伊利诺伊大学上课，并通过视频会议生动有效地向老师提问。

我只看了几分钟的课，但它在我脑海中停留了好几天。我越想越觉得这项新技术的利用率严重不足。毕竟，在迪凯特或东京对学生进行在线教学，在技术上并无太大区别。

在某种程度上，我之所以长时间考虑远程学习的潜力，是因为我想念亚洲。我在一所大学教授日本文学，但那里远离我深爱的亚洲，我周围的人很少对我关心的传统或当代韩国问题感兴趣。

我的系里有几位对亚洲很了解的朋友，但他们的领域不是我的，他们对我的 18th 世纪思想史研究或当代亚洲政治都不感兴趣。在亚洲待了那么久之后，我只想读中文、日文和韩文，并用这些语言与他人讨论我的工作。

这种利用视频会议将教师与学生或与其他教师远距离聚集在一起的方式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机会。我想，我可以利用伊利诺伊大学在技术方面令人难以置信的优势，与我在亚洲的朋友建立联系，开展亚洲语言的研讨会和课程，并创造一种完全新颖、令人兴奋的研究和教学方法。

这种在线教学方法的意義完全改变了我对工作和工作的看法。1998 年，我来到伊利诺伊大学，因为官僚主义的分歧，我未能如愿获得哈佛大学的工作。由于哈佛大学东亚研究系和比较文学系的工作重点不同，因此无法填补这两个系的联合任命。回到我成长的中西部很有意思，但我对伊利诺伊大学的感觉却相当矛盾。我认为伊利诺伊大学的亚洲研究专业并不强，我打算尽快转到更好的学校。但问题远不止于此。我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想当教授。我对古典文学的学术研究并不感兴趣，虽然我觉得教学有时很刺激，但大部分工作都很枯燥。

在韩国和日本，我的朋友们高度评价我是一个精通中文、日文和韩文的美国人。但在伊利诺伊大学，我只是伊利诺伊大学最贫穷、管理最不善的地方的一名文学教授。我想，如果我像父亲一样进入商界、政府或其他行

业，升任某个国际智库的负责人，我的能力就会得到认可，我就可以发挥我的能力。

但是，2000年4月，当在线教学的全部潜力在我的脑海中浮现时，我意识到，我正处于一场数十亿美元的教育革命的前沿，这场革命可能使我成为国际交流全新方式的世界领导者。突然之间，除了伊利诺伊大学，我再也不想去其他地方了。不仅如此，我还准备为这些计划熬夜工作，为利用视频会议和互联网教育将伊利诺伊大学打造成世界一流大学而奋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它能让我名利双收，让我的生活更加有趣。

视频会议和其他形式的研究与教学电子通信可能会让我与中国、日本和韩国最优秀的人才共事。伊利诺伊大学显然是远程教育（当时仅限于伊利诺伊州）和计算机科学与工程领域的佼佼者。如果我能利用视频会议在教育领域开展创新工作，或许还能在这一过程中成为一名管理者（当时我认为这可能更符合我的个性），那么伊利诺伊大学为我带来的职业发展潜力将超过哈佛大学，甚至超过学术界以外的其他大学。我对自己所从事工作的潜力深信不疑，对资深教师关于我应该专注于研究并获得终身教职的论点完全不感兴趣。或者更直白地说，伊利诺伊大学对我来说具有巨大的价值，但前提是这个项目能为我提供这样的潜力。如果我不能继续这个项目，我就不想在伊利诺伊大学待下去，甚至不想当教授。

我周围的学者或其他人很难理解这种观点。部分原因是，很少有人了解远程学习的潜在价值。但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我是一名学者，并致力于学术界的共同假设。那些试图劝阻我的人，无论是在伊利诺伊大学内部还是外部，都以为威胁我的终身职位，暗示我的院长或系主任会不高兴，就足以让我放弃这个项目。但是，为了确保自己能站在高等教育这股巨大浪潮的最前沿，我简直是不择手段。

我开始起草一份在全球范围内采用远程学习的建议书，这不仅是向学生提供教学内容的一种手段，也是让研究人员相互合作、团队教学、举办研讨会和开发项目的一种手段。我还设想了用于连接研究中心和实验室的复杂系统，这些系统可以分解任务，然后再将其整合起来。

我写的建议越多，对我提出的建议思考得越多，我就越强烈地感觉到，我偶然发现了一个无人掌握的概念，而这个概念将决定我的职业生涯。这些趋势与东亚的其他发展相重叠，也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使我从古典文学转向国际关系。我认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 2000 年春夏之交与朝鲜的广泛接触表明，该地区确实有可能发生深刻的变化，而我基于互联网的提案也可能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作用。

我全身心地投入到我的项目中，我花了很多时间起草和重新起草我的计划书，并把它展示给越来越多的各领域的教师同行。我的系主任或教研室主任对我所做工作的看法很有帮助，但并不重要。

我决定，最好的办法是建立一个联盟，在远程学习、在线研讨会和其他实验方面开展合作，以充分发挥基于互联网的研究和教育的潜力。我认为这将对教育产生积极影响，并将亚洲各国团结在一起。关于技术的积极影响，我认为自己过于乐观，没有意识到技术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不过，我认为，如果互联网通信是由教育工作者、非政府组织和学生推动的，那么很多事情本来是可以完成的，但由于我提出的想法完全是为了企业的利润而采用的，所以这些事情一直没有完成。

我的结论是，虽然伊利诺伊大学不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大学，但它在远程教育和计算机科学方面都有足够的优势，有理由提出与东亚最好的大学合作的建议。我猜想得没错，不管亚洲主要大学的一些学者怎么想，这项建议在这三个国家之间产生的引力足以吸引伊利诺伊大学加入进来。经过深思

熟虑，我决定把重点放在东京大学（我曾在那里获得硕士学位）、北京大学（我有几位好友在那里任教）和首尔国立大学（我曾在那里学习过一年）上。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我在工程学院已经有了几位好友。大约五个月前，由于对文理学院缺乏雄心壮志和令人窒息的官僚作风感到不满，我下定决心与工学院的教职员工接触。工程学院拥有大学预算的绝大部分和大多数著名的教师。

我浏览了工程学院所有系的主页，给那些我认为可能有兴趣与我合作的人写了简短的介绍邮件。我设法与大约 40 位兴趣相投的教师取得了联系，并与几位对亚洲有特殊兴趣的教师进行了面谈。最终，我向更多我认为可能对我的项目感兴趣的教师发送了说明，并收到了许多教师的热情回复。

在这些交流中，我开始拟定全球远程学习项目建议书的细节。我发现，我在工程学院遇到的教授们对探索我所提出的概念的热情要高得多，他们的见解帮助我确定了系统性远程学习方法的潜在价值。

我在与伊利诺伊大学的工程、法律、商业和其他学院的交流中所取得的进展，使我与文理学院的合作越来越令人沮丧。我的系主任和其他资深教师似乎对我提出的建议毫无兴趣。在早期阶段，问题与士气低落的东亚语言与文化系有关，该系最近失去了几位最优秀的教师。院长也施加了压力，他担心工程学院对文科的影响越来越大。

我与院长、副院长和系主任的关系都很好，只是偶尔也会有一些小矛盾，比如系主任想让我帮他教几门课，却不给我回报。

然而，当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的小组被指派处理我的案件时，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寻找所有这些微小的矛盾，并将其夸大，以试图诋毁我和我的家人。

让人觉得一切都因为我的粗暴而分崩离析。我当时完全没有想到，我的这些想法会带来如此大规模的冲突。

2000 年是克林顿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人们正在匆忙努力就朝鲜的核电项目达成某种协议。克林顿政府的几位高层人士对取得突破的可能性持积极态度，认为这将为他们留下一份与里根在与苏联打交道时一样的遗产。2000 年 10 月，麦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ine Albright）访问平壤，并认真讨论了克林顿在任期结束时访问朝鲜的问题，这些努力最终达到了高潮。

军方和情报部门最高层的严重反弹已经开始，并将蔓延到随后的混乱选举中。东亚紧张局势的解决可能意味着该地区将不再有武器市场，也不再需要美国的存在。不能让这种进展走得太远。这些集团（它们的数量并不少）已经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解决东亚的紧张局势。他们担心，解决朝鲜问题将导致削减军费的呼声，并终止他们最赚钱的项目，如导弹防御和价格过高的间谍卫星系统。他们缺乏想象力和意愿，无法为美国在该地区扮演任何其他角色。

事实上，当时已经有一系列机密指令，允许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和其他机构积极采取措施，防止任何可能导致这种突破的行动。

虽然我从未想过，但我很早就被智能贴上了标签。当然，“标签”既有积极的含义，也有消极的含义。我是少数几个精通中文、日文和韩文的美国人之一，在亚洲拥有广泛的关系网。过去，我还与驻首尔和东京的大使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一年前，我甚至还与耶鲁大学的同学李宇灿（Woo Chan Lee）讨论过国务院是否有适合我的职位。当然，这并不是我唯一感兴趣的职业。但是，当命令下来对我进行更仔细的观察时，已经有了大量的档案。幸运的是，我从一开始就没有被视为敌对分子，而是被视为有潜力的人，至少在指挥系统的较低层。

我以前并没有受到严密监视。但是，2000年4月我与伊利诺伊大学全校教师的讨论改变了这一状况。

伊利诺伊大学拥有工程学院、农学院、法学院、商学院、教育学院和音乐学院，在各个层面上都与全国各地紧密相连。当我与计算机科学的教授们交谈时，我就像是在向美国国会发言。我所宣传的想法激发了人们的热情，使我能够从大约15个不同的单位筹集到足够多的资金，用于我的亚洲之行。但是，我所接触到的那些感兴趣的教师们却与更多的人分享了这些想法。由于我是东亚研究中心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而该中心的成员来自整个校园，因此我在伊利诺伊大学应该如何对待亚洲的问题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军方高层首先担心的是，我关于远程教育和东亚和平的想法可能会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安全地位产生影响，并可能影响军费开支。我后来经常问自己，如果他们不想让我宣传我的想法，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或者干脆让我也去做别的事情。事实上，对于

由于官僚主义的原因，中央情报局指派给我的人不允许与我联系（尽管最后他们还是会这样做），而且该系统的设置是为了阻止而不是与人讲道理。

但是，以复杂的双向方式在国家间使用远程学习这一概念本身也令人担忧。这些担忧部分是合理的，因为它们源于对国界的打破将如何影响国家安全的担忧，但同时也是对美国受到外部影响的担忧。

此外，还有对利润的担忧。投资银行看到了关于我的活动的机密简报，可以看到技术和由此产生的远程学习系统可能对教育产生的巨大影响。他们希望确保这种技术的使用方式能够保证利润最大化。我的项目扬言要在不

收取任何费用的情况下，利用这种技术在教育领域开展创新活动，在教授而不是首席执行官的指导下，可能会带来一场教育革命。投资银行对这种模式深恶痛绝，当他们的分析师读到我的工作，他们决定我的计划将一事无成，这些想法将首先在私营部门推出。

2000年5月，当我把我的想法以有效和重点突出的建议书的形式汇集在一起时，所有这一切都有了结果。虽然我完全不了解我国最高层在做什么，但我已经确定了我将向东亚的三所大学提出我的建议。然后，我对建议书进行了定制，以解释如何使每所大学都成为真正的国际性大学；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我起草了在中国、日本和韩国具有说服力的定制提案，这些提案将迎合当地的关切和需求。

然后，我请人将建议书分别翻译成中文、日文和韩文，并反复推敲，确保建议书行之有效。在我看来，这种方法是取得成功的最佳途径，但我没有想到的是，我正在尝试一种前所未有的尝试。我利用自己的写作技巧、语言能力和人际网络来推动一个项目，这是任何大学校长或美国参议员都无法做到的。我能够让许多中国人、日本人和韩国人支持我的观点，即这些国家应该如何相互合作，以及如何与美国合作。作为一所重点大学的美国人，我的地位是这些国家中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

我的做法远远超出了我的级别。虽然我丝毫没有做违法的事，但对于政府、金融、法律和咨询等领域的实权人物来说，他们本应控制这一层面的政策，而我却犯下了最大的罪行：破坏指挥系统。

我的想法已经得到了东京、首尔和北京教授们的积极回应。我深信，尽管伊利诺伊大学不是最著名的大学，但它在工程学和远程教育方面的优势足以与中国、韩国和日本的一流大学达成交易。

我的朋友、电子工程系的凯文-金（Kevin Kim）教授把我介绍给了首尔国立大学研究生院的院长，通过无数次关于各种话题的电子邮件，我与他建立了友好的关系。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我认识了首尔国立大学韩国文学系的教授。

凯文-金还建议我与成均馆大学教授金泰东联系，他曾在金大中总统访问朝鲜参加首脑会谈时担任其高级顾问。我还与金泰东建立了友好的通信关系，他饶有兴趣地阅读了我的建议书。我在这些朝鲜人面前表现出色，部分原因是有一位美国教授能用朝鲜语详细地撰写文章，这实在是一件新鲜事，但也因为我对朝鲜政策和社会的细枝末节颇有了解。

我给金大中写信时似乎越界了。鉴于金大中总统即将于 2000 年 6 月 13 日访问朝鲜，东亚一体化的势头将不可阻挡，这种风险让华盛顿的当权者忧心忡忡。事情可能会失控。让一位能言善辩的美国学者来倡导东亚一体化，可能会在国内外暗示美国政策发生更大的转变，而这种转变尚未得到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批准。我被他们视为一种威胁，无论我有什么良好的愿望，无论我有什么合法权利，在那天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国家安全局和中央情报局成立了一个小组，与联邦调查局和其他组织协调，开展低层次的活动，破坏我的工作。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小组的性质及其任务发生了变化，但我们无法获得任何内部文件。起初，这一行动完全是隐形的，除了我发送的电子邮件从未收到，以及我寄给他人或他人寄给我的信件丢失之外，再无其他。

这些努力丝毫没有减缓我的进展，也没有减缓人们对东亚一体化日益增长的好感。2000 年 5 月，我采取了一项非常措施，即与大学行政部门的一些成员取得联系，并就他们应如何回应我的建议作出指示。由于一开始联系的人数很少，而且指示也不容易遵守，结果是好坏参半。至少，他们在

5 月或 6 月联系了我的院长、副院长，可能还有我的系主任。后来，他们又根据需要联系了其他人。

所有这些有趣的游戏导致了一种相当不寻常的情况：我从整个校园的各个部门获得了大量的旅行经费，但我却没有从自己的部门获得任何经费。这场旨在削弱我的项目的机密活动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我也完全没有意识到这只隐藏的手。他们的任务就是不择手段地阻止我。然而，由于军方有很多人并不认为我的尝试有什么不妥，因此采取的行动也很有限。直到今天，我也不明白什么是允许的，什么是不允许的。这似乎是一种相互矛盾的指令干扰模式。

但显然有很多人担心，我的努力正因为本质上是利他主义的，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而情报部门和咨询公司已经无法控制。

还应该指出的是，我的档案内容被大大扩充了。高素质的情报人员被派来花很多很多时间研究我。这是一个愚蠢的项目，但却使他们阅读了许多关于我的材料，并饶有兴趣地阅读了我用多种语言向世界各地许多人提出的复杂论点。如果说有什么结果的话，那就是我的地位得到了加强。我成功地将来自不同背景的人聚集在一起开展这个项目，很明显我具备了一定的政治技巧，而且我能够完全独立地撰写复杂的政策建议。我为自己的想法进行宣传的方式被认为是一种技能，受聘为我起草简介的心理学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该简介当时被广泛传播。

联邦调查局代表最初劝阻我的矛头直指文理学院院长杰西-德里亚和副院长查尔斯-斯图尔特。他们没有被允许透露为何采取如此僵硬的立场，大多数人认为这只是他们缺乏想象力，或者他们担心任何形式的远程学习会削弱他们相对于工程学院的权力。虽然这两个因素都存在，但他们的行动

实际上是被迫采取的，而且是通过机密咨询采取的，不过这个故事从未公开过。

但是，尽管我所在的系和我所在的学院对我的提议缺乏热情，我的提议却在整个校园里得到了压倒性的支持，而且在与我交流的东亚各大学中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这种趋势太大了，不是一个小小的干扰活动所能阻挡的。我开始前往首尔、北京和东京，与那里的高层人士讨论我的提案。提案不再只是我一个人的提案，我正朝着一个大的突破口前进。

在与伊利诺伊大学的多位支持者交谈之后，我于五月份向伊利诺伊大学教务长理查德-赫尔曼（Richard Herman）提交了一封信，并向校长詹姆斯-斯特鲁科尔（James Strukel）发送了一封类似的信。教务长赫尔曼已经对我之前写给他的关于该大学潜力的说明做出了积极回应（后来我才知道，我们的院长不喜欢我直接与教务长联系）。无论如何，教务长和校长都对我的建议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并写了一封非常积极的支持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迪莉娅院长的态度越来越消极。在某种程度上，我的院长的消极回应是一个领土问题。迪莉娅害怕与工程学院合作会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工程学院的预算要多得多。后来，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逐渐理解了迪莉娅的担忧，也对远程教育的滥用感到失望。

但迪莉娅一直都很支持我，甚至在我来到伊利诺伊大学时给了我一笔启动资金，而这并不是他必须给我的。因此，对提案的敌意似乎是其他因素造成的。德里亚早在4月份就收到了通知（可能来自联邦调查局），限制他帮助我开展项目的的能力，并禁止他透露指令的来源。到8月份，许多教职员工都收到了内部备忘录，限制他们与我的交流。我从其他人那里听说过这种完全非法的备忘录，因此感到非常困惑。这似乎完全是矫枉过正（因为我乐于与任何人合作，而发布备忘录则是公然违法）。给教职员工和管理人员的这些通知是私密的，但并不属于机密。

到 5 月底，我已经有了 2000 年 7 月前往汉城、北京和东京的具体计划，伊利诺伊大学的各个部门将为这次旅行提供支持。我的提议是要把伊利诺伊大学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这与伊利诺伊大学其他教师的想法大相径庭。这种关于大学潜力的理想主义更符合阿德莱-斯蒂芬森的时代。

在某些方面，当我把我的建议转发给汉城国立大学的几位好友时，我发现汉城国立大学的高层管理人员对我的建议更加热情。我写信给英语系的白仲中教授，他是韩国的一位重要知识分子，也是一位很有思想的人，我曾与他有过几次通信，他对我的想法很感兴趣。电气工程系的凯文-金（Kevin Kim）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成了我的挚友，他把我推荐给了时任研究生院院长的吴钟川（Woo Jongcheon）教授。巧合的是，当时的学术院长是韩国文学系的权教授，我在首尔国立大学的那一年和他也很熟。

研究生院院长 Woo 对我的提议相当感兴趣，他似乎对遇到一位对韩国感兴趣的美国学者感到相当有趣。他是一位科学家，我认为他从未见过一个美国人试图用韩语给他写详尽的电子邮件，并分享他对韩国文化及其命运的看法。一周之内，我们就成了亲密的通信者，尽管我们从未谋面。

吴院长非常认真地阅读了我的各种草稿，并对有机会参与这样一个项目感到非常兴奋。我与他交换了数百封电子邮件，试图论证为什么基于互联网的学习如此重要。

但后来我突然想到，要使这个项目取得成功，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各大学的校报上发表这个建议书，一个天真而又鼓舞人心的建议，即四所学校可以在基于互联网的教育和研究方面联合起来，形成紧密的联系，使亚洲团结起来。我与首尔国立大学的教师关系最密切，因此我从那里开始。

我没有向高层管理人员提出在校报上发表文章的想法。我以为他们会对这样的宣传过于谨慎。这似乎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可以就积极利用技术的潜力展开更广泛的讨论。我不知道美国国家安全局和其他组织已经在积极努力限制我的建议的影响。

于是，我给英国文学教授白中中写了一封信，他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深入参与民主运动的著名舆论领袖。我问他是否可以推荐我为首尔国立大学学生报撰写的文章的新版本。这篇文章多次提到了与朝鲜开展基于互联网的合作的可能性，这将使金大中当时提出的合作建议具体化。几天后，白教授给我回了一封邮件，是他发给研究生院院长吴钟川的。在这封电子邮件中，他全力支持所提议的文章。

看到这封信时，我觉得自己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白教授是韩国广受尊敬的知识分子，首尔大学很难拒绝这样一封信。此外，韩国国内的普遍情绪是与亚洲一体化，与朝鲜全面合作。我获得了一种新的自信心和使命感，这将促使我以新的热情完成剩下的任务。

我在首尔国立大学英国文学博士项目的好友 Yoo Hee Seok 帮助我将提案翻译成韩文。我们一起努力，使提案完全聚焦于韩国在东亚的作用，聚焦于首尔国立大学，这将会很有启发性。我认为提案相当有效。

首尔国立大学的修订提案讨论了东亚一体化的潜力，建议美国如何与日本、韩国和中国合作，形成一个相当于欧洲共同体的经济单位，并作为朝鲜半岛和平统一的平台。该建议还提出，远程学习可能是与朝鲜接触的第一步，因为它不需要任何人跨越非军事区，并解释了这种在线交流如何能够建立信任。锡拉丘兹大学马克斯韦尔学院将在与平壤金泽技术大学的合作项目中采纳这一建议，该项目自 2001 年起由斯图尔特-J-索顿教授领导。

我的下一步工作是向东京大学提出建议。我误以为东京大学是我的强项，因为我曾在那里学习过五年。高田康成教授恰好是我前女友小林佳子（东京大学英国文学教授）的导师，1999年我作为客座教授在东京大学从事研究工作时，他对我非常友好。他当时担任东京大学校长长谷茂彦的特别顾问，长谷茂彦是后结构主义批评的大师，也是驹场文学的学者。我与这些人都有联系，我的研究生一翻译完日文版的建议书，就给高田写了信。高田表示有兴趣，但表示他太忙，无暇处理此事。我把建议书寄给了我认识的其他教授，得到了许多教授的积极回复。

最后是关于北京大学的建议。我的同行们普遍认为，由于中国是一个较为封闭的社会，因此很难与北京大学合作开展这样一个项目。但我还是坚持到了最后，确保在其他三所大学得到大力支持后，才把中文版的计划书寄给了北京大学。

幸运的是，我的研究助理是一位非常能干的中国学生，名叫杜元成，他不仅出色地完成了翻译工作，还就如何与北京大学接洽向我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很快，我就写出了一份建议书，它很好地反映了我对远程学习和远程合作研究潜力的想法，同时也将这种教育创新与中国作为国际社会一员的新角色联系在了一起。

我把建议书寄给了时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的严绍棠教授。我与严教授相识多年，他是中国和日本文学方面的专家，他的研究领域与我的研究领域十分相似。他是一位严肃的学者，而不是政治人物，因此他对我的建议的评论用意非常单纯。他的答复使我深受鼓舞。

在伊利诺伊大学的另一位教授的介绍下，我认识了北京大学副校长、教育政策学教授闵维方，他的英语非常流利，被认为是教育政策领域的一位重要改革者。闵教授当时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闵教授立即回复了我的照

会，并建议我到北京后与他会面。他建议我与远程教育处处长侯建军联系。

我立即写信给侯教授，我们一见如故。事实上，那天之后我和侯教授一直保持着联系，并于 2005 年再次见面。开始通信时，我并不指望在北京大学取得任何突破，但对方的反应相当积极，表明他们有强烈的意愿向前迈进。毕竟，我只是希望我们能开一次视频会议。他们似乎已经准备好做一些更实质性的事情了。我很满足于从建议书的任何一小部分入手，因为这很容易发展成为一个可行的项目。

随着讨论规模的不断扩大，与其说是通过我自己的行动，不如说是通过我在亚洲所接触的那些人的行动，我意识到如果这次旅行处理不当，可能会引起美国政府的误解。为此，我打电话给时任华盛顿韩国事务处处长（后任驻越南大使）的戴维-谢尔，向他解释了我的建议的性质和背后的意图。他对细节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并要求我用电子邮件发送一份副本给他。我甚至问谢尔，我是否有可能访问朝鲜，讨论这一建议。鉴于金大中访问朝鲜后与朝鲜的交流日益开放，这似乎是一个绝佳的机会。谢尔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建议我回国后再详谈此事。他告诉我，他会做适当的介绍。我们再也不会联系了。

随着赴韩日期的临近，我想在校报《伊利诺伊日报》上发表我的建议。我的理由是，此举可能会激励其他大学的报纸也发表此类文章。

我给《伊利诺伊日报》打了电话，介绍了我们的项目和我访问亚洲的计划。记者是一位 23 岁左右的年轻人，他建议与其逐字逐句地发表我的建议，不如就建议和我的工作对我进行采访。我同意在 2000 年 7 月访问韩国、中国和日本的前一周接受采访。

然而，尽管我所在学校的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一个让伊利诺伊大学崭露头角的绝佳机会，但军工复合体的高层却在敲响警钟。当我兴高采烈地朝着以美国为中心、中国为辅的东亚一体化梦想前进时，我却在“腰带”内到处踩到（我看不见的）脚趾。最重要的是，我误以为美国国内对我的行动噤若寒蝉，只是缺乏兴趣。但是，美国国内正在酝酿一场巨大的政治冲突，到2000年8月，这场冲突将形成一场完美的风暴。孤立主义者和推销重型军事装备的公司无法忍受阿尔-戈尔当选总统，无法忍受克林顿继续推行旨在全球合作和摆脱军事现状的政策。到2000年夏天，有一大批军事派别决心确保戈尔永远不会当选总统。

从我2000年7月从国务院听到的消息来看，我的亚洲之行已经开始，而且在工作层面得到了真正的支持。此时，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一个小组（小组的具体组成似乎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已经在伊利诺伊大学安营扎寨，对我进行监视，而他们的行动命令确实与我的行动命令大相径庭。最重要的是，军工复合体内部的一个大派系对中美走向一体化感到极为紧张。与朝鲜关系正常化是他们不能容忍的一步，他们准备动用重兵来阻止这一步。

这些派别希望不惜一切代价保留美国在东亚安全政策中典型的“枢纽-辐条”结构。这就是说，美国必须与大韩民国和日本保持双边同盟关系，而这种关系并不是作为一个整体联系在一起的（与北约形成鲜明对比）。此外，美国不能将中国视为在安全问题上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这一理论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但战略思想家们却认为它是必不可少的，他们认为东亚最重要的问题是将日本和韩国留在美国的轨道上，同时保持它们之间的距离。这是一种典型的“分而治之”战略，再加上渲染来自朝鲜的直接威胁和来自中国的长期威胁，以此来维持亚洲的紧张局势，当然也是为了通过军售和军事部署来赚钱。现实主义者还认为，任何解决朝鲜问题的举措

都将导致美国在亚洲的角色终结，国内也会呼吁美国撤军。这一点是正确的。

从投资银行家和其他在华盛顿有实际影响力的企业界人士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唯一角色就是世界工厂，中国必须远离有影响力的位置。所有这些讨论都是在中国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背景下进行的。我的建议也非常令人不安，因为这些建议写得相当精致，给读者的印象是一个严肃的政策建议，但却暗示中国可以成为长期合作伙伴。这种讨论是不允许的。中国应始终处于不确定的地位，成为可能的对手，从而阻止人们从中国的角度看世界，削弱中国在谈判中的地位。

但并非五角大楼的所有人都同意这一公认的观点。有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专家，认为中国已经完成了进入国际社会的所有必要步骤，而且中国是比以色列、沙特阿拉伯或其他所谓盟友更可靠的伙伴。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看到大量证据表明，中国人真诚地希望与美国建立一个有意义的合作安全架构，他们甚至愿意接受所需的有些屈辱的条件。

然而，尽管军中有人认为此举合乎逻辑，但美国鹰派在右翼种族主义团体（恰好在我所在的伊利诺伊州相当活跃）的支持下，决心确保这种想法永远不会见光。

观察我的小组接到的命令是确保限制我的影响。由于这次行动是非法的，所以他们认为不会有任何人知道这件事。然而，随着我的项目开始起步，我也显示出自己能够熟练使用中文、日文和韩文，他们意识到低层次的干扰不足以阻止这个项目。东亚那些听说过我的提议的人都很兴奋，他们开始采取一些措施，这些措施超出了伊利诺伊大学联邦调查局小组的控制能力。他们决定采取更强硬的措施来控制我。

到 6 月中旬，提案的基本轮廓已经转交给三所大学的行政部门，并得到了相当积极的回应。根据我收到的答复，内部讨论似乎已经开始。但是，一个大问题依然存在：虽然我在伊利诺伊大学得到了广泛的支持，整个校园也为我的旅行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但我的院长和系主任却拒绝为我提供任何资金，不愿与我当面讨论这个计划，只是要求我推迟这次考察旅行。他们只说他们担心我的终身职位问题，这些话被我理解为公然的恐吓。

根据我后来目睹的情况，以及事后不同人士发表的非正式言论，我现在相信，迪莉娅院长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不得不积极劝阻我参与与这个项目有关的所有活动，并确保不会有任何结果。尽管我发表了大量的论文，而且我的资历毋庸置疑，但他还是被迫重复着这样一连串的话：作为一名即将获得终身教职的助理教授，我需要专注于我的研究。与此同时，他还不能透露联邦调查局曾向他下达机密指令，命令他采取此类行动。

当时我并不了解情况，我以为迪莉娅院长反对这个项目的最主要原因是他担心这会增加工程学院在校园里影响力，威胁到他在贫困而无权的文理学院的领地。

他的这种担心，以及他所在系的资深教师中存在的某种程度的自私自利甚至腐败现象，都是现实存在的，但这并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如果没有这些外部干扰，这个项目很容易就能推进下去。然而，回过头来看，我觉得自己当时也太天真了，没有认识到在线学习在大学内部的潜在破坏力，把反对意见简单地视为反动。我对在线学习和视频会议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可以通过这种媒介与世界各地的专家进行对话，并用多种语言讨论这个时代的关键问题。这种基于互联网的大学教育愿景是完全可能的，但永远不会实现。

我根本不知道将技术引入课堂会产生什么更大的影响。这不是为了让世界各地的教师互相切磋，设计出让不同背景的学生聚在一起进行深刻讨论的课堂。相反，远程学习将被用来降低教授的地位，让程序取代教师。随着远程教育的国际化，它的目的是在全球范围内推销品牌大学，削弱那些没有资金与之竞争的本地大学。如果我知道投资银行打算如何处理远程教育问题，我会更同情那些反对者。

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派来做我的沉默伙伴的那些人研究出了一种技艺，那就是寻找现有的紧张关系，并利用这些紧张关系作为掩盖他们行动的一种手段，从而使这一事件的后果似乎完全被控制在一个大学系内的一些不起眼的纠纷之中。令我惊讶的是，当时集团内的每个人都愿意相信这个荒唐的故事，并在之后的多年里一直坚持。甚至没有人愿意讨论这一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不当或违法之处，尽管它比其他许多涉及初级教员案件都要违法得多，而这些案件在媒体上也曾引起过广泛的争论。

当时，在我看来，前任系主任罗恩-托比（Ron Toby）和院长迪莉娅（Delia）之间过于密切的关系是托比和新任系主任杰瑞-帕卡德（Jerry Packard）对我的提议如此不灵活的主要原因。毕竟，我所要求的只是允许我用视频会议与亚洲的同事联系几次。但是，我再次认为，他们并没有愚蠢到以为只要不讨人喜欢就能让我闭嘴。相反，其他力量给了他们一个无法拒绝的提议。

当时，我认为这项提议非常重要，而院长的反对又如此不合理，因此我必须采取一个我确信迪莉娅院长不会喜欢的步骤。我觉得自己别无选择。我给教务长理查德-赫尔曼（Richard Herman）和校长詹姆斯-斯图科尔（James Stukel）写了信，描述了提案的内容。教务长赫尔曼甚至把信转给了迪莉娅院长，这无疑让他非常恼火。

最后，在负责国际关系的副教务长厄尔-凯洛格（Earl Kellogg）办公室安排了一次会议，讨论我的亚洲之行。双方似乎达成了妥协，教务长赫尔曼给了我一封信，他在信中说，LAS 将为我的旅行提供资金，但我今后应直接与 LAS 合作（可能不会与其他单位合作）。几个月前，我曾不遗余力地支持帕卡德竞选上任，他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教务长办公室的其他几位工作人员也在场做记录。

凯洛格以非常积极的态度谈到了我的建议，指出它 "已经成为许多讨论的话题"。他的态度非常外交化，避免发表意见，但给人的总体印象是，高层人士非常热情。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当时很多高层人士并不知道我的系主任、副院长和院长已经收到了有关他们行为的机密建议。

无论如何，凯洛格对我的部门主管帕卡德还是很体贴的。需要指出的是，当校长办公室打电话问我希望校长如何回复我描述提案的信时，我曾告诉秘书他根本不需要回复。但是，Strukel 校长不遗余力地写了一封非常支持我的信。这可能会让其他人产生误解，尤其是迪莉娅院长，她希望我会感到气馁、害怕和恐惧，然后回去继续写学术论文，这样大家就可以把这件事忘掉了。

Jerry Packard 随后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诚恳地表示，他担心一位非终身教职员工会从事他所要求的研究之外的项目。我觉得他的评论既虚伪又侮辱人。毕竟，我从未见过我所在系的任何资深教师对我的研究或出版物感兴趣。也根本不清楚这个项目会阻止我发表论文。事实上，我觉得这个项目可能是唯一能让我留在学术界的東西。

我回答帕卡德说："我不担心终身职位。"他回答说："我不太确定"。

那次交流是一个巨大的误会。我说 "我并不关心终身教职 "的意思是，我不在乎伊利诺伊大学是否给我终身教职。我会找到其他职业，在学术之外

发挥我的才能。但帕卡德却把我的话理解为一个助理教授花言巧语的自信表现。我怀疑他知道这番话有点勉强，完全不适合在会议上说。

凯洛格竭尽所能地做了修补工作，并建议说，虽然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但还没有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因此我应该独自去探索这种可能性，不需要得到学校的正式支持，但可以从我的院长那里得到一封平淡无奇的求职信。他还说，我一回来，我们就应该再见面。

他指出，文学院将为此次旅行提供少量费用，从而消除了最大的争议点：我将在没有本单位任何资助的情况下前往。离开办公室时，杰瑞-帕卡德走过来问我，在出发前是否有时间喝杯咖啡。

我告诉他我没有时间。我已经听够了他关于我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的说教。我已经厌烦了系主任把我当成他的手下，尽管学校明确规定我不是他的手下。

但此后多年，我一直在想，如果第二天我们一起喝咖啡，帕卡德会告诉我什么。他会不会只是重复了一连串关于终身教职审查和我缺乏经验的问题，或者他会不会暗示了更深刻的政治危机？我一直没有弄明白。

亚洲之行

在离开芝加哥前往首尔的前几天，我非常匆忙。没想到，在最后一刻，我收到了校报《伊利诺伊日报》的回复。根据在中国和韩国的大学报纸上发表我的建议的要求，我决定先在自己的学校试一试。我没有收到任何回复，于是我放弃了这件事。

但在我离开的前一天，一位年轻人给我打了电话，对我进行了采访。我试着向他介绍了这一概念，我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报纸会采访我，说明对我的支持程度越来越高。总体而言，《伊利诺伊日报》相当保守，不愿意为任何事情出头。采访进行得很顺利，我满怀信心地乘车前往机场。

我飞往汉城的航班于 2000 年 7 月 18 日起飞和降落。在金大中对平壤进行历史性访问一个月后，我抵达汉城国立大学校园。当我拜访我妻子的家人时（她没有和我一起旅行），我感受到了高度的兴奋和期待。有些人认为，真正的和解和统一之路已经不远了。鉴于我在日本和中国感受到的情况，我觉得这似乎也是可信的。

早上抵达仁川机场后，我乘车前往首尔国立大学，到达研究生院院长 Woo 教授的办公室时，会议已经迟到了大约 30 分钟。他还没到。我坐在椅子上，身边放着行李箱，很快就睡着了，因为我太累了。他很尴尬地把我叫醒。但我很快就恢复过来，开始向他解释我的求婚。事实上，我们之前已经交换了数百封电子邮件，他完全了解这个概念及其潜力。他向我解释说，首尔国立大学对这一概念非常感兴趣，他们已经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考虑进一步的行动。他告诉我，他们已经征求了校长的意见，并希望不久的将来试办几次视频会议研讨会。

随后，我去拜访了负责学术事务的副校长权杜焕，他是一位韩国文学教授，1995 年我在韩国留学时曾与他共事过。他告诉我，在经济和文化一体化的今天，我提出的建议对韩国非常有意义，他承诺将全力支持我的工作。虽然我们交谈的时间并不长，但我得到的印象是，首尔国立大学对该提案的共识比任何其他学校都要强烈。

我在首尔国立大学遇到的最后一位教师是艺术史教授 Park Nakkyu。早在 1995 年，我在首尔学习古典文学的一年里，大部分工作都是在他的办公

室完成的，此后我们还在多个项目上合作过。Park 和我详细讨论了当时视频会议在技术上的困难，但他也表示相信，只要做好充分准备，大部分困难都能克服。显然，在与我见面之前，他花了很多时间与同行讨论这个话题。谈话给我的印象是，首尔国立大学已经采用了这一概念，并与其他大学就如何进一步发展这一概念进行了讨论。

当我见到韩国文学系的 Chung Byungsool 教授时，他是我年龄相仿的好朋友，他表示，根据他所了解的情况，最高层已经就该提案达成了共识，该提案肯定会以某种形式推进。当我在岳母家收拾行李，准备飞往北京时，我感到信心十足。

我在北京大学教工宿舍预订了一个小房间，并准备了约 20 份中文版的建议书，准备在校园里散步时送给偶遇的人。当我坐上韩亚航空公司飞往首尔的飞机时，坐在我旁边的一位中年男子立即热情地与我攀谈起来。他告诉我，他是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的教授。他问我为什么来北京，我试着解释了一下。在这个过程中，我提到了我的提案，这让他非常着迷。由于清华大学是北京大学的主要竞争对手，而且拥有强大的技术专业，我之前就已经想过要向清华大学提交一份提案。我向他提起了我的建议，他顿时兴奋起来。他坚持要我立即为他起草一份清华大学的建议书，并告诉我他很乐意在第二天带我参观校园，与资深教师会面。

这对我来说有点太巧合了。我在飞机上碰巧坐到了一位技术专家的旁边，而这位技术专家正是要与我密切合作开展这个项目的中国顶尖技术大学的专家。就在那一刻，我意识到这个项目的规模开始变得越来越大，而我正受到相当严密的监视。不过，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种风险，而是激励我更加努力。

我在北京大学的实际会面略显有限。我见到了国际学术交流处的几位管理人员。他们考虑得相当周到，但显然不能就此事做出任何决定。我花了更

多时间与远程教育项目的侯教授交谈，他就我们可能采用的方法向我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问题。他确实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而且有兴趣与伊利诺伊大学合作。看得出来，他并不太在意伊利诺伊大学不是哈佛大学，而是对我们的远程教育技术很感兴趣。他没有像我后来在东京大学遇到的那样不屑一顾。

我没有见到闵副主席，他似乎认为在这个时候见我这样的人很不合适。或许对他来说，这次访问已经变得如此敏感。我也没能见到严绍棠教授，他是最亲近的人，从一开始就非常支持我。严教授是一位温文尔雅的学者，从事日本文学和中国文学的比较研究，我们曾多次见面。严教授给我写了一封电子邮件，这是我在北京时通过雅虎看到的，他在邮件中说，虽然他不确定学校可能会做出什么决定，但他个人同意我的国际合作提议，并将支持我。

一位中国教授，尤其是一位院长，写下这样一封信是极为罕见的，他在这样一个早期阶段就做出这样的承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后，我很后悔没有把那封邮件复制一份存档。但谁知道呢？我的许多邮件后来都奇怪地消失了，让我只能用有限的手段重现这次旅行的细节。不过，大多数来自日本的电子邮件都保存了下来。

7月22日，也就是冲绳名护八国集团峰会的第二天，我抵达东京。从真正意义上说，一切都在向我靠近。亚洲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性以及与中国的合作是媒体的中心话题，与最近的朝韩峰会相得益彰。日本报纸上充斥着关于八国集团峰会之后可能开展哪些合作的讨论。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尽管亚洲是八国集团首脑会议讨论的重点，但中国主席却没有受到邀请。这个决定让我觉得大错特错，与我在伊利诺伊大学观察到的欧洲中心主义态度如出一辙。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篇文章，一封与我的建议书配套的求职信的内容。

1999年，我刚到伊利诺伊大学任教不久，到东京大学学习了六个月，当时小馆一家为我们租了一个房间，我在他们家住了四天。当时只住了一年，所以我对他们家记忆犹新。我住在同一个房间。但根本没有时间放松。在冲绳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和其他新闻让我思绪万千，我在想我们该如何利用该地区前所未有的一体化水平，开始规划亚洲地缘政治的新未来。这个项目不再仅仅是关于远程学习和大学的转型，而是关于我们如何通过我们的活动为本地区创造新的潜力。

有关该项目的讨论比我预想的要顺利得多。大学角色的革命性概念与新技术可能带来的传播领域的深刻变革相结合，引起了许多人的想象。我花了几个小时在当地一家印刷厂的电脑上修改文本，试图创作出一部杰作。我读报纸，上网查资料，就互联网教育提案如何与亚洲下一阶段的一体化联系在一起以及日本如何发挥新的领导作用等问题进行了复杂的论证。我介绍了朝韩峰会、中国可能加入世贸组织以及技术对社会的影响。我还批评了七国集团（G7）将中国排除在外的做法，并建议日本需要更加认真地对待邻国。

随着我写得越来越详细，我的论点更多地是关于地缘政治，而不是教育，这种新方法也影响了我之后用中文和韩文写的东西。我在给教师和学生的一封信中，结合我的提案，阐述了我的论点，即日本如何在改变与美国关系的同时，与韩国和中国发展更密切的关系。建立一个由四个国家组成的、类似于欧洲共同体的共同体的愿景似乎是如此显而易见和令人信服，以至于这些信件和各种电子邮件简直就是自己写的。

一到日本，我就对自己的工作产生了强烈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并不局限于使用网络教学，也与伊利诺伊大学关系不大。我觉得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我得到了一个机会，我将竭尽全力使这个项目取得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把这个项目的成功视为积极推动亚洲一体化的一种手段，这将

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至于我的想法是否过于宏大，就留给读者自己去判断吧。

科德特家没有电脑。我在附近找到一家按小时出租电脑的中心，在那里花了很多时间处理我的信件、电子邮件和其他作品。我提出，日本有责任深化与东亚其他国家的关系。当时我天真地认为，东亚各国之间的问题是文化误解造成的。我没有想到，美国国内有一些势力正在积极地限制这些国家之间的合作。然而，在克林顿政府末期的那一刻，总的政策确实是支持一体化与合作的。

我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与伊利诺伊大学无关，我决心尽我所能，让这个项目在各个层面上为相关国家取得成功，让人类能够专注于更严重的气候变化、技术发展和其他新出现的问题。

我去计算机中心写了一封精心制作的求职信，附在建议书后面，信中我描述了这个项目的历史意义，并感叹日本在与东亚其他国家合作方面做得不够。当然，我当时天真地以为，没有人会使出浑身解数来压制这一努力。当时，这似乎与克林顿政府末期支持这种一体化的努力完全一致。我被周围的一切所鼓舞，不停地写作和修改，一写就是几个小时。

到达东京大学驹场校区后，我首先去见了系主任竹内信雄。我们就提案谈了一会儿，很明显，尽管他想支持我，但他对远程教育的细节一点也不感兴趣。他告诉我，他计划让我在第二年担任客座教授，但这件事一直没有实现。我还与我的朋友兼同学德森诚（Tokumori Makoto）谈了我的想法，然后我下定决心，要尽我所能推动这项提案，因为它现在在亚洲都得到了大量支持，更不用说在伊利诺伊大学了。

我有一份朴中奎教授给我的首尔国立大学教师名录。我复印了一份送给东京大学比较文学系。为了方便使用，我还把每个单位的名称翻译成了日

语。我希望两所大学之间的合作越简单越好。事实上，东京大学没有人对此感兴趣。不过，德森教授给了我一份东京大学的教师名录作为回报。我决定这次不再局限于东京大学的熟人。

我觉得我的建议非常新颖，我的信也非常有力（而日本不与中国接触的风险又如此之大），因此我决定将我的建议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全校约 200 名教授，或以印刷品的形式邮寄给他们。我知道，日本的一些管理者可能不喜欢我这样做，但我觉得，由于迄今为止得到了如此多的大力支持，我完全有权这样做。我还认为，如果东京大学的 200 名教授收到这样一份建议书，他们就会与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和商人交谈，就会有更多的人了解我的想法。这一点当然是对的，尽管我只是在很久以后才间接地了解到了一点影响的规模。

我又回到计算机中心，定制了致各位教授的信函，并详细介绍了他们感兴趣的领域。然后，我把信和建议书打印出来，拿到东京大学驹场校区附近的一家咖啡馆，坐在我喜欢的中国茶馆里，手写了教授们的姓名和地址。我坐在茶馆里，用手在信封上写下地址。把信和建议书塞进信里后，我就在校园里转悠，把信投进教授们的信箱，或者把一些信邮寄给在本乡校区有办公室的教授。

到最后，我认为我已经覆盖了可能对该主题感兴趣的广泛人群。我确信，许多人会放弃这项提案，但我也确信，这项提案会引起相当多的人的真正兴趣，他们可能会在今后的工作中发挥关键作用。

第三天结束时，我已筋疲力尽。我在东京品川站附近的格兰王子大饭店停了下来。格兰王子大饭店是一座高耸入云的建筑群，我从未去过。我在火车上看到它，就下定决心要去看看。我在下一个火车站停了车，然后走了过去。这种行为与我在东京大学读书时（1988-1992 年）在东京的生活方

式如出一辙。我会带着几本书和几份文件，在城市里四处游荡，在咖啡馆停下来，阅读和写作两三个小时，有时甚至到深夜。

那时我很喜欢逛豪华酒店，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这些酒店都远远超出了我的工资水平。如今，我倾向于将这些地方视为浪费和财富集中的代表，但在 2000 年，我还没有这样看待这个世界。

我乘电梯来到顶层，发现一个迷人的酒吧几乎空无一人，透过巨大的窗户，东京南部的美景尽收眼底。餐桌上有一项服务，可以听电子歌单上的任何歌曲。我坐在那里，用提供的耳机听着各种歌曲。不知为什么，我被 U2 乐队的《有没有你》这首歌打动了。我坐在那里喝着杜松子酒和奎宁水，听了大约 30 分钟。不知为何，这首歌捕捉到了我对日本的一些复杂情感。我想起日本曾是我生命中的中心（我曾想我会在那里度过我的整个职业生涯），同时也意识到，不知何故，我在日本并没有取得成功。我是一名日本文学教授，但与日本学术界的联系不再那么密切。虽然我的日语水平比大多数美国专家都要高，还用日语撰写了硕士论文，并与日本机构建立了如此密切的联系，但不知为何，我却与日本渐行渐远。

我还想起了在东京大学驹场校区与我的前女友小林佳子教授短暂的两分钟邂逅。我在赠送建议书时碰巧遇到了她。我递给她一份我的建议书，我们交谈了几句。我想起了六年前因为父母反对而戛然而止的那段感情。我还想起十年前我们在校园里散步时，担心谁会看到我们在一起，而现在根本没有人知道或在意。

那一刻，我想象着这次旅行可能标志着与日本建立更密切工作关系的开始。我收到了大约 50 封来自不同教职员工的熱情洋溢的电子邮件，想象着我们将在不久的将来举行视频会议。然而，尽管进行了几次令人兴奋的讨论，竹内教授也提出让我第二年以客座教授的身份访问日本，但在东京的最后一天，也就是冲绳 G7 会议结束后，我与日本的密切关系就结束

了。将近两年后我才回国，虽然 2003 年夏天我在那里待了两个月，但我再也不会在那里生活了。

第二天，我登机返回芝加哥。与我交谈过的人对我的巨大反响感到非常兴奋，虽然我没有被邀请参加高级晚宴，也没有被授予任何奖项，但似乎很明显我已经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可能已经开始认真重新考虑日本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关系。我觉得这是我职业生涯中的一次重大突破，将改变我的一切。我认为，在美国、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大学之间建立共享教学项目将成就我的职业生涯，并使我走上传统的成功之路。前者是对的，但对回报的期望却完全错了。我的生活将从此不同，这一点是肯定的，但回到美国后受到的欢迎却并不热烈。虽然我曾认为中国和日本将是这个项目中最难的部分，但事实证明，我自己的国家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困难得多。

重返伊利诺伊大学

我回到伊利诺伊大学后发生的一系列奇怪的事件从来没有得到过完整的解释，我的家人、朋友和同事中的大多数人甚至拒绝讨论这些事件。就我的直系亲属而言，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基本上没有人愿意与我讨论 2000 年 8 月至 2001 年 8 月发生的事件。

我并不妄想解释所发生的各种事件。我观察到的模式是相互矛盾的，这表明在各个层面上都有相当多的反反复复，形成了一种干扰模式。

例如，有情报人员被指派对我进行低级别的骚扰（电脑不工作、自动取款机出问题、汽车抛锚、我所在部门的文件丢失），但这些人中的许多人，无论他们做了什么，都对我的处境表示同情，在某些情况下，还试图在骚扰我的同时对我有所帮助。例如，有些骚扰行为是幽默性质的，有时会以垃圾邮件、我邮筒里的奇怪纸条以及陌生人似乎不合时宜的评论等形式，与我进行滑稽、调侃式的戏谑。甚至以信件的形式对我进行死亡威胁，甚至在我的钢笔侧面印上死亡威胁的字样，这些信件有时相当吓人，有时则是幽默的内部笑话，目的是让我觉得自己是团队中的一员。

我在与“秘密伙伴”的交往中观察到的这种分裂反映出联邦政府内部存在着深刻的裂痕，这种裂痕一直延伸到最高层，并导致了毫无意义的矛盾行动。

有大量证据表明，我长期受到这种骚扰，有时甚至令人心碎。但并非故事的每一个转折都很容易解释。即使是在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人日夜监视我的政治危机中（我也努力让他们觉得有趣，因为我知道要监视我无聊的生活一定很乏味），有些事情也只是伊利诺伊大学内部的官僚问题。与其他教员之间的一些问题实际上是基于性格差异，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从东京回来后，我与其他人的关系就再也不一样了。

香槟市的一切看起来都没有变化，但我不再只是一名日本文学助理教授。我是一个改变了亚洲以及相当一部分美国人思想的人物。我必须受到惩罚，与其说是因为我做错了什么，不如说是为了向所有人证明，教授这种小人物是不应该在政策制定中发挥作用的，如果他们自不量力，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虽然我的事迹没有人写出来，但却广为人知。

刚到香槟市，我就不得不全身心地投入到搬家的工作中，从我们的旧公寓搬到了一栋上世纪 20 年代的木质建筑里，这栋建筑离校园很近，位于绿

树成荫的林荫大道上。一楼公寓的木质装饰让我想起了我在华盛顿大学对面的帕克维尤长大的家。

搬家那天，我请我们专业的六名研究生帮我把租来的货车装上家具。我和我的研究生关系很好，但奇怪的是，第二天没有人回复我的电子邮件或电话（也许他们从来没有收到过）。我不得不一个人把所有的家具和书箱搬下三层楼，然后装上卡车。在搬家的最后阶段，一位中国留学生出现了，他帮了我大忙。这次搬家让我筋疲力尽。

很难想象联邦调查局特工会在那么早的时候就要求每个研究生不要帮我搬家，也很难想象我所在的系会这么做。但这件事太奇怪了，我必须说我当时相当困惑，而且我至今相信，有人采取了某种行动来阻止我的学生收到我的信息（后来又发生了多次）。

在新公寓安顿下来后，我开始给亚洲各大学的朋友写信，跟进我的提案。我收到了几位朋友深思熟虑的回复，但与我去亚洲之前相比，从亚洲寄给我的信件数量急剧下降。我怀疑中国的政治可能更敏感，但日本和韩国似乎很奇怪--好像人们没有收到我的信息，或者我没有收到他们的信息。

还有一些其他奇怪的事情，我也受到了低级别的骚扰。

我的电话没问题，但新公寓的长途电话服务在大约 10 天内无法使用，尽管我多次打电话，但似乎没有任何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一周后，服务恢复了，但没有任何解释。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也相当怀疑。

一开始，我只是觉得很神秘。似乎没有任何理由来打扰我。毕竟，我曾与国务院韩国事务处的戴维-希尔（David Shear）详细讨论过我的项目，它完全是光明正大的，而且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除了我的系主任和院长的

反对)。似乎如果有什么问题，人们就会来找我，告诉我该怎么做，或者不该怎么做。

但事情并非如此。五角大楼高层的派系指派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的人骚扰我，因为他们想确保这个项目失败，也因为他们想让其他人知道，任何尝试如此独立思想的人也会遭殃。但是，真正在校园里执行这次行动的人，并不是那些生我气的人。他们只是在做一项他们越来越觉得不道德、不合法的工作。

另一件事是小龙虾的失踪。我在新公寓前厅的桌子上摆了一个韩国著名陶艺家制作的碗。这个碗是 1997 年我们结婚时的礼物。我在鱼店买了一只蓝色的热带小龙虾放在碗里。小龙虾在碗里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我自己也非常高兴。两天后，小龙虾突然不见了。我再也没有在家里的任何地方找到过它，即使是一年后我们收拾东西搬走的时候。而且，它根本不可能从滑溜溜的瓷碗里爬出来。这件事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我渐渐相信，这也是我和沉默的伙伴们一起玩乐和游戏的一部分。

我与几位日本教授就提案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其中一些教授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我还了解到东京大学对我的想法优劣的争论。两周左右后，来自日本的电子邮件逐渐减少，我再也没有收到过来自日本的大量电子邮件。在很多情况下，即使是今天，我给认识的人发送的电子邮件也没有得到回复。但在 2000 年 8 月之前，我一直与日本学者就各种话题进行热烈讨论。

然后，我开始给我在伊利诺伊大学的几个朋友写信，介绍我的旅行。回信的数量有限，但我把这归因于大家都在放暑假。后来我对暑假是否能解释这种奇怪的现象产生了怀疑。不过，我还是找到了几个对我的提议仍然感兴趣的人。

当我给副教务长厄尔-凯洛格 (Earl Kellogg) 写信介绍我的成功之旅时, 他给了我非常积极的回应。他建议我们在八月底大家都回来后, 在校园里召开一次会议, 讨论下一步的工作。我还与另一位坚定的支持者--工程学院副院长布鲁斯-沃亚克进行了一系列交流, 我们约定在下周举行一次会议。

从一位支持我的教员的电子邮件往来中, 我了解到《伊利诺伊日报》(The Daily Illini) 于 2000 年 7 月 5 日发表了一篇关于我在亚洲期间东亚之行的奇怪文章。文章中关于我的部分非常正面, 但对我的系主任杰里-帕卡德 (Jerry Packard) 的采访却负面得令人吃惊。

"贝一明 将只与东亚各大学的管理人员交谈。他不是大学的正式代表", EALC 负责人 Jerry Packard 说。

"帕卡德说:"我们部门的人告诉他要冷静下来, 有条不紊地处理事情, 但他没有这么做。

EALC 没有为 贝一明 的旅行提供任何资金。学校代表说, 大学管理人员 "还没有决定是否同意 "贝一明的计划。贝一明说他已经联系了其他部门, 但 Packard 说他认为贝一明此行的费用主要是自掏腰包。

必要的技术已经基本到位, 但仍存在巨大的挑战。如果 贝一明 认为获得大学的支持很困难, 那么他在海外可能会面临更大的挑战。

"说到与繁文缛节打交道。帕卡德说:"你可能认为推动一件事很难, 但与中国相比, 这相对容易。"那里的繁文缛节要复杂得多。这是非常困难的, 尤其是当你是一个局外人的时候。

自从我进入伊利诺伊大学以来，杰瑞一直是我的好朋友。我当然可以理解他可能是迫于院长的压力。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在一次公开采访中如此不遗余力地对我的旅行进行负面评价似乎也很奇怪，而且可能会对他造成相当大的伤害。毕竟，我得到了全校十二个单位的支持，而且作为一名致力于改善学校的年轻教师，我也颇受欢迎。这似乎既不符合杰里的性格，也不真诚。在一个广受欢迎的项目上，他却要与一个在全校得到广泛支持的系里的年轻成员作对，这在政治上似乎根本无法理解。我现在相信，杰瑞是被迫以这种方式回应我的。

几天后，当我见到工程学院副院长布鲁斯-沃亚克（Bruce Vojak）时，他也对杰瑞公开发表这样的言论表示惊讶。当时我就断定，显然是校内（也许还有校外）存在着深刻的政治分歧，迫使他发表了这样的声明。但是，尽管我很了解迪莉娅院长的政治立场，但这似乎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有些事情说不通。无论如何，我减少了对此事的讨论，决定等到下一次教职工大会时再说。那个学期的教职工大会一直没有召开。

我与法学院院长办公室一位秘书的交往是我 2000 年 9 月的典型经历。我一回来就写信给她，告诉她我的成功。虽然她一直很积极地支持我的努力，但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几周后，当我在大厅里见到她时，她向我问了好，但却避开我，这显得非常奇怪。在我看来，双方并没有发生任何争吵或问题。

九月初，我收到了副院长查尔斯-斯图尔特（Charles Stewart）友好的电子邮件，邀请我去他的办公室讨论我的行程。我到达时，他和蔼可亲地向我打招呼，似乎还是老样子。然后，他递给我一封迪莉娅院长的信，信中对我的努力表示感谢，并告诉我，从那时起，所有与东亚的交流都将由院长办公室负责，我不再有任何责任，应将全部精力放在教学和研究上。

斯图尔特甚至没有试图向我解释这封信，只是说了一句：“从现在起，我们会处理好事情，我相信会有很多机会的”。

我没有心情去挑战斯图尔特，我一直很喜欢他，而且他从一开始就对这个项目充满热情。事实上，虽然他是一位极具政治头脑的副院长，但我从未想过这一切与他有关。

这封信让我觉得不可思议。我清楚地知道，作为一名助理教授，院长无权告诉我该做什么或不该做什么。无论院长喜欢与否，我都可以自由地主张我的想法。当然，他要对更大的项目协议负责，但在这里或那里教授一门基于互联网的课程，我可以不需要院长的任何帮助就能完成，而且伊利诺伊大学的其他单位也已经采纳了我的建议。

后来，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大学的理想与实际情况之间的差距有多大。

我很清楚，院长给我这封信是非常危险的。这无疑成功起诉他的理由，而且可能会让他丢掉饭碗。工程学院的哈里-希尔顿证实了这一观点。

我得出的结论是，迪莉娅院长是个政治白痴，校园里的其他人最终会让他清醒过来。事实上，虽然我相信他很想把这件事抛诸脑后，但这是不可能的。

八月底，我还收到了几封来自日本的重要邮件。第一封是东京大学英国文学教授佐藤弘明的来信，在我留学的最后一年，他一直是我的好朋友。我想，如果我留在日本，我们可能会变得非常亲密。就这样，我们经常通信。他从一开始就非常支持我的提议。他向我解释说，高田康成教授对我发出的建议东京大学新方向的电子邮件表示非常恼火。他解释说，高田教授和其他资深教授的主要问题是，东京大学是一所享有盛誉的学府，建议东京大学将首尔国立大学、北京大学和伊利诺伊大学作为合作伙伴是一种贬低。如果他们要做什么，那也是与哈佛大学或剑桥大学合作。

这封邮件表明，我的提案在大学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即使根本没有人联系我），既有大量的反对者，也有大量的支持者。除了这几封邮件，我不仅没有了解到更多有关讨论的信息，而且在过去的 18 年里，我的提案从未被任何一位日本教师提及。这简直就像从未发生过一样。因此，我无法提供在日本讨论的任何细节。

我坦率地承认，我给东京大学的 200 多位教授写信，提出我的建议，这是我的过失。但我就是那么热情，而且一开始得到的回应也相当积极。在我对亚洲之行的描述中，没有任何内容表明我不能这样做。事实上，由于我被派去讨论此事的方式并不明确，所以我的主张也没有明确的规则。如果有的话，我更担心的是，如果我不更加努力，伊利诺伊大学可能会被排除在未来的协议之外。

无论如何，我还是花时间写了一封详尽的信，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并承诺将尽最大努力，以有效的方式促进更密切的联系。我把信寄给了高田，还用电子邮件发送了副本。我没有收到他的回信，但我确信他收到了。2015 年，在韩国庆熙大学的一次活动中，我们有机会再次见面。我们进行了愉快的交谈，我答应会在东京见他。

我还听取了日本文学教授信广信治（Nobuhiro Shinji）的意见，我曾在 1991 年上过他的课。信广教授还敦促我就网络教育提案与高田教授联系。他并没有说我的做法有什么不对，而是强调我们需要理解高田作为管理者的敏感性。在这个时候，我怀疑田中是牺牲品。他没有充分的理由因为我的提议而对我发火，就像伊利诺伊大学的查尔斯-斯图尔特（Charles Stewart）一样，他一直是支持我的，因为他有能力支持我。问题是，那些想阻止这一加强交流进程的势力不想让人知道他们的身份，因此向某些教授施压，让他们背黑锅。

我收到了东京大学另一位专门研究日本历史的教授三谷浩（Mitani Hiroshi）的详细来信。三谷教授在信中详细介绍了我的建议，并讨论了植入可能涉及的官僚问题。我们讨论了与思想史有关的问题。他告诉我，他没有时间参与这个项目，但希望它能取得成功。

最后，我收到了东京大学伊藤健教授的一封长信。Ito Ken 是一位作曲家、指挥家和文化学者，同时还拥有扎实的物理学和计算机科学背景。伊藤是东京大学设立创新学术项目的核心人物，该项目与我的提案“信息研究跨学院倡议暨跨学科信息研究研究生院”同时启动。

我在为这次旅行做准备时就已经知道了这一倡议，并给所有相关教师写了一封信，表示愿意与他们合作。伊藤教授最感兴趣，他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

他的邮件告诉我，他已经听说了东京大学的高级官员和教授们对我的建议所展开的争论。他告诉我，他认为我的建议确实有价值，并将公开表示支持。

伊藤是一位非常善于思考的读者，他提出的每一个观点和建议都显示出相当的洞察力。我们就多个主题进行了长时间的电子邮件交流。他就我们应该如何前进提出了建议。

经过两周紧张的通信后，我再也没有收到他的来信。我不知道他是出于某种原因放弃了讨论，还是有一些邮件我一直没有收到。我本打算给他打电话，但其他事情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一直没有机会。

两年后，我得以短暂地前往东京，在秋叶原附近与伊藤教授共进午餐。我们谈论了历史、文学和音乐，他向我介绍了他的课程。他对我的项目只字

未提。事实上，自 2000 年 10 月以来，没有一个日本人向我或在公开场合提到过我的项目。

九月份，我还收到了一封奇怪的电子邮件，是首尔国立大学一位素未谋面的教授发来的。实际上，这封邮件并不是直接发给我的。相反，他邀请我参加首尔国立大学和北京大学之间举行的视频会议，并将我列为几个抄送人之一。我对这个机会感到非常兴奋，并立即给他回了信。但奇怪的是，教授在回复我的请求时说：“对不起。我不应该给你发这封邮件的”。

不用说，这简直太离奇了。这两所大学正在推进我提案中的想法，但却对我保密。在这中间，他们故意泄露给我，让我知道。我不知道该怎么理解这封邮件，但总觉得有些地方说不通。如果这个项目真的那么有价值，那么故意忽视它将是我所在大学的重大损失，而故意排挤我也是管理者的重大责任。但通过这次经历，我会明白，在足够高的级别上采取的某些行动基本上可以无限期地保密。

日本和韩国媒体也发表了许多关于互联网和教育的文章，这些文章直接提出了我最初的建议。这些文章直接提出了我最初的建议，即加强三所学校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基于互联网的学习计划。我没有保存所有的文章，但剪辑了其中几篇似乎最能反映我的建议的文章。

有几位教授坚决支持我，花了很多时间为我下一步该怎么做提出建议。正是因为他们的努力，我才暂缓了对深层阴谋论的思考，因为有一些教授会为我做出这样的努力，实在是太说不过去了。哈里-希尔顿（Harry Hilton）是一位航空工程学教授，他坚信大学是提出想法的空间。他还认为，我作为一名有能力、有想法的年轻教师，需要受到保护（实际上，这只是我关于改善伊利诺伊大学的一个想法，他完全了解我的努力）。

但奇怪的是，他从来没有带我去见过任何一位管理者，与他们商讨事情。他从来没有为我与这些大学中的任何一所安排过视频会议，也没有为我之后的任何事情找到哪怕一丁点的资金，尽管我在几天之内就为我的亚洲之行筹集到了资金。回想这段往事，我感觉希尔顿在某种程度上也意识到了这幅图画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在亚洲和伊利诺伊大学发生的整个过程让我深感困惑。我试着低调了几个星期，但即使这样也不那么容易做到，因为我的同事们故意不理我，而系里的秘书突然变得如此不友好。我还是觉得有必要为这种情况做点什么。我对大学的工作方式有足够的了解，知道我那薄弱的部门和懒惰的院长不可能在几个月的时间里针对我实施复杂的阴谋。肯定另有隐情。

九月初，我和妻子应邀参加同事拉尼亚-亨廷顿（Rania Huntington）家的晚宴。拉尼亚是我在哈佛大学的同学，我是系里最了解她的人。她的丈夫是一位印度裔美国人，名叫迪佩什-纳夫萨里亚（Dipesh Navsaria），有医学背景，我们经常和他们在社交场合见面。那天晚上，我们去他们那幢维多利亚式的破房子里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饭后，迪佩什开始和我聊起我和系主任之间的问题。但他并没有和我讨论为什么会这样的问题，也没有就我如何与系主任接触并解决问题提出任何建议，而是告诉我需要寻求心理帮助。

当然，我在寻求治疗师方面没有任何问题，而且我以前也这样做过。但这番话让我觉得非常奇怪，也非常不恰当。从任何地方都看不出我情绪低落，甚至过度愤怒。相反，他在完全不考虑实际情况的情况下，建议我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寻求治疗。这时，拉尼亚显得非常紧张，完全沉默不语。这次谈话非常奇怪，我无法用任何其他方式来解释迪佩什是在第三方的指导下对我说这番话的。这简直太不符合他的性格了。

第二天晚上 9 点左右，我去了另一位同事南希-阿贝尔曼（Nancy Abelman）的家。南希也曾就读于哈佛大学，被认为是我所在系的新晋教授，极受学生欢迎，也是一位高效的作家。她避而不谈我成功的亚洲之行突然导致我所在系的资深教师甚至不想见我的实际过程。她只是说，如果我愿意，可以请一位律师。这句话似乎是在回避问题。我想让她说的是，我们可以与其他教职员工讨论，确定问题所在。但没有人愿意寻找解决办法。

2000 年秋季是我停课的学期，因为我获得了高级研究中心的资助。此外，神经病学专家比尔-格林诺夫（Bill Greenough）是高级研究中心的主任，我们从一开始就相处得非常好。我打算用这个学期的时间来完成我的书稿，当然，也会尝试参加视频会议。我向伊利诺伊大学申请了该学期的资助。有几个人告诉我，如果我能在高级研究中心学习一个学期，就一定能得到资助。不用说，我没有得到任何资助。

不过，我有自己的办公室，远离系里。有一位诗人也在那里办公，我们有过许多愉快的交谈。但是，我的书稿几乎毫无进展，因为我所处的环境充满敌意，而且我不断受到压力，不得不对各种形式的骚扰做出回应。

2000 年 9 月中旬，父亲邀请我去旧金山看望他。当我到达他位于阿什伯里的家时，他对我说，他已经为我预约了去加州大学旧金山医学中心接受治疗师检查的时间。他说，考虑到我最近刚做了脑部手术，他建议我去做检查。我很高兴和父亲一起去见这位治疗师。

1999 年 7 月，我接受了右颞叶良性肿瘤手术。手术是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由著名的脑外科医生米切尔-伯杰（Mitchel Berger）完成的，早在 1998 年秋天，我父亲就不遗余力地与他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手术非常成功，第二天我就出院了。不过，手术并非没有副作用。之后的几个月里，

我的癫痫病一直轻微发作，为此我一直在服药。此外，在之后的几年里，我的体力一直很差。

我们到达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后，发生的事情让我有些吃惊。我们没有见到伯杰医生或任何神经科医生。他们没有问我脑部手术后的恢复情况。相反，我父亲为我预约了心理医生。我和他谈了大约 30 分钟。我向他讲述了我的生活、婚姻和职业生涯中的各种事件，他微笑着做了一些记录。然后，出于某种奇怪的原因，心理医生要求单独会见我的父亲。我没有反对。

直到很久以后，我才对这件事有了深入的思考。但有一个场景让我记忆犹新。在开车回家的路上，父亲突然对我说：“医生说，‘有时候人太聪明了，很难发现什么问题’”。当时，我对这句话一无所知。但这似乎暗示着医生曾对我父亲说过我患有某种精神疾病，尽管他并没有对我说过什么，我父亲也没有透露过谈话的任何内容。

2000 年 9 月，我的父亲 Peter 贝一明

与他的好友、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副校长 Zach Hall 谈起了我的病情。

我在高中时就认识扎克-

霍尔，还认识他的儿子和第二任妻子。扎克告诉我父亲，我的上司比尔-格林诺夫（Bill

Greenough）是扎克的好友，也是一位神经病学家，他认为我对我的部门主管的行为非常不理智，并认为我一定患有精神疾病，很可能是最近的脑部手术造成的。父亲并没有把这些信息告诉我，也没有倾听我的说法，而是对我隐瞒了这次谈话以及去看心理医生的全部原因。从那天起，他就开始了一场犯罪阴谋，我不知道他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没有意识到他的行为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影响。

后来，我父亲于 2001 年 1 月在旧金山的一次会议上见到了格林诺夫。格林诺夫对我的精神健康深表担忧，并表示他担心我会丢掉工作。这次会面让我父亲深受震动，他接着告诉许多家人和朋友我患有精神疾病。他对我也完全隐瞒了这次会面，没有告诉我他认为我患有精神疾病，更没有告诉我原因。

到 2001 年 2 月，许多家庭成员对我所说的一切都不屑一顾，因为我的家人都知道我患有精神疾病，这完全是格林诺夫告诉他的，而不是根据观察到的行为。

甚至在 2000 年 9 月，我父亲还认为我在伊利诺伊大学遇到的任何问题都是我的精神问题造成的。他没有就我应该怎么做提出任何建议，当然也从未给过我任何法律建议。我不知道我的全家人是在什么时候听说我患有精神疾病的，但我可以肯定地说，我的家人根本没有给过我任何关于我该怎么做建议。

家人对我态度的转变让我无法理解。从小到大，我都指望他们在实际问题给我建议。父亲喜欢侃大山，我们之间的大部分谈话都是关于他应该如何应对工作中的挑战。过去，他也经常给我提供这样的政治建议。这次的沉默让我震惊。我确实想到可能有人做了什么来影响他对我的看法，但我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因为这种行为是极其不道德和非法的，必然会被揭露出来。

九月底，伊利诺伊大学的环境让我感到非常沮丧，我想离开这里。校园里有几个朋友愿意和我一起喝杯咖啡，但基本上，我与所有人都隔绝了。我所在部门的所有成员都不回复我的邮件，也不在大厅里和我说话。他们都不想听我说发生了什么事，也不想给我建议我该怎么做。我最热情的支持者中有很多人现在都拒绝与我交谈。

就在这个时候，大约在 10 月 1 日，我给副院长 Charles Stewart 写了一封信，内容是关于我尚未收到的 LAS 支付的亚洲之行的费用。他给我回了一封简短的邮件，说他不记得有这样的协议，并问我是否有任何关于资助承诺的书面记录。我给他写了一封平淡的回信，建议我去其他地方寻找资助。

但我很生气。院长让我自己掏腰包付旅费。但我之所以向教务长要钱，是因为教务长在信中明确告诉我要向学院申请经费。否则，我可以很容易地筹集到足够的旅费，而不需要向学院要任何东西。

造成这种突然转变的原因似乎是，即使在我的副院长向我送达了一封信，告诉我这个项目将由学院接管之后，我仍然继续与人会面，并与校园里的其他人讨论互联网教学项目。但我很清楚，学院无权告诉教员该做什么或不该做什么。我对这种待遇很生气，但查尔斯-斯图尔特很可能完全知道自己没有权力，并听从了别人的命令。他一直非常支持我，没有理由对我做出这种行为。

我很生气，于是给全校的一群支持者写了邮件，解释我的旅行有多么成功，解释我得到了全校各单位的资助，却没有从自己的系和自己的学院得到一分钱。我最终发送了大约 100 封这样的邮件，效果很好。我从杰里-帕卡德（Jerry Packard）那里听说，他的邮箱里已经被敌意邮件淹没了。

我继续努力，但整个情况越来越不合理。我的院长根本没有那么大的权力，而我在整个校园里都有支持者。在正常情况下，我们会达成一些妥协，然后继续前进。然而，院长却不允许我做任何与我的项目有关的事情，即使我加大了对他的压力。我坚持不与校外任何人讨论这些事情，即使在校内也只与一小部分人讨论。解决方法很简单，但我的院长和系里却无能为力。我相信他们是受到了机密咨询，才不得不这样做的。

我在九月份收到了杰里-帕卡德（Jerry Packard）的一封电子邮件（发给了所有教职员工），邮件中说系里已经拒绝了所有新教职的申请。考虑到前任系主任罗恩-托比（Ron Toby）与院长的密切关系，这也是说不通的。似乎（我永远无法证明这一点）反对我的项目的原因是院长暗中威胁要削减我们系的经费。

在我收到帕卡德的那封电子邮件两天后，在我收到查尔斯-斯图尔特的便条五天后，我就此事给教务长厄尔-凯洛格写了一封邮件。我呼吁他，作为一个深谋远虑的人，找出一个解决方案。我坦率地写道，我的院长的这种行为看起来明显是一种报复。

厄尔-凯洛格的回答令我震惊。

他给我回了一封非常正式的电子邮件，在邮件中他说：“你提到的问题很敏感，只能向你的系主任或副院长提出”。语气和内容完全不符合我的性格。后来我才知道，这封信是教务长理查德-赫尔曼的顾问、律师蒂娜-冈萨雷斯写的。这封邮件的盲文副本也发给了我的杰瑞-帕卡德（Jerry Packard）和副院长查尔斯-斯图尔特（Charles Stewart）。实际上，这封信是想背着告诉我院长，我已经和教务长办公室谈过话了。后来，我将此事公之于众，而凯洛格也在12月承认，他曾盲目地发送过副本。

就在这时，我决定对德利亚院长绝不手软。他在担任院长期间犯下了多项腐败行为，而且他对我采取的一系列行动都是非法的，我认为，鉴于他极不受欢迎，学校必须采取行动。这是我对大学工作方式的一个相当天真的假设。

不管现实情况如何，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除了反击别无选择。这些腐败势力想尽一切办法孤立我，破坏我认为远远超出伊利诺伊大学的具有全球意义的项目。我无意放弃这个能成就我事业的项目。

我还感到校园里有很多人支持我。毕竟，整个校园都在宣布新的计划，以鼓励法学院与科学院之间的合作，鼓励青年教师为政策事务做出贡献，以及增加对东亚研究的投入。我怀疑这些对我想法的支持，如果不是对我的支持的话，大部分来自教务长，他与我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从一开始就明确支持我。也有可能是来自校外的其他力量，我并不认识他们，但他们对我的工作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我还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把人类学教授约翰-莱（John Lie）发给我的一封电子邮件转发给了大约 100 名教员，他在邮件中认为迪莉娅非常无能，显然会反对我的任何提议。约翰对我分享他认为是个人隐私的电子邮件相当生气。他说这是我们友谊的终结，尽管我们后来讨论了这件事，我后来也为这件事向约翰道了歉。大约十年后，当我在韩国时，我们有机会再次见面。

9 月底，我父亲即将去法国老家度假。我曾多次向他倾诉我的工作压力，虽然他没有提供任何建议或帮助，但他隐约有些担心我。他邀请我和妻子 Seung Eun 一起去法国看望他，我爽快地答应了，下周就出发了。在我做了这么多工作之后，我所在的部门却这样对待我，这对我来说是相当痛苦的。

在我们离开的前一天，我给杰里-帕卡德写了最后一封邮件，抄送了副主任大卫-古德曼，在邮件中我列出了部门对我所做的八件极不合法的事情，并要求他给我一个解释。到那时，这份行为清单已经相当具有破坏性了。我原以为，系里只会让我开几次愚蠢的视频会议，而不会将这些可能迫使院长辞职的信息公之于众。我完全错了。

我们第二天就去了法国。在去机场之前，我遇到了副主管大卫-古德曼（David Goodman）。他说：“我收到了你的电子邮件”，语气相当中性，

似乎他完全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没有兴趣与我发生争执。我告诉他我回来后会打电话给他。

法国之行并不轻松，但去法国总比上班好。父亲对我在在大学里发生的事情完全不感兴趣，这让我有些震惊。毕竟，我从小就喜欢听他侃大山，听他讲述如何处理交响乐团里那些难缠的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校长布雷顿-威尔伯（Brayton Wilbur）。父亲只能说，我应该放松，忘掉这一切。这完全不像我父亲的口气。

回到伊利诺伊大学后，我发现一切都没有改变。我的系主任没有回复我上一封邮件，我也根本收不到系里任何人的邮件。

我不再与任何人讨论此事，只有一个核心小组：我在工程学院的最大支持者哈里-希尔顿（Harry Hilton）、我在高级研究中心的导师比尔-格林诺夫（Bill Greenough）（以及他的助手入江真澄（Masumi Iriye，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入江昭的女儿）和监察员办公室主任杰奎琳-鲍曼（Jacqueline Bowman）。

杰奎琳是唯一一个对我的作品表现出浓厚兴趣并认真倾听我说话的人。她立刻意识到这幅画有很大的问题，并多次努力安排会面。其中一次与查尔斯-斯图尔特的会面取得了成功。她还四处打听，最终确定有一份内部备忘录已经发出，劝阻人们不要与我交流；这是一份明确的建议。虽然她无法为我获得一份副本，但这封信的存在已是公开的秘密。

杰奎琳的能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就我所关心的许多问题写信给了她。但很明显，她没有权力像比尔-格林诺夫那样，以相当于副教务长的身份来制定解决方案。

哈里-希尔顿 (Harry Hilton) 继续给我提供好的建议, 告诉我应该对不同的教职员工说些什么, 但是, 虽然他显然很重视我所倡导的东西, 但在第一个月之后, 他就不再试图安排会面了。形势看起来越来越严峻。

我与比尔-格林诺夫的关系更为复杂。当然, 当时我对他与我父亲之间的秘密交往一无所知。

从一开始, 我就和他相处得很好, 尽管他的性格有点刺儿头。我们就神经学和科学问题交换了许多电子邮件。我们讨论了我对互联网的看法, 以及它对教育的影响。比尔不遗余力地支持我, 但从不向我透露他打算如何处理我的案子。他从来没有说过他同意我的观点, 但我从他花在我的案子上面的时间可以看出, 他对我有相当的同情。他曾因其他教师不认可他的工作价值而被解雇。

我与格林诺夫的多次谈话开始感觉是在浪费时间。但后来我们有了突破, 我向他提到了我给厄尔-凯洛格发送的关于我工作的电子邮件 (告诉他我的院长的行为)。这件事之前一直瞒着他, 他似乎被冒犯了。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没过几个小时, 我就收到了厄尔-凯洛格的便条, 告知我那封奇怪邮件的盲文副本。

你可能会问自己, 格林诺夫怎么会对我的院长的所作所为如此愤怒, 因为他曾在什么都没告诉我的情况下与我父亲进行了一次极不道德的谈话。我不知道, 但我猜想, 伊利诺伊大学所有接受过关于我的机密咨询的人都试图与我保持正常的关系, 同时遵守某些突发事件的规则。结果是发生了一系列极其混乱的事件。

这就是我想要的一切。我立即给我记得曾向我抱怨过的部门的每个人写信, 为我不成熟的行为道歉。我告诉大家, 如果对这个项目感兴趣, 可以直接联系查尔斯-斯图尔特。

最后，比尔-格林诺夫从查尔斯-斯图尔特那里得到了一个相对积极的回应，内容是关于我今后工作的讨论。

查尔斯-斯图尔特（Charles Stewart）在 12 月份给我写了一封亲切的信，说他很乐意研究我们如何在下学期推广共享网络教学的提案。寒假前，我们一起喝了咖啡，就我们的工作进行了非常友好的交谈。我告诉他，我有兴趣在伊利诺伊大学从事行政工作，他似乎对我对学校如此浓厚的兴趣很感动。尽管查尔斯采取了种种令人不快的措施，但我从未对他产生过任何敌意。

上周，我还与杰里-帕卡德共进了午餐。他非常友好，似乎很乐意继续工作。我们讨论了我下学期的工作，他似乎很希望我回来。临别时，我向他提到我已经销毁了 9 月份写的那封信，信中列出了系里对我采取的八项非法行动。他淡淡地回答：“什么信？我顿时觉得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问题不在我所在的系，也不在教务长办公室。在此期间，美国瞬息万变。10 月，小布什的顾问卡尔-罗夫针对布什的竞争对手约翰-麦凯恩发起了一场运动，指责麦凯恩因战俘经历而精神失常。这场运动很可能与针对我的运动有关，声称我也患有精神病。

当乔治-W-布什周围的势力利用政治压力和武力威胁来阻止佛罗里达州的选举，并实质上发动了一场政变时，事情就变得扑朔迷离了。大量与布什家族和其他希望从布什接管中获益的派系有关联的军事和情报资产，利用他们的现金和体力，关闭了所有关于选举舞弊的严肃讨论。公司媒体宣布布什获胜。他们发出明确的威胁，迫使最高法院做出了不利于戈尔的荒谬裁决，并非法停止了重新计票。戈尔被迫离开欧洲六个月。

尽管人们拒绝明确表达自己的感受，但国家变得异常紧张。我周围的教授们都在装傻。没有人愿意承认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事情。

但是，增加授权情报部门在国内开展工作以压制反对派的做法却产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在布什政府建制混乱的情况下，军方和情报部门中反对布什接管的派系势力日益壮大。

一月份，我参加了我所在部门的第一次会议。一切都很顺利。当然，我并不完全放心，但我决定等一等再提我的提案。

我在系里并没有完全找到家的感觉，虽然我又有了两个学生助理来帮助我工作，但奇怪的是，他们什么也没做。我觉得还是有问题，就没有再让他们帮我做任何事情。我再次回到了这样的看法，即不知何故，问题比我所在的部门要大得多。

二月初的一个晚上，我收到了比尔-格林诺夫（Bill Greenough）发来的一封奇怪的信，暗示我出了问题。这封令人费解的邮件说：“你最近的邮件对你的案子没有帮助，你必须更加谨慎。”

格林诺夫没有详细说明。但我确信，我知道他指的是哪封电子邮件。我曾向我在东亚的大约十位朋友转发了我找到的文章链接，这些文章描述了佛罗里达州选举被关闭的非法方式，并解释了压制对这些非法行为的讨论的阴谋。这封邮件中包含的信息显然不应该传到亚洲。我认为，派给我的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小组已经汇报了这一事件，而格林诺夫也奉命阻止我。

我对这些背景一无所知。对我来说，似乎是在我完成了校方要求我做的所有事情，并撤销了针对我的各种非法行为的案件之后，比尔突然认为向我讲述政治是他的事情。

我告诉他，我认为他是多么没用，我没有说任何废话。我描述了他是如何浪费我的时间，并且没有兑现他的任何承诺。当天晚上，我给他发了一封后续邮件，告诉他我不想再从他那里得到任何帮助。他最后回了一封信，说“我正在尽我所能提供帮助”。显然，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整个过程让每个人都很疲惫。他甚至没有试着回复我其他的邮件，因为他显然明白自己行为的严重性（也比我更了解我处境的严重性）。

第二天早上，我见到了比尔，参加我们之前约好的一次会面。我们进行了友好的交谈，我没有提及前一天晚上的电子邮件交流。谈话结束时，他不经意地说：“有些决定是教务长可以做的。他拥有真正的权力”。

这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对教务长办公室非常了解，我知道教务长肯定没有这样的权力。比尔并不是在说教务长理查德-赫尔曼。他似乎暗指政治领域中更有权势的人物。他传达的信息是明确无误的：国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这次谈话之后，接下来的几天又有了几次奇怪的谈话。两天后，我见到了一位在教育学院工作的朋友，我们寒暄了几句。他看着我说：“看到你还在笑，我很惊讶。这句话暗示我的情况非常严重，我应该充满焦虑。”

在那一周的大学招待会上，我还遇到了法学院的一位好友菲利普-麦康纳（Phillip McConnaughay）。当他看到我时，立刻说：“这就是贝一明，一个有成千上万敌人的人。”这番话很奇怪。即使在我与院长的问题最严重的时候，也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实际发生的细节。我相信，他指的似乎是军方和情报部门的那些人，他们憎恨我在亚洲创造新的开放环境的努力，因为这种努力会把中国带进来，从而威胁到他们用于导弹防御和其他项目的预算。

这些谈话，再加上我几乎不认识的管理人员对我的敌意，让我相信伊利诺伊大学乃至美国的形势非常严峻，我应该低调地做好自己的工作。我的项目没有任何关键性的东西需要我站出来与世界对抗。我是主动倡导的。我会倡导法治，但我不会再提视频会议和教育。

其他教员所做的奇怪暗示似乎协调得太完美了。还有很多次，某些海报是为了让我看到而张贴的。有些是威胁，有些是鼓励。

我的邮件被偷看的情况越来越明显。指派给我的中情局/国安局小组变得越来越马虎。我认为他们是故意这样做的，在近距离观察我的遭遇如此之久之后，他们想表达某种同情。有几次，白天发生的事情显然与我前一天晚上写的邮件有关。

例如，当我给查尔斯-斯图尔特写了一封信，建议他阅读我的电子邮件时，第二天早上我就登录不上了。这种情况持续了大约 8 个小时。我还收到了一些奇怪的垃圾邮件。不过，虽然有些行为明显带有敌意，但指派给我的人似乎并没有敌意。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他们越来越爱玩了。我写给查尔斯-斯图尔特的信也越来越多地针对他们。我和他们一起玩耍，编造笑话，给自己发送本来是给他们的邮件。

致命的时刻来临了。我用中文写了一篇文章，描述了基于互联网的教育潜力，并提出了其对人类可能产生的积极影响的愿景。文章还提出了美国应该与中国、日本和韩国合作，在亚洲建立一个联合社区的观点。在朋友蒋洪生（北京大学学生）的帮助下，我得以于 2001 年 2 月 21 日在中文期刊《中华读书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是一篇布什政府有意掩盖的观点，而且不允许我向任何人透露。我的所有访问权限都被封锁了。但我还是设法用中文发表了这一观点，中方对此相当感兴趣。

这篇文章让我在军工联合体中的敌人看红了眼。但是，军方新上任的当权者和布什政府都沉醉于他们最近获得的权力，他们觉得可以对任何人为所

欲为。一个具有相当影响力的组织想通过 "意外"、"自杀 "或其他邪恶的手段杀死我。然而，分配给我的情报小组并不属于这一派，他们提出了一些真正的反击。然而，2001 年 2 月，反对新布什机器的政治力量越来越弱。

命令下来了，要摧毁我。骚扰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的电子邮件不断被打断。我从朋友那里收到的邮件中还夹杂着诡异的死亡威胁。

一群工人在我们的公寓前搭起梯子，开始修门。每次我经过时，他们都用威胁的眼神看着我，这表明他们的意图是恶意的。他们的目的是以周围人无法察觉的方式增加我的压力。在其他一些场合，我还会再见到那两个人。此后，在我一天的工作中，与他们和其他陌生人的敌意遭遇大大增加。

大约在 2 月 20 日晚上 9 点左右，我的房东突然来到我们的公寓。她强颜欢笑地问我公寓里是否一切正常。她以前从未来过我们家，她的到来让我感到非常奇怪。我不知道她的目的是什么。但随后我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细节。虽然她脸上的表情很平淡，而且很快就离开了，但她的手在颤抖，好像很害怕。短短的采访足以让我相信，我们正处于完全未知且极其危险的水域。我把与人的交流减少到最低限度，什么也不做。

我父亲原定于 2001 年 2 月 24 日来香槟看望我。他打算来看看我，他的妻子杰米 (Jamie) 随后也会来。我想他终于想明白了，如果他告诉所有人我患有精神病，他就应该努力亲自来见我。

我以为他的来访会是一个最终解决这个问题机会。我想象着，我们会想办法去森林深处散散步。然后，在远离所有人的地方，我会告诉他发生了什么。对我来说，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毕竟，在我的记忆中，父亲虽然有很多怪癖，但对我却十分关心。

这是不可能的。事实上，这永远不会发生。

多年以后，有三次我开始向父亲讲述我们在外面散步时发生的事情。他听了我说的话，但没有问任何问题，也没有做任何努力去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或者就需要做什么提出建议。也许他受到了机密警告，但无论如何，我和父亲的关系就这样结束了，从某些方面来说，这是整个冒险过程中最可怕的代价。

我去香槟机场接父亲，然后把他的行李放到我们的公寓。然后，我带他去我们家附近的一家意大利餐厅吃饭。我们吃完饭后，我努力开始聊起最近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我向他描述了最近发生的事情，他听得津津有味。然而，不到十分钟，叙述就中断了。

我提到了父亲的朋友扎克-霍尔。在父亲进城的前几天，我曾和扎克谈过我的工作，以及我对伊利诺伊大学的担忧。我只谈了一些官僚主义的问题，根本没有触及我更深层次的担忧。扎克听我讲述了我与系主任和副院长的谈话，以及他们是如何从允许我继续我的项目到突然拒绝让我做任何事情的。他没有对这个过程提出任何建议，也没有说系里可能在想什么，甚至没有说我可能误解了什么。谈话结束时，他淡淡地说：“我觉得你有点太激动了，在想象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我并没有提出任何复杂的阴谋论，只是坚持程序上的问题。扎克从我13岁起就认识我，他竟然如此轻易地就否定了我的说法，这让我有些震惊。我觉得他和我们部门的其他人基本上是同一条战线上的。

当时，我向父亲简单描述了那次谈话，并说：“经过最近与扎克-霍尔的谈话，我觉得我不能那么信任他。”

父亲的反应是公开的愤怒。他坚定而愤怒地告诉我，扎克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扎克绝不会对我做出任何不道德的行为。我对扎克表示如此不信任是不负责任的，他只是想帮助我。

父亲没有问我为什么失去对扎克的信任。他不想知道任何细节。

后来我才知道，在扎克突然决定飞往伊利诺伊大学见我本人的一周前，他曾去看望过我父亲。他们之间的那次会面对我保密，是父亲决定来的真正原因，如果不是几个月后父亲无意中提到那次会面，我根本不会知道这件事。

在那次会面中，也就是在我父亲决定来伊利诺伊州看我的一周前，我父亲在旧金山的一家酒店会见了比尔-格林诺夫和扎克-霍尔，比尔告诉我父亲，他对我的精神状态深感担忧，他认为我的行为极不正常，他担心我会被大学开除。

在餐厅与父亲进行了那次毫无结果的谈话之后，我感到自己被困住了。显然，他已经想好了问题所在。

当天晚上，我跟妻子说，我觉得如果事情继续这样发展下去，我可能会有很大的危险。她颇为好笑地看着我，不明白我为什么会有如此疯狂的想法。

几个小时后，当我再次提起这个话题并试图解释细节时，她表示非常恼火。“我怀孕了！”她惊呼道，“你为什么拿这些事情来烦我呢？”

孤立我的运动完全成功了。我被切断了与家人、朋友、妻子和同事的联系，完全孤立无援。我想到了伊利诺伊大学其他教授最近发来的电子邮件，其中的签名中暗藏死亡威胁，我得出结论，放弃的时候到了。

我别无选择，只能听从父亲、扎克-霍尔或院长的建议，哪怕这意味着被诊断为精神病、被大学开除或其他命运。我周围的人都不想支持我，甚至都不想讨论这个话题。一天结束时，我觉得我最亲密的朋友就是那些窃听我电话、阅读我邮件的聪明人。至少，他们在给我的隐晦信息中，死亡威胁和大力支持的承诺交替出现。

当晚临睡前，我又给查尔斯-斯图尔特写了几封邮件。

给查尔斯写信成了我给那些被派来监视我的人写信的方式。我在一封电子邮件中提到，虽然我认为小布什的上台是一项犯罪活动，但我们之间却有着奇特的联系。我解释说，我在校园里戴的红黑白学院围巾其实是达文波特学院的围巾。达文波特学院曾是最 "shoo"（耶鲁大学俚语，指富裕的本科生）的本科学院，由精英 WASP 家庭主导。但我的父亲，一位来自布鲁克林曼哈顿海滩的药剂师的犹太儿子，在 1955 年成功考入了耶鲁大学，他是通过新采用的抽签系统被分配到达文波特学院的，该抽签系统旨在确保大学系统的多样性。1983 年我进入耶鲁时，也被允许进入达文波特学院。

但有两个人也曾住在达文波特学院。参议员普雷斯科特-布什的儿子乔治-H-W-布什在我父亲之前就读于达文波特学院，而他的儿子乔治-W-布什在我父亲之后，也就是在我之前就读于达文波特学院。因此，我认为我的围巾有些讽刺意味。

最后，我对哈里-杜鲁门说了几句话，在我的冒险过程中，我对这个人有了很深的认同感。

后来，我开始怀疑我读过的大卫-麦卡洛（David McCullough）的传记的准确性，但在当时，哈里-杜鲁门对我来说似乎是一个坚守道德、不妥协的领袖典范。我在电子邮件的结尾写道，哈里-杜鲁门是 "一个身居最高职

位、进行最勇敢改革、致力于共同利益的人，但他是在各种人的帮助下崛起的”。最后一句话当然是为了说明杜鲁门是如何从机器政治起家的。但这也是在向那些被派去监视的人发出呼吁，希望他们能出手相助。这种呼吁在某种程度上是成功的。

关于杜鲁门的神话也很有效，尽管与历史不符。

我本以为，因为我的生命处于如此危险的境地，而且我周围的家人完全不了解我所面临的风险，所以我会失眠。然而，也许是因为疲惫，我没有费多大力气就睡着了。躺在床上，我试着想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完全不知道。

第二章

透过望远镜

第二天早上，当我醒来与妻子和父亲一起吃早餐时，他告诉我，当天早上他收到了比尔-格林诺夫（Bill Greenough）的一封电子邮件，建议我当天上午 11 点去香槟市的卡勒诊所（Carle Clinic）见一位治疗师。在我们前一天晚上的谈话之后，他突然收到了这封电子邮件，这对我父亲来说一点也不奇怪。我想他是认为我精神有问题，所以比尔提出这样的建议是完全自然的。我怀疑他知道整个过程都有猫腻，但他决定忽略令人不安的事实，而坚持让人放心的过程。这种心态在当时很普遍。

我和父亲一起去了卡莱诊所，我们填了一大堆表格，然后坐在神经心理学和心理科的候诊室里。大约二十分钟后，我们被叫了进去，见到了神经心理学家约瑟夫-阿尔珀博士（Dr. Joseph Alper）。在阿尔珀医生、我父亲和我之间进行的 30 分钟会谈是我经历过的最奇怪的会谈之一。

约瑟夫-阿尔珀身材矮小，留着光头，棕色头发蓬松，金丝眼镜后面有一双小而有力的眼睛。他的叙述风格相当幽默，言语中不断流露出讽刺和轻松的意味。他操着一口浓重的布鲁克林口音，这让他在中西部农村显得格外突出。

阿尔珀没有问我任何问题就开始了他的叙述。在整个过程中，他没有努力向我学习任何东西。相反，他是在以最富有同情心和最礼貌的方式为我制定法律。

他解释说：“你一直患有精神疾病，这是大脑执行功能失灵的结果。失灵的原因是你的脑瘤和 1999 年的手术。这种状态导致你的社会移情能力减弱，与他人合作或在组织中互动的能力受到挑战。”

学校非常关心你，希望你能得到适当的治疗，以便早日康复。这种赤字已经深深地影响了你与他人的关系，导致了巨大的误解。我们建议你休一个学期或一年的病假，立即生效”。

叙述的手段非常出色。阿尔珀的注意力集中在我父亲身上，而不是我。他偶尔也会朝我的方向看一眼，但他的眼神很幽默，好像在说：“这就是我们必须做的例行公事”。他向我发出的视觉信号是如此明目张胆，以至于我以为父亲会注意到。但是，我父亲似乎一点也没有因为神经心理学家的问诊而感到不安，他只是照本宣科，并没有向病人提出一个问题来确定问题出在哪里。但是，我的父亲已经进入了一种无法恢复的大规模精神错乱状态，他和当时许多其他受过教育的美国人一样，都进入了这种状态。

随后，我父亲和阿尔珀的话题转到了布鲁克林。由于两人是同乡，他们得以回忆起在布鲁克林的往事，特别是曼哈顿海滩和羊头湾。他们的关系非常融洽，当我们离开时，我父亲似乎对阿尔珀医生的印象非常好，对他的每一句话都非常信任。

这次面谈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地方。首先，我父亲被邀请和我一起参加初步心理评估，这是极不寻常的。整个过程就是一场让我父亲感觉自己很重要的表演，他完全上当了。根本没有涉及任何医学评估。

阿尔珀宣读了一张事先准备好的纸，上面列出了关于我与其他教师交往的道听途说和传言，但这些道听途说和传言并没有得到任何科学的证实。没有测试，没有提问，没有努力去确定发生了什么。结论是一切都源于我的精神疾病。

事实上，虽然我的精神疾病据说是肿瘤造成的，但在接下来三年的治疗中，我从未做过任何核磁共振成像，也没有做过任何其他标准检查。看来，相关医生故意忽略了所有有意义的治疗，以此向任何想知道真相的人表明，整个治疗从一开始就是一场骗局。

阿尔珀提到的“执行功能失灵”并非医学评估，而是对布什政府接管联邦政府后政治局势的描述。整个访谈似乎是一次相当幽默的交流，几乎就像

《周六夜现场》中的一个小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过程让我感到欣慰，至少还有一些人愿意谈论真正的问题，哪怕只是以一种间接和幽默的方式。显然，我身边有一些人在积极地保护我。

尽管在随后的 15 年里，我通过别人告诉我的信息，或者通过排除法，清楚了故事的许多其他部分，但约瑟夫-阿尔珀博士的身份仍然模糊不清。起初，我以为他是中情局聘用的专业心理学家，负责对人的评估，也许他是自去年以来一直在观察我的小组成员之一。毕竟，中情局雇用了很多人这样的人，我后来有机会见到了其中的几位。阿尔珀是来自布鲁克林的犹太人也是合情合理的，因为这种背景会让他更有能力评估我的行为和行动。这也会让他对我父亲更有说服力。

此外，有几次阿尔珀显然接触到了极其敏感的信息，而这些信息通常是不会给医生或没有极高权限的任何人的。我想，也许他是在我们会面的前一天被匆忙安排到那里的。我记得他说过一些话，暗示他完全知道我与第三方的电子邮件往来。他甚至还时不时地开一些玩笑，提到一些他不可能知道的事情。当然，也有可能不是阿尔珀，而是其他什么人在读我的邮件，然后向阿尔珀通报情况，但我无法确定。无论如何，我们谈话的过程涉及到一些可以想象到的最敏感的问题，而他都在场。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也没有任何权限，当谈话变得严肃时，也没有人要求我离开房间。

他还有一张名片，上面写着“心理学外交官”，这是他第一天给自己的名片，也是暗示他与政治有关的许多幽默细节之一。这些俏皮话可不是阿尔珀编出来的。我和那些观察我的人之间的笑话会持续很多年；我会画图，拍一些有隐含意义的图片，然后发给阿尔珀或其他人，作为评论。我不会低估我的文章和帖子的娱乐价值，它们让我保持清醒。

后来我在想，阿尔珀是否可能**实际上**是一名医生，可能是卡莱医院的医生，也可能是其他医院的医生，他在**没有任何正式准备**的情况下接受了这项工作，**并迎难而上**，完成了**这项复杂而艰巨**的工作。2012年，我访问了伊利诺伊大学，**并与**仍在那里工作的阿尔珀喝了一杯咖啡。如果他是中情局**临时派来的**官员，几年后肯定会想办法调走。

我曾于2012年访问香槟市两天，讨论伊利诺伊大学与韩国机构之间的科学合作。我与阿尔珀在北校区喝了一杯咖啡。他仍然对我的工作很感兴趣，**并对我的工作进展缓慢表示关切**。我们的关系最终变成了**亲密的友谊**，有时我不断地给他写邮件，但我们从未能非正式地见面（虽然我们有三**次见面喝咖啡.....嗯.....**这听起来很非正式，不是吗？）有时，他采取的行动很严厉，甚至有些残忍。但我总觉得他只是奉命行事，并不涉及个人恩怨。当我请他出去喝一杯时，他确实对我说过“我希望如此”。

在我的经历中，还有很多普通人因为**碰巧**与我有交集，而被临时放进了极其敏感的事务中。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这个团队似乎故意马虎**，乐于让大量人员参与高度敏感的行动。因此，阿尔珀是**碰巧**出现在那里的人并非不可能，但那将是一个巨大的巧合。

回到2001年2月我与阿尔珀的**会面**。出院时，我们在药房买了一些药。当时，我真的很想快一点吃药，因为在这种生死未卜的状态下，我感到越来越焦虑，不知道自己是生是死，**还是会被送进精神病院**。我感到越来越焦躁不安。

我一到药房就吃了药，然后承恩、父亲和杰米（我的继母也到了）开车送我回公寓。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我发现自己变得更加焦躁不安，甚至有些疑神疑鬼。一进家门，我就坐在桌边，给自己倒了一杯水。我立即吞下了两片药片。三分钟后，我有了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那感觉就好像我的大脑突然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不是一个缓慢的药物起效过程，而是我突然从

烦躁不安中解脱出来。我的头脑完全清醒了，没有一丝紧张或疑神疑鬼的感觉。

后来我得出的结论是，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下了药，然后又被注射了这种新药，以对抗药物的迷乱作用，从而让家人相信这种药有助于治疗我的精神疾病。

我问父亲发生了什么事，他解释了一下看医生的经过。我觉得也许一切都是我在做梦，我一直处于某种妄想状态。

我开始告诉家人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受到了监视，政府试图杀死我，美国在选举舞弊后发生了政变，我遇到了一位阿尔珀医生，他是政府派来处理我的人。

家人向我保证，这些都不是真的。我感觉好像卸下了肩上的重担。我的哥哥迈克尔当时正在伊利诺伊州的埃尔金，但要第二天才能到达，他恰好在这个时候给我打来了电话。我热情洋溢地告诉他，我告诉他的关于我在伊利诺伊大学遇到的所有问题都是一个巨大错觉的一部分，我很抱歉给他带来了这么多麻烦。

迈克尔有些困惑，因为很明显，有些事情已经发生了，我却说一切都是我想象出来的，这说不通啊。

谈话结束后，我有些困惑。我觉得故事中的某些部分一定是真的。我又问了父母一些关于当代政治的问题，才知道我记忆中的政治事件并非妄想，而是事实。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我的家人只是在极力否认美国的政治危机。我并没有从精神错乱中恢复过来，而是意识到我的假设基本上是准确的。查看我的电子邮件很快发现，整个故事都是准确的。我记忆中那些包含隐晦的死亡威胁和其他骚扰的电子邮件都在那里。

我从病痛中醒来的那一刻，是我被注射了让我变得焦躁不安和偏执的药物，然后又被注射了能对抗这些药物的药物的结果。这是一个创造出来的事件，其复杂程度令我印象深刻。但是，如果我的家人向我提出任何严肃的问题，整个故事就会变得支离破碎。但他们没有。我认为他们极度希望相信我患有精神病，因为他们不想面对美国现在被军事力量占领的这一迹象。对他们来说，相信我患有精神疾病的说法是坚持他们的妄想的必要条件，即使有证据表明这种说法毫无意义，他们也要坚持下去。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如果怀疑这个故事，他们就必须面对美国境内根本就是非法活动的现实，而这在心理上对他们来说简直是太过分了。

我与家人的关系也因此受到了永久性的破坏。虽然整个故事漏洞百出，但他们从未问过我一个问题的，以确定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确实对父亲和杰米说过一些话，表示这个故事更复杂，需要更多的解释，但他们似乎更愿意把我当成精神病患者，这样他们就不必问可能会导致真相的真正问题了。我当时觉得，而且我现在仍然觉得，如果我当时突然死于“自杀”或“吸毒过量”，我的家人也不会努力去查明真相。他们已经把我一笔勾销了，对弄清事情的真相不感兴趣。

第二天，我父亲被带去见高级管理人员，包括院长迪莉娅、教务长助理蒂娜-冈萨雷斯和其他高级官员。他们都告诉我父亲，他们是多么关心我，多么担心我。但事实上，自从问题出现以来，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见过我，而且除了我的副院长之外，我想和任何人讨论此事都遭到了阻挠。当时我并不以为然，但后来我才意识到，大多数人都收到了建议他们不要与我交往的机密通知。

有几次，我父亲表示他对整个故事有些怀疑，他似乎对别人的叙述不以为然。此外，在他见到迪安-德里亚之后，他回来告诉我，“迪安-德里亚是你最忠实的粉丝”。但当我提出我很乐意尽快见到他时，父亲说：“这可能不

是个好主意。"我看到了你在邮件里写的一些关于他的事"似乎在某种程度上，他不相信这些问题都是我想象出来的。他明白有些问题很严重。

但是，他并没有努力试图找出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想象的。事实上，他几乎完全没有认真尝试向我学习任何东西。

也有可能父亲从一开始就了解整个情况，只是为了帮助我才采取这些行动，但我并没有看到他有什么帮助我的计划。他似乎更高兴自己在我的生活中变得多么重要，而对我的状况毫无兴趣。

第二天，我哥哥迈克尔从埃尔金（地名很重要吗？有点深奥）来看我。那时，我已经厌倦了与父母谈论我的病情。我也意识到当时的风险极高，所以我决定避免与他进行任何严肃的谈话。更准确地说，我决定等到他问我问题。虽然他听到了关于我的各种自相矛盾的说法，但他在这一天里没有问我任何问题。我对这种完全不感兴趣的态度感到有些惊讶，同时也怀疑我哥哥并不完全相信这个荒唐的故事，而是决定在更深的层次上配合掩盖真相，因为他只是想避免了解真相带来的不便。

不过，有一次他问了一个真正的问题。我们坐在布西大道公寓前的楼梯上他说"告诉我发生了什么"我回答："你想知道什么？"他说："死亡威胁是真的吗？"我回答："是的"然后他说："我认为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 你应该去报警"

我没有回答。我想，当时我本可以大胆地回答，但我想，我说我受到死亡威胁，但却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这本身就说明情况非常严重，他会觉得有必要再问我这件事。

我完全错了。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迈克尔没有再问任何问题。他没有问我的精神状况如何，也没有问我那天或前后几天发生了什么。直到 2006

年，我坚持要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他才和我讨论故事的任何部分。迈克尔听了我的话，但他一直没有回应。后来我写了一封信，详细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他也没有回复。

第二天，我去卡莱诊所见阿尔珀医生，讨论我的进一步治疗问题。我一到那里，就看到了四年来我所遭受的低级骚扰的第一批例子，直到 2005 年 1 月（之后偶尔也有）。在我从停车场走下来的卡莱诊所的小路上，张贴着一些海报，上面写着自杀、儿童失踪、精神疾病等可怕的字眼，这些字眼清楚地写在显眼的地方，对我构成威胁。此外，还有一群穿着风衣的男子站在大厅的电梯前，他们明显是武装打扮，看起来气势汹汹。我试着对他们微笑，然后继续往前走。

但当我到达阿尔珀医生的办公室时，工作人员却非常友好。只等了十分钟，阿尔珀医生就来见我了，我们聊了很久。阿尔珀对我的健康状况丝毫不感兴趣。我曾希望他能关心我的健康，因为当时的压力已经让我身心俱疲，而偷偷给我服用的药物也让我心力交瘁。但我了解到，虽然有很多人支持我，但没有人能在这个案子上帮助我。

阿尔珀再次解释说，我有“执行功能”缺陷。然后，他和蔼地笑着向我解释说：“我们已经达成一致，你将在这些文件上签字，证明你患有精神疾病。你将休一年的病假，然后就可以回去恢复你的职业生涯了”。

我回答说：“我就不能说‘对不起’吗？”

他眼神闪烁地解释道：“说对不起对死刑没用。”

阿尔珀对当时的情况了如指掌，他的幽默感也让我非常欣赏。虽然我并不完全信任他，认为他会对我为所欲为，但我确实认为他极具洞察力，是一

个细心的倾听者，而且他显然很喜欢我这个人。此外，我还清楚地知道，他掌握着极高层次的信息。

他继续说："好吧，这就像佛罗里达州：事情有应该运作的方式，也有真正运作的方式。他指的是佛罗里达州重新计票工作被终止一事。

我又问他，是否有什么折中的办法可以让我避免签署一些证明我患有精神病的文件。

"你看，我想避免在我的记录中提及某种精神疾病"

"我不怪你！"他用幽默的语气说。

"你看，"他继续说，"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问题呢？"

"好吧，"我回答道 "如果我想竞选参议员呢？"

这句话显然引起了阿尔珀的注意。他饶有兴趣地看着我，问道："你是认真的吗？"

"嗯，不一定非得是参议员，但可以是类似的职位"。

"如果您接受了成功的治疗，而且您的档案中文件齐全，那么该记录根本不会造成任何问题"。

我回答说："好吧。那我就签你给我的任何文件。"

我们有一点时间讨论我的父亲，阿尔珀说他在与管理者会面时对我表现出了极大的关心。

然后我们握了握手。当我离开他的办公室时，阿尔珀说："你的围巾真漂亮。"

"这是耶鲁大学达文波特学院的一条围巾，我和我父亲之前都住在那里。乔治-W-布什和他的父亲也住在那里。

"他说："在这里，你很少看到这种东西。

他似乎已经知道了我给查尔斯-斯图尔特的全部邮件内容。

当时有一个难忘的时刻：下午，一架军用飞机以极低的高度直接飞过我们家的上空。虽然我不知道这有什么意义，但飞行路线非同寻常，而且显然是有意为之，这一点没有错。我认为这是一种支持的信号。

第二天，我母亲从加利福尼亚赶来看我。她听说我现在精神失常，就匆匆赶来了。我和母亲很亲近，因此，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让我深感痛苦。之前我已经在电话里试图暗示她，我的身体出了严重的问题，但她却对我的话置若罔闻。

在她抵达的第二天早上，我们进行了一些简单的交谈，然后出发去香槟市中心散步。一路上，我开始解释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些事情。尽管母亲非常担心我，但她并没有仔细听我说什么。我想，已经有好几个人告诉过她，根据当局的说法，我的精神疾病有多严重，因此，她对我说的话感到相当困惑。我想，她更容易对我说的话不屑一顾，因为承认这些话可能有一定的真实性，会让她的整个世界观大受打击。

但有一刻，她开始仔细倾听我所说的关于第一天我和父亲在一起时药房给我开的药的事情。突然，她问我："你的意思是说，你认为他们故意给你吃了让你生病的药？""他们得有多高的安全级别才能做到这一点？"我回答道。

她看起来很震惊，说她需要一点时间来透透气。她走到离我大约十米远的地方，然后回过头来，整理了一下思绪。我想，面对儿子可能患有精神疾

病的事实，她当时一定快哭了。在她心神不宁的状态下，她似乎没有想到我说的话可能有道理。她当然也没有想到，政府对美国人做这样的事情是否有先例可循。如果她调查过这个问题，就会知道这样的故事是完全可信的。

然后，我们一起驱车前往圣路易斯，大约三小时车程。我是在圣路易斯长大的，在我人生的这个危机时刻一起去圣路易斯是个奇怪的时刻。我们在左岸书店（Left Bank Books）停留，这是一家我从小就熟悉的书店，我们还参加了一位作家的朗诵会，我母亲非常喜欢她的小说。我很享受这次活动，终于开始放松下来。我们见到了左岸书店的店主巴里-利伯曼（Barry Lieberman），我对他的童年记忆犹新。后来我和他通过电话，他是唯一一个真正感谢我当时所做努力的人。我没有追问，但我觉得这似乎有点模棱两可。我不太确定他在感谢我什么，但考虑到在那之前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能得到任何感谢都让我感到欣慰。

那天晚上，我们回到酒店房间后，我拿出我的活页夹，找到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在《伊利诺伊日报》上，就在我从伊利诺伊大学休病假的当天。文章引用了中国总理朱镕基的话，他赞扬了一位因虚构的腐败指控而被不公平地解职的中国官员。这篇文章已经不在我手里了，但它似乎很有创意，而且明显是针对我的案件。这样的文章没有理由出现在《伊利诺伊日报》的头版。我把文章递给母亲看，说：“看看这篇文章吧。它会帮助你了解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她开始阅读。她似乎有些困惑。“我不明白。这只是一篇关于中国官僚的文章，”她说。“你看，这是在影射我是如何被大学不公平地开除的。”我解释道。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她突然站了起来，看上去深感不安。实际上，她已经通读了这篇奇怪的文章，并注意到它是多么不自然。她第一次想到，我所说的可能是真的。当时，她是我家唯一一个真正听我说话的人。

但她的反应并不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相反，她被一种非理性的恐惧所笼罩。我开始想，也许我连谈论这件事都是个错误。

她告诉我，我们必须烧掉所有文件，销毁所有档案。我对这个想法并没有表示出极大的热情，因为很明显，每个人对我行动的方方面面都了如指掌。在这一点上，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她太紧张了，以至于无法冷静地讨论这件事，谈话也就不欢而散。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出发驱车返回。开车的时候，我感到极度焦虑和紧张，过去几天发生的事情不断在我脑海中浮现。我太紧张了，不得不停了五分钟。

这一轮紧张似乎也是药物引起的。它让我母亲相信我有精神病，那天她不想再讨论这个话题。四天后，她打电话告诉我，她的一个朋友向她解释了某些人在压力下会如何被引导去想象精心设计的场景。她似乎认为这件趣事完全可以解释我的情况。

我的母亲和父亲受到了当时美国盛行的否认文化的影响。没有人愿意面对国家被军事政变接管的明确证据，他们无视任何可能迫使他们面对现实的证据。甚至在 18 年后的今天，美国人仍然害怕面对这一现实。

我也不同意母亲的解释。我看到我的影响已经结束，这次骚扰行动与其说是为了惩罚我，不如说是为了让其他人，包括派给我的特工知道，如果他们的行为出格，或者试图支持我，他们可能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

此外，我与当时被指派监视我的中情局小组成员之间的互动也很有意思。当然，还有很多我从未见过的人，那些读信和观察我的人。但我还是采取了多种措施，努力向他们表示感谢，并与他们发展关系，即使这种关系只能是单向的。

许多相关人员都不在伊利诺伊州。在起草邮件时，我考虑到了广泛的受众。我认为这是一种明确的政治行为，目的是吸引追随者。毕竟，我猜只有那些最高级别的人才会被指派给我。我应该把我的想法告诉他们。

有一些特定的人被指派到我家门外工作，我可以很容易地认出他们，而且他们也没有试图隐瞒发生了什么事。

首先，有一个被派来修理我们公寓楼大门的年轻人，在竞选活动最激烈的时候，他敌视地看了我一眼，还气势汹汹地冲我笑。这让我很困惑。后来，我向他做了自我介绍，并向他递上了我的名片。他似乎很感激我如此体贴，因为他被派来骚扰了我两个星期。那之后，我们又交谈过几次，我在香槟市散步时，也会在人群中随意看到他，而且频率很高。

后来，在我们家附近的公路上发生了一起汽车撞车事件。我们的车只受到轻微损坏。开车的是同一个人。整个事故看起来有点可疑，包括我们的车后面冒出的烟（可疑之处在于，这样的剐蹭会导致汽车冒烟，这看起来很奇怪）。这次事故是骚扰行动的一部分，但那时我已经和他很熟悉了，所以我感到很放心。

分配给我的另一个小组由两个柬埔寨人组成，他们要在三个星期内粉刷我们家的外墙。他们对我总是很和善，似乎对我有一些同情。每次路过时，我也会努力和他们说话。我家里有一尊小铜佛像，我决定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他们。我想我可以把它放在他们卡车的方向盘上，作为他们日后发现的

一个小惊喜。这是为了与监视我的小组其他成员在我家放置的各种幽默物品相提并论。

但当我试图打开卡车的门时，一声巨大的警报响起，他们向我跑来，看起来相当担心。我向他们解释了我正在做的事情，并把佛像交给了他们。他们对这份礼物很满意。不过，看来谁也不能对那辆卡车耍花招。

起初，我很享受整个冒险过程，但同时也对布什政府完全接管美国以及美国人对政变的漠不关心深感忧虑。通过晦涩难懂的类比，我和阿尔珀就政治局势开起了玩笑。我给他写了一系列明信片，上面写满了隐晦的说明。我最喜欢的明信片是一张印有 D. W. 格里菲斯的电影《不容忍》中巴比伦的场景的明信片，幽默地讽刺了美国的政治现状。

这种内部笑话最生动的例子可能是我给我的部门主管杰里-帕卡德（Jerry Packard）发的一封电子邮件，我在邮件中写道："我知道我们过去有过分歧，但我为我的所有行为道歉，并希望我们今后能够合作。毕竟，我们还有更大的事情要做"。

后来，我在与阿尔珀的谈话中提到了这封信，他表情神秘地看着我，一声不吭。他似乎读过那封邮件。随后，不仅在我和阿尔珀之间，而且在校园和其他地方，都流传着这样一个诨名："布什"听起来有点像"鱼"，而"我们有更大的鱼要炸"这句话就是指布什。

总之，报纸上、广告牌上，甚至我们信箱里的垃圾邮件中，到处都有关于炸鱼的介绍。场面相当热闹。第二天晚上，凯文-金（Kevin Kim）和他的家人带我们去一家餐馆吃饭，那里的特色菜是炸鱼。到了周末，炸鱼的笑话已经过时了。

这次活动之所以引人注目，有几个原因。虽然这只是我的系主任和阿尔珀之间的一个内部玩笑，但却有大量的人参与其中，到处散布消息，最后演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恶作剧，肯定有成千上万的人知道了。此外，布什政府实际上已经掌握了控制权，但这些大型团体似乎丝毫不害怕这种行动。我们似乎还可以合理地推断，有很多人知道我的案件，但并没有直接承认。

2001年1月至2004年12月期间，我所遭受的低强度骚扰，有时是高强度骚扰，其后也时有发生。首先，虽然有些官员奉命对我采取敌视态度，甚至偶尔表现出明显的威胁性，但似乎并没有人真正对我感到愤怒，而是被迫按照命令行事。他们认为自己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这些完全非法的命令。

整个过程的目的不是要吓唬我，也不是要改变我的行为，而是要让我周围的其他人以及更高层的指挥系统清楚地知道，我因为违反游戏规则而受到了惩罚。传达给我的信息是，你可以赚钱，可以升职，但你永远不可能对如何管理这个系统提出远见卓识。

总体而言，在此期间我与他人的交往极为有限。很少有人与我见面。我靠减少的工资生活，而且我们还要支付与我的精神病假治疗有关的大量医疗费用。在我休病假期间，尽管我曾试图与人联系可能的翻译、写作、咨询和其他工作，但除了正常工资外，我根本没有机会赚取任何收入。我妻子的社会交往也同样受到限制，这会给她带来巨大的压力。机密通知对我在美国的收入和活动范围的限制至今仍然有效。

许多人都被明确指示在与我交往时应如何对我，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在我被软禁并不断受到骚扰的过程中，几乎没有做任何努力来限制有多少人了解这一过程。威胁与幽默，甚至抒情相结合。被指派处理我事务的男男女女们从乏味的威胁中解脱出来，通过一些小手势表示对我的支持。知道伊

利诺伊大学这次行动的人即使不是更多，也有数百人。而在美国，知道这次行动的人则成千上万，甚至更多。时至今日，我真的不明白，既然违法规模如此之大，涉案人数如此之多，为什么这起案件没有公开曝光。

关于这次行动，我可以肯定几点。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恐吓我。上级确实下达了旨在吓唬我的命令，但下达命令的人与执行命令的人相距甚远，而且除了极少数例外，死亡威胁都是以死板甚至可笑的方式发出的。

很显然，对我所做的一切并不是为了惩罚我，也不是为了让我相信我的行为是错误的，而是为了给我周围的人一个明确的信息：一个知识分子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受到最恶劣形式的政治迫害，而每个人都会顺从它。

制定规则的人并不想回到正常状态，也不想忘记这一切曾经发生过。骚扰行为继续以如此公开的方式进行着，以至于让完全陌生的人都意识到发生了非常奇怪的事情。这似乎不是问题。有时，近乎陌生人也会被带入一些看似高度敏感、甚至是绝密的事件中，但这也不被视为问题。

同样明显的是，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内部有一大批人在处理我的问题，他们不仅同情我，而且把我看作是可以发挥领导作用的人。我处于图腾柱的最底层，没有行动自由，但他们几乎从一开始就在向我寻求下一步行动的想法。他们向我传达的许多信息，为我在校园里行走时设置的场景，都显示出对细节的关爱，以及在不同象征层面与我沟通的努力。

也许最初传达给我的信息是让我灰心丧气，让我觉得我时刻面临着被杀的威胁，让我觉得我没有任何希望，但我对我实际看到的东西并没有这种感觉。有时，我反而受到鼓舞。这种自相矛盾的行动结构至今仍是我心中的一个谜。这是一种干扰模式，还是别的什么？不过，显而易见的是，恐吓过程的目的并不在于阻止我。如果说有什么的话，那就是鼓励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胆地发言。

我间接听说，当时还有其他几起类似的案件，但我从未证实过这一事实。不过，我觉得，就所采取的行动的极端性和所涉及的利害关系而言，没有其他案件可以与我的案件相提并论。我个人认为，在这一过程中，我精通中文、日文和韩文的事实与我的写作爱好关系不大。我从根本上恢复了自己的写作技巧，这要追溯到我在洛厄尔高中担任《万象》诗刊编辑的时候。我喜欢讽刺性的戏谑，并为写出精辟的时事摘要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从 2001 年 1 月到 2004 年 11 月左右，媒体上不断出现一连串的内部笑话、间接提及，有时还暗示我个人生活中一些相当隐晦的方面。最常见的地方是《伊利诺伊日报》，但《香槟新闻公报》和《纽约时报》也有暗示，在我看来，有时是相当明显的暗示，无论是文章中的奇特句式，还是广告和其他地方的主题。汤姆-明日的专栏“现代世界”也经常明确提到我的案件。同样，《伊利诺伊日报》上的每日财富也经常提及我的私生活。整个行动肯定非常庞大，不可能保密。这不是他们的本意。

有一次，我经常在纸上涂鸦的一个卷曲涂鸦突然成为塔吉特公司商业设计和整个广告领域的流行主题。但也有其他这样的例子，我做的东西被融入了高知名度的商业艺术中，但却无法将其与我联系起来。我想，也许是我太自恋了，到处都能看到自己的影子。但当 2004 年 12 月我被伊利诺伊大学开除后，这种乐趣和游戏就永远结束了。这种隐藏的信息完全消失了。

起初，我收集各种剪报。但材料太多，我放弃了。许多关于我所受政治迫害的内容都是以叙述中国学者受政府惩罚的形式表达的。这是一种可爱的暗示方式，但由于秘密法律禁止公开承认这一机密行动，因此无法公开讨论。这也有点令人作呕。电影《美丽心灵》明确提到了整个过程。

有时我觉得这一定是我的想象力过于活跃了。但现在，十五年过去了，这些信息似乎已经非常直截了当，而且这个过程基本上在 2004 年 11 月就停止了，在那之后，我就很少看到符合这种描述的信息了。

无论如何，我获得了与许多人进行广泛对话的难得机会，其中许多人非常支持我，也有一些人极为敌视我。我觉得我写的每封邮件都是针对广大可能的支持者的，但我也意识到，不同情我的人也会读到我写的东西。

有时，我收到非常明确的信息和指示，建议我应该做什么，或者我做错了什么；有时，这些信息模棱两可，或者含沙射影。许多信息相当巧妙，表明有人费了很大的劲才编出这些线索。还有一些小谜题是通过电子邮件中的奇怪短语、阿尔珀博士的评论或其他留在我信箱里的奇怪笔记呈现出来的，我一直都没有弄明白。

阿尔珀告诉我，我必须在三月份搬出我在伊利诺伊大学的办公室，并停止与教师和研究生的一切交往。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我已经停止了大部分交往。他告诉我，这是我治疗精神疾病的一部分，与同事交谈可能会引起人际关系问题。这个命令毫无意义，但我还是照办了。此外，我也没有什么兴趣和他们交谈。一个下午，我就把办公室里所有的书都搬了出来，存放在我们公寓的地下室里。我的系主任并没有接到我腾出办公室的通知，一周后他给我写了一封邮件，对我带走所有东西表示震惊。

有趣的是，在我休病假的 16 个月里，我所在的部门从未使用过我的办公室，我的命运如何也无法预料。我认为这是一种声援和支持行动，尽管他们不允许与我当面交谈。我对他们对待我的方式感到沮丧，甚至愤怒，但同时我也不得不承认，我并不了解事情的全部。

虽然有很多有趣的戏谑，但压力也是相当大的。现在回想起来，似乎一切都很好，但在当时，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自杀”，会不会被送进

福利院，会不会长期失业，会不会被迫接受公共援助，或者其他什么。我孤独地度过了许多时光，没有真正的朋友可以与我谈论最严重的问题。很多人跟我说话都很紧张。

鉴于骚扰的强度很低，从非常含蓄的评论到相当可怕的说明，至少可以说集中注意力是很困难的。与此同时，我可以有效地集中精力讨论某些令我印象深刻的重要话题。有一段时间我可以阅读。我读了几本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书，一本休伊-朗（Huey Long）的传记（这对我理解政治魅力的重要性大有帮助），维克多-弗兰克尔（Viktor Frankl）的《人对意义的探索》（在我母亲的推荐下）。我还在互联网上阅读了许多文章和论文。我发现研究历史对于理解正在发生的政治危机至关重要，因为尽管这在我的生活中是前所未有的，但对其他人来说肯定不是这样。

给阿尔珀的电子邮件和信件中涉及的话题多种多样，从历史和政治到文学和哲学，不一而足。我试图以自己为互联网教学提案撰写的材料为基础，就美国应该如何参与东亚事务提出自己的看法。事实上，我发现尽管我受到骚扰，活动也受到严格限制，但我似乎可以很自由地给阿尔珀（和其他人）写任何我想写的东西。这一写作过程改变了我，也为我十年后主要以短文作家的身份出现，对当代事务发表见解奠定了基础。

3月中旬，阿尔佩尔向我解释说，“大学里的某个人、教务长或国务卿”正在为我制定一项计划。他没有解释这个计划是什么，但在几个星期里，我一直坚信会有什么重大突破。事实上，我的情况永远不会有重大改善。

无论如何，我被要求填写了无穷无尽的表格，这些表格后来丢失了，我又被要求重新填写。这些表格是为我在伊利诺伊大学的康复工作准备的。忘

了我在哈佛工作的梦想吧，仅仅是留在伊利诺伊大学就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全校教师向我提出了许多我可以参与的研究项目建议。我花了很多时间与他们通信，但一个计划都没有实现。其中一个涉及面较广的项目是，一家公司正在中国开发一个侏罗纪公园类型的主题公园。

我与组织者通了几个小时的电话，写了一系列的建议信，甚至介绍了一些可以帮助他的人。但是，尽管这位组织者表达了极大的热情，并对我的建议表示了热情的感谢，我却从未得到一分钱的报酬，也从未被允许参与这个项目。我很可能从来没有机会赚到钱。我被迫靠病假收入生活。其他任何工作都没有报酬。很明显，我们已经发出了一纸空文，而我也接受了这种状况。至少，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害怕在不久的将来会被杀害。

在伊利诺伊大学余下的三年里，我大概有三四十个这样的项目。我也有机会去其他地方工作，出国旅行，当顾问，参加会议。但几乎没有什么结果，到最后，我对任何人都不抱太大期望。亚洲对我来说已经变得相当遥远，我与亚洲人交流的机会也急剧下降。

大约在3月25日的一天，阿尔珀博士突然要求我写一篇文章，让我提出我认为美国在亚洲乃至全世界面临的真正挑战。这个要求似乎相当严肃，就像他代表一个团体真诚地想知道我的意见一样。我感到非常荣幸，当晚就坐下来写了一篇相当复杂的文章。我试图阐述未来安全需求的愿景。我假定技术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会带来根本性的转变，并提出需要对安全进行根本性的重新定义。

我最后说了一句话，我现在多少还记得："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我们将达到一个人能够杀死数百万人的地步。这将彻底改变安全的概念。我们将需要军队中的每一个人，但我们必须彻底改变"。当时，我对这一问题的

思考还不够深入，但我认为大多数武器系统已经完全过时，与我们将面临的挑战毫不相干。我还提出了自己对亚洲的看法，认为美国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与中国更紧密地合作。阿尔珀和朋友们似乎都同意这一观点，但这一观点在整个美国并没有得到多少支持。

第二天，我在阿尔珀的办公室见到了他，我们谈了谈我应该如何处理我的父亲、我的妻子，以及因我的奇怪职位而产生的与同事之间的其他问题。这是一次友好的谈话，但有点毫无意义，因为很明显，要想与同事建立正常的关系，还需要好几年的时间。事实上，在我的同事们重新开始与我交往之前，我就会感到疏远，并远离亚洲研究。

谈话结束时，我问他关于我寄给他的信的事。“我的信不合适吗？”我问道。他嬉皮笑脸地说：“是啊，有些人就是拿钱来考虑这些事情的。是的，好吧，如果你能偶尔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可能会有所帮助。”当时，我们正朝着美好的友谊迈进，尽管美国的局势正在失控。

2001年4月1日，一架美国海军情报飞机与一架中国喷气式战斗机在空中相撞，造成中国飞机坠毁和一名飞行员死亡，至少官方是这么说的。一听到这个故事，我就有点吃惊。这起事故似乎与我在消息发布前几小时给阿尔珀的电子邮件中开的一个玩笑完全吻合。我曾说过，我们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并始终有一个计划。即使你在飞行时失去了一只翅膀，你也要有一个计划，知道该怎么做。

当然，我无法证明我所说的话与所发生的事情之间有任何关系。我也不知道这个故事是否准确。但有几次这样奇怪的时刻，让我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涉及两架飞机的事件仍在继续。

当看起来可能会有重大突破时，我感到有些兴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发现，无论我的电子邮件多么受欢迎或多么有帮助，我都无法摆脱在

伊利诺伊大学的从属地位，多年来，我总是身无分文。有时，我非常气馁。我会在深夜独自开车出去兜风。现在很难想象我还会做这样的事情，我的妻子不会再容忍了。但我听 U2 或其他能让我振奋的音乐，试着想象我正在做出巨大的改变，即使我完全与世隔绝，与所有人隔绝。

那么，在那段时间里，我是如何被对待的呢？起初，我的直系亲属似乎真的相信了我患有精神疾病的谎言。我有些怀疑父亲是否真的相信，但他努力（我可以观察到）让自己相信这一定是真的，因为他无法面对另一种可能，那太可怕了。

大约一个月后，他们都不再过问我的治疗、情绪和工作。虽然作为父亲、母亲或兄长，询问我在患上如此严重的精神疾病后过得如何是很正常的事情，但他们都置之不理。他们也从未努力去弄清故事中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我的妄想。他们避而不谈导致我被解雇、安置为残疾人以及最后请病假的过程。如果仔细追问这些故事中的任何一个，并提出简单的问题，很快就会发现官方叙述中存在不可调和的问题，因此他们刻意避免提出真正的问题。

在我努力尝试告诉他们每一个人真相之后，我发现我遭到了所有人的拒绝，尽管我的母亲最初试图理解我。没有一个家人就所发生的事情向我提出任何有意义的问题。我知道这一点，因为我已经下定决心，如果他们问了，我就会开始讲述真实的故事。直到三年后，我才迫使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听我讲故事。他们自己是不会问的，在我讲述了细节之后，他们也从来没有问过我任何问题，也没有问过任何试探性的问题。

这个过程对我来说非常严肃。在这里，像我母亲、我哥哥和我父亲这样的人变成了完全陌生的人，他们的所作所为，即使中情局威胁要杀了我，我想我也做不到。他们似乎很自然地接受了这个巨大的骗局，甚至不会暗示有任何不妥。监视我的中情局特工比我的家人更加诚实和直率。我心想，

而且我现在仍然相信，如果我当时被杀了，我父亲一定会在我的葬礼上声泪俱下地讲述他如何无法理解自己的儿子是如何夺走自己生命的。他对查明真相完全没有兴趣。

在某种程度上，我发现了美国社会中上层阶级的一些特点。他们对不方便的真相不感兴趣。但我认为，从整体上看，美国作为一种文化正在衰落，公民正在做出以前不会发生的行为。

无论如何，我对家人很反感，我下定决心，在他们问我一些问题之前，我不会告诉他们任何事情。最后，我不得不自己提起这个真实的故事，因为我的家人会非常乐意把这个奇怪的故事永远埋在心底。

事实上，我从未遇到过一个愿意合作调查针对我的犯罪阴谋的人。在极少数情况下，有人愿意暗指这一过程。

这种现象让我觉得，问题绝对不是出在小布什身上。相反，我觉得问题出在美国文化的腐朽和知识分子的消极被动上，他们都很有能力，却不愿意冒任何风险，为了自己的方便而乐于维持完全的虚构。

"梦游者》（Die Schlafwandler）是奥地利小说家赫尔曼-布罗赫（Hermann Broch）一部长篇小说的名字，他在这部小说中描述了三个虚构人物的生活，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日子里被卷入欧洲崩溃的文化秩序中，并经历了那场灾难。布罗赫描述了当时德国受教育阶层的一种怪异心理状态。人们像梦游者一样生活，在社会中发挥着作用，胜任自己的工作，但从最深刻的意义上讲，他们完全无视经济和制度崩溃的迹象。因为他们可以在不知道自己行为后果的情况下管理社会，所以他们使不可思议的事情成为可能。

只要看看 2000 年 12 月至 2005 年 6 月期间（以及今天）发生的事情，就会明白美国出了什么问题。美国显然是在一场军事政变中被接管的，在这场政变中，一小撮人控制了政府的大部分，但并没有控制整个政府。2001 年 1 月之后的大约一年时间里，媒体进行了完全不切实际的宣传，但也有隐藏在表面之下的稀世珍宝。然而，除了极个别的例外，我遇到的大多数人都对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保持沉默。

没有人敢说什么，或者更好的是，他们为了自己的方便而自欺欺人。在随后的几年里，发生了数次未遂政变和反政变，但尽管我阅读了大量左翼、右翼和阴谋论博客，却从未在互联网上看到任何描述这一过程的努力。

有一件事我可以肯定，那就是虽然我被明确列入了黑名单，但还是有很多幽默的事件为我上演，在一些奇怪的活动，我碰巧遇到了一些穿着引用了我最近邮件的 T 恤衫的人，甚至还有人在我的桌子上留下了素描，这让我在严重的孤立中确实得到了某种愉悦。这是一种喜忧参半的体验，有时让我感到相当困惑。

但骚扰并没有停止，甚至有人对我和我的家人发出死亡威胁，尽管我并不太担心大约六个月后我们会发生什么。

我可以肯定，这个故事虽然从未被讨论过，但却有极其详尽的记录，而且许多相关文件仍然存在，其中可能包括许多未被列为机密的文件。我还没有开始申请文件，原因很简单，我在美国找不到一个支持我采取这种行动的人。

我意识到写邮件的危险性，但我开始相信，也许是错误地相信，写这些邮件是一个向广大读者表达我的观点的机会，其中很可能包括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那些被派来骚扰我的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对我深怀敌意，

可能滥用了我提供给他们的信息。但根据我当时的遭遇，我明显感觉到他们基本上是同情我的，想知道我的想法。

我意识到，我在外交政策方面提出的建议，或者后来在其他安全问题上提出的建议，确实有可能被阅读这些建议的陌生人滥用，用于不道德或不道德的目的。我深知这种风险。我对中情局的性质也不抱任何幻想。我只是觉得，显然有一批核心人员愿意冒着极大的风险来帮助我。

然而，我觉得，无论谁愿意冒着这样的风险在美国恢复法治，我都有道德义务与他合作。这不是为胆小鬼做的努力。这是我不得不冒的风险。在接下来的几周里，风险会越来越大。我试图说服自己，如果我有机会提出想法，尽管这些想法有被滥用的风险，但鉴于美国当时的混乱局面，我有义务做些什么。我不太确定这场赌博是否成功，但我最终也不知道。

在伊利诺伊大学就读时，我曾申请参加国务院的考试，当时我非常沮丧。这其实并不是我的首选职业，但却是唯一的转行选择。考试是在 2001 年 4 月。我曾就在大学工作的问题联系过其他人，但他们往往连答复都没有。我甚至没有被邀请作为哈佛大学职位的候选人。

国务院是唯一的机会。我的妻子没有兴趣考虑我的处境的严重性，她坚定地认为我会加入外交部，并对远离中西部的新生活抱有极大的希望。我想，在那样的环境中通过这样的政府考试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我又想，也许这一象征性的举动会带来一些机会。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4 月 18 日前后，我在与妻子的一次谈话中说了一句奇怪的话。当时我正在开车，我随口对她说：“我想，也许我应该加入中央情报局。”她对我的评论大吃一惊，坚持要我申请加入国务院。

我是在表达一个在我心中酝酿了一段时间的想法。由于已经过去了很多年，我无法回忆起我和阿尔佩尔之间关于美国严重政治危机的确切通信内容，因此存在一些失真的风险。当然，当时我对整个中央情报局并不抱有幻想。我对它几十年来所从事的犯罪活动，以及它与毒品交易和洗钱活动的联系了解得很多。

这句略显不经意的话的意思是，我被我遇到的一小群与中央情报局有关的人的纪律性和原始勇敢精神深深打动了，他们是被派来监视我的，但更准确地说，是被派来保卫我的。我已经开始在脑海中构思如何利用这一小撮勇敢的人，与布什政府对抗，推动美国的真正改革。

虽然我显然无法证明这一点，但我开始相信，事实上，正是中情局本身和军方中的这一小撮人，才有机会将美国带向新的方向，因为我看到周围的知识分子都是如此懦弱。我可能看错了。当然，对于后来所有的英勇行为，那些体制内的勇敢灵魂都无法阻止美国在制度和文化上的衰败，但在2001年时，我不可能知道这一点。

第二天，我在阿尔珀医生的办公室约见了她。我每周和她见三次面，我们谈论更多的是政治和外交政策，而不是心理健康问题。当我在她办公桌对面坐下时，她微笑着对我说：“你真的要避免被你的妻子支配。我相信，以你的强势个性，一定能赢得她的青睐”。

这句话是突然冒出来的。之前根本没有讨论过我妻子的问题。阿尔佩尔继续着整个套路，听起来就像事先已经练习得炉火纯青。他继续提到我妻子的固执，还特别提到了我参加国务院考试的问题。然后，在对话中间，他用了一句最让人忍俊不禁的话：“我的意思是，我不为国务院工作，也不做任何事情……”

这时，我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他指的显然是我和妻子在车上的谈话。他向我传达了一个非常强烈的观点（很可能是整个团队的观点），他们希望我加入他们。但这与中情局的招募完全相反。至少有一个听众对我的想法非常感兴趣。至于当时或日后的受众有多大，这可能是一个永远无法回答的问题。

谈话的基调随之发生了变化。阿尔珀采用了一种相当不寻常的语气。他超然物外，但语气轻松，突然转过身来对我严肃地说道。他对我说了一句话，在此之前，我周围的美国人没有一个愿意对我说这句话。阿尔佩尔说：“这个国家正处于无政府状态。政治完全混乱”。他公开描述了自布什集团夺取政权以来政治体系的严重混乱，但却无法完全控制政府的所有部门。¹他还表示，如果这种状态持续下去，可能会发生真正的冲突（我想象的是内战，但我对他的话的解读可能超出了他的本意）。

我认为那次谈话不仅是我们关系的转折点，也是我角色的转折点。当然，我以前也曾就国际关系发表过意见，但实际上我并没有发挥积极作用，只是提供了一些无关痛痒的建议。但现在，我担心美国政府表面下的冲突已经失控。我决定尽我所能，为我所认为的美国极其危险的局势找到一个政治解决方案，而我要做的就是向那些照顾我的人发出呼吁。

人们可以把我的这种想法理解为我个性中巨大的自信（或傲慢）的表征。不知何故，我认为我比任何人都能更好地管理整场演出，即使我实际上被软禁在家中，受到持续的监视。但这就是我的个性，无论好坏，我坐下来思考需要做什么。

¹我认为当时至少有三类人：小布什身边的人希望通过政变巩固权力；反对小布什极端行为的人，其中一些人正在考虑采取暴力行动；那些趁乱在其组织内夺取权力的人，但他们不一定是小布什的支持者，而更像是军阀。我不知道当时有多少人丧生，但我认为，如果没有暴力，不太可能发生这种程度的冲突。也许有一天我们会知道。

我还想，在这样一次公然的非法行动中，那些被派来监视我的人显然都是高级官员，而且权限很高。看来，向他们献计献策不失为一种好策略。

但是，风险当然是存在的。不仅对我个人和我周围的人有风险，而且同样重要的是，如果我提出有用的建议，这些建议以后会被滥用，这也是真正的风险。你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情况确实发生了，但我认为，在那一刻，我真的没有什么选择，或者说，我是这么认为的。

无论风险有多大，我当时就决定要写下一些想法，说明如何将情报工作至少部分地转变为一个能发挥积极作用而不是消极作用的组织。

十八年后，我相信与我交往的这群忠诚的人没有滥用我的信任，他们真诚地努力将情报变成有意义的东西，并利用他们的影响力和原始的勇敢来抵制布什政府。但是，我所写的东西最终产生了什么结果，它们又是如何与其他想法相互影响的，我们最终不得而知。

任何人都会觉得奇怪，我怎么会认为中情局这个美国最腐败、最反民主的机构之一能够发挥积极作用，但根据我当时的所见所闻，这就是我当时的感受。我清楚地看到，情报部门中的这一派别是美国唯一一个真相大白的地方。美国所有进步和自由的机构都崩溃了。伊利诺伊大学没有其他人愿意如此坦率地谈论这场危机。因此，我觉得中情局不仅有公然违法帮助企业派别，也有愿意顶住巨大压力，争取正当程序的小团体。

我认为，当时正在形成的的是一个另类的情报界，它最终将为匿名者和维基解密等组织提供信息，并支持爱德华-斯诺登、布拉德利-曼宁等人的努力，以及其他成千上万利用情报或军事职务披露非法活动或试图让政府承担责任的人的努力。我与这些反抗行为毫无关系。最重要的是，所有这些自以为是的泄密者对我的案件没有任何兴趣。

我觉得，唯一愿意站出来反抗这种压迫的人是军方和情报界的一小群人；他们不害怕死得不明不白，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对所看到的一切印象深刻，无论好坏，我都选择与他们站在一起。我可能弄错了，我说过的话可能被误用，我可能无意中与不怀好意的人合作。他们与我在朋友、家人和同事身上看到的懦弱形成了鲜明对比。

我认为我对自己有很高的道德标准，我希望这一点能传达给这本小说的读者。很多人已经知道了这个故事的某些部分，所以我觉得有义务写下我认为发生的事情，以正视听。当然，我不能写我不知道的事情。

我可以肯定地说，“照看贝一明”行动是如此复杂，如此密集，肯定有大量文件，我相信总有一天会公布详细情况。参与这次行动的很多人没有任何许可，因此，它并不具有严格的秘密性质。

我觉得自己必须写这本书的原因之一是，有很多人对我如何为中情局工作发表了评论和笑话。我想在这里尽可能准确地讲述这个故事，让大家对实际发生的事情没有任何怀疑。我从未从中央情报局得到过任何补偿，也从未被要求做其他任何事情，只是装出一副精神病患者的样子来羞辱自己。我周围的人一般都待我很好，即使他们对我做了一些明显不道德的事情。

我认为，理解这个故事的最佳方式是想象中情局是美国唯一一个拥有独立预算和复杂强大的等级制度的组织，它内部的派系能够对抗布什政府，并在当时为持不同政见者提供任何职位。也许，中情局是唯一一个可以接纳像我这样的人的组织。

第二天，我在大学体育馆锻炼身体，这已成为我的习惯。在举重的间隙，我在不同的纸上潦草地写下了我对恢复美国秩序所需采取的措施的建议。无论如何，这都不是一个激进的声明。我认为，我所发表的精辟言论和提

出的建议代表了我思想和**写作的精华**。字数不多，但寓意深远。几年前，我把**这些笔记的内容改写**成了一封简短的信，也许可以找到它。

我把所有材料装在一个信封里，包括一些用中文写的东西，然后寄给“阿尔珀博士”。我在信封背面画了一个日出/日落的图案，意在提出一个问题：美国是在衰落，还是在重生？当然，这个形状也是为了反映中央情报局标志的形状。



我在向那些为了让我活下去而冒了那么大风险的隐形人发出呼吁，希望他们能够凭借自己的勇敢和想象力，以某种方式将中央情报局或其中的一部分改造成一个良善的机构，并发起一场扭转国家局势的运动。这似乎是一个相当天真的假设。毕竟，这只是信封背面的一个记号，从来没有写过任何合同来解释什么。我的评论言简意赅，只对那些已经知道我间接提到的危机是什么的人有意义。

从很多方面来看，我的提议并不成功。尽管中情局里有一些勇敢的人采取了冒险的立场，而且后来也有揭发者将这一努力继续下去，但中情局的绝大多数人只是朝着破坏性的方向前进，而且这种前进的步伐今天仍在加快。

不过，我认为可以反驳的是，系统抵制布什政府的努力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从一个基本上被认为属于布什家族的组织开始的。在一个野蛮的政府中，为维护零星的法治和任人唯贤而进行的勇敢斗争，为奥巴马执政时期

进行的一些改革（在有限的意义上）奠定了基础，并为其他政府工作人员提供了抵抗的勇气。

我想澄清我所写的内容。虽然我不在此重复，但全文可在其他地方查阅。除非你想象我当时并不确定自己还能活多久，我感觉自己正处于美国一场低强度内战的中间，我必须迅速行动，否则你就无法理解我写的东西。你是否认为我的观点是正确的，完全取决于你当时在美国社会中所处的位置。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与中情局有某种牵连的故事在朋友和同事之间，以及在完全陌生的人中间广为流传。这种“宣传”（我认为其本质近乎幽默）的结果是，多年后我遇到一些人，他们会在打招呼时对我说：“你懂很多亚洲语言。我猜你是为中央情报局工作的”。我并不觉得这种造谣活动有多有趣，尽管它相对无害。

但关于我的行动的底线必须澄清。我从未签署过任何合同，也没有与中情局达成任何书面或口头合作协议。我就美国需要做的事情提出了建议，其中包括如何改革情报工作的建议，但这些建议几乎从来没有被征求过。我从未根据中情局人员的指示向第三方发表过声明（我从未充当过特工）。最重要的是，中情局或美国政府从未以任何形式付给我一分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我的想法有时会得到高层的跟进，但中情局可以保护我，却无法帮助我解决最基本的月度财务问题，也无法帮助我结束所遭受的低级骚扰。我在系里的工资仍然是所有教职员中最低的，尽管我在那里工作的时间比其他三名教职员都长。为了治疗并不存在的疾病，我负债累累，四年来不断受到骚扰和威胁（偶尔夹杂着幽默和支持性的评论）。

有时，电子邮件、广告、垃圾邮件和媒体中隐藏的信息是如此常见，以至于我怀疑自己是否反应过度，看到了不存在的东西。但是，当我2004年12月准备离开伊利诺伊大学时，所有这些信息都突然消失了。我偶尔也

会有一些经历，表明一些官员试图向我暗示什么，但这样的时刻很少，而且相隔很远。从根本上说，这种对话在 2004 年就结束了，尽管对我的工作和活动的保密限制至今仍然存在。

第二天，也就是 2001 年 4 月 20 日，我已经被安排到卡莱诊所接受一系列检查。当我正准备离开我们的公寓时，收音机里传来了新闻，我听到广播说一架飞机坠毁了。报道说，秘鲁空军一架执行缉毒任务的战斗机向一架涉嫌贩毒的飞机开火，而这架飞机是世界福音浸礼会协会租用的。由于中央情报局的一架飞机提供了信息，飞机紧急迫降，造成两人死亡。广播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中央情报局“提供情报”，这让我立刻想到了我前一天下午写给阿尔珀博士的信，我甚至还没有把这封信拿给他看。一听到这个广播，我就明白了其中的意思。很有可能，我的信已经在我睡觉的时候被抄写了，因为我显然受到了全天候的监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时刻，因为在我看来，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广播都是对我所写内容的明显而直接的引用。

值得注意的是，那天我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有机会见到阿尔珀。相反，我接受了一系列心理测试。测试内容包括匹配各种图像和形状，其中许多似乎与我的信非常相关。事实上，我有一种明显的感觉，在中情局的某个实验室里，有人在这 8 个小时里阅读了我的手写信件，并以一种看起来令人信服的格式为我拼凑出了这个“测试”，从中获得了很多乐趣。

无论如何，从那时起，我就试图就美国需要采取的行动向那些我认为与美国体制关系密切的人提出建议。我还应该指出的是，我在报纸上看到了许多间接提到我的报道，我周围的人也采取了其他行动，或者在伊利诺伊大学张贴了海报，这些都表明这些支持我的团体对布什政府怀有深深的敌意。当时我同样担心，这一紧急情况可能会导致严重的暴力事件，甚至是内战。在这一点上我错了，但在当时的混乱局面下，政府内部的关系非常

紧张。2000 年 12 月至 2004 年 7 月期间在美国发生的故事还没有被讲完。

无论如何，我不确定自己还能活多久，也不确定自己会被怎样处置，因此，由于担心美国的混乱局面会带来最坏的结果，与中情局内部这一小撮人合作似乎是最明智之举，甚至是一种道德义务，因为他们愿意不计风险地站出来。

但是，我意识到我的行为可能会有歧义，我也接受了这样的风险，即我可能会与我从未计划或打算过的事情联系在一起，或者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利用或操纵。总之，我认为我当时被允许，而且现在仍然被允许就重要问题说出真相。这是我的幸运之处，而这往往是一场彻底的灾难。我不认为我被操纵或利用了多少，尽管我建议的事情肯定与后来被定为犯罪的行为有关，但很明显，我与申请的转变没有任何关系。

很多人都问我，电影《美丽心灵》在多大程度上是一部 *"film a clef"*，描述了我当时在伊利诺伊大学的经历，特别是我在 2001 年布什政府夺权时，参与了中情局/军方的一个分裂组织。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因为很多故事我都不知道。

这部大制作电影由朗-霍华德执导，讲述的是约翰-纳什教授的故事，特别是他作为数学天才在普林斯顿大学期间患上精神分裂症的经历。影片的大部分内容与我的案例无关。然而，影片的基本情节与我的病例十分吻合，而且有大量证据表明，影片的情节经过修改，与我的病例更加吻合，而与约翰-纳什的实际经历不太吻合。

这部电影于 2001 年 12 月上映，当时正值有关我在伊利诺伊大学的地位的争议最激烈的时候，我确信许多观众对电影中的许多内容并不陌生。但我还想说，影片中的许多内容都可以被理解为是指政府、学术界、法律界和其他领域的许多人，他们当时也同样受到了政府的虐待。

与我的生活相吻合的部分显而易见：一位在大学任教的教授被周围的人认为患有精神疾病，但他却认为自己正在领导一场拯救国家的机密行动。

纳什努力以自然的方式上课，同时又担心自己随时会被杀死，这些场景似乎是我经历的真实写照。而且，在纳什的实际生活中并没有这样的场景。

为了更贴近我简单的生活，故事经过了清理。霍华德省略了纳什与一个从未结婚的女人组建家庭的细节，以及他的一些性尝试。他被描绘成一个直率、平淡的教授，有妻子和年幼的孩子；这更像 2001 年我在伊利诺伊大学的生活，当时我的儿子本杰明才几个月大（与影片中的男婴同岁）。

此外，《美丽心灵》一书中描述的纳什的妄想并不那么可信。书中描述的纳什的幻觉并不那么可信，其中包括从美国的大规模共产主义阴谋到不明飞行物造访等各种奇幻故事。纳什的幻觉不符合逻辑，也没有形成连贯的情节。他认为外星人在向他传递信息，打红色领带的人都是秘密共产主义者。他向同事声称自己是教皇，还是南极洲的皇帝。他甚至认为自己是上帝派来的信使。

但电影描述的是一位教授意外地被军方/情报部门带入一项机密行动，并被告知不得告诉家人。行动出了差错，他发现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结果，他被指控患有精神疾病，并被解雇。事实上，这样的情节是完全可信的，而且与记录在案的涉及中情局的实际事件非常吻合。但更重要的是，对故事情节的这一改动使它更适合我，而不是约翰-纳什。

《美丽心灵》开头打领带的场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约翰-纳什在一次鸡尾酒会上看到了光线透过多面玻璃折射后形成的半太阳图案。然后，该图案被投射到橙子的切片上，然后，光线再次通过玻璃花瓶折射，最后被转射到一名学生的领带上。领带上布满了一系列被光线照亮的小太阳图案和一个大太阳图案。

纳什说：“你的领带如此糟糕，一定有数学上的解释”。

在故事中，关于领带的叙述表明，纳什开始害怕打红色领带的男人，因为他认为他们是共产主义阴谋的一部分。但在《美丽心灵》中，领带不是红色的，而是橙色的。纳什并没有被这条领带吓到，反而觉得很有趣。

2002年初，当我看到这部电影时，我立即意识到这一场景直接指向中情局标志的罗盘形状，以及我上文所述的关于美国是旭日还是夕阳的问题。当我看到这部电影时，我很惊讶，我以为除了一小部分人之外，其他人永远不会知道这件事，但它却因此被公之于众，让所有人都看到了。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他们这样做的确切原因，但很显然，我不会再做回一名普通的教授了。

电影与纳什生活的另一个显著区别是他与妻子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纳什的婚姻在他患病期间彻底破裂。他和另一个女人有了孩子，还和许多人发生了性关系。而在我的生活中，我过着忠实的家庭生活，没有任何这些倾向。

电影中的几个场景与我生活中发生的真实事件非常接近，尤其是当我的家人都被当局告知我患有精神疾病时，我的生活一片混乱，他们完全不知道实际发生了什么。

纳什与指派给他的国防部特工威廉-帕彻（由埃德-哈里斯饰演）之间的对话，与我和阿尔珀的经历有着真实的相似之处--有些场景直接引用。虽然我没有像纳什在电影中那样保留了成堆的剪报，但有一段时间，我确实剪下了一些暗示我经历的文章和广告，以备将来参考。当我意识到这一过程会拖上几年甚至几十年时，我就扔掉了其中的大部分剪报。我相信，这部电影还提到了其他一些至今仍未公开的案件，涉及美国当时遭受类似待遇的许多人。

最后，在电影的结尾，约翰-纳什作为一位老人获得了诺贝尔奖。这个场景告诉我，我将在今后的几十年里远离任何公众角色，如果我的努力获得了任何荣誉，那也将是在我生命的极晚期。但事实并非如此，至少在十二年内，我开始在韩国乃至整个亚洲受到广泛关注，但这与在美国发生的事情无关。

在这场危机发生的一年前，我就下定决心离开伊利诺伊大学，如果可能的话，离开学术界。为了离开伊利诺伊大学，我申请了哈佛大学的教职，还申请了国务院的职位。这两份工作都不是我梦寐以求的。我本可以在更广阔的领域求职，但我以为我在远程教育方面的创新足以成就我的事业。但事实上，在我在建议书中描述的想法的大规模发展过程中，我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当时似乎很清楚，我的职业生涯已经结束了，至少在几年内是这样。我为美国应该做些什么而提出的建议可能深得一些人的赞赏，但他们几乎无法改善我的命运。当然，他们对我做了一些有趣的事情，保护我免受威胁。

我申请的职位从未被邀请去哈佛演讲，尽管很多人都认为我是最主要的候选人。我想，要想把我从那份名单上除名，一定要付出很大的努力。但申请外事服务的工作继续向前推进，我通过了最初的笔试。令我惊讶的是，三月份我收到了一封信，通知我到芝加哥参加外事面试和考试。

当我把外事面试的事告诉阿尔珀时，他说："考虑到你的病情，我觉得现在有点早，但你为什么不试试呢？我不知道该怎么理解他的话，但我还是按计划行事，租了一辆车，出发去芝加哥大学参加考试。

当晚，我住在芝加哥大学附近的国际之家。这是一次巨大的冒险；大部分时间都很有趣。国际之家是一座罗马式建筑，有着非凡的装饰和木制品，非常符合我的口味。遗憾的是，它不再出租房间了。大楼里贴满了各种海

报和广告，其中提到了我的一些电子邮件中的主题和当时的政治事件，还有很多提到了我已经忘记的内部笑话（除了少数人之外，其他人都不知道）。这是一次相当有趣的经历，在我的印象中，这是在一个残酷的夏天里的一个放松时刻。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出门喝了一杯咖啡，然后步行前往密歇根大道上的考试中心。

考试本身很平淡，只有书面论文，以及与其他同样来参加考试的人一起表演各种场景。最后与主持考试的外事官员的对话很特别。他们告诉我，我没有通过考试，并祝愿我一切顺利。他们以一种有些幽默，甚至有些亲密的方式告诉我，暗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对我了如指掌。

当我离开办公室，在明媚的阳光下走到公园的绿草地上时，我突然想到我把日历忘在了参加考试的办公室里。我急忙跑回去取日历，这时另一位外事官员出现在我面前，他之前没有出现过，他与我进行了一次颇有深意的简短交谈。事后，我问自己，那个人是否就是我在伊利诺伊州期间被派来听我讲话的人之一，但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了。我觉得整件事都是精心安排好的，尽管我似乎是自愿把日历抛在脑后的。谁知道呢？

我坐上租来的汽车，开始驶出停车场。我被一连串指向出口的箭头带着转来转去，但这些箭头似乎一直在把我引向错误的方向。这成了一场持续不断的游戏，直到我最终成功驶出。这是一系列有趣的恶作剧和小把戏的开始，我认为这些恶作剧和小把戏的目的是暗示我，即使我没有通过外事服务考试，我仍然有我的支持者。

这只是为了我个人的利益而炫耀的特别行动。为了创造这种体验，肯定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完全是为了我一个人的利益。在那段时间里，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让我觉得有趣，或者让我觉得神秘。

我从收音机里听到的音乐是如此独特，以至于我确信整个广播都是为我而编的。其中包括几首我最喜欢的歌曲 当然还有 "加州旅馆"，以及它著名的结尾："你可以随时退房，但你永远不能离开"。

虽然我认为自己已经被非正式地接纳为俱乐部成员，即使不能正常进入国务院，但这是我对形势的误读。那些被派来监督我、控制我并最终保护我的工作级别人员对我的善意，无论他们多么体贴入微，对我职业生涯的影响都是有限的。也许在开始的时候，我们曾有过一些团结一致有趣时刻，但随着 2001 年夏天的到来，我越来越意识到联邦政府内部正在进行一场无情的斗争。我又回到了以前遭受的低级骚扰、与同事和朋友的完全隔绝以及普遍的疏离感中。

我对自己命运的估计完全错了。我原以为我很快就会因为我的角色而获得巨大的成功，我所支持的人和 support 我的人很快就会在世界上占据一席之地，而我的事业也会因此获得巨大的发展。但我也认为，我完全有可能被杀，或者被关进监狱，而我的事业也将就此终结。我从未想过还有另一种可能：很多人会知道我的故事，但不会谈论它。通过《美丽心灵》这样的作品，我将以一种隐晦的方式获得不应有的荣誉，但我的职业生涯将继续遭受羞辱和挫折，长达数年，甚至数十年。

我还认为，因为对我采取的行动是非法的，而且有这么多人直接目睹了这种行为，所以负责任的人会尽一切努力结束这场闹剧，让事情很快恢复正常。对于在我的骚扰事件中公然违反法律的人来说，这绝对不是什么问题，而且这种骚扰已经持续了好几年，数百人甚至数千人都知道了这一过程。

现在回想起来，这次行动的全部目的似乎并不是为了恐吓或惩罚我（尽管我显然受到了惩罚），而是为了向全世界展示，如果有人试图改变最高层的政策，会受到怎样的警告。我的家人、朋友、同事以及社会上所有被问及的人都参与了这场非法闹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事实改变了我对自己国家的看法。

我在本书中使用“布什政府”时有些惶恐。我深信，尽管布什、切尼、拉姆斯菲尔德和其他政府成员参与了许多完全可以弹劾的非法行动，但我目睹的许多行动并非由高层下令，他们很早就失去了兴趣。恰恰相反，是政府中的广大下层人员利用国防部和其他部门出现的权力真空，发起了自己的扩权运动。我们指责布什，但这只是部分准确的说法。掠夺和战争贩子并不完全是布什的产物。我周围的人天真地以为这些组织是为布什工作的，但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摧毁联邦政府的努力与布什毫无关系。

2001年的夏天过得很慢。二月、三月和四月的行动令人恐惧，但也令人兴奋和富有意义。很明显，尽管我受到了某些派别的关注，但不可能奇迹般地康复，我很可能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恢复我的职业生涯。第一阶段的兴奋很快就消失了，我感到非常失望。

我偶尔也会提出一些建议，有些建议甚至还得到了采纳，但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填写必须向伊利诺伊大学提交的“疾病”表格，努力偿还为我的利益编造的巨额医疗费用所造成的巨额债务，以及支付我的新房贷。事实上，我从未患过被诊断出的疾病，我也不允许以任何形式赚取大学工资以外的一分钱，而且我与他人的交往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这些都让我在这段时间里痛苦不堪。我的孤独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超过了二月份最糟糕的时候。

但这一过程中最痛苦的部分是，我意识到自己既不会在恢复民主的英勇斗争中英勇牺牲，也不会作为一个赢得全世界广泛支持的杰出能人而得到提

拔。相反，我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我的同事们当作无名小卒，他们不会再和我说话。

终于上完了课，休完了所谓的病假，我终于松了一口气。一边要教两门课，一边又要努力理解和应对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政治危机之一（或者说我是这么认为的），同时还要考虑到如果政治局势发生变化，我和家人随时都有可能面临危险，这简直就是谋杀。这些课程非常耗时，要求我假装什么事都没有，专注于日本古典诗歌和中国小说。

阿尔珀博士通知我，接下来的两个学期我将休病假。当然，这让我松了一口气，但这又一次公然表明，整个过程完全是政治性的。虽然我已经顺利地教了两门课，没有出现任何问题，但现在我却被勒令休病假，而且没有做任何体检，也没有说明为什么必须这样做。几乎每个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只有一两个人向我暗示这个过程有问题。

我也开始改变对整个美国的看法。起初，我对小布什以如此明显的非法方式上台感到愤怒和羞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感觉到，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布什政府，也不在于他们的战争动力，更不在于他们正在进行的任何其他娱乐和游戏。最根本的问题是个人道德的沦丧，以及美国体制的腐朽，使得所有这些教授、政府官员、专业人士，甚至我的家人都认为，他们完全可以继续好好地生活下去，假装在布什的统治下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而眼睁睁地看着我遭受最恶劣形式的政治迫害。

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或俄罗斯的知识分子身上，他们肯定会勃然大怒。但在这里，我是他们的近亲，他们却有意回避任何可能会让我的故事变得模棱两可的问题。例如，我父亲在2月底的一次电话后，就没有再问起我的“精神病”。没有一个家庭成员问过我的故事，从来没有。他们被动地看着我接受数百次被操纵的羞辱。这次行动一点也不隐秘。附近的大多数人都能清楚地看到正在做什么。

逃离香槟市和伊利诺伊大学相当恶劣的环境的所有希望都在阿尔珀的指示下破灭了，因为他告诉我，为了从精神疾病中恢复过来，我必须买一栋房子。这个命令非常令人沮丧，但很明显，我别无选择。我想尽快离开香槟市，搬到一个能发挥我的能力的大城市。从在伊利诺伊大学任教的第二年开始，我就有了这样的打算。虽然像香槟这样的中西部小城非常适合抚养小孩，但总的来说，我和妻子都对我们所能做的事情受到的限制感到沮丧，我也受够了那些不近人情的同事。买房意味着我已经决定要在香槟待上几年甚至几十年。

我的儿子本杰明出生于 2001 年 6 月 11 日，他的出现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有时，我花大量时间陪伴本杰明，用婴儿车带着他在附近转悠，在我们公寓铺着地毯的地板上和他摔跤。后来我变得更忙了，但那时我有时间好好陪陪他。他是个出色的儿子，心思缜密，一直在认真倾听。他显然不知道他的父亲被软禁了。

但是，家庭生活的乐趣并没有解决所有问题。多年来，我们一直濒临破产，家人甚至不愿过问我的生活。我深深地感到与同事的疏远，而且再也没有恢复这种关系。我不明白，我的国家怎么会发生军事政变，怎么会长期处于严重政治冲突的边缘，而人们却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我还注意到他们是如何刻意回避任何可能导致他们讨论此类话题的谈话的。他们显然知道出了大问题。

本杰明出生后不久，我们就搬进了香槟市的一栋新房子。这是一栋单层平房，建于 20 世纪 30 年代，位于教堂街，离大学有一段距离。当时我们只花了 75,000 美元就买下了这栋非常普通的房子。考虑到我们当时的经济状况，这大约是我们能够合理承担的全部费用。这栋房子的木制品相当吸引人，窗户也很经典，带配重，就像我长大的房子一样。

起初，我并不想买房子。我暗暗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以某种方式逃离香槟市。但阿尔珀医生坚持要我买房子，而在我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我知道我没有资格拒绝这样的命令。我担心买了房子就意味着要在伊利诺伊州住上几年甚至几十年。对我来说，这意味着我在事业上继续前进的希望破灭了。这并不是对形势的准确判断。

事实上，搬家的计划和实施证明是一种极其宝贵的分心。我把时间花在了打扫房子、擦亮木制品和修缮地下室上，这让我不再去想那些让我瘫痪的更大的地缘政治和政治问题。我在打扫和修缮房屋的过程中找到了生活的规律，这给我相当不稳定的生活带来了秩序。我没有固定的工作，不断受到压力和隐晦的威胁，我不知道国家会发生什么，甚至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为了理清思绪，我全身心地投入到修缮房屋的工作中。

搬家完成、地下室重新粉刷后，剩下的夏天时间就用来种植西红柿和黄瓜、修剪草坪、带本杰明推着婴儿车到附近的公园散步、帮忙做饭，以及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其他事情。更没有时间去担心遥远的华盛顿特区，不管那里的局势看起来有多么严重。

2001年7月，阿尔珀医生对我提出的关于工作的问题给予了肯定的答复。他告诉我，鉴于我的收入减少，支出增加，他认为我已经康复到可以寻找咨询工作和翻译项目的程度。我花了几个小时寻找翻译工作，并向朋友打听是否有咨询工作。我的工作没有得到一分钱报酬。在接下来的15年里，我很少收到正常工资之外的工作报酬。

我还与其他与亚洲合作的公司进行了交谈，看我能否帮助他们开展业务。虽然我有资格，也提供了很多建议，但没有人愿意付我一分钱，尽管他们经常说会在不久的将来付我钱。

举个例子，经朋友介绍，我认识了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团体，他们与中国签订了一个侏罗纪公园型主题公园的规划合同。他们说他们有钱，非常需要我的帮助。我和项目负责人谈了几个小时，倾听了他的担忧，并撰写了详细的建议书。我编辑了他们的宣传册，并提出了有益的建议。他们告诉我，他们会让我飞到中国，还说要给我一份咨询合同。由于介绍他们来的朋友很专业，这看起来很正当。但在最后一刻，他们突然停止了联系。他们没有付给我一分钱，也没有再写信或打电话给我。

在 2001 年夏天到 2004 年期间，当有人向我提出研究项目、邀请我参加会议、到华盛顿特区参加研讨会以及其他许多机会时，这种模式也多次重复出现。在大多数情况下，就在我们看起来即将取得突破时，事情却不欢而散。

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在找兼职工作时与我交谈的许多人都是善意的，他们并没有试图刁难我，但他们帮不了我什么，他们也知道这一点。有几次这样的经历很有趣，但越来越明显的是，除了向阿尔珀提出我的意见，以及从伊利诺伊大学领取病假工资之外，我根本无法做任何事情。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除了读书看报，当然还有写作，我经历了几乎无所事事的漫长岁月。我与大学同事、朋友和家人的联系少之又少。有时，我甚至见不到阿尔佩尔那么多面。

然后，突然就会有人主动联系我，就某个话题与我进行激动人心的电子邮件交流。对方可能是教授、商人、非政府组织负责人或政府官员。讨论会很有趣，似乎会引出某个项目，而我可以在其中发挥核心作用。但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后，这个项目就会偃旗息鼓，我也就再也听不到对方的消息了。2001 年之前的情况并非如此，我觉得自己的活动范围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但一路走来，我写了无数份简历，试图向来自不同背景的陌生人推销自己。这段经历虽然令人沮丧，但确实帮助我培养了真正的技能，这对我日后在华盛顿特区的工作大有裨益。

到 2004 年，我经历了太多的失败，以至于当真正有结果时，我都感到非常惊讶。不用说，这种蓄意骚扰（尤其是政府机构下达的命令）是完全违法的，而且是一种低级的心理战，属于重罪。但我周围的每个人都毫不客气地配合了这场闹剧。除了我自己，我没有发现一个人对调查过去的事件感兴趣。实际上，我周围整个阶层受过教育的美国人都认为，参与这样一个明目张胆的非法和不道德的过程并没有什么不对，即使他们知道我的罪过是倡导和平、反对专制政府。这一事实比任何事情都更让我深感疏远。过了一段时间，我更喜欢和体面的工人阶级在一起，我开始深深地敬佩他们，我对学术界的同事们无话可说。

我被安排参加为期一年的康复计划，通过强化治疗恢复我的语言和社交能力。我想大多数参与该计划的人都能看出，我只是被软禁了起来。我与参与康复计划的人之间的互动是友好的，甚至是幽默的。这项工作的全部意义在于让其他人明白，对不守规矩的知识分子会有什么下场。没有其他意义，也几乎没有任何反抗。

伊利诺伊大学心理学助理教授朱莉-亨斯特（Julie Hengst）负责这项康复计划。她是“成人认知语言交流障碍”方面的专家，从 2001 年 9 月到 2002 年 3 月，她和她来自希腊的研究生安提戈涅每周与我会面两次。她和她来自希腊的研究生 Antigone 从 2001 年 9 月到 2002 年 3 月每周与我会面两次。这些会面非常有趣，因为我并没有遇到任何语言方面的困难。然而，大约 16 年后，我开始出现一些语言问题。我别无选择，只能参加这个项目，在那里我找到了很多关于公开演讲和写作的好建议。

我想，在这个过程中，我不再是一名学者，而是一名公众演说家。几年内，我为报纸撰写的文章在我的职业生涯中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学术写作。这一转变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或许我们可以追溯到阿尔珀问我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看法的那一刻。

朱莉是个非常善良的女人，她努力从个人和实际两方面帮助我。我们一家和她的家人（她的两个女儿）见了几次面，她本人也非常关心我的健康。不过，她和其他人一样，完全乐于按照既定的剧本行事，她从未对项目本身的合法性提出过任何质疑。她对我非常重要，因为当时我非常孤立，伊利诺伊大学或其他大学的同事都不愿意与我交谈。因此，她的友谊对我的影响很大，我也非常认真地对待她的建议，因为这是我从别人那里得到的唯一建议。但最终，我认为她的行为和其他人一样不道德。我最终决定，虽然这个职位不容易胜任，但我认为每个人都有责任。

在我们的会谈中，阿尔珀医生和我谈了几个小时的美国政治。我们的会面不包含医疗内容。他偶尔会解释我必须为保险公司填写的众多表格中的哪一张。但是，2001年7月，他突然向我宣布，我需要着手修改关于日本和中国文学的书稿。同事和家人都认为，我这辈子唯一能做的工作就是当教授。阿尔佩尔和我的系主任的声明强化了这种看法。当然，这与我之前多次表达的脱离学术界的强烈愿望完全背道而驰。大家普遍认为，我唯一的出路就是写这本书。但是，对我来说，哈佛大学出版社拒绝我写这本书让我疑虑重重，而且我对阅读古典文学的过程也不再感兴趣。这项任务对我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大约十年后的2011年，我终于将半部手稿写成了一本书。

作为针对我的骚扰行动的一部分，手稿于2001年1月被退稿。哈佛大学出版社《哈佛东亚专著丛书》的编辑约翰-齐默（John Zeimer）拒绝与

我讨论退稿的原因。我收到了一封信，信中列出了手稿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但这些问题都不是拒稿的可行理由。

两年后，当我在亚洲研究协会的一次会议上见到齐默时，他从我身边走过，避免与我交谈。

这种亲密职业关系的转变在我与斯蒂芬-欧文（Stephen Owen）的交往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他是我在哈佛大学的导师，也是我的挚友。欧文在我还是研究生的时候就以各种方式支持我，在我的研究生生涯中，我们就文学、历史和其他许多话题进行了通信，我觉得这些通信代表了我的一些最佳写作。他是我生命中的重要人物，对我如何将自己视为一名知识分子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斯蒂芬-欧文确实不是一个简单的人格类型。

2001年4月，欧文给我寄来一张手写的短笺，鼓励我不要因为手稿被拒而失去希望。他讲述了自己的第一部手稿也被退稿的经历。这是一封感人至深的信，但我们的通信就此结束。他再也没有回复过我的电子邮件或信件。2005年，我在亚洲研究协会的一次会议上见到了他，他简短地打了个招呼，但之后我们再也没有交谈过。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我每次去波士顿都会给欧文写一封邮件，但他从未回复过。对于这段关系的彻底结束，我没有任何解释。也许欧文觉得我渐渐远离了文学教授的身份，也许他对我的所作所为不甚同情。也许是这样。但我不排除这样一个事实，即作为对我的骚扰行动的一部分，他有可能被明确指示不得再给我写信。

我与亚洲研究领域的同行完全隔绝。阿尔佩尔只和我谈论政治，而我对古典文学的写作过程只有最消极的联想。我很难激励自己去完成书稿。这似乎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我还是强迫自己开始做一些修改。我决定不再试图写一本关于中国通俗小说在韩国和日本的影响的书，而是只关注日本对中

国小说的接受。2003 年夏天，我有机会在日本完成了这份手稿，然后在 2011 年将~~这些~~材料修改成书，提交给首尔国立大学。

奇怪的是，就在我在伊利诺伊大学完全与世隔绝的时候，我的朋友亚当-克恩（Adam Kern）邀请我于 2001 年 10 月在哈佛大学做学术报告。我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并认为作为一名学者，我很快就会恢复正常。但事实并非如此。由于一些我不明白的原因，我得到了这唯一的一次机会，去哈佛看望一些朋友，并与我的好友埃里克-马勒（Eric Marler）和尼尔-卡特科夫（Neil Katkov）一起玩耍。这是我在 2001 年离开伊利诺伊州的唯一机会。

9/11 事件发生一周后，我前往哈佛大学，当时我在想，在那里等待我的可能是怎样的混乱。时至今日，我仍对美国是如何在那样的动荡中保持团结感到困惑，但不知何故，它做到了。我在哈佛大学与正在撰写博士论文的卡特科夫进行了交谈，我试图告诉他一些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尼尔是我最信任的朋友之一，他告诉我他不想听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的细节，这让我大吃一惊。他基本上断绝了我的来往。他和我接触的其他人也都不愿谈论 9/11 到底发生了什么。美国对我来说越来越陌生，而这种伤害并不是那么容易弥补的。我对美国的这一类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感到厌恶，他们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假装在一个部分处于军事统治下的国家一切正常。

限制我活动的行动并不隐蔽或有限。成百上千的人被卷入其中，不让我诉诸正当程序，宣扬我患有精神疾病的谎言，阻止我与世界各地的同事和朋友交流，并对我进行低级别的骚扰。他们这样做了数年，甚至数十年，我从未见过任何试图抵制或批评的迹象。每个参与其中的人肯定都知道整个事件是多么违法，多么不道德。然而，他们却对整个过程乐此不疲。

不过，在我严重的孤立无援中，我还是有几次真正发挥作用的机会。最值得注意的是蒂莫西-麦克维（Timothy McVeigh）一案，他被指控是俄克拉

荷马市阿尔弗雷德-默拉联邦大厦爆炸案的同谋。2001年5月，报复心极强的布什政府要对他执行死刑。我认为，在当时政治混乱的情况下将此人处死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的支持者有可能发动进一步的袭击。

我的建议立即得到了回应，联邦调查局公布了大量文件，表明审判已被推迟。试图帮助我的政府工作人员竭尽全力，但遗憾的是，我们无法阻止傲慢的布什政府的危险进程。最重要的是，麦克维于2001年6月11日被处决。

有时，我受到同事或监视我的人的侮辱性辱骂。但在其他时候，我却获得了在大学和美国发挥重要作用的独特机会。我一直不明白，我怎么会受到如此重视，有时我是组织起来反对布什政府的核心人物，但我却从来没有机会与任何人会面，而且还不断受到同样的虐待，以及无休止的经济和官僚主义挑战。

也许反对布什政府的势力能够重新控制联邦政府的某些部门，但却无法将忠于布什的人赶出部分部门。企业界的情况也是如此。结果是，政治环境变得古怪而难以预测，许多神秘的行动在其中发生。在一个层面上，我可以自由地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但在另一个层面上，我仍然被关在一个良性的笼子里。

通过精心设计的圈套，我一再被诱导相信，我将有机会获得新的职业、新的收入来源，或者新的朋友，他们会欢迎我加入一个令人兴奋的网络。这种模式变得相当容易预测。首先是通过电子邮件提出大量建议，然后是电话交谈，最后是谈论我去访问和就职。但最终，这些提议都无一例外地落空了，或者就这样消失了。来自商人、研究人员或政府官员的通信会慢慢减少，最后彻底结束。每一次，我都没有得到一分钱的回报。

起初，我以为自己是因为在美国的支持下，在东北亚地区发起了一场真正的经济和政治一体化运动而受到惩罚，而惩罚我的原因是我得罪了国防部里那些不想让自己的预算陷入危险的势力。我以为惩罚的目的是阻止我做我计划的事情，并确保我再也不会尝试任何事情。但后来发现，这根本不是我受到骚扰的原因。如果说中情局（和其他机构）保护和支持我，鼓励我做更多的事情，更加直言不讳的话。

我的活动受到骚扰和阻挠（18 年后的今天，我的活动在某种程度上仍在进行），其目的是向其他人展示，一个试图做完全原创的事情、不按常理出牌、想得太过远，而不是只专注于自己狭隘的职业道路的人，会有什么样的下场。他传达的信息是，在体制内，激进的压迫是有可能发生的，而对此却无能为力。在大多数情况下，保守派甚至是推动中国威胁论的军事鹰派对我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军方中的一些人可能会对这位新晋的年轻自由主义者感到愤怒，因为他差一点就破坏了对中国有利可图的遏制政策，而且是在没有任何授权的情况下完全凭一己之力这么做的，但这并不是主要因素，我后来也从未因为我的文章而受到直接批评。

毫无疑问，我能够以一己之力对美国政策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并在联邦政府内部推动抵制活动，这意味着我有一份厚厚的档案，详细记录了 my "政治破坏力"，但这些细节并没有向任何人公开。

从根本上说，我被列入了黑名单，不能从事长期工作，也不能参与任何机构的活动，因为我被认为拥有政治技能、教育和社会网络，如果任由我摆布，我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大多数雄心勃勃的年轻人都想成为哈佛大学的教授、成功的律师、参议员甚至总统。这些都是可以预见的目标，也有实现目标的既定途径。但在 2000 年，我已经不再主要考虑自己的职业生涯

了。我愿意把一切都抛到九霄云外，因为我认为我可以通过重塑大学和国际关系的本质来获得成功。这是一种相当冒险的做法，很少有人愿意走这条路。但我看到了国际远程教育概念的价值。

在很多方面，我都是一个难以忍受的自大狂。这并不是说我把所有时间都花在了谈论自己上，而是我对自己所倡导的东西的价值深信不疑。我完全有能力一个人坐下来，独自制定美国的外交政策，然后为之鼓与呼。我有信心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写出我的观点，然后与他人讨论，仿佛这些观点是常识，是需要讨论的严肃问题。此外，我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从不暗示其中包含意识形态内容。我愿意与任何愿意倾听的人交谈，伊利诺伊大学的许多保守派人士都是我的朋友。

到 2001 年秋天，长期的政治竞选活动已成定局，我再也不会再在公共领域获得任何显赫的地位（当然，我经常被非正式地讨论）。

他们明确宣布，我不能担任任何行政或组织职务，因为这将使我有能力在美国获得政治权力。我被授予写作和发表演讲的权力，偶尔还可以在美国和世界各地的一些期刊上发表文章。因此，我最终成为了一名主要的散文家，尽管这从来都不是我的初衷。

从那时起，我的家人、朋友和同事就一直拒绝告诉我，他们在与我交往时到底接到了什么命令。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向我证实，他们曾经接到过命令。我的情况非常奇怪，也非常严重，以至于我的朋友和同事中没有一个人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这非常说明问题。我认为这一事实表明了当时美国的怯懦和虚伪。

就我的家人（父亲、母亲、继父母、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姑姑和舅舅）而言，二十年来，除了极少数我坚持的情况外，他们普遍拒绝提起这个话题。我个人认为，他们不仅受到了惊吓，而且还都收到

了规定他们行为的机密通知。我有理由相信，我周围的人收到了数百份这样的指令，而在过去的 18 年里，全美各地收到了成千上万份这样的指令。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骗局之一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严格遵守这些非法指令。即使无法获得这些信件，也可以通过我周围人的反常举动来证明它们的存在。如果有人对这样的调查感兴趣，那就很容易了。

坚持了二十年的第二项政策是，整个案件不被媒体报道，也不被电子邮件交流所提及。每个人都被要求把这一事件当作从未发生过的事情。这一揽子命令涵盖了阴谋论博主和其他左右派意见领袖。他们严格遵守了这些指令。

没有人愿意与我讨论这些事件，即使是私下里。在极少数情况下，当我提出问题，人们愿意向我询问所发生的事情，但没有人努力主张结束对我的这种待遇，更不用说主张将事情公之于众，或主张我应该得到赔偿。我周围的人甚至都不愿意讨论这件事，即使我受到的虐待是如此明目张胆，而且是以一种非常非法和前所未有的方式，这让我很困扰。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那些甘愿与这场闹剧同流合污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反感，包括像布鲁斯-卡明斯这样著名的“进步”知识分子。换句话说，其他阴谋是左派应该谴责的可怕罪行，而我的情况却是“从未发生过的”。与我的美国同胞们在一起的经历远比 2000 年发生的实际事件更痛苦、更具破坏性。

第三章

我的帕蒂-赫斯特时期

我的状态变化速度虽然缓慢，但确实发生了变化。我在 2001 年秋季接受的言语治疗仍在继续，2002 年春季又会见了另一位心理学家。在那个学期结束时，有人谈到了我在未来的某一天是否真的能够再次任教。所有这些变化都没有减轻我的孤独感，也没有减轻我康复过程中不断遇到的挫折和所需的文书工作。

病假期间，我把时间都花在了打扫房间或陪儿子本杰明玩耍上。我挣不到钱，没有人邀请我参加会议，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发现自己很难与同龄人交往，不是因为他们试图与我保持距离，就是因为我与他们无话可说。鉴于当权者允许并支持罪犯统治，我对自己社会的看法确实发生了永久性的改变。

在 9/11 袭击发生后的几个月里，以及在该事件发生前后的几个月里，军方和情报机构似乎接近内战的状态，在我找到的任何文字中，包括在极右和极左网站以及相关阴谋网页上的搜索，都从未有过记载。美国历史上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竟然被所有人默默无闻地遗忘了这么多年，这确实令我感到惊讶。如果非要由我来迈出开启讨论的第一步，那也同样令人吃惊。

2002 年 1 月，军方和情报部门的大部分仍由 2001 年 12 月夺权的阴谋家把持，但政府中也有其他派别，他们不一定是布什的忠实拥护者，但却利用混乱扩大了自己的控制。行政部门失去了权力，但声称代表总统行事的军事派别却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9/11 是一次至今仍模棱两可的行动。它是由布什和切尼的直接追随者实施的吗？拉姆斯菲尔德的人是否也参与其中，或者他们是否反对？在这一过程中，白人民族主义者、以色列、有组织犯罪和其他参与者在哪里？这是否也与伊斯兰教有关？那些炸毁俄克拉荷马州联邦大楼的反政府白人民族主义者又是怎么回事？如果有的话，他们扮演了什么角色？

9/11 事件为推动《爱国者法案》、大幅增加国防开支和建立警察国家提供了契机。但在短期内，袭击事件也给政府内部顽固的反对派带来了力量，他们不遗余力地攻击布什派。

但重要的是要记住，9/11 还有其他含义。正如我当时写的那样，它是 "东方快车谋杀案"。这意味着，许多不同的派别都捅了一刀。

值得注意的是，军方内部反对布什政府的有组织势力正在增强实力，当时已接近实际控制。9-11 事件可以被解读为一种反击的努力；一种将权力控制在支持布什的人手中的努力。

但我怀疑这是布什或切尼的杰作。事实上，我经常想，我们需要扪心自问，9.11 事件是否可能是反对布什和切尼的派别所为，或者是某些奇怪的重叠。

《纽约时报》等报纸上的亲布什宣传与系统内部公开反对布什的信息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令人困惑的拼贴画。许多当时暗示对布什政府深怀敌意的奇怪文章和广告后来都被完全从数字档案中删除了。

我记得在一次会议上，当我们讨论美国的政治时，阿尔珀对我说：“这些天你看到的一切都没有意义”。这正是我的感受。支持布什的人和反对布什的人似乎同时崛起，他们在幕后激烈地相互斗争，同时又相互合作。这种情况简直毫无意义。

2002 年 1 月 13 日，小布什据说被椒盐脆饼噎住，然后晕倒在地，这一离奇事件使联邦政府内部混乱不堪。这个故事完全不可能发生，也没有专家相信。最好把这个故事看作是一个内部笑话，针对的是有安全许可的政府人员。也许这个故事与我开的“更大的鱼（即布什）要炸”的玩笑有关。根据这一解读，椒盐脆饼意味着鱼嘴上的钩子，而这一事件表明布什已经上钩，只需将其钓上来即可。

虽然特勤局那次对布什进行了几个小时的粗暴对待，但他们是在报复布什对待他们的傲慢态度，而不是对推动战争和国家经济军事化发表声明。虽然善意的人们能够夺回联邦政府的大部分权力，为奥巴马的当选创造了条

件，但他们无法扭转因 911 事件而加速的系统内部的大规模衰败。他们也无法夺回被切尼势力及其盟友占据的五角大楼的关键部分。有时，各派（有时是三派或更多派）为了不同的目的在同一空间内合作，在多个层面上展开了一场奇怪的政治战争。我并不假装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我可以肯定地说，这个故事还没有人讲过，尽管很多人都知道。

政府中反对布什的人可以在小事上惩罚他，甚至可以让他拥抱以色列的行动暂时倒退一下。但他们无法阻止切尼和支持他的跨国公司将联邦政府私有化。布什身边的腐败势力有钱收买大量左右派人士，许多人很愿意拿钱来换取装傻，从不质疑官方的说法。

自制宪会议（当然还有南北战争）以来支持联邦政府的整个意识形态都受到了毒害，无论一些官僚多么聪明，他们都无法赢得这场结构性战役。

2002 年春，我有了更多机会与大学其他系的教师交谈，特别是工程系和政治系的教师。当时，我所在系的教师都不愿意与我交谈。在美国，我没有收到任何人邀请我参加任何与东亚研究有关的学术活动。虽然阿尔珀一直让我修改书稿，但考虑到整个学术领域对我来说已经变得如此遥远，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不会在短期内（如果有的话）回到正常的生活中去，而且我似乎不会因为我成功地做过或努力做过的任何事情而获得丝毫的荣誉，无论是帮助伊利诺伊大学成为一所更好的学校，还是建立东亚研究领域，抑或是反对美国的军国主义和极权主义。在《美丽心灵》中，会有很多落后和晦涩的功劳，但这些功劳只对那些对案例有一定了解的人有意义。

尽管形势看起来很严峻，但仍然存在一些真正的希望，这与 2018 年的灾难完全不同。有一些令人难忘的突破。

最值得一提的是 2002 年 4 月的一天，阿尔珀通过电子邮件告诉我，“别太在意”，我又获得了一间办公室。在那之前，我一直把所有的书都存放在教堂街我家的地下室里，无法随时取用任何东西。在伊利诺伊大学分配到一间办公室的象征意义是巨大的，根据阿尔珀后来告诉我的情况，我感觉这次搬迁是一场巨大的隐秘斗争的结果。

我被分配到这间办公室的方式本身就是一个有趣的故事。阿尔珀博士，而不是伊利诺伊大学，通过电子邮件向我宣布了我被分配到军械库临时办公室的消息。他在邮件中表示，这次分配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突破。

然而，很难说这是一次彻底的突破，也很难说我完全获得了自由，因为办公室就设在美国军方控制的大学区内。也就是说，美国社会中唯一能够与布什政权抗衡，并给我一个栖身之地的，就是美国军方本身。

把我交给军队的决定揭示了美国的悲剧。我所熟悉的整个系统和文化都处于严重衰败的状态。事实证明，我所认识的学者和管理者根本无法为我做任何事情，他们只能无奈地接受那些强加给他们的荒谬故事。美国社会中唯一能够站出来反对极右派、抵制布什政府罪恶行径的派别是军队本身的一部分。后来，在爱德华-斯诺登和布拉德利-曼宁的事件中，这种讽刺意味更加明显。我确信，如果我得到绿党或其他非政府环保组织的支持，我早就死了。但是，与斯诺登和曼宁不同，我永远不会成为一个著名人物，至少在美国不会。

阿尔珀指示我去东亚语言文化部领取新办公室的钥匙。我去找秘书珍妮-普尔 (Jeanne Poole) 女士，她亲切地把钥匙交给了我。珍妮是一位出身工人阶级的正派女性，她的一举一动总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她以最平常的方式行事，礼貌周到，同时又能观察到最特别的行为。当我离开伊利诺伊大学时，我觉得自己离她很近。我走到军械库，这是一座巨大的建筑，顶部有一个半圆筒，两侧是拱形的橱窗，阳光透过橱窗照射在跑道上。中间的空间被预备役军人训练团用于训练。后来，我曾多次在那里慢跑。

我的办公室在二楼，位于一个相当不起眼的角落。当我用钥匙打开门时，眼前出现了一幅奇异的景象。我走进一间没有窗户的小房间，四面都是黄色的釉面砖，唯一的家具就是角落里的一张小铁桌。但令人惊奇的是，房间里的灯还亮着，一位老人正坐在桌前翻阅着一些文件。他向我自我介绍说，他是一名高级管理人员（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他握了握我的手，然后迅速离开了。他一开始出现在那个壁橱里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事实上，他似乎等待我的到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隐晦地说："哦，我最近一直在用这间办公室。"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这是为我，也是为我一个人设置的有趣活动之一，往往会给我带来相当大的麻烦。这减轻了我不断为生存而战的压力，我很欣赏这种幽默和团结。同时，这种特殊待遇也让我感到更加孤独。新办公室是一个巨大的突破，但它必须以最羞辱、最有损尊严的方式呈现。一些好心人（我常常不知道他们的名字）试图减轻对我的打击。

我被派往军械库意味着我基本上处于军方的控制之下，他们被派来保护我。我曾想过是否有谁被指派来监视我，但我不知道。我在新办公室待的时间

并不长。在家工作要轻松得多。与军械库的隶属关系提供了新的机会。我得以向军械库的其他住户介绍自己，包括征兵人员、军士和因各种原因驻扎在那里的其他军官。他们愿意认真地与我交谈，而我自己部门的成员却不愿意。我没有心情去评判他们的隶属关系。

这种经历与我以前经历过的任何事情都不同。我花了很多时间与这群新的军人以及后来从事安全和国际关系问题研究的教授讨论国际关系、技术，偶尔也讨论自己的个人经历。

我远离学术界，在那里工作时不可能写日本古典文学。当然，我并不赞同美国的军事政策。但我当时还没有到对美国军国主义完全反感的地步，所以我愿意--也许是天真地--考虑如何与这个团体中更有思想的成员合作，为美国在世界上发挥积极作用制定计划。

我认为我在军械库度过的时光是我的 "帕蒂-赫斯特时期"。对于不熟悉这段历史的人来说，帕蒂-赫斯特是一位富有出版商的女儿，她被一个左派组织绑架，并被迫配合他们的恐怖活动。最后，她积极参与了他们的行动，甚至重复了他们的意识形态口号。但归根结底，帕蒂-赫斯特虽然受到周围革命者言论的影响，但她是被迫参与这些行动的，并不是出于自愿。

同样，在一段时间内，我也深受与我交往的人的影响。我写了许多关于安全问题的电子邮件，包括讨论战争性质的变化、无人机和网络战争以及其他符合我所接触的军方人士所持假设的话题。我认为我的论点很复杂，对整个布什政权提出了深刻的批评。但事实并非如此。

将来，我当时写的电子邮件和其他文字有可能会曝光，并显示出我与后来的我截然不同：我是韩国和平运动的创始人，也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倡导者。这本书并不是要解释我自己思想或行为中的矛盾之处。我更愿意从一开始就说明，这段时期是存在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价值观和制度崩溃所带来的人生危机的结果。

但我没有选择我的环境。我没有选择与其他教授交往，甚至没有选择与绿党交往。多年来，我一直受到冷落，被排斥在美国的日常生活之外，许多所谓的自由主义者也主动避开我。那些原本可能是我在美国社会中的天然盟友的人物，按照指示与我保持着距离。当我写下我认为可以如何使用无人机的笔记时，并不是因为这个话题是我的兴趣所在，而是因为环境迫使我这样思考。我真的被切断了与所有同事的联系，一年内只能与军方人员交流。这种状况结束后，我的活动也发生了变化。和帕蒂-赫斯特一样，在那段时间里我也是一个俘虏。

在第三方安排的地点，我被唯一能与我交流的人吸引。在我遇到的军官中，有些人几乎没有为我做过什么，但有些人的言行却相当周到，表现出真正的关心。同样重要的是，我在与美国军队的交往中意识到了阶级问题。我的家族中没有人在军队中服过役，因此，我对军队这个机构很陌生。然而，我亲眼目睹了它是如何成为许多美国工人阶级的共同出路，既是一种职业，也是一种学习社会交往基本价值观的手段。我第一次看到了迫使人们加入美国军队的经济压力，我也开始同情他们为证明自己的工作正当的并在其中找到意义所做的努力。我再也回不到以前对美国社会的看法了。

此外，我仍然相信，军方中承诺抵制布什政府极权主义的派别最终会取得胜利，恢复某种形式的民主。因此，我相当天真地感觉到，通过军队本身实现美国转型的某种希望。这部分我错了，但并非百分之百错了。

军队中许多反对布什政府及其违反指挥系统的人对民主或正当程序毫无兴趣。他们只是出于各种原因对布什感到愤怒：因为布什忽视了他们的利益，违反了公认的惯例，他们认为中国可能是未来的好伙伴，或者因为他们自己的军事改革议程与切尼的不同。

我自己的家人和整个受过教育的美国中上层阶级决定让我自生自灭，不问任何问题，我对这种方式的情绪反应也是影响我当时行为的一个真实因素。美国社会中最熟悉的部分，比如哈佛大学，突然变得陌生起来。我再也不会以同样的方式见到我的家人和朋友了。

有迹象表明，我身边的情报人员和军方人员出于对正当程序和真相的真正兴趣而保护我。在其他许多情况下，人们希望通过帮助我而获得的好处并不明显，而且被复杂的政治游戏所包裹。我们不能假定小布什和他的内阁总是对我充满敌意。这场游戏有许多参与者。我怀疑我们永远不会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但从来没有人开始提问。

我努力向在军械库工作的军官们介绍自己，并试图建立友谊。就我当时所知，我可能很快就会被卷入美国军队。当然，我似乎不会再回去当教授了。其中一些军官向我坦诚地谈到了他们对布什政府的担忧，以及那一刻的危险。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自己太天真了，以为他们的个人意见意味着什么。

我遇到了一位陆军中士，他就布什政府与伊拉克的对抗向我提出了许多深思熟虑的意见，他似乎对美国的政策颇有想法，甚至持批评态度。我们经常一起吃午饭，讨论伊拉克战争的准备情况。我喜欢我在那里遇到的低级人员朴实无华的态度。学习他们的文化对我的生存非常宝贵。

2001 年后在美国生活需要做出根本性的选择。要么接受美国政府的大部分机构已被雇佣军和愤世嫉俗的暴发户（如迪克-切尼）接管，他们利用军队来实现残酷的目标；要么假装这个国家基本没变，只是因为新的保守派政府而出现了一些问题。我选择了前一种假设，虽然我守口如瓶，但我永远失去了那些希望生活在舒适麻木和否认状态中的人。

我阅读了许多关于国际关系和安全的文章，以了解我周围的世界发生了什么。这项工作使我变得比以前更加专业，并促使我最终撰写了关于当代国际关系的文章。我系统地研究了 9/11 事件后美国在东亚和中东的所作所为。我开始定期参加 ACDIS（军备控制、裁军和国际安全）的研讨会。在此期间，我结识了与 ACDIS 有关的教授，如政治系的 Edward A. Kolodziej 和物理系的 Jeremiah Sullivan，他们为我提供了不可估量的建议。

每年都有来自美国空军的上校被派往 ACDIS，三年来我花了大量时间与他们交谈，试图了解他们的世界。我之所以这样做，部分原因是我似乎有可能成为一名军人（不管你喜不喜欢），另一个原因是我觉得有必要了解他们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

这些活动促成了我第一次受邀在学术活动上发表演讲，即 2002 年 12 月在台湾举行的第三世界研究协会年会。这是我自 2000 年 7 月访问中国、日本和韩国后首次获准重返亚洲。我准备了一场题为“主权、财富、

文化和技术 ”的演讲：中国大陆和台湾在 21 世纪如何应对 “民族国家 ”的参数》的演讲，后来在互联网上引起了广泛关注。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自己又回到了美国学者的正常职业生涯。

2003 年春天，ACDIS 项目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在他们的办公室做一个关于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演讲，这个演讲是根据我在台湾做的演讲改编的。尽管我当时还在休病假，不能讲课，也不能与我所在的部门交流，但我感觉自己被 ACDIS 项目接纳了，他们也给了我一个隶属关系。

2003 年 1 月和 2 月，布什阵营控制的军方各派与其他军事集团展开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美国内战，目的是强行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不少美国人在五角大楼的这些暗战中丧生。新闻界充斥着荒谬的论调，说什么美国必须入侵伊拉克，因为伊拉克正在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整个过程就是一场闹剧，我再次被家人和朋友对这场为政治和经济利益而渲染的战争的沉默所震惊。我对整场演出感到厌恶，而且我发现，在那次失败之后，ACDIS 与军方合作的项目活动就不那么吸引人了。

我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在军方内部组建一个能够公开抵制这种战争推动力的派别，即使我们不能成功击败这种推动力，至少也能限制他们的势头。

我跟阿尔珀详细谈了我认为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我也给他发了几封邮件，描述了我认为需要做的事情。当然，这些邮件比较隐晦，没有直接参与的人很难理解。

我的建议与军方内部一个人数不多但热衷于夺取五角大楼部分控制权、公然对抗布什政府建立的独裁政权的重大努力直接相关。我认为，如果这些材料解密，与我的建议之间的联系就会一目了然。

在美国于 2003 年 3 月 20 日入侵伊拉克之前的几个星期里，有零星报道称军方正在缩减在该地区的武装集结，并朝着和平解决的方向迈进。此外，一些网络还首次播出了对问题的坦诚分析。五角大楼内部表面下的斗争十分激烈，并造成了人员伤亡，但我并不清楚细节。从媒体报道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变化，而且这次行动的确切日期也很容易确认。

最终，军方对伊拉克战争的抵制，尽管产生了怀疑的中央情报局报告，并被公之于众，但仍无法阻止战争的推动。但它清楚地表明，存在着强大的反对力量。这些一致行动大大减缓了战争进程，减少了切尼的选择。

可悲的是，布什政府并不是非要完全控制整个军队才能推动战争。我认为，阻止战争的努力失败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军队反对派的软弱，而是公民的冷漠。可悲的是，尽管只有少数军官愿意冒着生命危险捍卫正当程序，但实际上没有任何平民愿意冒这种风险。

当我发现我家地下室的地板中间躺着一个卫生棉条时，我才知道伊拉克战争即将爆发。这是我的监视者给我留下的另一条特殊信息。

我在军方最后一次抵制伊拉克战争的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军中流传的许多关于积极抵制伊拉克战争的声明，都可以追溯到我在伊拉克战争前三周写的文章。我曾建议，现在是团结军中所有抵抗力量，努力阻止战争的时机。在我提出建议后不久，新闻上就有迹象表明，美军正在努力撤

回准备入侵伊拉克的部队，而且还有人开始转变媒体的叙述方式，包括中央情报局的报告，其中指出伊拉克并不构成任何威胁。我不确定有多少人知道我的作用。

但我做得太过分了，我再次在政府中有效地组织了对布什家族的抵抗。第二任美国政府中强大的新势力决定，我再也不会在美国政策中扮演任何角色，并将我彻底拒之门外。

那次事件后，我偶尔会与政府人员见面，甚至与华盛顿特区的名人通信，但从此我就永远退出了内幕政策讨论。我摆脱了多年来遭受的威胁和强烈骚扰，但也被排除在美国方面的行动之外。即使我有什么好的建议，也没有人再愿意听取我的意见。

阿尔珀博士宣布，我应该放下日本文学书稿的工作，开始从事外交或安全方面的工作，这与我目前的兴趣相符。他建议我为可能在政府部门工作做好准备。我花了很多时间与 ACDIS 的研究人员、美国空军的访问学者以及其他通过电子邮件介绍认识的人打交道。很快，我就在华盛顿特区积累了一份重要的工作联系人名单。

虽然这没有什么意义，但与我交谈过的每个人都建议我必须从国务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或其他部门的初级雇员做起。最终，我找到了一个愿意花时间帮助我解决这个过程中的细节问题的人。这个人就是罗伯特-萨特（Robert (Bob) Sutter），他是乔治敦大学的教授，有情报学背景，也是中国安全问题专家。他在大约六个月的时间里将我置于他的羽翼之下。他就

我能做的工作向我提出建议，并向我介绍我应该与之交谈的人。其中有些人从未回复过我的邮件，但有些人则与我进行了广泛的交谈。

后来，我在韩国大使馆工作时曾多次在华盛顿与鲍勃会面，他甚至安排我在乔治敦大学做了一次小型演讲。我们失去联系多年，但十年后又通过电子邮件联系上了。

这个过程与我之前在 2001 年寻找工作的过程并无太大不同。我会通过鲍勃或其他人的介绍，认识一些来自学术界、政府或政界的人，然后我们会进行一系列激烈的讨论，接着是大量的电子邮件往来。然后这个过程就会突然结束，没有一次工作机会，甚至没有一次参加活动的机会。但我仍然认为这是值得的。我心想，我遇到的每一个人都会让我意识到，我是一个勤奋工作、心地善良的人。我认为，这种认识可能意味着生与死的区别。但我们现在谈论的不再是普通朋友。

萨特给了我一份专家名单，让我向他们咨询可能从事的政府工作。我开始了一个耗费时间的过程，与智囊团、政府和商界的大约三四十人联系，询问可能的职业。虽然我并不真诚地相信任何一条线索都会给我带来工作机会，但我觉得认真对待这个过程仍然很重要，我想看看通过这些努力，我是否能在华盛顿特区建立起一个支持者网络，他们最终可能会为我安排一些工作。

有趣的是，鲍勃介绍的那位在国家安全局工作的人是唯一一个既不接电话也不回邮件的人。2004 年，通过父亲朋友的介绍，我与国家安全局的人

简短地交谈过一次，但在那之前和之后，我与国家安全局完全没有任何交流。我不知道这是否表明该组织内部存在敌意。

2003年，我前往华盛顿特区，会见了鲍勃-萨特和他推荐的其他几位从事外交和安全工作的人士。华盛顿特区对我来说是一个陌生的世界。我已经十年没有去过那里了，也从来没有花一天时间与从事国家安全和外交工作的政府人士会面。当时，这似乎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机会，因为我在伊利诺伊大学的活动受到了很大限制。

我在华盛顿特区遇到的人对我说的话很感兴趣，他们很重视我的意见。在香槟市，我作为教授的作用微乎其微。我靠微薄的薪水养家糊口，多年来没有机会去任何地方旅行。我的妻子比我更感到困顿。她渴望搬到华盛顿特区。我们想找到某种方法离开香槟市，但每一次机会都是死路一条。

我相信，在此期间，我与在华盛顿特区遇到的从事东亚安全研究的研究人员和政府官员的通信为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会。如果我采取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共识态度，模仿“腰带通道”内部人士的风格，我想他们就会认真对待我，并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接受我。如果我开始撰写文章，为美国的自由贸易政策辩护，或主张与日本进行军事合作，我就会有更多的机会。

问题是，我对自己亲眼目睹的腐败和犯罪行为深恶痛绝，对我来说，中情局或五角大楼的唯一吸引力在于，这些机构内部有一小撮无所畏惧的人，他们愿意不计风险，挺身而出，反对腐败。我对遵守公认的准则以获得一份舒适的工作毫无兴趣。我从未想过要走这样一条职业道路。

17 年后回想起来，当时的我似乎有些天真，不知道联邦政府究竟是如何运作的，也不知道那些工作机会是否真的有可能实现，但考虑到我完全与世隔绝，寻找某种机会也是理所当然的。

这一时期的另一个重要发展是我尝试制定一种新的整体安全方法。我在抵达华盛顿特区后详细阐述了这些想法，并在《真相》（一份网络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广受读者欢迎的文章，阐述了这些观点。文章发表两天后，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洛克利尔上将访问哈佛（2013 年），与专家讨论气候变化问题，并阐述了与我所表达的观点相近的意见。

我无法证明其中的因果关系，但我认为它影响深远。遗憾的是，这场辩论中的许多内容都被用于危险的地球工程、碳交易和其他骗局。

真理报》上的这篇文章是对我与约翰-费弗（John Feffer）于 2012 年 10 月合写的一篇题为《从太平洋支点到绿色革命》（"From Pacific Pivot to Green Revolution"）的文章的阐述，这篇文章发表在《聚焦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in Focus）上。

文章详细描述了美国军队为直接应对气候变化而进行的全面调整。其理念是，安全方面的创新不应局限于提出新的武器系统，还必须包括在最根本的层面上对安全进行定义。这些想法可以追溯到我 2003 年关于台湾的演讲，我在演讲中讨论了技术的发展以及由此导致的民族国家的分裂，认为这是当前体系中被忽视的一个关键安全问题。

我想讨论的是真正的威胁是什么，而不是企业愿意资助什么。我认为，我的经历给我造成了创伤，我是如何违背自己的意愿被卷入政治冲突并受到多年惩罚的，这使我不愿在安全定义问题上妥协。我的观点在美国专家中是独一无二的，但却产生了真正的影响。

2003 年春，我应邀在日本驻芝加哥领事馆发表演讲，这是我在 2003-2004 年与日本进行大量交流的短暂时期。我为听众讲述了美国在东亚的角色，并与总领事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我前往华盛顿。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自己即将重归主流。我还获得了日本基金会的资助，继续在日本撰写关于日本文学的著作--这是一个重大突破。

我甚至对再次重温我的书的主题产生了一些热情，并期待着在离开几年后重返日本。在东京的那个夏天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经历之一。本杰明非常享受在我们住的国立小房子里度过的时光，而承恩则和附近年轻的日本母亲们交了很多朋友。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和本杰明在公园里玩耍，并把他送到当地的幼儿园，在那里他的日语变得相当流利。

我为自己的著作撰写了新的一页，讲述中文叙事对 18 世纪日本的影响，甚至还与我在东京大学的两位导师长岛宏明和信广慎二会面，讨论我的工作。虽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还是努力回到日本文学教授的轨道上来。我的脑海中又浮现出一些概念，于是我整理了一份手稿，最终于 2011 年由首尔国立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3 年秋天，我被伊利诺伊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重新聘为助理教授，我的终身教职时间正式倒退两年，因此我将在 2004 年接受第三年的审查。

我被分配了两门课，并再次被邀请参加教员会议。虽然我不再觉得自己是系里的一员，但我偶尔也会与其他教员见面，并重新开始教书，这让我感到很自在。然而，在我的生活中，我的学生远比我的学术同事更重要。

令我惊讶的是，我的学生们对美国大规模的政治混乱完全视而不见。有时，我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明确的话题提出来讨论。我想我是极少数这样做的教授之一。也许我在日本度过的岁月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我对世界的看法。也许是在国外的那些年让我看到了美国意识形态的扭曲，而包括我的家人在内的美国人却无法或不愿看到这些扭曲。

2003 年秋天也是我第一次用简短的文字描述自己的遭遇。我用五页纸概括了事件的主要轮廓，对细节和人名避而不谈。我想启动真相与和解的进程，但没有其他人对此感兴趣。我最终给母亲、父亲和哥哥寄了一份副本。父亲后来回信说他收到了。我没有得到母亲或哥哥的明确答复。后来与母亲和哥哥的谈话表明，他们读了我写的东西，但不想讨论此事。

2006 年，我的母亲、父亲和哥哥有一段时间愿意（分别）倾听我的讲述，但不愿意就所发生的事情向我提出任何有意义的问题。2007 年之后，有目的对话的窗口关闭了，我哥哥又开始试图戳穿我的叙述。到 2017 年，他、我父亲和我姐姐安娜又开始在背后暗示我患有精神疾病。对他们来说，这样的指控几乎成了第二天性。

我找到了伊利诺伊大学法学院教授弗朗西斯-博伊尔，他当时曾为弹劾小布什起草过文章。我记得，当我问他的办公室在哪里时，法学院的秘书一脸茫然。看来他在大学里不受教职员工欢迎，所以我的询问一定让她大吃一惊。考虑到他曾不遗余力地与布什政府作对，我以为他自然会成为我的盟友。我错了。

博伊尔似乎很喜欢和我谈论当代政治，但他不想讨论我在伊利诺伊大学的问题，只说我受到了不近人情的资深教师不公正的终身教职审查。当时，如果博伊尔愿意为我辩护，我愿意接受这个封面故事，但我对这种状况并不满意。我强烈认为，博伊尔至少应该私下对我坦诚，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他显然知道）。但这要求太过分了。2004 年春天，他确实与大卫-古德曼（David Goodman）见了面，讨论了我的案子。博伊尔告诉我，古德曼告诉他唯一的问题是我没有发表论文；这显然是个谎言，因为在那之前我已经发表了大量论文。

2004 年春天，当我被剥夺终身教职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物出现在了关于我未来的讨论中。这个人就是芝加哥大学的布鲁斯-卡明斯（Bruce Cummings），他是韩国研究领域最著名的进步人士，似乎是我的天然盟友。显然，卡明斯是我 1997 年在韩国时就认识的人，他想帮我。他为我安排了在芝加哥大学的一次演讲，并多次与我通电话。有趣的是，他还把我介绍给了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教授，一位经常为《纽约时报》撰写时事评论的英语教授。据卡明斯说，费什教授对我未来可能的工作有一些想法。费什简短而隐晦的邮件并没有解释太多，他也从未与我通过电话，或给我任何具体的建议。我想我应该感谢这样一位高人愿意看我的简历，为我的未来着想。

但是，我的家人和朋友到底被告知了什么，让他们离我如此之远，如此不愿意听到我的一面之词？后来，我研究了一下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机构发出此类警告的先例，并起草了一份我认为信件内容的副本。我的父亲和哥哥竭力坚称他们从未收到过这样一封信，但他们拒绝与我就这样一个重要的话题进行任何严肃的对话，这表明他们在对我撒谎，也许是按照咨询的具体要求在撒谎。

我认为那封信是这样写的

这封信正式要求你在与 Emanuel 贝一明 教授的所有交往中给予合作。贝一明 教授目前在美国的活动受到一系列国家安全指令的限制。这些指令的内容是保密的。请您遵守联邦调查局就您与 贝一明 教授的交往性质可能向您发出的所有指示。这些指示将由我、XXXX

警官或其他经授权的联邦调查局官员提供给你。这些建议适用于你与 贝一明 教授以口头、书面或其他形式进行的所有互动。

以下是有关 贝一明 教授在美国活动的主要限制。如果您不确定与 贝一明 教授的互动方式，请随时咨询我。

未经联邦调查局明确授权，贝一明 教授不得从美国任何机构或公司赚取收入。您被明确禁止为他的工作提供任何形式的报酬。

未经联邦调查局授权，贝一明 教授不得接受任何形式的雇佣、机构隶属关系或其他具有正式或约束性质的协会。未经联邦调查局的明确许可，您无权为他的职业生涯提供帮助。

未经联邦调查局的明确许可，贝一明 教授不得接受任何美国媒体的采访、拍照或以其他方式进行描述。

未经明确批准，贝一明 教授不得参与有关机构合作、工作合同、研究项目、教育计划或其他可能涉及财务问题的冗长讨论。

感谢您在这一敏感的国家安全行动中给予的合作。我们将随时向您通报今后的进展情况。

根据《美国法典》第 18 篇 * 2709(c)(1)，披露联邦调查局提出本函所述请求的事实可能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干扰反恐刑事调查或反情报调查，干扰外交关系，或危及个人的生命或人身安全。因此，《美国法典》第 18 卷第 2709(c)(1)和(2)条禁止你或你的任何官员、雇员或代理人披露本信，但为满足本信的要求而必须披露的人除外。

2004 年对我来说是极其混乱的一年。年初的时候，有一些迹象表明我真的有机会取得突破。我应邀参加了日本千州大学的一个网络教学项目。我与坂本元子 (Sakamoto Motoko) 进行了详细的交谈，她是这项工作的组织者，在 18th 世纪的日本文学方面著述颇丰。我非常了解她的工作。她邀请我到东京就我们计划的项目进行一系列会谈，她甚至暗示我将来可能有机会到仙州大学工作。

2004 年 4 月，我飞往千州大学与坂本教授和其他教师进行了为期三天的会谈。最重要的是，我很喜欢与那些被指派带我四处参观的年轻日本学生交谈。坂本教授邀请我到她家与她的丈夫共进晚餐，席间我们讨论了我关于 18th 世纪中国小说对日本的影响的研究工作，并就今后的学术合作进行了规划。刹那间，我觉得自己又回到了正轨。

虽然仙州大学为我的日本之行提供的资金不足以支付我的所有费用，但能再次与日本教师合作，并通过互联网直接向日本学生授课，我还是感到非常兴奋。

但就在我返回美国的几周内，整个项目戛然而止。我给坂本教授写了一封详细的感谢信，但只收到了简短的回复，似乎与我们在日本的谈话完全不符。我也给她的助手写了信，她告诉我项目被推迟了，然后就完全不回复我的邮件了。我再也没有机会给他们的学生上课，为这个项目付出的许多时间也没有得到任何补偿。整个经历令人费解。又过了十年，我才再次与日本人有了认真的交流。

2004 年春，尽管有迹象表明我的合同可能不会续签，但我的职业生涯还是出现了一些复苏，这并不是因为日本教授或布鲁斯-卡明斯（Bruce Cummings）的努力，而是因为在政府工作层面重新出现了一些头脑清醒的人物，他们是上几代人中幸存下来的，因为他们受到了国务院的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和中央情报局的乔治-特尼特（George Tenet）（以及国防部内其他不太知名的人物）的保护）。当时，人们相信，民主党人会以某种方式当选总统，民主党也会控制国会参众两院。

这种可能性是真实存在的，但并没有持续下去。支持布什的派别采取严厉措施，将所有不支持强硬派的人赶走。到 2004 年 5 月，由一群更加残暴和无情的人物掌管的布什第二任期的过渡已经确定，我在美国的职业生涯基本上结束了。我的情况令人震惊，但这与丹尼斯-库奇尼奇（Dennis Kucinich）和罗恩-保罗（Ron Paul）被永远赶出众议院的方式，或拉里-威尔克森（Larry Wilkerson）等人被赶出国务院的方式并无太大区别。

对我来说，2004 年的另一项重要发展是我与丹尼斯-库奇尼奇（Dennis Kucinich）在 4 月份开始的总统竞选活动中的合作。丹尼斯-库奇尼奇（Dennis Kucinich）是仅存的一位有胆量与布什政府对抗的国会议员（与

罗恩-保罗 (Ron Paul) 并列) (当然 , 他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 。他提出了弹劾条款 , 还对布什政府提名的职位人选提出了有理有据的尖锐问题。库契尼奇的工作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 我认为他是唯一值得支持的总统候选人。2004 年春 , 我进入了几个有关美国政治的在线讨论组 , 并找到了一些愿意为更美好的社会而努力的坚定而有思想的人。

在我通过电子邮件讨论库奇尼奇的过程中认识的人中 , 有几位最终成为了我的好朋友 , 比如库奇尼奇的竞选经理戴维-斯旺森 (David Swanson) , 他后来经营了 "超越战争的世界" (World Beyond War) , 这是一个旨在结束战争、建立可持续和平的全球性运动 , 他曾多次向我提供支持。我还认识了吉姆-川上 (Jim Kawakami) , 他是洛杉矶人 , 几年来一直是最亲密的朋友 (在线) 之一 , 2004 年我几乎每天都给他发邮件。后来 , 川上在他的文章 (包括我帮他设计的通讯) 中变成了非常主流的民主党路线 , 我们也因此渐行渐远。

我不认为库契尼奇是一个有效的政治家。他的提案没有足够的说服力 , 他的 "和平部 " 法案也被描述得过于天真 , 很难想象他将如何获得任何支持。但他明确强调了气候变化和财富分配等关键问题 , 这是其他人无法做到的 , 而且他对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提出了积极的愿景 , 这比伯尼-桑德斯在竞选中提出的愿景要好得多。

我认为库契尼奇的竞选活动整体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 我花了很多很多时间向讨论小组和他的竞选团队成员提出建议 , 告诉他们他应该如何对待初选 , 如何才能获得强有力的广泛支持。这一过程对我来说是极好的培训 ,

我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许多政治理念和策略。我还发现自己因此而远离了日本文学研究。

我原以为库西尼奇并不打算在竞选中坚持太久。但我们（我和讨论组中的其他一些人）设法提出了相当有力的论据，说明他为什么应该坚持竞选到底，而且我们还提出了改进他的方法的建议，这给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动力。不过，民主党内部的隐秘势力显然不希望他太成功，他迫于压力不得不减少发言。我参与讨论的时间越长，就越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想法遭到了最高层的否决，库契尼奇在民主党内也无能为力。有时，他看起来就像一个崩溃的人。当然，2006年我在华盛顿特区见到他时，他就是这个样子。他对我非常热情，承诺如果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取得成功，他就会给我找工作，但我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

最终，我们的努力让他在竞选中坚持到了最后，这也给约翰-克里施加了政治压力，使他在最终获得提名时对布什发表了强烈的批评言论。但这个项目令人沮丧。我看到热情的追随者被政治操作者误导，话题不断回到琐碎的问题上，远离了真正的政策辩论。

这段经历让我相信，美国社会中存在着一种赤裸裸的堕落，它正不可避免地将我们引向前所未有的灾难。我曾希望，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就能真正改变国家的发展方向，甚至将危机转化为机遇，但现在我不再这么想了。虽然我并没有完全失去行动的动力，但我越来越觉得，我们无法在政治体制或政府中取得什么成就，只有灾难才能唤醒我的美国同胞。

我在库奇尼奇团队的工作也让我学会了如何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快速写出概念和主题。这是与学术写作完全不同的技能。我的电子邮件一点一点地把我拖向新闻方向。我发现自己最擅长的是撰写关于当代问题的两页长的短文。与我的学术写作不同，我喜欢这样的工作。然而，这种转变不仅仅是个人的进化。我基本上失去了与亚洲研究领域的同行交流的机会，虽然今后我还会在学术会议上发言，但我从未觉得自己是这个圈子的一员。学术界对美国社会的影响也在急剧下降。

与阿尔珀和其他教职员工的谈话，以及我对大学管理层对我日益冷漠的普遍看法，都表明我无法通过 2004 年 5 月的终身教职审查。委员会从未与我会面，对我的实际工作也兴趣不大。毫无疑问，我发表的学术论文足以让我续约，但我知道，如果当权者做出裁决，我也无能为力。我采取了三项准备措施：1）我跟进鲍勃-萨特推荐的政府和智囊团中的各种关系；2）我开始广泛申请全国各地大学和学院的学术职位，包括那些在正常情况下我永远不会申请的不起眼的小机构；3）我开始在当地一所名为帕克兰学院的社区机构增教一门课。我被告知，如果我愿意，可以无限期地继续在那里任教，但我没有任何福利，工资也相当低。在最坏的情况下，考虑到我不想再呆在香槟市，那里暂时还能给我提供一份工作。

没有一所大学、非政府组织、公司或任何其他组织根据我的信件或电话通知我去面试。甚至只有少数人愿意给我回信。

多年后，我的一位马克思主义朋友说，主要问题在于我是阶级的叛徒。虽然我不喜欢这种简化分析，但我不得不说，这种解释有一定的逻辑性。我所说的一些话打破了美国许多专业人士为证明自己与极权政府合作的正当

性而编造的故事情节。作为体制内的一员，我一直在指出系统性的错误，这让我感到特别刺耳和恼火。最终，我的存在提醒人们，有些事情错得离谱，因此，对所有人来说，干脆没有我在身边会更舒服一些。

后来，我的家人和其他人暗示，我找不到工作的原因是我在伊利诺伊大学遇到的问题。这种说法显然是不诚实的；这是一种避免讨论黑名单的方式，当时这个话题并不局限于我，但他们认为这是禁忌。我与我在所在的系关系相对较好，我怀疑他们是否花了很多时间向第三方谈论他们与我相处得如何不好。

我也不了解美国正在发生的政治斗争，而我可以在《纽约时报》甚至垃圾邮件中找到有助于我了解真实情况的参考资料，但这一次我却一无所获。到2004年夏天，在媒体上找不到任何关于我的案件的报道。此外，我与政府人员和国际关系人员的交流也大大减少，尽管还没有达到零。我似乎正在走向失业，或者是根本性的就业不足，也许是在帕克兰学院兼职工作。

不过，有一次工作机会确实让我更上一层楼，然后就有了面试和工作机会。这个机会的出现相当偶然。2004年4月，我走在伊利诺伊大学的校园里，遇到了在伊利诺伊大楼举行的大型招聘会，招聘毕业生进入政府部门工作。我在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的展台前闲逛，并与中央情报局的一位招聘人员进行了非正式交谈。我并没有把这次谈话当回事，因为在过去的四年里，我与政府机构、大学、非政府组织或其他组织的每一次谈话都遭到了拒绝。但我还是把名片留给了招聘人员，然后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几天后，招聘人员给我写了一封电子邮件，我给他发了一份我最近的简历（在语言治疗课上修改过很多）。他把这份简历转给了其他人，几周后，我被告知需要更多的履历细节。最后，有人建议我在 2004 年秋季申请 FBIS（对外广播信息服务处）日本分部的职位，这是中央情报局专门负责公开情报的部门。我当然同意了，他们给了我中文、日文和韩文报纸上的文章，并要求我翻译这些文章，作为一级测试的一部分。

FBIS 是联邦政府中一个历史悠久的组织，为政府官员提供世界各地高级报纸重要文章的英文翻译。它是国务院和其他政府部门成员的重要信息来源，提供最可靠的当地语言（而非英语期刊）实际内容的翻译。

2004 年 5 月，我前往华盛顿参加了最后一次可悲的外交考试，并利用这次机会会见了当地大学和政府中对亚洲感兴趣的各界人士。我有机会见到了一位在 FBIS 日本团队工作的年轻人，我们参观了办公室。我与其他一些员工交流了几句，甚至还碰到了韩国团队的人。虽然访问时间很短，但该办事处所做的努力表明，我的申请受到了重视。

到 2004 年夏天，申请 FBIS 是我唯一剩下的就业希望。我完全意识到自己有可能在帕克兰学院兼职任教，甚至失业。

有两个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 FBIS 这份工作对我来说仍然是开放的，而其他所有的工作都消失了。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中情局是一个有足够实力的组织，内部有深厚、复杂的融资结构支持；外部任何人都无法控制它的派系。这种“深层国家”结构相当危险，但有时也有明显的优势，

因为即使某个派别控制了白宫和国会，中情局内部仍有一些圈子可以说不。这就是我最终与中情局扯上关系的原因。

此外，我认为那些支持我也希望在我极度紧张的时期给我一些希望。我的未来看起来相当黯淡，他们不希望我过于气馁。

2004年9月，我被叫到弗吉尼亚州的雷斯頓，参加财务与预算信息系统日语翻译职位的面试。说实话，我不知道这次面试是认真的，还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游戏的一部分。也许许多参与面试的人也不知道。也许直到最后都是模棱两可的。我所知道的是，尽管中央情报局应该报销我的机票，但尽管我多次提出要求，却从未收到付款。

下午，我从芝加哥奥黑尔机场飞往华盛顿，住在面试地点附近的一家假日酒店。酒店里挤满了前来中情局面试的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虽然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以为整个面试过程都是保密的，但很快我们就发现，在雷斯頓并没有什么特别秘密的事情，我们在登记入住时就被公开发放了中央情报局的资料袋，并被告知何时登上酒店门口的面包车将我们送往面试地点。

我很享受在那里与年轻人的交谈。同时，看到他们的公共服务理想如何被无情的私有化政府锯成碎片，我也感到非常难过。他们中的许多人与我在伊利诺伊大学的学生年龄相仿。

一位平淡无奇的官僚对我们进行了简短的欢迎致辞，然后每个人都开始与来自不同部门的专家进行一系列一对一的访谈。我忠实地按照自己的马尼拉信封里打印好的日程安排进行了采访。

虽然我已经忘记了大部分访谈的内容，但有两个访谈让我记忆犹新。其中一次是我与一位心理学家的会面，地点在一个可以俯瞰森林美景的角落房间里。房间里的书架上摆满了有关心理健康的著作，这让我想起了阿尔珀的办公室。桌子对面坐着一位老妇人，说话时隐约带着东欧口音。她问了我一连串的问题，包括我的价值观、我父母的离婚以及我迄今为止的生活进展。她的表情很文艺，甚至有些俏皮，我感觉她似乎是在试图为我的人生描绘一幅类似于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笔下的“千面英雄”（*Hero of a Thousand Faces*）的史诗画卷，而不是在官僚机构中为我找到一个匹配的对象。谈话结束后，我觉得一切都不尽如人意，在中情局这个机构的深处，有一些人性的角落，正是因为与世隔绝，才得以茁壮成长。

这一天面谈的高潮是我见到了“鲍勃”，他是一位长期从事情报工作的专家，看起来级别很高，被指派对我进行测谎。在这一天里，我和他见了三次面，他似乎是负责人。他还表示，他一整天都在监视我。鲍勃的话很有深意，他对我的称呼也很熟悉，这说明他可能就是在伊利诺伊大学时密切观察我的人之一。这是他唯一一次真正见到我本人的机会。我没有关于此事的任何具体证据，但我从我们立即以朋友身份互动的方式暗示了这种长期关系。

我感觉到了这种关系的存在，在我们第一次短暂会面后分别时，我对“鲍勃”说：“我一直都很依赖陌生人的善意。他轻轻一笑，表示感谢。

当天早些时候，一个 30 岁左右的年轻人把我带到装有测谎仪的房间，让我躺下，他把电极装到我的身上进行监测。我们准备就绪后，他开始问我一系列关于我的生活和工作的问題。这些问题不言自明，甚至有些平淡无

奇。我完全诚实地回答了他们。我想，虽然这个年轻人可能不知道我是谁，但那些观察我的人肯定比我自己更了解我。这个过程顺利地进行了大约 30 分钟。

但当他问我有关我在伊利诺伊大学任教的问题时，突然响起了一个相当大的蜂鸣器，就像火警警报器一样。他停了下来，再次向我提问。

恐怕我想不起来确切的问题，但我相信我已经尽可能准确地回答了问题。我绝不是锦上添花。呼叫器再次响起。那个年轻人离开了房间，鲍勃代替他进来了（估计是在幕后观察了我）。鲍勃开始问我更具体的问题，关于我在伊利诺伊大学的工作，以及我离开的原因。哔哔声不时响起，整个过程开始像一出喜剧。

最后，我开始厌倦了这个节目。我告诉他，“听着，为什么我不从头开始讲述整个故事呢？”

“当然，好主意。慢慢来。”鲍勃回应道。

我开始向他讲述从 2000 年 7 月我去亚洲旅行到现在的主要故事。鲍勃认真地做着笔记，不停地向我询问人名和大致日期。但在这个过程中，鲍勃有时也会越俎代庖，提出一些我的故事中没有的细节，来说明那些对我如此苛刻的人的动机。例如，他认为军方中反对我的观点的最重要团体是那些提倡“导弹防御”的派别。我以前从未提倡过这样的解释。

大约 90 分钟后，鲍勃宣布当天的工作到此结束，但他希望我不久后能再来一次。我告诉他我很期待，然后我们握手告别。我想当时我们俩都很享受这次谈话。遗憾的是，我再也见不到鲍勃了。几周后，我打电话到中央

情报局就业中心，询问何时需要到华盛顿参加后续面试。接电话的女人告诉我，我已经顺利完成了面试，我应该等一封信，告诉我的任务。

我回到伊利诺伊大学，教完了最后一个学期。我感到心平气和，但完全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我与伊利诺伊大学的关系彻底结束了。很少有人与我交流，我在自己的系里几乎是个陌生人。也许与其说是我被排斥，不如说是其他教师担心我会说出这件“绝不能提及的事”，让他们陷入困境。

学期结束时，我面临着从一月份开始的失业（没有积蓄，也没有工作前景），我收到了一封信，信上说我已获准在 FBIS 担任分析员。信中没有写明开始工作的日期，显然也不是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聘书。它确实表明我已经通过了安全测试，一旦程序完成，我就会被录用。

虽然我和妻子在很多事情上意见都不一致，但在这件事上，我们并没有意见分歧。我们都认为应该卖掉房子，带着当时三岁的本杰明和 2004 年 7 月刚出生的女儿瑞秋搬到华盛顿。对我来说，香槟市几乎没有什么发展前景。伊利诺伊州还有各种各样的种族主义者，他们不希望我和我的亲亚合作倡议生根发芽。

我想，即使 FBIS 的邀请没有结果，只要我花一周的时间四处奔波，与介绍给我的各种人见面，就一定会找到某种工作，或者至少我的机会会更大一些。

我们聘请了在教堂街找到房子的同一位房地产经纪人鲍勃-沃勒（Bob Waller）将房子挂牌出售。他很快就卖掉了房子，我们小赚了几千美元。

我们无法将出售房子的时机与我们搬到华盛顿的计划完美地结合起来，因此我们决定在 Orchard Downs 教工宿舍按月租一间小公寓，我刚开始在伊利诺伊大学任教时，我们就住在那里。这是一套非常简单的两室一厅公寓，由于有两个小孩和很多行李，变得相当拥挤。我们原本打算带走的家具都放在了仓库里。

幸运的是，孩子们还太小，无法理解发生了什么。承恩和她所信任的算命先生完全相信，FBIS 的工作将是我辉煌新事业的开始。她甚至让我打电话给她在莫桑比克的父亲（他最近在那里开了一家工厂），告诉他我的新工作。我对这一举动感到相当不安，怀疑这份工作会不会有什么结果，但我确实认为未来还是有希望的。虽然小布什第二任期内的美国看起来更加压抑和法西斯化，但至少还是有一些积极的迹象。我不再受到任何骚扰。也许有人偷看我的邮件，偷听我的电话，但他们完全没有干涉我的日常生活。我也很高兴能离开香槟市。

圣诞节前，我参加了在外语大楼为我们系成员举行的一个小型聚会，这给了我一个告别的机会。在同事们面前，我尽力表现得自信满满，甚至有些目中无人。没有人问我下一步的打算，同事们也大多避而不谈。杰里-帕卡德送给我一块伊利诺伊大学的手表作为礼物。我收下了它，并说了几句大学对我有多么重要（但没说具体是什么如此重要）。我还记得凯伦-凯斯利（Karen Kesley），一位新聘的初级教员，她将教我的课，她对我说了一些奇怪的话，说“你不可能赢得所有”，这让我觉得特别奇怪。不过，最后一次活动结束得很痛快，我很高兴能回到家人身边。

2004 年 12 月，我们通过搬家公司将大部分财产运往华盛顿特区，暂时存放在那里。然后，我们把六个月大的瑞秋和四岁大的本杰明送进我们的福特金牛座，搭上一辆小型 U-Haul 拖车，踏上了前往华盛顿的史诗般的旅程。我们在俄亥俄州的一家旅馆停了下来，大家一起睡在一张大床上。第二天，我们抵达目的地，虽然疲惫不堪，但却异常兴奋，为来到一个全新的环境而激动不已。

搬到华盛顿这样一个昂贵的城市，既没钱又没有确定的就业前景，虽然有一定的风险，但总比呆在香槟这个没有任何利用我的技能的选择的小镇要好得多。我希望能在华盛顿特区找到新的出路。

承恩把我光荣的新职业告诉了她住在华盛顿的妹妹英淑，大家都以为我们的一切都安排好了。但我还没有收到最后的确认信。到华盛顿后，我看到布什政府是如何牢牢地控制着一切，并开始在各个智囊团结识朋友，因此我几乎放弃了对 FBIS 工作的所有希望。承恩的姐姐以为我们会在她们家住上一周，然后钱就会源源不断地到账，我们就可以买自己的房子了。

永淑在弗吉尼亚州北部一个昂贵的社区有一栋大房子，生活相当舒适，这让她的这次逗留变得更加痛苦。相比之下，我们简直一无所有，而且，据我所知，我们正在走向经济灾难。承恩告诉她姐姐和她住在附近的叔叔关于我新工作的故事，确实提高了我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

在我们出发之前，我就开始联系我的亚洲专家名单上的人，从我们抵达的第二天起，我就安排了一系列采访。我将会见智库专家、律师、政府官员、顾问，甚至是父亲推荐给我的几位朋友。虽然承恩很乐意和她姐姐坐在厨

房里闲聊各种家庭琐事，吹嘘她丈夫的新职业，但我觉得我们的生存将是一场持久战。

我收到了国务院两位外语口译员对我邮件的友好回复，他们建议我可以为他们找一份口译和笔译的临时工作。我安排第二天早上去雾谷地铁站与国务院的中日高级口译员会面。我不记得中文口译员的名字了。他是中国人，但已在美国生活多年。日语口译员是查尔斯-赫希（Charles Hershey），他才华横溢，比我小几岁，多年来一直是国务院最高级别的口译员。

我去这位中国口译员的办公室拜访了他，我们边喝咖啡边愉快地交谈了专业口译的现实问题。我告诉他，我没有受过任何培训，但对中文、日文和韩文有一定的掌握。他立刻拿起一本杂志，大声朗读了一段英文，然后让我把它翻译成中文。我尽力而为，但做得很不完美。他怀疑地看着我，指出我在翻译中犯了一些相当初级的错误。我没有异议，但我觉得这次突击测试的整个形式相当奇怪。面试结果与我之前的经历颇为相似。

第二天，我与查尔斯-赫希的会面更具实质性。我们详谈了各自的职业生涯，并找出了我们经历中的共同点，从而加深了理解。他承诺会研究一下可能存在的机会，并在几天内给我回电话。

两天后，查尔斯打电话给我，我们谈了大约四十分钟。在谈了几句华盛顿特区自由职业者可以从事的工作之后，他还为我做了一个简短的测试。这真是一场好戏。测试中有一半时间他都在用南方口音说话，仿佛他是一个对日本一无所知的政客。他使用了大量专业语言，给我的同声传译时间相对较少。

我尽力完成了这项相当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礼貌地听我说完，然后说：“你的日语知识显然很精深，但在这种实际工作中却没有受过多少训练。我欣然同意他的评价。他告诉我，如果他对我可能找到的工作有什么想法，他会再打电话给我。但大约一年后，安倍晋三首相在威拉德酒店发表演讲时，他担任了首相的翻译，当时我们进行了简短的交谈。

我在智囊团和律师事务所遇到的人普遍友好热情，对我的到来感到非常高兴。这种善意本身就足以让我坚持下去，在这个完全疯狂的世界里为理智发声。当我不在人行道上奔波时，我就把修改过的简历转发给华盛顿各地的人，并安排约会。

一路上，我的好友、宾夕法尼亚大学中国文学教授维克多-迈尔（Victor Mair）承担了一项相当复杂的任务，为我在他的系里争取到了为期一年的客座教授身份。这个职位没有收入，但给了我一个可以写在名片上的正式职位，我还应邀访问过一次，并做了一次演讲。我还可以使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图书馆，但我从来没有使用过。这种隶属关系最终确定下来，为我提供了一种不显得失业的手段。

在她姐姐家住了大约 10 天后，Seung-Eun 向我解释说，我们已经不受欢迎了，需要搬走。不用说，这件事让我非常恼火，因为她自己根本没有努力找工作，而且她还在我们的身份问题上欺骗了她的家人。但我也知道承恩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我觉得我应该感谢她一直和我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女人都会一走了之。

考虑到我们情况的严重性，她姐姐的这一反应似乎很不公平，但已经没有时间去担心这个问题了。我用剩下的钱买了机票，让家人回韩国和她母亲住在一起。这将给他们带来些许稳定，让他们远离我在美国找工作的紧张过程。同时，我问我的表弟曼尼（Manny），在我找工作期间，我是否可以在他家住几个星期。曼尼欣然同意。

我通过电话向父亲了解了我的情况。虽然他显然知道我和我的妻子及两个年幼的孩子一直在华盛顿，而且就业前景不明朗，但他并没有与我联系，而且他回避了任何有关核心问题的谈话：他的儿子，一位著名的美国亚洲问题专家，究竟为什么在美国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工作，做任何事情。父亲听了我的故事，没有发表任何意见。最后，在沉默了一会儿之后，他同意寄给我 2500 美元，以帮助我解决眼前的经济问题。他告诉我，他再也帮不了我什么了。

这样的回答让我很受伤，于是我开始向他详细说明我生活中的实际情况。几个月前，我已经给他写了一封信，用几页纸概括了主要问题，但他一直没有回复。父亲驳斥了我关于被列入黑名单的“阴谋论”，并很快结束了谈话。虽然我的其他家人后来告诉我，父亲曾尽力帮助我，但我的印象是，他根本不愿意采取任何行动来查明事实真相，而且基本上是在积极参与针对我的犯罪阴谋。我的其他家人和同事或多或少也是如此。

把我的家人送回韩国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但这让我腾出时间来认真地找工作。几天之内，我不仅见到了律师和外交官，还见到了临时职业介绍所的经理。他们也没能给我找到任何工作。经过一番考虑，我决定最好还

是集中精力发挥自己的特长，努力找到一份真正的工作，而不是消失在秘书的岗位上，从此可能再也无法重见天日。

与我的表兄曼尼-帕斯特雷奇（Manny 贝一明）在一起的经历也很有趣。他与女婿一起创办了镀银企业科汉-埃普纳（Cohan Epner），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赚了不少钱（尽管后来因经营不善而血本无归）。曼尼-科汉喜欢举行盛大的家庭聚会，溺爱他的孙子孙女，家族中的每个人都对他怀有深厚的感情（不过，在他的工厂里工作的那些收入微薄的黑人工人可能就不会这么想了）。

父亲为我取名贝一明-帕斯特雷奇，以纪念他敬爱的祖父。我的母亲是欧洲人，她同意了这个名字，但条件是我必须叫贝一明，而不是曼尼。我父亲的弟弟比尔在 20 世纪 70 年代深入参与了组织穷人和医院工人的活动，他也给自己的儿子取名贝一明，但他的儿子叫曼尼。

在某种程度上，贝一明和曼尼体现了一种轻微的家族竞争关系，即谁的儿子会更成功。我们各有所长，学习成绩都不错。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到最后，我们不再是竞争对手，因为我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

曼尼继承了父亲的事业，加入了有组织的工会。他在国际服务雇员工会（SEIU）担任组织者。很快，他就做起了文职工作，拿着高薪，远远超过了我在伊利诺伊大学的收入。他很少冒险，在我看来，他与 SEIU 相当反动的立场是一致的。他在 Facebook 上发表的帖子从未提及任何有关调查

工会腐败的努力，他也忽视了囚犯的罢工和其他非主流工会工人的不便努力。他在 Facebook 上对监狱罢工的沉默令我非常震惊，于是我给他写了一封邮件。他回复说他对此一无所知，并表示不感兴趣。

我认为他的心态受到了他与梅丽莎的婚姻的影响，梅丽莎是一名医疗保健领域的公司律师，因为她的工作有问题而赚取了丰厚的薪水。他在华盛顿特区北边的时尚街区有一栋大房子，他的孩子们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关系一直很好，多年来偶尔也会有重要的交流。在我进入耶鲁大学几年后，他考上了哈佛大学，我们在家庭活动中互相陪伴，其乐融融。

现在的问题是，曼尼的表弟因为坚持法治和反对军国主义而陷入了可怕的政治麻烦，他该怎么办？他自己的表弟显然被列入了黑名单，无法在美国工作，而且因为努力恢复美国政策的理智而不断受到骚扰，他现在会怎么做呢？

我不太情愿问曼尼我是否可以住在他家，但当时我真的别无选择。我几乎身无分文，父亲也只给了我一点钱让我渡过难关。我还想，也许在我们逗留期间，曼尼会问我发生了什么事，当他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后，他会通过他广泛的关系网，在华盛顿的某个层面为我说话。我的这种想法太天真了。

在一次电话交谈中，曼尼说他很高兴在我找工作的几个星期里让我和他在一起，他的语气非常欢迎我。不到三天，我的妻子和孩子就坐上了飞往韩国的飞机，而我也在曼尼和梅丽莎家三楼的一个舒适的小房间里安顿下来。

那里的环境很舒适，我和曼尼、梅丽莎以及他们的三个孩子一起吃饭，然后我就在电脑前忙到深夜，试图找到一份工作。给全国各地的人写邮件，请求介绍华盛顿特区的人帮我，写自我介绍，这些内容最终会成为我在2001年早些时候开始撰写的政策文章的一部分。然后就是与华盛顿的各种内部人士会面，寻求帮助。

事实证明，与曼尼和梅丽莎的谈话内容极为有限。我没有把话题引向我的政治问题。但我以为，到了一定时候，曼尼会开始问我一些有意义的问题，也许会带我到树林里散步，进行一次坦诚的谈话，或者表示有兴趣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或者只是想知道他能提供什么帮助。但这种情况从未发生过。

他很体贴，告诉我怎么去我需要去的地方。他彬彬有礼，乐于为我提供干净的毛巾和饭菜。当我谈到可能的工作机会时，他听了我的话，但他刻意避免讨论我为什么失业、为什么没有人愿意雇用我，或者我到底想做什么。

梅丽莎并没有什么不同，不过因为她不是我的家人，所以和她聊天比较轻松。我没有试图告诉她或曼尼他们不想听的故事。我只是继续在华盛顿见人，继续写邮件，继续思考我是否有可能搬到韩国，或者做些别的事情来摆脱困境。我已经明确下定决心，如果他们问我问题，我一定会清楚地回答。

我清楚地记得与曼尼的父母比尔和安妮共进晚餐的两个瞬间。那是一次盛大的家庭聚餐，曼尼和梅丽莎的家人以及一些朋友都来了。

晚餐进行得很顺利。大家都聚集在厨房，然后在宽敞的木地板餐厅里吃了一顿美味的自助餐。

首先是我与曼尼的母亲安妮短暂的交流。她对我表现出明显的恼怒，这与我们之前几十年的亲密关系形成了鲜明对比。

我想，她觉得我应该多吃一些，帮助提供晚餐，而且我应该与在场的其他人更多交流，更幽默一些。我确信，我并不幽默，也不容易与人交谈。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活下来。

她的恼怒似乎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我失业、被迫到表姐家避难是正常的，没有理由对我的处境表示任何理解。不用说，安妮没有问我任何关于我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她甚至没有问我家人为什么要回韩国。我没有心情接受她对我的行为。除了几年后在旧金山与安妮姨妈打过一次简短的招呼外，这简直是我最后一次与她交流。

第二件事发生在晚饭后，我们一起坐在客厅里。比尔叔叔不经意地对我说“你为什么不申请失业呢？”

这一评论在多个层面上都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这是个好建议。我已经失业五个星期了，我当然应该更早地申请失业。这并不是我无能的表现，而是因为我当时的注意力只集中在保命上，而不是想方设法找工作。这是我的失误，但也是特殊情况下的产物。

比尔的这番话深深地刺激了我。这番话表明，他唯一的责任就是就我目前的状况提出建议，而不讨论我为什么失业。他是穷人运动的左派组织者，现在却在装傻充愣，甘愿做法西斯的合作者，这实在令人匪夷所思。这种虚伪和不诚实让我受不了。失业保险是我最不关心的问题。如果他关心我，他就会关注我的正当程序权。

在曼尼家还发生了一件让我记忆犹新的事。梅丽莎的妹妹来吃晚饭时，我和她聊了一会儿她的工作，她的名字我忘了。她为民主党工作了多年，现在要请一年假去一家对冲基金公司工作（大概是为了赚大钱，作为她为企业利益服务的回报）。当时，我在香槟市的民主党内还有朋友，我认为他们是在打一场漂亮仗，所以我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对该机构产生敌意。

我问她我们能不能找个时间见个面，能不能哪天我去民主党办公室看看。她一脸茫然，就好像我问她能不能借她的车用一个星期一样。然后，她紧张地环顾四周，看了看她的一个朋友，又看了看梅丽莎，最后看了看曼尼。她又犹豫了几秒钟。最后，她说："当然，我们见个面吧。"她在一张纸上为我写下了她的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地址。第二天，我给她写了一封邮件，并试着给她打电话，但没有回音。我绝对不是她认为可以交往的人。

因此，虽然和曼尼住在一起并不令人不快，我也很喜欢从他们英俊的家走到地铁站，走在绿树成荫的街道上，但我每天都觉得住在那里让我堕落了。

有几个人问我，为什么要如此直言不讳地记录很久以前发生的那些事情，这些事情不仅会对我自己，也会对其他家庭成员和同事造成伤害和羞辱。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

首先，在这篇文章中，我必须尽我所能，努力准确地反映事实真相。这种做法是必要的，因为关于我的行为和我本人，已经流传了太多错误的说法，这些说法极具误导性。我需要把真实情况公之于众。虽然关于我的案件，显然还有一些细节我仍不了解，但我对事件过程的想法与其他人不同，因为我身处其中。即使中央情报局或联邦调查局的官员仔细阅读了关于我的

行动和背景的报告，我也严重怀疑他们能否理解我与中国、韩国和日本重要人物的谈话内容，或者我的动机是什么。我希望这是一个客观的叙述，包括我明显的错误，甚至我的傲慢，以正视听。

同样重要的是，我认为自己没有责任保护或维护家人或同事。阿尔珀博士、我的前系主任杰里-帕卡德（Jerry Packard）、我的父亲、母亲、兄弟，或者我的堂兄曼尼（Manny）和他的妻子梅丽莎（Melissa），都有多次机会在小事上帮助我，想方设法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或者试图找到解决我所面临的严重问题的办法。我处理的政治问题与他们直接相关。他们拒绝这样做。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出于懦弱，也是美国精英们自私自利的文化使然。

我甚至可以说，美国精英阶层决定掩盖我的案件，而将曼宁、斯诺登或斯特林的案件公之于众，产生了极其负面的影响（显然还有像我一样默默承受痛苦的人）。这一决定在受过教育的美国人中造成了一种对当时大规模腐败的极度虚伪姿态。

我的案件已成为一种难以启齿的真相，许多人都知道，但却从未讨论过。我的家人的所作所为是一出滑稽可笑的闹剧，我认为他们有道德责任正视自己的所作所为。

第 4 章

大变革

在华盛顿特区失业的两个月里，我取得的唯一进展（除了认识了很多人之外）就是成功地被宾夕法尼亚大学聘为访问学者。中国学者维克多-迈尔（Victor Mair）是我很久以前的好朋友，他为我做了特别的努力。虽然这个职位没有给我带来任何收入，但它确实给了我一个隶属关系，让我可以使用图书馆。二月初，我还应邀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就我的研究做了一次演讲，演讲相当成功，让我从华盛顿的日常工作中解脱出来。

我一直在与一个不起眼的人物 Sangjoo Kim 通信，他是美国科伦研究所的副所长。我仍然不清楚这个组织到底是什么，但它定期在华盛顿举办研讨会，邀请主要政策人物参加。科里安-美国研究所的办公室在费城，我在访问宾夕法尼亚大学时得以与金相珠见面，我们已经有几个月的通信联系，共进了一顿愉快的午餐。

根据我们关于韩国历史的谈话，他给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邀请我参加 2 月 24 日在 Dirksen 参议院大楼举行的 ICAS 研讨会。我不清楚为什么会邀请我做演讲，但这次活动显然很高调。有趣的是，这次活动几乎正好是我从伊利诺伊大学休病假 4th 周年纪念日。

以下是本次活动的阵容：

2005 年冬季研讨会：“人类、和平与安全

美国参议院迪克森大楼，华盛顿特区

2005 年 2 月 24 日

发言者

Patrick M. Cronin，美国和平研究所研究主任

"美国在东亚的外交政策：朝鲜半岛与地区稳定"

尼古拉斯-埃伯斯塔特，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与朝鲜的红线在哪里？如果外交失败怎么办？"

Masataka Okano，日本大使馆外交官

"日本的视角：东亚的挑战"

Emanuel 贝一明，宾夕法尼亚大学访问学者

"朝鲜半岛与世界大国之间的斗争：塔夫脱-葛村协定》和《朴茨茅斯条约》
签订 100 年后"

Evans J. R. Revere，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

"朝鲜半岛的和平之路"

我谈到了《塔夫脱-葛村协定》，这是美国和日本之间的一项秘密谅解，根据该协定，华盛顿承认东京在 20th 世纪初对朝鲜的殖民统治，而东京则承认华盛顿对菲律宾的殖民统治。这个话题是 Sangjoo Kim 交给我的。我很高兴地答应了他的要求，以换取在这样一个论坛上发言的机会。我还详细谈到了东北亚的长期历史发展，这是其他发言人都没有提到的。我就外交的本质和长期视角的必要性提出了自己的思考。我认为，我所采取的

宽泛、反思和哲学的方法更类似于《葛底斯堡演说》，而不是像帕特里克-M-克罗宁（Patrick M. Cronin）等其他智库人士所做的嬉皮笑脸的演讲。这种方式与华盛顿特区的文化格格不入，很可能只能吸引少数听众。

尼古拉斯-埃伯斯塔特（Nicholas Eberstadt）和帕特里克-克罗宁（Patrick M. Cronin）都是令人喜爱的人物，他们在许多此类活动中都会提出建制派对亚洲的看法。会议室里坐满了政策观察家、国会和国务院的工作人员以及媒体成员，尤其是来自韩国和日本的媒体成员。可以说，这次研讨会是我在美国受邀参加的唯一一次如此高规格的政策活动。

我紧接着在埃文斯-雷维尔面前发言，他当时是负责东亚事务的代理副国务卿，也是一位资深外交官。此后，我与雷维尔多次相遇，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他开始适应布什日益危险和罪恶的政策。作为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生，他还学习了中文、日文和韩文，我以为我们会一见如故，但我错了。

我被邀请参加这次会议是件了不起的事。在这里，我，一个曾被职业介绍所拒绝从事秘书工作、失业了两个月的人，以演讲者的身份出现在华盛顿一场重要的政策讨论会上。我把那一刻和 FBIS 的工作邀请一样，理解为我的支持者在努力向世界表明，我没有完，他们也没有完。然而，最终他们和我一样，在华盛顿败下阵来。

讲座结束后，很多人走过来向我提出意见，但最热情的是来自日本和韩国的外交官和记者，而不是美国人。第二天，当我通过电子邮件跟进我收到的名片时，韩国和日本之间的明显差异变得一目了然。只有一位日本外交

官建议我们喝杯咖啡（我们在那一周以一种相当令人遗忘的方式喝了咖啡）。

然而，当我回到家时，却在信箱里发现了一封信，信中收回了我最初被中央情报局财务和预算信息系统录用的决定。具体内容如下

招聘中心

L100-LF7

华盛顿特区 20505

2005 年 2 月 16 日

亲爱的帕斯特雷奇先生

这封信是关于你申请在中央情报局工作的。遗憾的是，我们认定你目前不适合在中情局工作。这一决定是根据你提供的信息或在处理你的申请时透露的信息作出的。根据这些新信息，我们必须撤销 2004 年 10 月 1 日发出的有条件聘用通知。对此决定不得上诉。

虽然我们无法向你提供作出这一决定的具体原因，但许多导致一个人被确定为不适合工程处雇用的情况或情形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得到缓解。因此，你可以在一年后重新评估你的情况，并考虑届时再向工程处提出申请。

由于本决定是基于你是否适合工程处的工作，而不是安全方面的考虑，就本决定而言，你可以在今后的安全申请和表格中申明，你从未被拒绝过安全审查。我们感谢你对工程处工作的兴趣，并祝你今后工作顺利。

此致敬礼

雷根-V-丹尼尔斯

虽然我已经预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但还是很失望。

我在这次活动中遇到的两位韩国人的热情和承诺令人印象深刻。韩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外交官 Kang Ikhyun 似乎被我从文化和历史角度解释韩国立场的努力所感动。第二天，我们一起吃了寿司，他告诉我，他会想办法在韩国大使馆和韩国国内宣传我的努力。他想帮助我找工作。后来，我们有很多机会一起工作，讨论韩国和美国之间相当复杂的关系。

当天傍晚，我还见到了那位给我名片的韩国记者，《世界日报》的 Kuk Kiyeon。Kuk 是个奇怪的外国记者，他留在华盛顿特区养家糊口，放弃了公司内部的快速通道。他的思想有一定的进步倾向，马上就想出了一个办法，让一个真正了解韩国的美国人有更多的曝光机会。他比华盛顿的大多数人都更看好卢武铉政府。

Kuk 已经下定决心为我辩护，他在大约十天的时间里集中精力为我辩护。他安排我接受 KBS 电台的韩语采访，还为 Segye Ilbo 撰写了一篇关于我的文章。他把我介绍给了韩国主流媒体，这是我后来在韩国取得最大成功的源泉。在那之前，我对如何获得成功有过很多想法，但与媒体的接触从未在我的考虑之列。

最重要的是，Kiyeon 是我的朋友。他告诉我他自己的情况，以及他个人的担忧。他听我说话，而且听得很仔细，考虑得很周到。从我们谈话的过程来看，老实说，我认为他第一次见到我时并不完全了解我是谁。一路走来，他开始问我正确的问题，我也坦率地回答了，即使不是很详细。他似

乎有些困惑，但还是开始寻找更多的朋友为我辩护。然而几天后，我们又见面了，他坦言这看起来并不容易。但他并没有放弃，还经常打电话给我，给我提建议。他帮我准备了一份韩语简历，并建议我如何介绍自己。

就我个人而言，在此之前，我对韩国并没有特别的偏见。前一年，我在日本度过了一个夏天，因为日本是我的研究领域，我还与三位日本学者一起开展了一个研究项目，在一年的时间里，这个项目对我来说相当有吸引力。但日本人、中国人或美国人对我都没有这种热情。

Kiyeon 在电话中向我宣布，他已经约好与新上任的韩国驻美国大使洪锡炫见面。他告诉我，他计划以个人名义为我发出呼吁。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但与他之前所做的相比，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

与洪大使的会谈结束约 30 分钟后，Kiyeon 打电话给我，兴奋地向我解释了会谈的经过。洪大使对我的情况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他告诉基延，他认为一个对韩国如此了解的哈佛大学博士在华盛顿完全得不到重用是一种极大的浪费。洪大使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告诉 Kiyeon，他会研究一下可能的办法。

虽然我确实与日本有更密切的联系，但我也确实从韩国卢武铉新政府身上看到了一些希望，这是我在周围其他地方感受不到的。

当时的韩国总统卢武铉是一位进步的律师，他的职业生涯一开始就与军事独裁政权作斗争。在金大中总统执政末期，各种腐败丑闻被曝光，而且由于金大中推动与朝鲜接触，在小布什的领导下，韩国与美国的关系日趋紧张，西方媒体普遍认为保守派将重新掌权。但 2002 年发生了一起事件：

两名美国士兵驾驶吉普车撞死两名朝鲜女学生，然后驾车逃逸。军事法庭进行了审判，对士兵的犯罪事实不予认定。

这一事件引发了大规模抗议，并引发了对韩美关系的深刻质疑。网络媒体（如 OhMyNews）的出现扩大了这场公开辩论的影响，即使在主流媒体对卢武铉进行封杀的情况下，网络媒体也为他带来了真正的受众。他火热的演讲非常有效，尽管比一般候选人更左，但还是赢得了选举。卢毫不犹豫地谴责政府和企业的不负责任，他避开了所有传统的政治权力中心。他从未完成四年制大学学业，而在韩国社会，这通常是掌权的先决条件。他的演讲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无论对错，我都觉得他与我有某种亲缘关系，因为我曾在美国反对过军政府。

从一开始，布什政府就把卢视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他们密谋破坏他的工作，想方设法让他下台。但是，多年来一直生活在死亡威胁中的卢并不容易被吓倒。他是当时唯一一个对布什阴谋怪诞地唯命是从、有意愿直言不讳的大国元首。然而，他并不是一个政治激进分子，而是一个在疯狂世界中寻求某种平衡的人。

洪锡玄大使从卢总统手中接受了韩国驻美国大使的任命，这让他的许多保守派朋友感到惊讶。但他与卢总统的观点一致，认为有必要与朝鲜进行认真的对话，而且他也认真地表达了帮助完成这一使命的意愿。就在洪秀柱抵达华盛顿特区的前几天，他接受了基研（Kiyeon）关于我的采访。洪秀柱与卢武铉的关系并不那么亲密，但卢武铉铿锵有力的演讲以及他致力于在韩国建立一个更加透明的社会的承诺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洪大使是韩国大报《中央日报》创始人洪基真的儿子，在相当舒适的环境中长大。洪基振曾是李承晚手下的法律部长，因为拒绝执行李承晚围捕公民的所有要求而被关进监狱。政治生涯结束后，老洪担任三星集团创始人李秉喆的顾问。作为少数几个通过日本皇室最高级公务员考试的人之一，他受过高等教育，能言善辩，被认为是三星崛起背后的智囊。后来，Hong的姐姐嫁给了李秉喆的儿子、三星集团董事长李昆熙。

洪锡玄一般被视为主流保守派商界人士，他决定在卢武铉政府执政期间接受大使一职似乎相当奇怪。毕竟，卢武铉直率的风格和拒绝遵循既定的政治惯例，甚至导致他自己（原党）的民权（民主）党成员与保守派一起要求弹劾他。卢被媒体描绘成激进的左翼分子（我不认为他是这样的人），他在布鲁金斯学会和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受到广泛批评，而洪锡炫多年来一直在这些地方与主要学者培养密切关系。

尽管洪锡炫在很多方面都是保守派，并与美国和日本的主要政治保守派人士保持着密切联系，但他在某些时候也很勇敢，他拒绝在与朝鲜对话的承诺上妥协。洪博培接受大使一职是一个勇敢的决定，而当时考虑在大使馆聘用我也是一个大胆的决定。

我不知道卢总统或洪大使是如何促成我被韩国大使馆文化中心聘用的。我猜这个过程并不简单，很可能涉及到他们两人。我还认为，我的聘用肯定包括支付报酬。雇用我并不那么容易。我还认为，有几位韩国人认为，作为一个对韩国事务感兴趣的美国人，作为一个懂韩语并有成熟的政治行动记录的人，我可能相当有价值。但我认为，这个决定最终不是出于战略考虑，而是出于感情因素。许多韩国人对 20 世纪 80 年代军政府如何对待

他们记忆犹新，因此他们希望能够提供帮助。我认为他们也很感激华盛顿有一位真正学会了他们语言的美国人。

我并不一定是韩国及其文化的狂热粉丝。在韩国工作和韩国文化，尤其是当时的韩国文化，有很多让我难以接受的地方。但我认为韩国有其独特之处。韩国人愿意倾听我的意见，而日本人、中国人和美国人往往不愿意。一些韩国人坐下来认真听取我的建议。

其他大使馆，比如日本大使馆，完全有可能雇用我，或者某个美国机构也有可能接纳我。毕竟，在华盛顿特区找工作的两个月里，我和很多有关系的人都聊过天。

如果韩国大使馆的工作没有成功，我可能最终会在某个地方找到工作，但我可能会因此债台高筑。这一点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我可以说的是，韩国人不遗余力地帮助我，而这一决定并不仅仅是因为我会说韩语和嫁给了韩国人。在接下来的 13 年里，许多韩国人偶尔会提示我提出极为坦率和批评性的意见，并总是鼓励我说出真相。有时，这些讨论是在政府机构内极为公开和正式的场合进行的。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在我交往过的所有国家中，韩国人对我的性格类型最为宽容。

卢武铉总统的政府是一个进步的政治团体，几乎没有与华盛顿打交道的经验，在面对布什政府及其“邪恶轴心”演讲（他在演讲中把朝鲜称为敌人）时完全没有准备。他们对布什政府的运作方式知之甚少，在整个智囊团中也没有人可以向他们咨询。我相信，卢或他身边的人希望利用我达到这样

的目的。遗憾的是，外交部的官僚机构对这种想法充满敌意，我没有得到这个机会，也从未见过卢总统，几乎没有见过他身边的任何一位高级官员。

五天后，Kuk Kiyeon 带着韩国大使馆提供的一份在文化中心工作的具体聘书回到了我身边。虽然年薪只有 4 万美元，也没有医疗保险和养老金计划，但这至少是一份工作。我被期望帮助向美国人进行文化宣传，并编辑宣传材料。我认为，使馆在法律上不是美国领土，这让我的工作更容易一些。

尽管这个职位基本上已经答应给我了，但我还是立即起草了一封应聘意向书，并于第二天上午拜访了韩国文化中心，见到了负责该中心的外交官李贤彪。

李贤彪是外交部的一名德语专家，曾多年担任柏林文化中心主任。他的英语不如德语流利，性格也很难相处。我怀疑他之所以被任命，是因为他对卢总统忠心耿耿，也许是过于忠心耿耿。他非常健谈，说话也相当自信。他经常忙于其他事情，总是匆匆忙忙。

李是个很难相处的人。他对文化外联活动充满幻想，希望员工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立即接受。他对员工大吼大叫，几乎是无事生非，经常使用我从未在办公室里听过的侮辱性咒语。

我开始怀疑，虽然他最初给了我一张公司卡，并允许我带人出去吃午餐（仅仅是头两个月），但他只是奉命行事，他更希望我不要获得太多曝光或宣传。

不过，有时他也很和蔼，甚至允许我和他一起出去，一起在华盛顿闲逛。我们参加了一些智囊团的研讨会，我试图给他一些有用的建议。但总的来说，我觉得他盛气凌人，他让我一个人呆着时，我很开心。他还采取了一些明显的措施来削弱我的权威。这不是政治阴谋。对大多数韩国外交官来说，我只是使馆的一部分。在过去的四年里，主导我生活的美国国内紧张的政治博弈消失了，我只是一名雇员。

韩国使馆从未聘用过具备任何专业技能的美国人担任全职雇员。作为全职雇员，我可以接触使馆的所有其他外交官，在最初的三个月里，我有计划地与他们一一见面。韩国大使馆是我的归宿，我尽最大努力利用好它。一些外交官认可了我的能力，定期邀请我共进午餐。还有一些外交官则根据我在韩国文化中心的卑微地位，推测我的社会地位。

收到正式邀请后，我给在韩国的妻子打了电话，请她带着孩子们回到华盛顿。我不知道我们如何负担得起，但我希望我们能找到办法。我一个朋友的女儿是房地产经纪人，她在弗吉尼亚州安南代尔为我们找到了一栋白色的小房子，有一个绿色的大院子，离韩国城很近。我把仓库里的一些家具搬进了房子，想在妻子和孩子们回来之前把房子布置得像个家。

我很高兴能离开表弟曼尼的家，也很高兴自己有了一份有收入的工作，这样我就不用再和家人说话，也不用屈辱地到处卑躬屈膝地找工作了。

安南代尔的房子是一座小楼，位于一个大院子中间。附近环境相当宜人，步行到韩国城也很方便。和家人住在那里的最初几天，我感到非常兴奋。我感觉自己正处于某种重大突破的边缘，韩国人会尽全力帮助我，这样我

就能成为华盛顿特区的重要人物。但持这种观点的外交官并不多，大多数人都不会做任何可能危及他们与布什政府之间互动的事情。

一开始，我应邀参加了洪大使的几次高规格活动，与军方要员以及美国和韩国政界人士进行了交流。这一过程并没有持续太久。洪大使希望我发挥重要作用，但不幸的是，他在华盛顿的任期并不长。

在最初的六个月里，我出乎意料地接触到了大使馆的许多人，包括洪大使，我也被列入了许多活动的名单。我还在文化中心组织了几次备受瞩目的研讨会，受到了华盛顿业内人士的欢迎。访问洪大使的办公室或政治公使魏成乐（后来成为我的挚友）的办公室时，我感到非常自在。但 2001 年 7 月，蜜月结束了。

首尔的 MBC 新闻突然公布了十年前录制的录音带，其中显示洪秀柱向政界人士非法捐款。媒体每天都在渲染这一丑闻，果然，电视上出现了要求洪秀柱辞职的呼声。洪秀柱对卢政府的感情并不深厚。他没过几天就下台了，很快又回到了首尔。

虽然我毫不怀疑指控的合法性，但我对指控的时机持怀疑态度。在我看来，洪秀柱是被各种势力故意拉下马的，这些势力不希望这样一个独立的人物参与韩美外交关系。洪秀柱拥有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英语水平高超，而且博览群书，因此他可以有效地为政策辩护。他在美国智囊团和其他机构的重要人物中拥有自己广泛的关系网。他有能力在没有国务院或韩国外交部帮助的情况下安排与人会面。此外，洪秀柱对统一和与朝鲜接触有自己

的想法，他无意在这些问题上妥协。他认为与朝鲜接触至关重要，而且他毫不犹豫地这样说。

他的背景是保守派，但却反对许多有关安全的标准路线。虽然他与小布什的关系不错，但毫无疑问，华盛顿特区有很多人不希望一个思想独立的人担任如此高调的职位。罗政府中也有人认为洪秀柱过于独立。我很高兴在韩国能有这样一位知名人士认真对待我。

接替洪秀柱的是李大植，一个沉闷的职业外交官，在他的任期内没有任何新意，整个大使馆都陷入了沉睡。我清楚地意识到，虽然我可以与个别外交官会面，帮助他们适应华盛顿的生活，但使馆最高层对我的意见并不感兴趣。我偶尔会与魏公使交谈，但我们的友谊是在我们都搬到首尔之后很久才发展起来的。

当我开始在韩国大使馆工作时，我与反对布什接管的美国政治边缘人士的交流就结束了。我可能受到了监视，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我有任何异常，也没有任何与我协商的努力。直到特朗普时代，我才看到任何通过垃圾邮件、杂志广告或其他类似方式与我沟通的迹象。这种沉默表明，我以为在伊利诺伊大学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并非我的想象。那些隐藏的信息并不是我想象出来的，因为它们的结局非常戏剧化。

韩国大使馆位于马萨诸塞大道上，离谢里丹环形公园（Sheridan Circle Park）北面只有几个街区。我每天都乘坐地铁前往雾谷，最初是从安南代尔出发，后来从西福尔斯教堂出发，因为我妻子在那里为我们找到了一套较大的公寓。每天早上，我都会从雾谷地铁站步行上山，经过山坡两侧的二十世纪

初的美学艺术宅邸。偶尔，我会停下来喝杯咖啡，为一天的工作做准备。这是一段冥想的时间，偶尔也是一段恐惧的旅程，因为华盛顿似乎处于混乱的边缘。这条路我走了两年。

本书并不是一本详尽的自传，而是简明扼要地叙述了我的政治斗争经历。我在韩国大使馆的许多工作，无论是组织“泡菜日”、定期举办研讨会、举办2002年世界杯日韩联合展览，还是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大使馆与中国、韩国和日本大使馆联合举办电影系列活动，对我来说都很有意义，但这些工作与美国的问责斗争关系不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我被迫接受现状。这些活动以及其他活动给了我一些想法，这些想法在十年后成为韩国媒体上关于公共外交的一系列文章。有一段时间，特别是在朴槿惠政府执政期间，我被认为是公共外交专家，尽管我个人对这个话题并不感兴趣。

文化中心有时会让我一整天都忙于官僚活动，但在其他时候，基本上是我出去结识可能对我有帮助的人。我可以自由会见美国的亚洲问题专家，访问国务院，或与记者和教授交谈，从而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人际网络。我有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可以到处逛逛，了解华盛顿特区是如何运作的，对此我非常感激。

韩国文化中心是一栋很小的建筑，离韩国大使馆不远，就在山下的几栋房子里。这里的工作人员由四名长期在当地工作的韩国人、三名韩国外交官和几名短期实习生（研究生）组成。一楼是展览室，很少有人来参观。办公室在二楼的后面。我在二楼办公，办公桌前可以看到石溪。在我任期结束时，负责文化活动和编辑《活力韩国》杂志的团队越来越明显地不希望我

提供太多帮助，于是我搬到了三楼的一间小办公室，在那里我可以写作，也可以与前来拜访的人私下会面。

有时，我都不清楚自己整天到底该做些什么。当时有一个韩国团队，他们负责编辑《活力韩国》的每日文章，到 2005 年底，他们开始嫉妒我的工作。他们要求我做一些编辑工作，并把我对华盛顿各方面人物的采访写进了期刊，但他们不希望我在期刊的管理或内容开发方面发挥任何作用。

最终，我在使馆最重要的角色是一对一的会面，在人们的办公室、咖啡馆、午餐会和晚餐会上与在韩国使馆工作的外交官和各部委代表会面。我努力向使馆的每一位政府代表介绍自己，并主动提供帮助。大多数人并不需要任何具体的帮助，但有些时候，我可以把他们介绍给美国政府的同行，或者找出有关华盛顿如何运作的信息，与他们分享。

我很快就了解到，外交官们对海外记者非常重视，而且这些记者有时比大使馆里的记者更了解问题。有几位记者在他们的文章中引用了我的话，这让我开始走上了新闻之路，而在我到韩国之后，这种感觉更加明显。

最终，为媒体撰稿成为我职业生涯中最成功的部分。也许早知如此，我就会花更多的时间写文章、出书，而不是花更少的时间与人会面、谈论项目和工作机会（这些机会都没有任何结果）。我在想，限制我活动的机密文件是否特别将写作确定为我可以更自由行动的领域。当然，我与美国主流媒体的互动一直受到严格限制。但我曾多次获准就极其敏感的问题进行写作。

在韩国大使馆工作期间，我第一次开始为媒体撰稿。这在以前并不是我感兴趣的活动，但我觉得很有必要在华盛顿获得更多的读者，而我的写作能力是我更重要的资产之一。后来，为报纸撰稿成为我职业生涯的核心，而掌握社论形式则是我移居韩国后的主要表达方式。但写作问题对我来说并不简单。毕竟，在伊利诺伊大学期间，我基本上被挡在了与知识界同行以及其他许多人进行有意义交流的大门之外，无论是香槟绿党成员，还是军械库的军官，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对学术讨论毫无兴趣。我一再被告知必须完成关于日本古典文学的书稿，尽管我对这个话题已经毫无兴趣。在我看来，写一本学术著作相当于坐牢。在某种程度上，我希望能逃避现实，去做一些事情，去参加政策方面的斗争，而把我的学术生活抛在脑后。

但是，在华盛顿等待我的并不是这样一个世界。我发现为正义而战的人寥寥无几，动不动就面对自由贸易和传统武器系统的啦啦队。大使馆的工作经历很吸引人，但这显然不是我的职业，我周围的智囊团和大学似乎也不可能对我这样的人感兴趣。

写作显然能帮助智囊团中的其他人确立自己的地位，在阅读了研讨会上分发的一些术语垃圾之后，我开始有了一定程度的自信。

我的第一次尝试是为《日本聚焦》（亚洲事务学术期刊）撰写了一篇关于韩国总统卢武铉的文章，题为“平衡者：卢武铉对韩国政治和东北亚未来的展望”（2005年8月1日）。这篇文章被广泛阅读和评论。由于完全没有关于卢武铉真实身份的报道，我的文章填补了这一空白。

这篇文章确实受到了批评。首先，我听到一些人说这篇文章过于同情卢，其中包括国务院韩国问题办公室的泰德-奥西乌斯（Ted Osius），我和他关系很好。我不认为我的文章是在为卢辩护，我认为问题在于人们试图把他归类为左派，尽管他显然在努力为韩国寻找一条中间道路。

然后是关于利益冲突的指控。一位学者写信给《日本聚焦》，暗示由于我在韩国大使馆工作，这篇文章是一篇讨好雇主的吹捧文章。任何花时间仔细阅读过这篇文章的人都很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然而，我的情况太不寻常了，人们有这样的看法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我也想解释一下，我之所以在韩国大使馆工作，是因为我因争取法治而被非法流放出美国，但我决定还是先等等再说。

我的直属上司李贤彪也对我提出了批评，他斥责我在没有获得批准的情况下擅自撰写有关总统的文章。我认为他只是在履行职责。事实上，当卢武铉政府发现事实上只有我一个人以深思熟虑的态度写了关于卢武铉的文章时，他在一天之内就改变了口风。事实上，李明博会要求我安排将文章翻译成日文和中文，以便广泛传播。

下一篇文章将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竞争与上一个时代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冲突进行了比较。2006年3月6日发表的文章《中国是新冷战的克星吗？》这篇文章首先发表在韩国在线报纸《OhMyNEws》上，然后被鹦鹉螺研究所的NAPS网络名单转载，向政策制定者广泛传播。

我认为，美中之间的竞争本质上是经济、文化和政治上的竞争，虽然有军事方面的因素，但这也许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此外，我还提出，使用“冷

战"模式，即美国继续像旧美国，而中国像新苏联，是完全错误的。这篇文章被广泛阅读，另一位学者在 NAPS Net 上发表了复杂的反驳，我的回应也被发表。《金融时报》甚至提到了这篇文章，这是过去 18 年中极为罕见的一次在企业媒体上出现关于我的报道。

使馆最成功的项目是"韩美之家"系列研讨会，李馆长授权我举办该研讨会，并在邀请对象和讨论内容方面给予我很大的自由度。我认为，在最好的情况下，它是华盛顿特区一个独特的公开讨论空间，我们培养了相当忠实的成员，他们每次都来参加活动。这个系列讲座是韩国文化中心主任李贤彪提出的一个概念。KORUS 指的是当时正在谈判的《韩美自由贸易协定》。有人提议由我在文化中心组织各种有关经济和自由贸易益处的活动。我按照指示做了几次，但我并不乐在其中，因为我坚决反对所谓的"自由贸易"。我知道自由贸易对环境和社区的灾难性影响，我也能复述给我的材料，但我无法支持整个大使馆都在推动的自由贸易。

许多研讨会涉及文化、经济（贸易除外）、气候变化、社会和历史。我邀请的发言人包括对美国亚洲政策持极端批评态度的人。当我邀请《聚焦外交政策》的约翰-费弗（John Feffer）或前驻韩大使、小布什的激烈批评者唐纳德-格雷格（Donald Gregg）等人时，韩国人似乎一点也不觉得困扰。就连我在伊利诺伊大学演讲时认识的比尔-奥多姆将军也同意来参加，他对我的工作非常感兴趣。我甚至还邀请了政治学家查莫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通过电子邮件通信，我和他的关系变得非常密切。约翰逊告诉我，由于健康原因，他不再旅行。

此外，我还与比尔-克林顿时期的前国务卿麦德琳-奥尔布赖特的助理在她的咨询公司进行了一系列颇为有趣的谈话。这位助理毫不掩饰对我的蔑视，好像我是如此卑微的人，却与如此崇高的人接触是无礼和不恰当的。但这位助理并没有明确拒绝我，很可能是因为她希望韩国大使馆能与该公司签订一些咨询合同。

我屡次遇到这种期望。我曾邀请一些人就美国在亚洲应该扮演什么角色进行坦诚的讨论，但他们暗示或明确表示，他们想要咨询合同。事实上，有些已经在为韩国大使馆提供咨询的人把我视为不共戴天的敌人，这并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是因为我提供了竞争。有几次，韩国经济研究院对我踏入他们的领地表示恼怒，气氛十分紧张。我试图以外交方式处理这些问题，但我并没有降低韩国经济研究院研讨会的规格。我决心让我们的项目与华盛顿著名智库的项目一样有意义、有能力，我认为我们经常能达到这个目标。与此同时，我也得出结论，在那个腐败的城市里，绝大多数亚洲问题专家都不欢迎我的努力，在那个环境中没有我的位置，至少除非我在一个重要机构里有一个真正的职位。

从 2006 年春天起，我又开始兼职教书。就我个人而言，我想永远离开学术界。我不想再教书，也不想再写学术论文。我更愿意从事行政工作，这更符合我的兴趣和技能。但我需要额外的收入，这是我唯一能赚到的钱，以补充我微薄的薪水，而且没有医疗保险。我在乔治-梅森大学以及后来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的课程，让我有机会与年轻人交流，这有助于我更好地了解美国，与在韩国大使馆的生活相比，这是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

变化。在随后的几年里，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几位学生一直与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洪大使离开后，我在使馆的影响力有所减弱，而由政府主导的在线品牌推广活动“活力韩国”也由全韩国员工负责，这些都减少了我的工作量，但李馆长还是很乐意派我出去，每天花很多时间在 CSIS、布鲁金斯学会、威尔逊中心、新美国基金会、传统基金会和其他许多类似机构的研讨会之间奔波。我在邮寄名单上，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与许多工作人员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我收集名片并加以整理，为《活力韩国》采访专家，邀请专家到韩美之家座谈，偶尔参加午餐会和咖啡会，在这些活动中，我尽我所能提供帮助。

从 2005 年秋天开始，有两个重要的研究小组在我的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一个是国防分析研究所的凯蒂-吴（Katy Oh）为智库中的年轻韩国问题专家定期组织的系列研讨会。凯蒂也隶属于布鲁金斯学会，从一开始就对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不遗余力地确保我被认为是一个重要人物。从那以后，她一直是我的好朋友和支持者。她是一个甜美的女人，喜欢讽刺，既能说出华盛顿智库关于导弹防御、朝鲜威胁和自由贸易的“内幕消息”，同时也承认还有更多事情正在发生。

这个系列讲座的其他成员都比我年轻，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已经当了八年的教授，却被当作年轻人对待，这让我感到有些奇怪。不过，其他一些成员逐渐成为了我的好朋友。另一些人则以宣扬自己独特的优越感和影响力为乐。我无法像凯蒂-吴（Katy Oh）那样成为沟通世界的桥梁。对我来说，当时的许多基本问题，例如气候变化和社会分化，都是如此重要，以至于

在讨论中忽略这些问题简直是不诚实的。因此，我无法很好地融入其中。有时我也在想，如果我在伊利诺伊大学的经历不是那么痛苦和充满对抗，也许我还能通过某种方式实现转型。

我与乔治敦大学的戴维-斯坦伯格和《聚焦外交政策》的约翰-费弗共同建立了另一个规模更大、更重要的小组；这两个人最终与我关系密切，尽管我们有时在基本问题上存在分歧。

戴维-斯坦伯格是缅甸问题专家，也撰写了大量关于朝鲜问题的文章，他个性热情，有着无穷的好奇心。他也没有自负，从一开始就愿意认真对待我。我甚至可以说，戴维-斯坦伯格是华盛顿极少数认为我精通中文、日文和韩文的人之一。他偶尔会邀请我去宇宙俱乐部吃早餐，我们讨论了如何重新建立亚洲专业知识的伟大传统，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费尔班克斯和赖肖尔。我认为，由于戴维当时是活跃在亚洲政策领域最年长的人士之一，而且与亚洲基金会有着长期的联系（在亚洲基金会发挥广泛而积极的作用时），因此他对我希望在我所说的话中追溯到罗斯福或阿德莱-史蒂文森的想法有一定的理解。他仍然记得一些失落的传统。

有一天，我犯了一个错误，为所有经常参加韩国之家活动的人建立了一个庞大的谷歌群组。我请求谷歌的特别许可才建立了这个群组。我认为这将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既能让我宣传我们的活动，又能得到那些经常参加活动的人的回应。总人数约为 150 人。但谷歌群组建立后，我发现发给我的任何信息也会同时发给所有其他成员。在 20 分钟内，就有多人对这一系统提出了投诉，所有这些投诉都被再次传给了所有其他成员，从而引发了更多的投诉。我花了五个小时才关闭了这个谷歌群组，并多次致歉。

这件事引发了我们与大卫-斯坦伯格 (David Steinberg) 更长时间的讨论，他建议我们可以成立自己的独立小组，以思想开放的个人为核心，定期讨论东亚问题。在约翰-费弗 (John Feffer) 的帮助下，我们组织了一个定期系列活动，吸引了十到二十人参加，进行了生动而有思想的讨论。

在我离开华盛顿后的一段时间里，这个系列电影一直保留了下来，我在韩国、日本和中国大使馆以及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大使馆之间组织的短片节也是如此。此外，2007 年 2 月我前往韩国时，正是这个小组邀请我参加了一次相当难忘的晚宴，为我送行。

在此，我还想提及其他几位关键人物，因为他们在那艰难的两年中为我付出了特别的努力。

当时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人物是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 (吉米-卡特的前国家安全顾问，CSIS 的创始成员) 和亨利-基辛格 (理查德-尼克松的前国家安全顾问，CSIS 的另一位创始成员)。他们两人之间形成了相互重叠但又截然不同的影响力圈子。布热津斯基是一个非常内行的人，与企业界有联系，而且并非没有罪过，但他将自己的角色视为专业人士，以学者和战略家自居，最终为更崇高的事业而工作。相比之下，基辛格则是一个商人，他试图把联邦的资金抽调到他的咨询公司基辛格及合伙人公司 (这正是玛德琳-奥尔布赖特所模仿的)。基辛格比任何一个人都更能贬低美国外交政策的性质，尤其是通过他对激进私有化的倡导。

我从未见过亨利-基辛格，与他和他周围的人也没有任何交集。但当我在 2006 年写信给布热津斯基，询问他是否愿意在 "韩美之家 " 发表演讲时，

他给我写了一封详细而认真的回信。我甚至可以说，他在回复我的请求时所表现出的认真态度，就像人们期待他对国家元首或重要知识分子一样。这封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我觉得布热津斯基很可能从一开始就是为我出谋划策的人之一，他甚至可能在帮助我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他对每一封信都一丝不苟的回复来看，他肯定对我非常认真，甚至比乔姆斯基还要认真，尽管乔姆斯基最后成为我的笔友已经超过 14 年，我们之间的电子邮件往来多达数百封。

我只在 CSIS 的一次研讨会上见过布热津斯基本人一次。我上前与他握手，但他没有发表任何评论。这并不像是他在疏远我。恰恰相反。我认为他是在表示，没有必要在公开场合暗示任何亲密关系。不管布热津斯基对阿富汗极端主义的兴起或与俄罗斯的对抗负有什么责任，他在很少有人愿意与我交谈的时候为我所做的一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是，如果布热津斯基真的对我那么热情，那就表明外交政策的环境是无情的。想到我可能在那么长的时间里受到那样的待遇，而像布热津斯基这样的人和其他人的大力支持却没有什麼影响，这表明这样的政策知识分子已经不再参与决策过程了。

时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的约瑟夫-奈是另一位不遗余力帮助我的人。2003 年，他访问伊利诺伊大学时，我见到了他，我们有机会进行了交谈。他多次同意接受我的采访，为我撰写文章，帮助我树立了威信。

虽然我们相处的时间相对较少，但我和奈的关系却相当亲密，我清楚地记得，2015 年我在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为一小群师生做演讲时（在韩国研

究所拒绝做东道主之后)，他特意赶来听讲，尽管演讲的主题与国际关系毫无关系。

我还想提及国际关系和安全领域的其他一些人。对于美国在海外犯下的罪恶，我并不天真。但我想说的是，尽管看起来很奇怪，但那个时期唯一愿意站出来反对腐败的往往是那些军人或情报人员。他们不是普通人，而是特殊的人。相比之下，我所遇到的非政府组织和左派团体则显得十分懦弱。我真诚地相信，如果我在香檳的命运掌握在绿党或各种左派活动家手中，我肯定活不下来。

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理查德-布什（Richard Bush）也竭力邀请我参加各种活动，并与我坐在一起喝咖啡或吃午饭，讨论华盛顿特区发生的事情。但我们从未讨论过我的案子，他也从未问过。我从一开始就认为他知道的已经够多了。

他也没能邀请我去布鲁金斯演讲，尽管他尝试过。即使十年后，我已成为韩国的知名人士，完全有资格受邀出席重大活动，但他仍然无法邀请我。

我与主席斯特罗布-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t）的关系也很好，他曾是我在耶鲁大学班上的演讲者，尽管我们并不亲密。很显然，我不会被邀请去布鲁金斯，而且我也从未被邀请过。不过，2010年，我奇迹般地获准在CSIS举办的可再生能源研讨会上发言。虽然我曾邀请智库人士到韩国国际交流中心（KORUS House）发表演讲，但他们从未给予回应。我想我还是被列入了黑名单。

过了一年，我才设法和拉里-威尔克森一起喝了一杯咖啡，但我们一见如故，此后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他的言谈举止让人感到亲切而坦率。我不敢说他完全直率，但话说回来，当时很少有人觉得自己可以直率。

我不敢说我们完全是同道中人，但很明显，虽然我们从未谋面，但我们有很多共同的朋友。我从一个朋友那里得到了他的电子邮件地址，于是就给他写了一封信。他在两小时内就回复了我，两天后我们在雾谷的一家咖啡馆见面。他并不惧怕讨论当时的政治混乱，我清楚地记得他对我说，我们能存活这么久，令人印象深刻。我经常有这种感觉，尽管我周围的人表现得好像一切都很正常。仅在这一句话中，拉里就表现出了我从华盛顿其他人那里从未听到过的严肃态度。我多次尝试让他参与各种活动，并最终让他在 2013 年来到韩国参加一次会议，但奇怪的是，虽然拉里的经济状况显然要好得多，而且显然不像我那样受到骚扰，但他的行动自由却比我受到更多限制。韩国政府让我来促进他们的网络建设，我也因此受邀参加了拉里没有参加的活动。

约翰-费弗（John Feffer）是我后来在华盛顿创办另类政策讨论小组的核心人物，他当时是“聚焦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in Focus）的负责人。我们来自相似的家庭，他对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写过几部剧本），就像我对外交政策有着浓厚的兴趣一样（作为一名文学教授）。我们在很多问题上意见一致，但偶尔也会有分歧。约翰后来同意担任我后来在韩国成立的亚洲研究所的研究员，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一起写了很多文章。

2005 年夏天，当我开始完善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概念，然后起草会议提案时，约翰、戴维-斯坦伯格和理查德-布什是我最先向他们寻求建议的人。

我曾多次努力组织一次会议，哪怕只是一个小型研讨会，讨论水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造成的严重安全威胁。我清楚地记得，当我提出“非传统威胁”这一话题时，政策领域的某些人完全不感兴趣。不知何故，我们面临的重大问题似乎并不那么重要。

我曾与华而不实的新闻政策大王史蒂夫-克莱蒙斯（Steve Clemons，当时在新美国基金会工作）进行过一次讨论，其间我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即举办一次题为“水：比黄金和石油加起来还值钱”的安全问题研讨会：水：比黄金和石油加起来还值钱”。克莱蒙斯回复说，这个话题“很有趣”，也许可以在“将来的某个时候”考虑。我再也没有收到他的回复。

我们没有得到任何活动经费。我对大卫-斯坦伯格说：“这完全是错误的。这些人认为我们能用航空母舰来应对气候变化或水资源短缺吗？”

但我显然走错了地方。所有这些所谓的安全专家对任何意义上的安全都不感兴趣。但我开始看到这样一种愿景：将气候变化视为主要威胁，要求重塑整个军队，以直接应对这一挑战。这本身就是一个有价值的概念，我将更详细地阐述这一主题。后来，当我完善了我的信息后，这也将成为一个重大政治问题的根源，但规模还没有达到我们在2001-2004年间所遭受的程度。

还有很多人在华盛顿帮助过我，或与我进行过重要谈话，或我以自己的方式帮助过他们。民主党进步活动家安娜贝尔-帕克（Annabel Park）是“咖啡党”的创始人，深思熟虑的律师雪莉-约翰逊（Shirley Johnson）和她体贴的丈夫查尔斯（Charles）经常邀请我们去他们家做客，还有很多其他人。

在华盛顿的经历足以写成一本书，事实上，我在那里的许多经历也为我后来关于韩国文化的著作提供了素材，这些著作在我搬到首尔之后大获成功。有一段时间，我被认为是公共外交方面的专家，尽管我对这个话题兴趣不大。但这些事件与本故事没有直接关系，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在此期间，我确实发生了变化。我认识了很多学术界以外的人，学会了以新闻的方式写作。我与韩国人亲密接触，发现他们往往很容易接受。但更重要的是，我与美国的联系被削弱了。在伊利诺伊大学时，我担心自己会被杀害，但我显然是在与其他试图恢复法治的美国人一起工作。我是非常美国化的人，我感觉自己处于为美国而斗争的中心。但现在，我身边的许多人却没有这种激情，他们对服务合同和政治关系更感兴趣。一年后，我得出结论，我并没有真正完成转型。我并没有成为华盛顿特区的政策内行，而且我对一些基本行为模式感到厌恶，这种程度是我始料未及的。在伊利诺伊大学，我想象自己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可以为了事业与任何人合作。但我意识到，华盛顿的文化容不下我这样的人。

但与此同时，在 2000-2007 年期间，我明显发生了变化。究竟发生了什么，很难说清楚。美国变得更加压抑和颓废，一种否认的文化悄然兴起。但是，我也比以前更加意识到世界和美国的问题。我开始意识到，事情并不是在 2000 年 11 月突然发生变化的，相反，受教育阶层在政治接管面前装傻充愣的溃败是一个长期过程的产物，过去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但我并不知道。我也开始比以前更认真地思考阶级和经济结构等问题。我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与阶级关系的分析似乎是解释我所观察到的某些奇怪现象的唯一方法。

2006 年 10 月左右，我在雾都（Foggy Bottom）与耶鲁大学的老同学吴灿利（Woo Chan Lee）见面，喝了一杯咖啡。我已经有八年没见过他了。我和吴灿既是朋友，又是竞争对手，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 1987 年，当时我们都报名去日本的大学间中心学习日语，并申请了同样的奖学金（吴灿获得了奖学金，而我没有）。Woo Chan 是韩国人，日语能力很强，后来还学会了中文。我们对未来的规划都很有抱负。

我当上教授，在某种程度上是个意外。吴灿最终在美国国务院工作了几年，然后，就在我们见面的时候，他离开了国务院，去了亿万富翁、中国投资者约翰-桑顿的公司工作。他赚得盆满钵满，生活舒适，现在娶了一位日本女人。我在银行里几乎一无所有，也不知道我的工作能否长久。

他详细谈了他与桑顿公司的新咨询工作、他与斯特罗布-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t）的关系以及其他重要问题。与我和拉里-威尔克森（Larry Wilkerson）在同一家咖啡馆喝咖啡（我们在那次谈话中详细谈到了华盛顿特区体制的衰败）相比，吴灿似乎一切都很好。

有一点是肯定的，在吴灿看来，如果你没有高收入，没有与超级富豪建立密切的工作关系，你就不会那么成功。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他的改变是他在国务院的经历和他建立关系网的努力的结果。但我也因为自己的前进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最后，我努力写信给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和其他许多人，讲述了我当时在伊利诺伊大学发生的事情。我写了一份长达 5 页的要点摘要，打印出来寄给了他们。我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们要求我这样做。

我这样做有两个动机。首先，我想让他们知道我认为发生了什么。毕竟，关于我的流言蜚语和半真半假的说法不绝于耳，我无法确定他们知道些什么。我回想起自己曾以为伊利诺伊大学的系主任杰里-帕卡德（Jerry Packard）对我的遭遇了如指掌，但后来我才知道，除了知道我深陷某种政治麻烦之外，他对所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

第二个动机是，我不想让家人有任何借口。我不想让他们觉得，在将来的某一天，他们可以轻率地解释说，他们不知道贝一明发生了什么事。我想让他们清楚地知道，我已经以明确无误的方式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并请求他们提供帮助，而他们几乎什么都没有做（这是正确的）。

我父亲回复说，这封信让他明白了一些道理，但他没有再问什么，甚至没有表示愿意进一步倾听。2006 年底，我和他一起去旧金山散步，在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试图向他解释问题所在。他表现得好像什么都没听说过一样（尽管有这封信），虽然他在听，但他没有问任何问题，也没有提出任何建议。

我的继母杰米花时间与我同行，并向我提出了所有家庭成员中最有意义的问题。她似乎愿意走一遍这个故事，看看它是如何连贯起来的，哪些是无可辩驳的。然而，她什么也没做。

2006 年，我弟弟迈克尔来看我，我们还一起走了很久。和我父亲一样，他只是听，很少说话。在我们谈话的最后，他提到了一些特别的事件，这表明他很认真地听了我说的话。但他并没有什么想法，也不想听更多的东

西。后来他又反悔了，说他觉得我的故事不可信。但在那次会面中，他接近于愿意倾听和理解。

我的母亲没有立即回应，但她后来认真地与我接触，尽管她似乎害怕得什么都做不了。还有一些人始终没有回应。2015年，我也发起了另一场类似的运动，试图迫使朋友和家人至少讨论这个问题，但我并没有取得特别大的成功。

因此，即使违背我的意愿和我的最佳判断，我和家人之间的明显距离也无一例外地在增长，尽管我和母亲的关系总体上还可以忍受，因为她会问一些真诚的问题。

第 5 章

迁往韩国

我从未打算在韩国大使馆工作很长时间。事实上，我以为过不了多久，就会找到另一份更重要的工作。但我怀疑，从我被伊利诺伊大学解聘的那一刻起，我的文件夹里就被塞进了一封信，明确规定我不能在美国境内受雇。从那时起，虽然有几次我在美国发表演讲获得了报酬，但除了韩国协会给我的一份工作邀请之外，我在美国真的没有得到过任何工作邀请，而这份工作邀请似乎从来就没有认真打算过。

2006年，我与其他几位对韩国文化有着浓厚兴趣的美国人一起，应邀在纽约韩国协会发表演讲。在很大程度上，这次活动的概念是我提出的，最初的提议也是我写的，但之后就与我无关了。韩国文化中心的李主任与韩国协会有联系，唐纳德-格雷格（Donald Gregg）主席是对我的情况感兴趣的人之一。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父亲在耶鲁大学有一个室友，他在商界工作，和中情局有些关系。他认识以前的韩国人，尤其是前大使詹姆斯-里利（James Lilley，也来自耶鲁大学）和唐纳德-格雷格（Donald Gregg）。我想这位朋友也为我说了不少好话。扎克-霍尔（Zach Hall）也是耶鲁出身，我相信他也认识格雷格的家人。格雷格对我的遭遇深表同情，认为这是不公平的，也意识到了国家的混乱。我对格雷格不抱任何幻想，他是里根人质换武器交易的主要参与者，也是中情局政治中的一个玩世不恭的角色，但我个人从他在某些场合对我说的话中感受到了某种诚意，觉得他比外面的大多数人都更有思想。格雷格后来对美国在朝鲜的政策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批评立场，甚至超出了进步媒体所能接受的范围，因此他下定决心要做点什么。他显然对小布什政府很反感，似乎想做点什么来帮助我。

不过，2007年之后，他就不再回复我的电子邮件了。

我在韩国协会举办的关于韩国流行文化的讲座座无虚席，甚至传回了华盛顿。

两周后，韩国协会的一位工作人员打电话给我，表示愿意聘用我。我急于摆脱在韩国大使馆模棱两可、不稳定（无福利）的工作，因此表示了极大的兴趣。

我们就这份工作进行了两次电话交谈，并交换了几封邮件，但不久我就意识到，这份工作并不是认真的。在曼哈顿备受瞩目的韩国协会办公室工作的薪水略低于我在伊利诺伊大学的最初薪水，大致相当于韩国大使馆给我的薪水。现在回想起来，这根本毫无意义。我已经当了八年教授，拥有丰富的经验，当然有资格担任韩国协会的核心职位，但我却被当成了刚毕业的大学生。

在韩国方面，许多朋友一直在为我寻找职位，他们的热情远远超过了我的美国朋友。2006年春天，我受邀飞往韩国，参加韩国高丽大学终身职位的面试。这个提议听起来似乎很实在，对我来说是一个重大突破。与此同时，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个职位是有问题的。高丽大学校长一直在努力聘用更多的外国人，这也是全校推进国际化工作的一部分。韩国文学系的这个职位就是明确为外国人设立的。我准备了一份演讲稿，飞往首尔参加面试。这是一次奇特的经历。

虽然我比华盛顿特区政策圈中的大多数人都更了解韩国文学，但面试我担任韩国文学系的职位实在是太愚蠢了。我一生中只读过五六本韩国小说，也叫不出几个现代作家的名字。但我当然认为，如果没有其他人，我可以在用英语介绍韩国文学方面发挥有意义的作用。

事实上，我并不想教书。当时我宁愿做一名行政人员。在伊利诺伊大学，教书对我来说是一场噩梦，是我违心做的事。

我用韩语向大约 14 位韩国文学教授介绍了小说家朴智元，时间约为 50 分钟。有些问题很有想法，也很吸引人。但有两位教授试图削弱我的实力，

拷问我是否知道研究朴智元的主要学者的名字，是否知道这一领域的重要研究。我没有兴趣为自己辩护。我坦率地告诉他们，我无法胜任这个职位，但我建议，如果他们聘用我，我可以帮助他们开展国际推广活动。

询问持续了十分钟，然后会议结束。我被要求离开。这是我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求职面试中发表演讲，却没有被邀请共进晚餐。后来，我与其中一位教授通了电话，从他的话中我了解到，教授们并不是反对我（事实上，他们对我学习韩语的努力表示赞赏），而是对校长作为其国际化项目的一部分，试图把我强加给他们感到不满。

我感觉这也是一次注定失败的面试，但我必须说，我比以前更接近成功了。秋天，会有两份真正具体的录取通知，从某种意义上说，为我提供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未来。

我的朋友布鲁斯-贝希托尔（Bruce Bechtol）向我提供了一个机会，他是一名退役海军陆战队员，在海军陆战队战争学院任教，我很喜欢他，经常在深夜与他谈论与朝鲜人结婚的感受以及其他事情。他算是我的好友，虽然我不一定同意他写的关于朝鲜的文章，但我觉得他基本上是个正直的人。

2006年，我恰好受邀担任国防大学一个班级的毕业演讲人。军中有一群人一直偶尔与我见面，并与我坦诚交谈。就我个人而言，与国务院的人相比，我更喜欢我遇到的军方人士，因为我偶尔会遇到那些真正愿意讲真话的军方人士，而国务院的人很少能做到这一点。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布鲁斯告诉我海军陆战队战争学院有一个教职，而且我很有机会得到这个职位。我想拉里-威尔克森可能也帮了我，但我不记得了。

我做了一个关于东亚安全的演讲，其中包括很多关于气候变化和当代政治的内容。他们中的一些人看起来像铁杆军人，深深卷入了国外的各种肮脏战争。然而，他们似乎很欢迎我，而智囊团的人往往不是这样。我不想猜测为什么是海军陆战队战争学院愿意为我提供一份工作，而没有一所大学、智库或非政府组织愿意。很可能当时的情况与我失业三个月时中情局给我的工作机会并无二致。

不过，我并不认为这个职位是我梦寐以求的工作。我认识到有必要在这场战斗中与军方人员合作，但如果可以避免的话，我不想成为这个系统的一部分。不过，与大使馆的工作相比，这似乎是一个更好的机会，因为我怀疑大使馆的工作会持续更长时间。我相信他们已经准备好给我提供一份工作，但我一直没有发现，因为我写信给布鲁斯，告诉他我将接受韩国的另一份工作。

2006年，在华盛顿特区的韩国人中，我最忠实的朋友之一是内政部高级官员崔民浩（音译）。他心思缜密，比我年长几岁，不仅花时间了解我，还了解我的家人。我向他介绍了华盛顿的一些我认为可以提供帮助的人，他非常感激。

2006年6月，崔忠万的高中好友李完九当选忠南道知事，他建议我担任顾问。此外，由于两人都有远大的抱负和在大田的人脉，他们决心要实现这一目标。李完九曾一度升任首相，后因各种丑闻被迫辞职。

2006 年夏天，我到首尔参加一个关于公民新闻的会议，崔珉豪坚持让我乘坐 KTX 到大田，一个我从未到过的城市，只为与候任省长李完九进行一次简短的会面。我同意了，不到三个小时，我们就在大田忠南道厅的大门口见面了，这是一座日本殖民时期的建筑，由切割好的石灰岩板建成。在宽敞的省长办公室里，我与李完九和崔民镐坐了下来，我们就李完九对全球忠南省的宏伟计划进行了愉快的交谈。他们两人似乎非常希望我能尽快到他们那里工作。

在大约十年的时间里，我与韩国保守派政治家的交往多于自由派政治家。我并不假装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但我认为有几个基本因素。首先，保守派的思想更加务实。他们根本不在乎我为美国的法治进行过什么政治斗争。他们想利用我的名声、人脉和其他无形资产，在忠南搞出点事来，让他们脸上有光。自由派政客们更不愿意接触一个可能会给他们带来麻烦的被宠坏的美国人。

韩国自由、进步的政治家往往不太重视网络活动。他们希望把重点放在福利和环境问题上。某些领域的外国人往往薪酬过高，目的是为精英阶层的利益服务。虽然我并不这么看自己，但工作中的很多方面从本质上来说都是精英主义的，我后来才体会到韩国人对这种自上而下的国际化的犹豫不决。

尽管如此，当时我正试图在某个地方找到某种形式的工作，没有能力提出要求。我想，如果我的妻子也有同样的决心，我也会愿意接受一份低薪工作，为正义而工作，但这不是一个选择。我的妻子、我的家人、我的许多

好友和我之间的价值观差异问题也许是这个故事中最令人痛苦的部分；这比政府特工按照命令对我所做的事情要糟糕得多。

在接下来的六个星期里，崔珉豪试图缓和关于我的职位和工资的讨论。这件事并不简单。首先，担任顾问的收入不足以支付我的账单。州长为我安排了一个职位，在大田的武松大学新成立的国际学校 "SolBridge "担任教授。后来我才知道，在教授职位的问题上我被骗了，虽然后来给我的名片上写着 "教授兼院长"，但实际上我只是个讲师。

薪水是我在华盛顿特区薪水的两倍（尽管他们会根据技术性问题不让我领取其中的一部分）。我们有住房，甚至还有一辆汽车。我被告知，这将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国际项目，而我将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也许这就是他们的计划，但我怀疑，事实上，他们完全知道我没有任何谈判的资格，他们想先把我招进来，这样他们就可以通过说他们有在哈佛和耶鲁接受过培训的教师来吸引更重要的人。

我妻子不想离开华盛顿。此外，她的算命先生也认为当时去韩国是个错误。崔永元随后也咨询了两位算命先生。其中一位也认为去韩国是个错误，而另一位则说这是个好主意。

此时，我已经看到我妻子信任的算命先生在很多事情上都算错了，所以我并不感到特别害怕。我也很清楚，两年来我在华盛顿进行了复杂的游说和高调的活动，但我甚至没有得到一份与我的技能和经验相称的正式工作。我决定去。如果我知道我的身份实际上并不是教授，我不会得到他们承诺

的全额薪水，也许我会更加犹豫，但我想无论如何我都会接受这份工作，因为我在华盛顿没有前途。

我独自去工作了一个月，看看工作会是什么样子。他们给了我一套舒适的小公寓，我在州长办公室和 Woosong 大学之间来回奔波。我妻子根本不想来韩国。事实上，我自己也不想在那里待上几年，但事情的发展完全不在我的掌控之中。一个月后，我得出的结论是，对我来说，大田比华盛顿更有发展潜力，尽管我当时还不太懂韩语，在韩国也没有广泛的关系网。

但从一开始就很清楚，虽然我在韩国的活动受到限制（这一点在接下来的十二年里会变得很明显），但我比在美国拥有更多的自由。我心意已决。

我不想详细描述离开美国的痛苦过程，以及它给我、我的妻子和后来我的两个孩子带来的问题。我只想说，代价是巨大的。我也不会在这里描述我在吴松大学（2007-2011 年）以及后来在庆熙大学（2011-2018 年）的全部工作，因为大多数活动都与教学、帮助这些大学的行政管理以及国际交流有关。我在某些方面取得了成功，而在另一些方面则不太成功。与本书有关的工作相对较少。

2007 年 4 月，我的妻子承恩（Seung-Eun）、儿子本杰明（Benjamin，6 岁）和女儿瑞秋（Rachel，3 岁）和我一起来到了大田。每天早上，我从城北的公寓坐公交车到学校，然后坐在宽敞而空荡的办公室里，帮助修改宣传册、招聘教师、就如何开展项目提出建议，以及提供其他帮助。

我认为，在我任职的几个里，SolBridge 的性质发生了变化。首先，他们决定把它办成一所商学院，而不是一所国际学校。他们一直在谈论国际

关系，因为他们希望招聘的 SolBridge 校长中有两个人对国际关系有着浓厚的兴趣，但这个决定很早就做出了，而且很明显，在 2007 年 5 月左右做出这个决定之后，我的能力就大打折扣了。我无法管理一所商学院，也没有资格在商学院任教，尽管我尝试过，尽管我对商界普遍怀有强烈的敌意。

为州长工作比帮助建设 SolBridge 更有意思，但不到半年，长期支持州长的 Woosong 大学校长 Kim Seong-gyeong 就明确表示，他希望我主要为大学工作，偶尔才为州长办公室工作。因此，在与州长进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日本之行，并在旅游和多元文化教育方面做出了各种努力之后，我在州长办公室的角色就慢慢减少了。

与此同时，我被要求在为索尔布里奇国际学校（后来的索尔布里奇国际商学院）招聘新院长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出于我不明白的原因，Woosong 曾试图吸引两位安全研究方面的专家来领导这所学校。他们通过猎头公司联系到了高高在上的外交官兼教授罗伯特-加卢奇（Robert Gallucci），他是克林顿时期与朝鲜谈判的核心人物。但加卢奇对去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学校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吴松放弃了。随后，他们又找到了佐治亚理工学院的约翰-恩迪科特（John Endicott），他是亚洲安全问题专家，曾就东北亚无核区问题提出过深思熟虑的建议，而且还娶了一位日本女性为妻。

我之前在华盛顿特区见过恩迪科特几次，对他的印象非常好。我们一开始就很合得来，我尽力说服他来吴淞。

在韩国并非一帆风顺。几周后，我从远离大使馆和整个华盛顿特区压抑环境的兴奋中恢复过来，开始努力恢复与各种人的联系。有几位著名的学者，尽管我过去曾与他们有过密切的交流，但却根本无法与他们见面。我给他们写过邮件，给他们的办公室打过电话，和他们的研究助理聊过天，甚至给他们写过信，但都没有结果。他们中的一些人多年后我还能联系上，而另一些人我却再也没有联系过。

在大田的四年里，有太多人向我提出咨询和赚钱的机会，我也不想在这个故事里再提那堆可悲的童话故事了。我只想说，有成百上千的人向我提出计划，让我为朋友的公司提供咨询、创办新公司、帮助韩国引进投资，或者做一些项目或其他。我猜想，只有大约 5% 的人给了我一杯免费咖啡，有时是一顿免费餐。

然而，起初我真的相信韩国的情况会有所不同，我投入了数百个小时来跟进这些机会。我甚至努力让自己熟悉做生意的方式，以及韩国可能的投资者（或国外的韩国投资者）的需求。三年左右后，我清楚地认识到，我不可能在商界发展，也无法弥补我在美国遭受的巨大损失。我开始从事写作和演讲，这是我能够相对自由地从事的两项活动。

我相信，韩国社会的某些方面会使一个人很难从事教授以外的活动，但我当时非常乐意永远放弃当教授，而且我提供了这样一套技能和关系，我不认为我面临的问题可以简单地解释为我无法适应韩国社会。相反，我认为韩国人对我既有怀疑，也有很大程度的黑名单，这使我无法做任何事情。某些韩国人费尽周折为我争取到一个咨询机会，然后又突然收回了邀请，他们的奇怪行为表明，限制我活动的建议有时是以相当明确的方式使用的。

现在回想起来，我应该从一开始就用英语和韩语写一些关于韩国的有趣的书，但我花了三年时间才发现，虽然提出了很多建议，但真正实施的却很少。我在韩国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写作。

有两个短暂的例外。有一家建筑公司聘请我担任顾问，帮助他们拓展海外业务，他们支付给我的报酬是每月 2500 美元，为期 6 个月。我想这是在朋友的推荐下安排的，因为我为了让儿子在大田价格过高的国际学校接受教育，花掉了很多收入，他觉得很对不起我。此外，在大约九个月的时间里，大德 Innopolis（负责大德研究集群国际事业的机构）也向我支付了一笔类似的费用，作为我帮助他们向海外扩张的报酬。这是当时的总裁姜桂玉和一位前官员特别努力的结果，他们对我的情况非常感兴趣，并想出了帮助我的办法。

约翰-恩迪科特（John Endicott）就任吴淞大学校长后，一些最初的体制性挑战得到了解决，我对他们的重要性大大降低。他们重视我的存在，会宣传我是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毕业生，但让我参加会议，或者让我去说服人们到新成立的索尔布里奇商学院工作或学习并不重要。我很高兴能有更多的自由。在某些时期，我们的关系发展得很好，但也存在某种紧张关系。吴淞大学的一些人认为，对于一个不是商学院教授的人来说，我的薪水太高了，而我也觉得，作为一个不能自由旅行或随意找工作的人，我被占了便宜。因此，他们认为他们没有从我身上得到足够的价值，而我则认为我受到了无情的剥削。

一般来说，吴淞大学的名声是比较吝啬和小气的；一所私立高中，利用炒地皮赚来的利润升格为大学，但缺乏对教育的真正投入。但我开始欣赏我

在那里教过的普通韩国学生，他们来自工人阶级，学习铁路管理和工程专业。我还与几位留学生结下了终生难忘的深厚友谊。我还遇到了一些了不起的人。还有一些有思想的教授，他们不知何故在创新的头几年来到了索尔布里奇。

最重要的是，这里的环境让我感到放松。在伊利诺伊大学或华盛顿特区，我的同事们对我敬而远之，因为他们担心我的政治问题会成为他们的问题；而在吴松大学，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我是谁，对我就像对待普通人一样。

我在大田的所有经历中，最成功的莫过于与以 KAIST 为中心的大德研究集群的合作。我从一开始就试图结识首尔耶鲁俱乐部的人，甚至在我搬到韩国之前。他们两人都在大德研究集群工作。其中一位名叫金元俊（Kim Wonjoon），是一位技术创新领域的教授，年龄与我相仿，他曾多次特意与我坐在一起，向我解释研究集群是如何安排的。

没过多久，我就发现大田可能拥有一个世界级的研究集群，但却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如果我能帮上忙的话，这个集群的潜力是巨大的。我很喜欢这种项目，它与我在伊利诺伊大学工程院所做的工作略有相似之处。

在金元俊的介绍下，我认识了大德 Innopolis 的工作人员金庆才（Kim Gyeongjae）。Kim Gyeongjae 是一个非常正派、体贴的人，我在大田期间，我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大德创新城在“国际化”和组织国际会议方面得到了政府的支持，但研究机构和 KAIST 的国际交流则由这些机构自己负责。

Kim Gyeongjae 给了我一份名单，上面列有大德研究集群中所有政府研究所的副所长，我决定尽我所能。我给他们都写了邮件，介绍了自己，并说我希望对他们和他们的研究所有所帮助。15 人中有 6 人回复了我，并同意与我见面。其中四人承诺与我密切合作。一年之内，我与所有研究所都建立了实质性的关系网，并系统地了解了每个研究所的工作内容和管理人员。

显然，他们在国际化方面的努力需要帮助，而且有可能获得资金来支付这项工作。

当时的副校长 Yang Jiwon 和其他几位有想法的教师还提议将我作为 KAIST 大学教授的潜在候选人。虽然我可以为 KAIST 的国际化做出很多贡献，但聘用像我这样没有理科博士学位的人却非常困难。经过多方努力，我终于在他们规模很小的文化与技术系担任了人文学科教授。

这次尝试没有成功，但我认为它本可以成功。有几个挑战必须克服，而且并不容易。首先，我不想再当教授了。我当了七年教授，在美国受到了最恶劣的虐待，工作报酬低得离谱。我强烈地感觉到，我可以做很多事情来获得适当的报酬，而教授的身份和无厘头的终身教职压力，是我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情。

因此，在 KAIST 的工作是一个有趣的机会，但它并不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KAIST 的老师却不这么看。他们认为 KAIST 是韩国最伟大的工程学校，我应该心存感激，并为得到这份工作而努力奋斗。这绝对不是我的态度，后来我才知道，一些教授在我的求职面试后说我似乎对这个职位没有足够的兴趣。

但还有其他原因。KAIST 意味着我将在终身教职的轨道上从头开始，被迫撰写我希望再也不用写的学术期刊文章。他们的要求会更高，因为他们是一所重要的大学，如果我不服从，他们完全有能力剥夺我的终身职位。这种工作环境对我来说毫无吸引力。

当我得知提供的薪酬和福利低于 Woosong 时，我失去了热情。我本该与他们跟进申请事宜，但我没有给他们打电话，他们也没有给我打电话。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我当时知道在韩国的日子里我别无选择，只能主要以教授的身份工作，我想我会尽最大努力争取到 KAIST 的工作，并以此为契机，通过获得适当的机构证书来确立自己的地位。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大学排名在韩国有多么重要（比美国或日本重要得多）。我还想用英文写一本关于大德研究集群的书，并以此获得国内和国际的关注。

但我想我可以不做教授了，我想经营一些东西，而不仅仅是写期刊论文。过了好几年，我才能够坐下来，强迫自己再次从事学术写作。

尽管我与大德的互动可能会提高他们的合法性，但吴淞大学并不支持我与大德的互动。事实证明，他们的主要兴趣在于赚取学费，以及提高他们在大学周围所拥有的房地产的价值。他们有大把的钱可以花，但与其他学术机构的联系质量却不是优先考虑的问题。后来，约翰-恩迪科特（John Endicott）帮助他们与佐治亚理工学院（Georgia Tech）就 "2+2" 联合学位项目进行了谈判，这深深地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以至于其他任何事情对他们都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即使是我参与的高调活动，也没有引起金成景主席的注意。值得注意的是，恩迪科特在吴淞一待就是十一年，虽然学校

的质量没有显著提高，但建立了一所恩迪科特学校，这让他非常满意。我对这种游戏毫无兴趣。虽然在整个四年中，我一直在以各种方式帮助 Woosong 大学，但当 Endicott 被证明是他们正在寻找的人才时，蜜月就结束了。我个人也认为他更合适。他很喜欢见面会和问候活动，而且他刚刚从佐治亚理工学院退休，没有必要为自己的未来职业生涯做规划。

韩国现代建设公司前首席执行官李明博于 2012 年就任总统，他推翻了卢政府的许多政策。虽然发生了大规模的街头抗议活动，但大部分韩国人都被他支持增长的言论所吸引。他很早就提出了 "绿色增长 "这个词，暗示环保型经济计划将成为其政府的核心。尽管最初几年有人（包括我在内）认真对待这一举措，但它最终演变成了一个利用税款资助大规模建设高尔夫球场的计划，以及沿河流和溪流到处浇筑混凝土，造成至今仍未消除的混乱局面。

但是，最初对 "绿色增长 "的关注为我提供了一个机会，成为我在韩国的第一次突破。就在韩国宣布绿色增长之前，我的朋友约翰-费弗（John Feffer）来到大田访问，当时我们都写了关于韩国拥抱绿色经济的潜力的文章。我与人合写的一篇文章提出了大田如何成为生态城市典范的愿景，并通过利用大德研究集群的先进技术和科研成果来实现这一目标。

许多年后的今天，我想我当时对技术在帮助解决环境问题方面的潜力还相当天真，我不知道我的想法与大多数研究人员的优先考虑事项有多么遥远。但是，当提案用韩文发表时，许多人都给予了非常积极的回应，包括一些我已经认识的研究人员。在曾在大田市政府工作多年的武松大学教授 Yu Hyeok-jong 的帮助下，我们召集了一批研究人员、政府官员和其他人，

成立了大田环境论坛，后更名为大田绿色增长论坛，我和韩国科学技术院副院长 Yang Jiwon 共同担任论坛主席。

我们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定期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将大田建设成为一个环保城市，并发表了许多激动人心的宏大言论。十年过去了，大田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当然也没有成为一个领先的环保城市。我曾自豪地谈起那次环境论坛，但现在已很少提及。不过，这个过程给了我一些认可，也给了我今后宝贵的人脉。

在大约六个月的时间里，我受到了相当多的关注，似乎我即将取得突破性进展。然而，事实证明，李明博政府对我们提出的任何内容都不感兴趣。未来的研究经费流向了 KAIST 和其他地方，但我却一无所获。此外，虽然我曾在几次高规格会议上作为嘉宾发言，但根本没有后续行动。这是我在韩国期间的总体趋势。我在韩国受到了短暂的关注（在美国从未受到过关注），但随后就完全无所作为了。

大田环境论坛最激动人心的部分是大田、日本筑波研究集群、北京清华大学周边研究集群以及帕洛阿尔托和斯坦福大学之间的生态城市联盟提案。尽管我们最初得到了清华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积极响应（包括 KAIST 杨副校长和我本人对两地的访问），但最终，合作协议还是在大田、筑波和中国深圳之间达成。双方就全球合作进行了认真讨论（我被排除在外），并在大田、深圳和筑波举行了三次国际研讨会。我没有被邀请参加深圳和筑波的活动，这个项目也从此告吹。不过，有那么一瞬间，我们似乎正处于大事的边缘。

2010 年，我得到了一份在釜山国立大学任教的工作，我本打算接受这份工作，但这份工作会让我远离大田看似充满希望的活动。最终，我没有接受这份工作，因为我的妻子不想搬到釜山，她仍然希望我能够以某种方式回到美国受聘。

如果不是因为武松大学对我在这些研究所的工作普遍持敌视态度，我本可以做得更多。我起初认为，让我们的学生有机会与这些研究机构交流，并获得实用的建议，对我们的学生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优势，原因很简单，因为在大田，只有这些机构是一流的，否则，我们的专业几乎什么都做不了。我认为这种逻辑是完全正确的，但武松大学有自己的优先事项，创建一个强大的专业并不是其中之一。

我承担的第一个项目是 KRIBB（韩国生物科学和生物技术研究院）提供的为期一年的国际化战略研究。我的参与并非偶然。2008 年，KAIST 迎来了一位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新校长，名叫苏南彪（Suh Nampyo），他是一位极度政治化和腐败的管理者，虽然我们偶尔会通过电子邮件交流，但我从未与他相处过。苏南彪曾支持我受聘为 KAIST 的教授，但我得到的待遇太低，显然不受重用。

Suh 与李明博校长成了好朋友，在首尔的时间比在大田的时间还多。在此期间，他萌生了一个想法：KAIST 可以通过恶意并购的方式收购 KRIBB。这种并购的理由相当可疑，许多专家都反对这一举动，但 Suh 利用他在科技部和青瓦台的关系推动了这一想法，并即将获得成功。

KRIBB 的 Liu Jang-ryol 对文学和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很欣赏我的作品。

他询问 KRIBB 应如何应对 KAIST 的接管，我提供了我最好的建议。我还得到了扎克-霍尔（Zach Hall）的帮助。最终，我们发表了几篇关于 KRIBB 的文章，在韩国国内争取到了支持，并说服了足够多的人相信这个想法并不是特别可靠。

就我个人而言，我对并购问题没有强烈的感觉，但我很高兴能参与评估研究机构真正价值的工作。我撰写的有关 KRIBB 和生物技术的文章非常有效，因此 KRIBB 向我提供了一个为期一年的研究项目，内容是国际化和宣传战略。

在随后的两年里，我又获得了韩国地质和材料研究院（KIGAM）、韩国标准和科学研究院（KRIS）、韩国核安全研究院（KINS）以及首尔国立大学聚合技术研究生院的类似研发资助。在首尔国立大学，我直接与当时的院长安哲秀（Ahn Chol-soo）合作开展了一个项目。

这些项目为我提供了聘请研究助理、出国旅行以及在首尔参加高规格研讨会的预算。总之，它们为我提供了在吴松大学找不到的合法性。

我与大德研究集群的合作始于一位名叫 Kang Gye-doo 的深思熟虑的政府官员被任命为大德创新城的首席执行官。我们一拍即合，在多个项目上进行了密切协调。他确保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荣誉，甚至坚持要为我的工作支付报酬。

正是在这个时候，我成立了第二个会议--大德融合论坛，探讨快速的技术变革如何导致不同领域的融合。这次会议也得到了政府的正式认可，其重

要性相当于大田环境论坛。不过，这一次我没有那么热情了，因为我太清楚这样一个项目会如何被用来利用我了。

姜桂斗的统治在 2011 年春天突然结束，原因是一场相当隐晦的政治斗争。我受到了直接影响。我失去了所有的资金，有一段时间，所有的机会对我来说都枯竭了。我想，也许是我与姜桂斗在大田的影响力太大了，某些派别希望我们下台，但我不知道具体情况。

在大田的日子让我明白，写作是我唯一的出路之一，我可以稳定地从事写作，不会大起大落，这有助于我在韩国乃至全世界树立声誉。此外，正是新闻写作让我起飞，随后是书籍，让我最终获得了我认为我需要的认可，使我的职业生涯重新走上正轨。然而，我对自己的相对名气对收入的影响的看法是错误的。在韩国期间，我出版了三本畅销书，并在一家大报上发表了一篇阅读量最高的专栏文章，但这并没有帮助我找到我想要的工作，当然也没有让我不再当教授。

显然，关于我在韩国的行动有极其具体的规定，而且这些规定将无限期地持续下去。

最初几年，我用英语为鹦鹉螺研究所 (Nautilus Institute)、《聚焦外交政策》 (Foreign Policy in Focus) 和 OhmyNews 撰写关于国际关系和气候变化 (这已成为我的工作重点) 的文章。有些文章受到好评，但突破性的是我为大德网 (Daedeok Net) 撰写的韩文文章，内容涉及韩国科学政策、环境问题以及对大田市未来的建议。其中一些文

章，尤其是与韩国长期科学政策有关的文章，获得了广泛的读者，特别是在我成为大田环境论坛联合主席之后。

结果，我在 2010 年受邀成为《前京经济报》的撰稿人，这是一份颇具影响力的大众期刊。我花了大量时间撰写这些文章，并开始收到各种经济论坛的演讲邀请，偶尔还受邀到大田和首尔的公司演讲。

有趣的是，虽然一个外国人为《前京》这样的经济刊物撰稿是一件非常不寻常的事，但吴城大学完全无视这一突破，就好像我不存在一样。我已经决定要想办法离开 Woosong 大学，于是我更加努力地写作。最终，我向一系列中级报纸投稿，获得了很多曝光率。更重要的是，我开始积累了数百页的韩语原创文章，内容涉及外交政策、技术监管、文化、国际关系、教育、环境以及其他众多主题，这对我日后用韩语撰写书籍大有帮助。

后来，在我搬到首尔之后，我获得了一个突破性的任命，成为韩国主要报纸《朝鲜日报》的撰稿人。我为这份保守的报纸写了六个月的稿子，之后，我经过一番奋斗，终于获得了为《中央日报》撰稿的职位，这一干就是六年，并成为我的身份标志。

但很明显，我在韩国社会中寸步难行，如果不尽快行动，我很容易就会老死在武松大学，或者某个更不起眼的大学。武松大学对提拔我不感兴趣，韩国大学只关心 SSCI 期刊的发表。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喜欢我的文章，邀请我去演讲，但没有一家愿意真正聘用我。

需要指出的是，我不写 SSCI 期刊论文有多种原因。我不仅不喜欢用这种狭隘的期刊来评价教授的制度，而且也没有从写文章中得到任何乐趣。更

重要的是，我不再受邀参加我原有领域或其他学术领域的任何学术会议，因此，我无法与同事进行智力交流，而这种交流可能会鼓励或要求我撰写学术期刊文章。

我下定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我就必须用韩语出版一本书，讲述我在韩国的冒险经历，以及我的亚洲研究背景，这样就会有更多读者，也能让我克服自己明显的局限性。当时我已经清楚，我永远不可能靠当顾问谋生，也永远不可能被大学以外的任何机构聘用。我在耶鲁大学的一位同学（我从未直接认识过他）在韩国出家为僧，并将他在韩国的经历写成了一本书，成为畅销书（比我的书更畅销）。他的名字叫 Hyungak Sunim。我们最终见了面，当我的韩文书最终出版时，我会请他为我的书写序。

我用英文写了一份详细的手稿，介绍了我的童年、家庭成员、我第一次到亚洲的经历、我对韩语的学习、在韩国的一般学习以及我对韩国传统的理解。我还详细介绍了我在大田的工作。之后，我聘请了一位名叫李美善的年轻女士为我将手稿翻译成韩文，然后我再仔细核对。到 2010 年 3 月，我手里有了一份重要的手稿，我相信它在韩国年轻人中会很受欢迎。

然而，当我开始与出版商洽谈时，却发现他们对此毫无兴趣。没有人愿意接手这个项目，很多人甚至不想见我本人。最后，我遇到了一位名叫李三夏的古怪作家，他在喝了三轮 makgeolli（一种有点甜的韩国酒精饮料，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米啤）之后同意出版这本书。李三夏是某位商人的老朋友，这位商人经常来大田，许诺给他大笔商机，但从未实现。但这次介绍还是很有价值的。

李三夏曾是一名学生活动家，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他就曾因发表有关 20 世纪 40 年代韩国政府在济州岛屠杀平民的诗歌而锒铛入狱。他是一位博览群书、深思熟虑的知识分子，虽然有些飘忽不定，但他对我的案件抱有真诚的兴趣。

最后，他找到了一位编辑，一位名叫 Gosan 的作家和老师，他帮助我把相关的著作写成了韩文手稿。幸运的是，我非常喜欢与 Gosan 交谈，我们成了相当要好的朋友。虽然寻找出版商的过程很艰难，但与高山的合作很愉快，手稿虽不完美，但已于 2011 年 3 月准备就绪，将由李三夏的出版社游牧书局出版。

这本书作为邪教出版物获得了成功，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我猜想它至少卖出了 15000 册，甚至更多。李三夏和后来的其他出版商一样，没有如实告知销售数量，我只收到了一小部分版税。

但是，这本书让我在韩国各地找到了广泛的读者，也为我提供了一个直接表达自己的机会，让我可以谈论自己对文化、历史和当代社会的真正兴趣，而不仅仅是辛苦地寻找有关科学政策或研究集群的相关内容。

但是，即使我的书稿在不断进步，我通过各大报纸为更多的全国读者撰写文章，并应邀参加更广泛的活动，用韩语和英语发表演讲，我的教授身份却变得越来越不确定。约翰-恩迪科特（John Endicott）突然告诉我，2010 年秋季将不再与我续签在 Woosong 大学的合同。虽然我在韩国、日本和美国的大学和其他地方申请了多份工作，但都没有获得面试机会，我只能像在伊利诺伊大学一样坐等失业。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被解雇了（很明显，作为教授，我的工作没有保障）。我不知道这是否与此时大德谷的某些事态发展有关，这些事态发展可能促使那里的强大势力，或许也包括李明博政府，希望我离开。

我一直在努力实现将大田作为一个城市来宣传的想法，不仅要解决研究战略问题，还要对旅游和形象进行更广泛的思考。我参与的活动包括为大田设计一个新的标志，制作有趣的大田 T 恤衫和纽扣，以及开发一个艺术网站“大田指南针”，该网站重点介绍大田有趣的地方，包括详细的英文介绍。

我认为这些努力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但市政府的朋友们却表现得异常沉默。此外，当时我发现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受邀参加活动。我在大田的活动明显被冻结了。一位朋友后来解释说，我已经成为小池塘里的一条大鱼，这也许是真的。但与此同时，我的主要赞助人姜桂斗却意外地被解除了大德创新城首席执行官的职务，这显然是一个政治举动。但我不清楚这场斗争主要是大田各派系之间的斗争，还是涉及李明博政府的斗争。

下学期于 2011 年 3 月开学，但我没有收到任何大学的录取通知，即使是在 2 月初。我做好了再次失业的准备。后来有了两次突破。Kang Gye-doo 成功地获得了南部全罗南道光州市副市长的职位。他是我为数不多的真正的朋友之一，立即为我找工作，并从朝鲜大学校长那里得到了我可以在那里任教的承诺。虽然这不是一所所有名的大学，而且我妻子也不太愿意住在这个城市，但这至少是个不错的职位。

另一个机会是在庆熙大学，这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大学，在韩国排名前十，甚至前七。李三夏是庆熙大学的毕业生，他的导师、英国文学教授都钟日刚刚开始为本科生开设人文学科，即人文学院。2010 年秋天，李向都钟日介绍了我两次，后来我写信向他介绍了我的工作。起初，都教授表示了极大的兴趣。但当我一月份再联系他时，他似乎对我的来电相当恼火，让我不要再缠着他了。

今年 2 月，我本以为自己已经踏上了去朝鲜大学的路，却在最后一刻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通知我庆熙大学的申请已被接受。

在韩国求职的同时，我也再次向美国求职。我为一家商业报纸撰稿，为计划全球化的技术机构担任顾问，并取得了成功，我还应邀参加了主流企业的讲座。我决定再次争取进入主流社会，看看能否在美国再次获得成功。毕竟，我的妻子每天都在抱怨在韩国的生活，而我的儿子在大田上了一所价格过高的国际学校，这所学校花光了我们所有的剩余资金。

我删除了自己在 YouTube 上发布的一段视频，在这段视频中，我描述了美国军国主义的危险；我清理了自己的简历，强调了最近的咨询工作；我还征求了一些专业建议。总之，我试图走向主流。我首先联系了耶鲁大学的同学格伦-古特马赫（Glenn Gutmacher）。他给了我一些关于简历内容的建议。他还告诉我如何在 LinkedIn 和 Facebook 上为自己做宣传。根据格伦的建议，我还建立了自己的博客 circlesandsquares.asia，并尝试为自己创造一批追随者。格伦还建议我联系一个叫 Reo Hamel 的人。

雷奥是一位住在波士顿附近的老人，他的副业是职业咨询。我从 2010 年开始向他寻求建议，重点是美国的就业问题。

我只见过他一次，那是 2011 年 2 月我去美国访问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时，当时我与 Woosong 大学的合同刚刚结束几周，而我与庆熙大学的合同尚未敲定。Reo 为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让我了解了别人是如何看待我的。他大大提高了我的修养，让我走上了一条更有政治头脑的道路。

雷奥于 2013 年 9 月去世。他在我生命中扮演的角色很短暂，也很有限，但他深深地打动了我。

2010 年和 2011 年，我在美国申请了各种学术工作。没有一个人给我面试机会。这其中包括约翰-恩迪科特特意介绍给我的许多重点大学的高层人士。

有一个职位似乎更有前途，有几个月的时间，我真的以为自己有很大的机会。

耶鲁大学决定在新加坡开设分校，几位朋友建议这对我来说可能是个好机会。我很快就联系上了讨论这一倡议的委员会的核心人物之一，Haun Saussy 教授。Haun 是一位中国文学和比较文学教授，我认识他很久了，他也曾师从我在耶鲁大学的导师张康一。我们一见如故，我很快就与他就耶鲁大学在新加坡的战略进行了一系列讨论。很快，我也与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有了联系，感觉自己也成了委员会的一员。2011 年 2 月，我前往耶鲁大学访问，与委员会成员会面，看望校园里的其他朋友，并与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前院长亨利-罗索夫斯基会面。

最后，我申请了耶鲁大学新加坡校区的一个职位，但最终没有被录用（没什么好惊讶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与时任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

(Richard Levine) 有了直接接触，他多次给我写信，他的熟识让我暂时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自己将被美国主流社会重新接纳。

此后几年，我与美国机构的关系突飞猛进，我不再撰写关于美国主要机构腐败的文章。2013 年，我甚至受邀在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发表演讲，这似乎是一个真正的突破。我两次参加了亚洲研究协会的会议（这是我自 2002 年以来的第一次），以此作为重返亚洲研究领域的努力的一部分。

我认为，我对自己与美国关系的新自信（即使这种自信只持续了几年），使我对韩国机构的吸引力大大增强，而耶鲁之行和其他活动，则确保了我在庆熙大学的职位。

第 6 章

回归主流，再回归主流

庆熙大学

庆熙大学校长赵仁源对我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人文学院院长充满热情。我非常符合他的计划，即开发一个全球性项目，将美国高等教育的精华带到韩国，并与常春藤联盟的强校建立密切联系。我将扮演核心角色。

他同意给我比同行副教授更高的薪酬（尽管我认为我早就应该成为正教授了）。这一决定引起了广泛的不满，结果适得其反。

赵校长给了我预算，让我开展跨学科项目，并给了我一间大办公室。我还被任命为庆熙大学暑期项目“全球合作”（The Global Collaborative）的负责人。庆熙大学与宾夕法尼亚大学共同管理该项目，并从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其他大学请来知名教授。总之，在短暂的几个月里，我以为自己终于成功了。

他们期望我利用在美国的人脉关系，以及我在韩国官僚机构中久经考验的生存能力，帮助庆熙大学更上一层楼，这并非毫无根据，但他们低估了我在美国所面临的政治障碍的规模。这种努力在某些情况下取得了成功，但

最终，由于大学教师的抵制，他们不喜欢有一个被校长强加给他们的外国人参与其中，以及我在美国事情系统中的对立面的一些背景低级干扰，这种努力的影响是有限的。我在庆熙大学待了八年后，觉得自己必须离开了。

在庆熙大学的前两年是在人文学院度过的，该学院是英语系都钟日教授新设立的文科专业，后四年是在国际研究学院度过的，该学院是唯一愿意为我提供副教授职位的院系。虽然我从一开始就具备了成为正教授的资格，但在这六年里，我却经历了一系列不必要的不确定性。

我被任命为校长顾问、跨学科研究所所长，以及庆熙大学与宾夕法尼亚大学联合举办的暑期全球合作项目主任。我的跨学科中心获得了一个巨大的房间，但没有为我提供工作人员和家具。我所有的资金申请都被婉言拒绝。与我共事的行政人员对我很好，但他们对我的工作没有提供任何支持。Humanitas 学院的院长也成了我的好朋友，但在资金问题上，他似乎束手无策。校长想让我做一件大事，但这根本不可能。

我的职责一点一点地被剥夺。我作为全球协作主任的任命被取消了，尽管这是写在我的合同里的，而且我从未被告知变更的原因，甚至没有得到关于我身份变更的书面解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与行政部门几乎没有互动，尽管我受聘的主要目的是担任校长顾问。

我不知道出现这种奇怪情况的原因。也许是教授们嫉妒我的作用，也许是不高兴突然来了一个外人。也可能是校外，甚至是来自美国的明令限制我的作用。我怀疑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其中的原因，事实上，到那时，我已经不再那么在乎了。我已经习惯了被无形的枷锁束缚。

因此，从 2011 年 3 月起，我就一个人坐在书房里，整天读书、写作，偶尔也与其他教师会面。有些人很高兴我来到庆熙大学，他们认为我是恢复庆熙大学最初对和平与人文学科的承诺的一个机会。尽管承诺了这么多，但我一开始的作用非常有限。我的行动受到了严格限制。

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写作中，不仅利用这个机会写文章、出书，还学习如何有效地写作。例如，在经历了长达八年的心理障碍之后，我得以重新开始学术写作。在半年时间里，我（在一些人的帮助下）完全修改了关于日本和中国近代前期小说的书稿，并在首尔国立大学出版社出版。我还修改了韩国作家朴志源的小说译本，并由首尔大学出版社出版。

我的老朋友萨拉-刘（Sarah Liu）帮助我完成了编辑工作，还有一位名叫梅丽莎-皮诺（Melissa Pino）的体贴的女士，她是哈佛大学英国文学系的研究生。她为我提供了很多帮助，即使她自己的身体也很虚弱，我很遗憾一直没有机会见到她本人。

我每月，甚至每周都为韩国报纸撰写大量文章。其中许多文章被广泛阅读，这一过程奠定了我在韩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尽管我没有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可，也没有被邀请参加亚洲研究会议。由于我的活动被阻挡在写作之外，我无法走上美国亚洲问题专家的成功之路。然而，我所走的道路帮助我学会了如何为韩国普通读者写作，并培养了广泛的追随者，如果不是这样，我永远不会拥有这些追随者。

后来，我出版了一本关于我的人生经历和我与韩国文化的相遇的书《*生活是方向问题，而不是速度问题*》，这本书成为了人们崇拜的经典之作。虽

然这本书是由一家小出版社出版的，但很多人都读过，还给我写了私人信件。

到 2012 年，我开始收到数量空前的邀请，与非政府组织团体、企业和其他组织进行对话。

我根据对弗朗西斯-福山和诺姆-乔姆斯基等著名学者的采访撰写了另一本书的手稿，书中我谈到了韩国面临的严峻挑战。虽然这本书写得很好，而且在 2013 年大选前及时出版，但它并没有大受欢迎。不过，它确实提高了我在韩国的整体声誉，并为下一步工作奠定了基础。

这本书确实将我推上了媒体的食物链。2013 年春天，韩国排名第三的报纸《东亚日报》邀请我担任专栏作家。这一任命彻底改变了人们对我的看法，在短时间内，我被当作主流人物对待（在韩国，而不是在美国）。2013 年秋天，我被任命为韩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朝鲜日报》的专栏作家。《朝鲜日报》是一份极其保守的报纸，这完全不匹配，但在当时，我被认为是了解韩国的美国人的重要资产。

这一过程的顶点是我被《中央日报》任命为长期专栏作家，任期从 2014 年春季至 2019 年 1 月。基本上，主流媒体中的每个人都在阅读我的社论，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针对媒体不擅长的话题创作出了有效的文章。

多年来，我还找到了一些人，他们可以帮助我将作品翻译成韩文、中文或日文，并收取合理的费用，这样我就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快速表达自己的观点。此外，我还找到了愿意发表我的作品的期刊。最重要的是，我在撰写客观、相关的文章方面享有盛誉，而这些文章显然不是由企业赞助的。

但还有更进一步的工作在等着我。我请我的好朋友、YTN 的记者王善泽帮我编辑《*韩国人无知的大韩民国*》一书。作为一名对韩国历史有着深刻理解的专业记者，王森泽对我的文章进行了重新修改，使之具有广泛的吸引力，并于 2014 年由顶级出版社 21st Century Books 出版发行。这本书最终成为全国畅销书，连续一周排名全国第八。尽管出版商显然没有支付我应得的版税，但这并不重要。我的知名度又上了一个新台阶。下文将详细介绍这部分故事。

我的第二本韩文著作出版后，我在韩国的知名度也随之提高，我还被选为《朝鲜日报》和《中央日报》的撰稿人，我在庆熙大学也开始受到更多关注。我被邀请加入各种委员会，还被要求向校长赵寅元提供建议，并编辑他的演讲稿。我不再被完全禁锢。

2012 年 10 月，我到普林斯顿和耶鲁大学访问，发表了关于古典文学的演讲，受到好评。我还结识了很多人，比如高级研究所副所长迈克尔-加勒特（Michael Garrett），他是我从小就认识的人。我见到了耶鲁大学西校区的副教务长，他同意访问韩国。我与耶鲁大学的多位教师进行了积极的对话，他们曾试图帮助我在新加坡校区找到工作。

我还说服了我的朋友、哈佛大学的中國史专家迈克尔-普伊特（Michael Puett），让他第一次来到韩国，到庆熙大学拜访我。最终，他与我和约翰-特里特（耶鲁大学日本文学系）共同举办了一场讲座，并因此被邀请担任为期一年的客座教授。虽然我在校园里的总体影响力仍然有限，但我确实取得了一些相当大的成功。

虽然庆熙大学没有给我提供终身职位，也没有给我提供丰厚的收入，但它提供了住房帮助，使我能够在首尔居住。现在回想起来，那段住在首尔市中心的日子是我人生中稳定而幸福的时期。我的孩子们茁壮成长，我的妻子在高丽大学艺术史硕士课程的学习中也相当积极和热情。

两年后，我被决定必须从人文学院调到一个成熟的系，重新开始终身教职的计时。我了解到，前两年我在庆熙大学的职位不被视为终身教职，我出版的两本书也不计入终身教职。

事实上，自 2004 年以来，我一直未被允许进入终身教职轨道。我认为大学可以随意利用我的弱势地位，他们也确实这么做了。

就我个人而言，2002 年我本可以永远离开学术界，但我不得不继续担任教授。这一次，由于我显然无法在韩国自己创业或找到其他工作，我曾希望通过某种方式，回到教授的主流定义中来，帮助我解决所面临的无法解决的问题。我猜想，如果所有其他因素都相同的话，在庆熙大学工作会是一件好事。但其他政治和社会问题正在迅速恶化，它们最终将开始直接影响我的生活和思想。

经过与各院系的多次协商，校领导决定让我转到远在水原的庆熙大学国际研究学院。中国文学系、日本文学系和韩国文学系都明确表示不要我。

很多韩国人都认为我应该感谢这份任命。但让我感到震惊的是，他们仍然拒绝给予我终身教职，这与我研究生院的任何同事都不同。不过话又说回来，我缺乏其他人的许多基本权利。从积极的方面来看，我在荒废了十年之后被允许重新开始终身教职，有几位好心的教员尽量让我顺利过渡到新项目。

在国际研究学院的头几个月里，我清楚地认识到，我并不完全适合这个专业，而且那里的教师们一开始就不想要我。我是那里唯一一个有人文学科背景的人。大部分教师都是经济学教授，他们信奉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让我无法忍受。

课程用英语讲授，节省了我的时间。而且，该项目相对较高的排名让我在韩国社会，尤其是在有编制的韩国人中间有了一定的影响力。那段时间，我有几个能力很强的学生，与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关系也很好。我从未与系里的任何教授亲近过，我发现他们的因循守旧令人不安。不过，这是一个有地位的职位，它打开了某些大门。不过，我不确定最终尝试重新加入主流是否是我的最佳选择。

在国际研究学院学习了几年后，这个课程对我来说变得越来越乏味。不仅教学方法不诚实，教师对时代的重大问题完全保持沉默令人不安，而且我还发现教师对教职工和学生的态度是一种贬低。也许是我越来越同情工人的困境，也许是大学的等级制度越来越森严，也许两者同时存在。

在庆熙大学工作八年后，我发现自己更喜欢与学生交谈，而不是与其他教师交流。我没有受到重视。我被要求撰写学术期刊文章，我觉得这些文章没有社会价值，也没有什么学术意义。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我所在的系对我的角色兴趣不大。

2016 年秋天，我已经认真考虑过离开庆熙大学。

在庆熙，我被排除在国际交流发展之外，只能做讲座和批改论文。我接受了这一身份，并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写作（这不是学术性的）和亚洲研究所的发展上。但是，由于我偏离了他们规定的工作重点，系里最终（没有任何正当理由）推迟了我的续约。

2012 年 2 月 18 日，也就是我受聘一年后，庆熙大学创始人赵永植去世，庆熙大学的文化也发生了整体转变。我从未见过赵英时，但在他弥留之际，

我仍能感受到他在学校的存在。他是一个复杂而意志坚强的人，在创建庆熙大学的过程中，他既有专制主义的影子，也有自由国际主义的影子。这所学校有着支持艺术和人文学科的优良传统，并致力于环境和世界和平，这正是吸引我的地方。此外，过去曾有许多陷入政治困境的人在庆熙找到了庇护所。

我刚来时，赵永植卧病在床，我只是从图书馆里读到的资料，以及与他的儿子、学校校长赵仁元的交流中了解到他的思想。我担任他的顾问长达数年，我们的关系变得亲密无间。赵永植上一代提拔起来的教授和高级管理人员与赵永植一样，对世界和平抱有憧憬，他们支持我。另一派则希望通过出版刊物和其他举措来提高学校的排名，从而将大学带向不同的方向。赵老先生去世后，SSCI 文章和增加教学工作量将成为普遍现象。

庆熙大学正在发生变化，变得不再那么熟悉，正在被市场力量所改变。

但世界的这些变化也在改变着我。大学似乎越来越不像一个学习的地方。我也越来越意识到生态系统的崩溃。我可以看到，人类的灭绝已经写在墙上，因此我开始迅速重新整理自己的价值观。到 2015 年，很明显气候变化是核心灾难。我觉得自己不得不写下这些文章，并随时采取行动，尽管我周围的人都不愿意这么做。

我还看到政府腐败日益严重，尤其是在美国，但在韩国也是如此，已经到了必须采取行动的程度。整个经济都被投资银行的利益所左右。没有什么比解决经济扭曲和气候破坏问题更重要了。撰写 SSCI 期刊论文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财富的集中和媒体的消亡，让我陷入了与 2001 年时相同的危机模式。奥巴马时期的短暂假期结束了，我感受到了危机感。此外，闲聊变得越来越困难。其他教师谈论安全和外交，却回避气候变化、财富集中或技术对社会的影响，这让我难以忍受。他们不仅错了，还在积极误导学生认识我们生活的世界。

我无法专注于学术期刊文章，我为学生和市民组织了与当代社会有关的活动，但这些活动在大学里毫无意义。

然后是晋升的小事。很明显，从 2011 年我在庆熙大学工作开始，我就完全有资格成为正教授。我知道，庆熙大学有一些教授发表的论文比我少，但他们已经成为了正教授。但我的身份七年来一直是副教授。2017 年我接受审查时（不是为了晋升，而是为了让我再当五年副教授），系里认为我略低于续约要求。但事实上，我发表的文章数量完全符合他们的要求。整个过程就是个骗局。

在长达六个月的时间里，我的合同能否续签都悬而未决，更不用说成为正教授了。最后，双方同意将我的合同再延长四年。但是，我发表的论文（包括两本书）一文不值。我被当作新来的助理教授对待。

这还不是全部。当我知道我的合同被延长后，我再次询问我什么时候能有一个学期的休假来进行研究。我被告知，由于我的论文发表滞后，我不再有资格享受休假（即我将没有时间撰写论文）。这种说法听起来很荒谬，我怀疑这个过程是否合法。无论如何，我没有兴趣与工作人员争论，他们

显然是被迫告诉我这些事情的。显然，事情另有蹊跷。究竟是资深教师不喜欢我，还是第三方明确命令他们骚扰我，我不得而知。

还有其他一些问题让我想离开庆熙大学。我越来越担心自己的健康，担心健康状况会影响工作。我把自己患有神经系统疾病的情况告诉了院长，但他对此毫不关心。我有一封汉阳大学医生写给院长的信，信中详细说明了我的病症。院长甚至从未承认他收到过这封信，更不用说与我见面讨论我的健康问题了。不过，我从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那里得知，院长收到了那封信。他们根本没有帮助我。他们只说，如果我拿了正常工资的三分之二，就可以休一个学期的病假。

我怀疑有一些指令限制了院长的活动，也限制了他帮助我的能力。韩国国内刁难我的压力与日俱增，伊利诺伊大学的景象开始重现。院长甚至拒绝与其他教职员工公开讨论对我提出的要求的合理性（这些要求显然不同于对其他人提出的要求），这表明他的做法有很大问题。整个过程显得如此勉强，如此荒谬，以至于在我看来，根本不值得与这个制度作任何抗争。

也许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我在院长的鼓励下设计、申请并获得资助的气候变化课程。对于大学和韩国来说，这是一门独特的课程，因为我详细讲述了气候变化的整个故事，并计划让学生们广泛讨论这一威胁的严重性。我还布置了关于化石燃料公司和其他利益集团如何通过贿赂专家来低估气候变化的阅读材料。

经过一番准备，我发现2017年9月的第一节课总共只有5名学生上课。在庆熙大学任教的六年里，我从未遇到过本科生班级第一天没有满员的情况。

这种情况让我深感神秘。随后，我收到了系秘书的邮件，通知我如果没有招到至少十名学生，这门课将被取消，我的工资将被扣 300 万韩元。

整个过程似乎很荒唐，而且似乎违反了 my 合同，合同中并没有提到因为我没有教那些不允许我教的课程而扣我的工资。

但经过一番调查，我了解到了真相。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大学进行了一次重大的结构调整（对教师保密），某些课程被定为必修课，而其他课程则被指定为选修课。另外，校方坚持每位教授每年要教授五门课程，而不是四门，因此造成了严重的课程过剩。

我的课程被指定为选修课，而我了解到，许多想上我这门课的学生无法选修，因为他们必须选修经济学课程或其他新的必修课程。因此，对我的课需求不足完全是人为造成的。第二天，我与系主任开会讨论此事。我首先告诉他，整个过程违反了 my 合同。他沉默不语。

我保持友好的态度，并建议把我的气候变化课程作为必修课，而把经济学作为选修课。他笑了。不过，我并不完全是在开玩笑。然后，我建议我们和教员们开个会，讨论一下这套新的教学规则，以及气候变化是否应该作为辅修课程的问题。他拒绝召开这样的会议。

我觉得庆熙大学已经沦落为一家营利性公司，试图以更低的工资和更少的知识内容来压榨教授，同时要求学生支付更高的学费，因为如果他们想要工作，就别无选择。教学和知识追求毫无价值可言。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目睹了这一切的发生，但与系主任的那次会面让我明白了一切。几周后，

我告诉他，我打算离开，尽管在我的班级出现问题之前，我已经表明了这一意向。

在韩国的一所精英大学里，我的作用大打折扣。我能够与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教授取得联系，并在许多方面为庆熙提供帮助，但我的心已经不在这个项目上了。我越来越关注普通孩子的困境，包括我自己的学生，他们的未来和优先事项被大学，特别是教授们公开欺骗。没有人谈论战争、气候变化或财富的集中。

我感到震惊的是，教师们竟然不惜一切代价不谈论任何实质性的问题，更不用说美国的犯罪行为了。为了让自己重返主流社会而进行的七年计划取得了适度的成功，但我的思想却在向另一个方向游移，那就是激进的批判。在我的系里，没有人可以倾诉。

到 2017 年，我从激进批判的新闻来源获得了大部分有关经济和政治的信息。2007 年，我还会经常从《纽约时报》上获取信息（尽管从 2001 年起我就不再信任它了），而到了 2017 年，我简直再也不看它了。此外，我还看到了正在发生的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变革，而这些变革只能用马克思提出的经济和文化批判来解释。我从来都不是马克思的忠实粉丝，因为我觉得他的分析过于简单。但我认为他关于权力和意识形态的许多论点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完全符合我在韩国和美国看到的情况。

而在 2001 年，我甚至会认为我可以在美国政府工作，到 2014 年左右会有我的用武之地，但随着特朗普的崛起，这样的工作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了。即使是在美国大学工作，在心理上看起来也很困难。

我的健康状况也是决定离开庆熙大学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如我所提到的，1999年7月，我做了脑肿瘤手术。虽然肿瘤未能完全切除，但十多年来我基本上没有出现任何问题。我的神经系统没有出现严重问题。然而，2009年左右，我在大田开始注意到，我的左手有些无力，有时身体左侧会有刺痛感（就像脚睡着了一样）。我向医院询问可能出了什么问题，他们告诉我这是意料之中的。他们建议我做核磁共振检查，但他们认为情况没那么严重。

2011年冬天，当我去耶鲁大学访问，讨论在新加坡新校区任教的可能性时，我感到整个左侧身体都在拖动，我越来越担心这是一个严重的情况，而且会迅速恶化。事实上，神经系统的状况会经历短时间的剧烈变化和长时间的小问题。

我去波士顿的麻省总医院做了核磁共振检查。虽然收费高得吓人，但我得知几乎没有任何变化。但我并不完全相信一切正常。

从2011年到2018年，我的运动控制能力明显退化。我洗碗要花更长的时间，穿衣服要花更多的力气，就连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写点东西这样简单的事情都变得很麻烦。我的打字速度也变慢了，偶尔我还担心下床或穿衣服时会摔倒。

没有什么事情是我不能做的，但所有事情都更加费时。后来，我更加难以入睡，经常长时间躺着，耳鸣不止。庆熙是一个高压力的环境，那里的教员们显然不在乎我的死活。乘坐公共汽车前往水原校区的路途非常遥远，

我越来越不喜欢这样的路途。部分原因是我睡眠不足、身体状况和其他问题，但也有部分原因是我对那里的文化感到沮丧。

由于我的妻子比以前更加暴躁，这种情况变得更糟。她的经历我就不细说了。毫无疑问，她在那 18 年里也受了很多苦。我只想说，如果我们没有在朝鲜如此艰难的环境中生活那么久，很可能很多心理压力都可以避免。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的睡眠不佳和耳鸣是否是骚扰的结果，使用各种低级能量束扰乱我的睡眠，并以其他方式长期损害我的神经系统。美国国家安全局已经解密了有关目前使用这种武器攻击美国人的文件。我的症状与记录在案的类似骚扰事件相似，国家安全局曾使用此类装置骚扰和损害被列为攻击目标的公民的健康。

除了我多年前看到的有关此类骚扰的文件外，美国报纸上还有关于中国如何使用高频率攻击美国大使馆里的美国人的报道。美国报刊上的这些报道并不令人信服，但它们表明美国本身也在从事此类活动。我是否受到过此类骚扰，程度如何，在无法查阅机密文件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知道的。我确实与一些人进行过几次交谈，他们似乎知道我受到了某种虐待，这种虐待会损害我的健康。

我主观地感觉到，在美国发动与伊朗的战争、制造与韩国的问题等各种努力期间，尤其是 2016 年之后，我经历了一些最严重的失眠和耳鸣。

无论如何，如果我当时受到这种骚扰，我是不容易阻止它发生的。也有可能，这种形式的骚扰与其说是进行骚扰的人为了伤害我，不如说是为了让我免受更严重的惩罚而做出的某种妥协。整个过程包括低级骚扰、对我神

经状态的故意伤害，以及严重神经疾病在紧张环境中长期存在的自然结果，这些最终都无法理清。

\

为韩国和全球读者写作

让我们回顾一下我 2011-2017 年在韩国的职业生涯。在此期间，我在韩国取得的最大成功是作为一名作家。正如我之前所说，我并不认为作家是我在韩国职业生涯的首选。我曾多次努力从事顾问工作，并以顾问的身份赚钱，但尽管这些工作我做得很好，却很少有人认真地付给我报酬，这对我来说从来都不是一个可行的职业。

我相信，存在着一种明确限制我的活动，但把教学和写作作为一种可能活动的机密咨询。事实上，我比韩国或世界上任何其他人都更能直言不讳地谈论问题，并能在主流企业报纸上发表这些文章。虽然我并不富有，我的妻子也被我们的生活折磨得心力交瘁，一直找不到工作，但我确实有一些独特的优势。

在华盛顿期间，我为《聚焦外交政策》和鸚鵡螺研究所撰稿，其中一些文章受到了关注。

来到大田后，我根本不想写作。我只想做好我在 SolBridge 的工作。但一路走来，我为当地的《大田日报》写过文章，后来又转到了 Daedeok Net，

这是一家科技日报，阅读量很大。我的一些文章在技术专家和政策制定者中广为流传。

2010年，我应邀成为《前京商业周刊》的专栏作家，这是一个重大突破。我的文章比他们的大多数文章都更有趣，也更有思想深度。最终，我得以为几家大报广泛撰稿。

但直到2013年，我开始为三大商业报纸之一的《东亚日报》撰稿时，我才被认为成功了。尽管即使在韩国，我的行动也受到各种机密限制，但这并不是一个小成就。

我开始在韩国取得突破，因为我写了数百篇不同主题的文章，开始有了真正的读者。2013年秋天，我成为《朝鲜日报》的撰稿人，这是一份发行量很大的保守派报纸。我的第三本书成为畅销书的那一刻恰好发生了这件事。

2014年春天，我应邀开始为《中央日报》撰稿。之后的六年里，我一直按月撰稿。我为《朝鲜日报》和《中央日报》撰写的文章在韩国被广泛阅读，并在受过教育的韩国人中建立了广泛的追随者，否则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我被其他媒体封杀的事实并不重要。当然，如果我不愿意花那么多时间为报纸撰写有关当代问题的短文，将其翻译、编辑并说服他人发表，我也不会那么成功。在外国人的正常途径被堵死的情况下，在韩国站稳脚跟并非易事，但这也有一定的好处。

我还用中文、日文，当然还有英文发表文章。经过多次尝试和失败之后，我的出版流程已经形成了一个运转良好的系统。我知道如何为每一位读者撰写文章，也有能干的人可以随时为我翻译和编辑三种语言的文章。我也

有编辑和重要的韩国、日本或中国报纸愿意发表我的作品。一两篇文章的影响并不大，但我已经用韩语写了数百篇文章，用中文写了约 120 篇文章，用日语写了 50 篇文章。

我的写作水平也因此开始提高。我学会了如何在写作中加入一些文学元素，其分析方式比韩国的其他任何方式都要直接和残酷得多。我认为，创造力和严厉分析的结合为我在韩国赢得了声誉。

在撰写韩文书籍和文章的同时，我还用中文写了一本书。我从 2012 年开始写书稿，但直到 2015 年才真正付梓，2016 年在香港一家大型出版社出版。这本名为《漂洋过海寻真相》(*Kuahai Qiuzhen*) 的书，一部分是自传，一部分是对中国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的潜力的评估。虽然我从未卖出过几本书，但它以 PDF 格式广为流传，我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中国的许多知名学者，其中许多人给我回了信。我认为，总的来说，这本书广受欢迎，使我成为研究亚洲问题的知名人士。作为一本用中文撰写、面向中国读者的书，而且完全不考虑销量、市场或政府意见，这本书是独一无二的。

YTN 的记者 Wang Seon-taek (他后来成为亚洲研究所的核心人物) 在我的第三本书《韩国文化的隐藏潜力》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在这本书中，我评估了韩国过去文化的潜力，为其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此外，我还论证了韩国在许多领域已经处于领先地位，而韩国人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一事实。第二部分论点受到了许多韩国人的欢迎，而王善泽具有专业知识和洞察力，他补充了许多有用的例子，使我的论点更加有力，给韩国读者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

虽然我并不特别同情朴槿惠的政策，但我从很多人那里听说，她是一个体贴的人，对国家有责任感，即使她被玩世不恭的政治操纵者所包围。

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我和孩子们一起参加的一部新动画电影的开幕式上，她发表了讲话。有人告诉我，她曾就读于我女儿瑞秋当时就读的小学。但我们并没有交流。不过，我确实注意到，她努力注视着她所见到的孩子们的眼睛，并表现出某种同情，这超出了我在许多政治家身上所看到的。

2015年10月，在朴槿惠总统计划赴美会见奥巴马的一个月前，我写了一篇文章，就她与美国人会面时应该做些什么提出了建议。文章发表前三天，我接到青瓦台一位秘书的电话，问我是否有空见面喝杯咖啡。我怀疑是有人看到了我的文章草稿，于是想派人亲自来见我。做出这个决定的很可能就是朴槿惠本人，因为我后来得知她非常喜欢我的文章。

第二天，我会见了秘书，我们讨论了这次访问的复杂性。我就朴槿惠总统如何能够以一种与日本安倍晋三政府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的方式阐述韩国的观点提出了建议。我个人认为，她对这次访问的态度表明，她严格遵守了建议。

一个月后，我接到外交与安全部高级秘书朱哲基的电话，他邀请我共进午餐。作为一名专业外交官，朱哲基对我在韩国的工作很感兴趣。虽然我不同意朴槿惠的大部分政策，也觉得朴槿惠政府过于难以接近和神秘，但与他交谈让我感到很舒服。午餐期间，我们主要谈论了文化，不过也讨论了当前外交的复杂性。用餐结束时，我向他赠送了一本我的著作《*韩国人不了解的另一个大韩民国*》（*A Different Republic of Korea that Koreans are*

Ignorant of)。他对这本书 (这表明朴总统也有同样的兴趣) 和我的其他著作表现出了真正的兴趣。

几个月后，我从第三者那里听说，朱先生回到青瓦台后把这本书交给了朴槿惠，她几乎立刻坐下来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虽然她知道这本书，也知道我的著作，但那次阅读让她相信，我的书为韩国的未来提供了一个愿景。

一周后，我又接到了朱先生的电话，这次是用他的私人手机打的，他问我是否可以当天晚上在 Koreana 酒店共进晚餐。这对我来说有点吃力，但我还是在晚上 8 点前赶到了那里。Joo 向我解释说，朴槿惠总统饶有兴趣地读了我的书，她非常认真地考虑了我关于韩国可以做些什么的建议。他说她打算在不久的将来采取一些具体措施，并请求我给予支持。虽然不清楚她到底打算做什么，但我很高兴能得到她的关注。

第二天，我的手机收到了一位记者发来的神秘信息，其中提到 "朴总统提到了你"。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又过了五个小时，我才找到一台电脑，确认了她所说的话。

朴槿惠在一次内阁会议的开幕式上详细谈到了我的书，说这是她最喜欢的一本书，为韩国提供了一个愿景。由于过去韩国总统有指定自己最喜欢的书的传统，媒体很快就报道了这件事。

我从未见过韩国总统，虽然我在社论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却很少受邀参加任何高规格的活动。今天回想起来，我觉得这是我的福气，因为我不用浪费时间去见贵宾，而是可以专注于阅读和写作，但在当时，我仍然把在主流社会取得重大突破视为重中之重。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尽管时间

有限，但它确立了我作为韩国主要评论家的地位，尽管我在韩国以外的地方完全被忽视了。

后来，蓝宫的一位成员问我想做什么，我回答说，我希望向政府各部门介绍我的想法。

我立即应邀举办了一系列讲座，最后为高级官员举办了四次讲座，在政府内部引起广泛讨论。我还为 60 位高级将领做了演讲。我花了很多时间准备和编辑这次演讲，其中详细谈到了气候变化和其他新出现的威胁。随后，我还为司法部、外交部和许多其他机构做了演讲。我被允许谈论任何我想谈论的话题，包括经济不公正和气候变化。考虑到这个政权据说是如此保守，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时刻。

然而，私人智囊团并不欢迎我。值得注意的是，外国媒体只字未提这个美国人，他的书被公认为韩国总统的最爱，并在各个层面对治理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好吧，日本媒体也有少量提及，《韩国先驱报》最终也对我进行了简短的采访，但这一系列通常会让我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广泛认可的事件却完全被掩盖了。这意味着朴槿惠的影响力和韩国的影响力仍然极为有限。

我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些谈话。我花了几个小时来撰写这些文章，使它们既通俗易懂，又严肃认真；它们是关于治理的本质和道德要求的论文。当我告诉朋友们我想“像林肯一样写作”时，我并不完全是在开玩笑。现在回想起来，我认为这些演讲在文体上并不完美，但它们并不只是可预见的、令人感觉良好的谈话，因而显得与众不同。我认为，这一事实使我的作品脱颖而出。

为高级政府官员举办的讲座强调了韩国善治传统的力量，并建议如何利用过去的范例塑造韩国的未来。为军事将领举办的讲座广泛讨论了气候变化的影响及其作为当今安全问题的核心地位。

我感到惊讶的是，我被赋予了完全的自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且朴槿惠似乎根本不在乎我公开反对她政府的许多政策。仅这一点就表明，她并没有决定太多的政策。这种解释与标准的 "进步 "解释背道而驰。

我还被任命为文化充实委员会成员，该委员会由朴总统正式领导。我参加了几次会议，包括朴槿惠出席的一次会议。我坐在她的旁边，报纸上的照片（现已消失）把我放在中间。后来，由于各种财务丑闻，这个委员会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委员会主席、淑明女子大学的金相烈教授因为非法交易惹上了大麻烦。后来，《东亚日报》的一位记者打电话给我，就委员会会议上发生的事情问了我一系列问题。当我告诉他，我对传统文化很感兴趣，并做了关于文化政策的发言时，他开始感到厌烦，并很快结束了谈话。显然，我完全被排除在了所有有价值的事务之外。

虽然韩国媒体广泛报道了我的书的成功故事，我的书在全国畅销书排行榜上名列第八，电视新闻也对我进行了多次采访，但关注度仅限于韩语媒体。朴槿惠总统选中了我的书，随后她又在其他三次公开场合（包括在纽约举行的招待会）上对我的书发表了评论，但这并没有引起海外媒体的关注。《韩国先驱报》上刊登了一篇对我的英文采访，几个月后，《韩国商业》上又刊登了一篇文章。韩国以外的所有外文期刊都没有提到过这个美国人，他写的书得到了韩国总统的大加赞赏，并成为畅销书。

我可以肯定地说，海外有关这一主题的报道完全受阻，是由于对有关我的报道有各种机密限制。我在这本书上取得的成功也没有给我带来任何长期的咨询机会、工作机会或对我在韩国的研究的支持。我曾多次向基金会提出申请，但只能找到发表演讲的工作，偶尔还能参与一些短期项目。

无论如何，从 2012 年到 2016 年，我更有条件与美国的著名机构建立联系，也有一些知名学者努力帮助我。例如，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成为了我的定期电子邮件笔友，他还同意与我的学生一起参加两次基于互联网的研讨会。我还为我用韩语撰写的第二本书采访了他。他的支持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后来，我给乔姆斯基写了一封信，简单描述了我的情况。虽然他从未承认收到过这封信，但我认为在我给他写信之后，他已经做出了一些特别的努力来帮助我。

1992-1993 年，我在哈佛大学开始攻读博士学位后，参加了英语教授马克-谢尔（Marc Shell）的几门课程。当我在伊利诺伊大学与世隔绝时，他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与我交流，他还多次来到韩国，在亚洲研究院发表演讲，这为我们带来了相当大的知名度。他耐心地会见了许多教授以及首尔市长朴元淳等其他人士，商讨未来的合作事宜。他甚至安排亚洲研究院的郑宇镇作为访问学者访问哈佛一年。这些互动让我在韩国的主流社会中站稳了脚跟，否则我永远无法做到这一点。

弗朗西斯-福山同意接受我的几次采访，这让我以一种我从未想过的方式进入了韩国主流社会。他甚至邀请我参加 2015 年他在首尔举办的一次研

讨会，尽管我因日程冲突未能出席。我想，这些人都意识到我的处境出现了严重问题。

经过第一年的平静之后，亚洲研究所频繁举办研讨会，大约每月两次，我们培养了一批忠实的追随者，并在 2015 年左右达到顶峰。我们涵盖了从文化和历史到防扩散、气候变化和技术演进等众多话题。我认为，尽管我们从未在任何官方智库名单上得到认可，因为我们没有大笔资金，但我们已牢固确立了自己作为一个进行有意义讨论的场所的地位。在我们的鼎盛时期，我们的活动有 40-50 人参加。我们的重点从来都不是让更多的人参与，而是关注重要的问题。

起初，我们在庆熙大学校友会堂开展活动。这项工作相当成功，但庆熙大学的管理者认为支持这项工作太麻烦，因为我们没有预算来补偿他们。之后，我们在洪锡贤创办的非政府组织开放论坛 "W 空间 "开展活动。后来，我们又在庆熙大学和淑明女子大学举办了研讨会，但由于地点不便，参加的人不多。最后，在 2018 年，我们在 Commons 基金会启动了一个项目，这是一个由比特币百万富翁建立的新平台，我们至今仍在继续运营。

我们收到了用于小型研究项目的少量资金，尽管这些资金都没有亚洲研究所在大田时从研究机构收到的资金多。不过，我偶尔也会得到一些资助，用于支付差旅费，并有机会与政府组织举办研讨会，从而提高了我们的知名度。我增加了与亚洲研究所有联系的世界各地学者的人数。一些亲密的朋友，如约翰-费弗（John Feffer），多年来一直是我们的忠实支持者。

淑明女子大学的金贤玉教授成为了我的好朋友，他既努力理解我的处境，又确保我得到适当的治疗。他在 2014 年至 2018 年（当时他的父母生病，他无法发挥作用）期间的不断努力，对亚洲研究所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尽管我们仍未获得任何重要资金。

Kim Hyungyul 把我介绍给淑明大学其他支持亚洲研究所的教授，并定期与我支持亚洲研究所的朋友会面。这些会面达成了强烈的共识，即我们应该依法成立公司。在金教授和最近从美国回到韩国的一位有思想的年轻女士 Chung Yoojin 的努力工作下，我们于 2015 年在首尔市教育局正式注册成立。

然而，从 2016 年底开始，我与亚洲研究所的一些最热心的支持者之间开始产生了一定的距离。对于主流世界观，我基本上已经走到了尽头，我的文章也变得更加具批判性。我继续为企业和政府举办讲座，继续为主流媒体撰写文章，但我为《韩国时报》撰写的文章在谴责美国的腐败、军国主义的崛起以及气候变化的巨大威胁方面越来越尖锐。

对我来说，掩盖气候变化、无视社会中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现象以及军国主义的兴起所带来的巨大欺诈是无法忍受的，我觉得我们有责任直面这一丑陋的事实。我的友谊范围因此缩小，我认为某些关系已经完全破裂。例如，我为《中央日报》做了一系列非常成功的电视广播，但我的言论显然与他们宣传的观点相去甚远。

2018 年，我在韩国的基础开始大不如前，媒体报道和活动邀请明显减少。2019 年，我公开批评韩国国内公开的反日言论，也许是我对新常态的反

对过于强硬。这并不是说我觉得日本是一个完美的国家，而是我无法忍受看到韩国拥抱美国，而所谓的进步政府从事着更糟糕的活动。在南朝鲜生活的吸引力减弱了，回到美国的可能性似乎又有了。

与日本的交流

虽然我的主要突破是在韩国，但与日本和中国的交流也偶有成功和有意义的时刻，甚至在美国也有新的机会。

就日本而言，我从 2005 年开始在韩国大使馆工作后，交流的深度有所下降。在此之前，我曾应邀在日本进行过几个月的研究，甚至参加过一些会议。此外，我的日本朋友很少回复我的电子邮件。以前，当我发送新年问候时，会收到几十封回复。而现在，我只能收到两三封。

不过，在大田工作几年后，我的朋友本田广国邀请我去日本参加两次会议。我非常感激，但我始终没有进入这个圈子。也许部分原因是我的思维越来越不像一个学者。

由于我在大田从事科学政策方面的工作，从 2009 年起，我应邀出席了在日本举办的活动，并经常与日本驻首尔大使馆的科学参赞会面。三年来，我一直是京都大规模科学、技术和科学论坛的常客，这是一个资金充足的

活动，来自日本、美国和其他先进国家的科学家和科学政策制定者都会参加。我有幸多次见到 STS 论坛的创始人、前大臣近江浩二，他同意邀请我参加。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可能会在科技领域找到出路，但最终连一次联系都没有持久。

此外，作为 2009 年生物技术政策研究项目的一部分，我父亲的朋友扎克-霍尔 (Zach Hall) 安排我访问了冲绳科学技术研究所。虽然我没有很强的科学背景，但由于我经常用韩语和英语撰写文章，我开始在韩国科学政策方面发挥真正的作用。当时，将研究扩展到日本似乎顺理成章，鸠山政府的高级官员甚至邀请我参加科学政策研讨会。

我与日本关系中最关键的转折是《中央日报》决定将我每月发表的许多文章翻译成日文，这一决定持续了大约三年。这些文章涉及文化、科学政策、外交、安全和教育等主题，由于我比大众媒体上的大多数文章更科学地切入主题，我开始拥有了大量的日本读者。

在我意识到这些文章有可能产生广泛影响后，我花了很多时间起草这些文章，因此其中很多日文文章被广泛传播。其中一些还被雅虎日本转载。2013 年，我还在《赫芬顿邮报》日本版找到了博主的位置，并撰写了数十篇深度报道，直到 2018 年 12 月他们关闭了开放博客。这些文章的撰写得到了《赫芬顿邮报》编辑的宝贵意见，也是我最好的作品之一。

2015 年 12 月，我受邀为日本读者最多的期刊之一《*Sekai*》(意为“世界”)撰写文章，这或许是我在日本写作生涯的最高潮。我谈到日本的和平宪法

是未来安全的预兆，而不是过去挥之不去的错误。我是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提出这一论点的。这篇文章将成为我日文著作的核心内容。

Facebook 还帮助我在日本重新站稳脚跟。虽然我没有经常受邀在日本发表演讲，但我与日本人建立了强大的网络联系，其中包括认真对待我的写作的学者、记者和政府官员，这些在线讨论为我提供了向他们学习和参与的机会。我建立了一个重要的日本人网络，与他们用日语交流当代问题。

另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我与 Layne Hartsell 共同撰写的文章 "Peer-to-Peer Science : 与 Layne Hartsell 合著的文章《应对福岛核灾难的百年挑战》(2013 年 9 月 3 日) ，涉及福岛核灾难的应对措施。

这篇文章描述了如何利用 P2P 方法来动员世界各地的人们有效应对福岛灾难造成的环境危机，是当年《外交政策聚焦》最受欢迎的十篇文章之一。这篇文章以日文发表后，我在短时间内收到了许多来自素不相识的日本人的信息，甚至还收到了一个关于福岛事故对策的政府-学术委员会的邀请，我在会上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但后来通信又中断了，我与大多数相关人员都失去了联系。不过，我还是认识了川中洋，她是一位年轻的日本女性，精力充沛，尽职尽责，后来在亚洲研究所的许多项目中都提供了帮助。

我自费访问了福岛几天，并为福岛和首尔的青少年制定了一项交流计划。虽然我女儿的学校拒绝了最初的提议，但我还是找到了足够多的学生，制作了一批小型艺术品，送到了事故现场附近的一所小学。我在庆熙大学认识了一位来自福岛的学生本田日香，她在这些工作中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

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我与日本福岛问题相关人员的交往终止背后有一只隐藏的手。在我逐渐崭露头角的时候（就像 2000 年之后多次发生的那样），所有的交流突然戛然而止。

2015 年，我开始与一位名叫中富治博彦的有思想的年轻人通信，他是一位拥有庆熙大学博士学位的学者，有志于成为日本的政治家。他致力于在东北亚建立一个可行的政治秩序，我们通过电子邮件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交流，因此他邀请我与福井省的一位名叫猪部幸太的政治家共进午餐。那次午餐相当成功，促成了我两次前往福井，并最终于 2018 年 12 月成立了日本亚洲研究所，在福井设立了办事处。

这是一个突破，但过程很复杂。尽管我们做了大量工作来宣传亚洲学会，并为日本制定了可行的计划，但我们没有获得任何资助，最终，截至 2019 年 5 月，日本亚洲学会的资助仍然为零。尽管如此，在日本建立亚洲研究所这一非政府组织是一项巨大的成就。

2017 年 8 月 4 日，亚洲研究所在东京国会举办了气候变化研讨会，韩日合作的潜力得到了广泛关注，并向所有议员进行了宣传，提高了知名度。这是我自 2003 年以来第一次有机会与日本政治家直接交流。

我猜想，在日本的亚洲研究所对日本人很有吸引力，因为我们讨论的是真正的问题，而其他方面从未涉及。我可以说的是，在国会举行的那次活动，加上我在日本媒体上发表的文章，意味着一大批日本人知道了我的工作，即使他们没有与我交流。

一路上，我失去了本田宏明，他是我在伊利诺伊大学结识的教授，曾多次帮助我访问日本。2016年在日本的一次谈话中，我曾提起我的遭遇，他表示兴趣不大。我给了他一个简短的故事版本，我们进行了通信和电话交谈。但最终，他告诉我，他不希望我再提及此事。我没有再努力与他交谈。

通过我曾帮助过的一位学生山本浩二的介绍，我还认识了大阪政治家服部良一。服部给我介绍了几位在大阪很有价值的人，他还安排我在2017年与前外务省厅长马越崎（Magosaki Ukeru）一起发表了公开演讲，听众很多。此后，服部还帮助我完成了其他一些小项目，并继续认真关注中、日、韩、美之间的坦诚交流。

服部还把我介绍给了编辑川濑秀行，我在首尔和日本都多次见到过他。我开始与河濑合作撰写书稿，这就是后来于2019年7月25日出版的《永别了武器：气候变化危机与日本的和平宪法》。这本书将对我与日本的关系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在某些方面，它将日本重新带回我的生活中，这是自2004年以来或之前从未有过的。虽然愿意与我合作的日本人仍然有限，但日本媒体对这本书进行了报道，各大书店也有销售，包括许多政府官员在内的许多人都非常重视这本书。

我的书获得成功的同时，亚洲研究所也在福井成立了，成为一个合法的非政府组织，并配备了办公室。突然间，我发现我们又被真诚地看待了。这种转变可能与日本新一代活动家的崛起有关，尤其是亚洲研究所的研究员、密友川中洋（Kawanaka Yo）曾接触过的玲和新人组（Reiwa Sinsen Gumi）的活动家。此外，我曾多次有机会与“日本灭绝反叛运动”（Extinction

Rebellion Japan) 合作，这激励我更加认真地对待日本，并尝试为日本读者撰写更多文章，即使我不能在为赫芬顿邮报日本版撰稿。

我的上述著作出版后，我与女儿成功地在日本进行了一系列巡回演讲，讲述了我对日本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愿景。尽管许多保守的政治家可能不喜欢书中的内容，但我的论点得到了许多政府和行业人士的同情，我与日本的交流也有所增加，但这与 2001 年之前的情况完全不同。

与中国的交流

在中国的进展也相当缓慢和痛苦。一开始，我在日本取得的成功要比在中国多得多。但在 SolBridge 和庆熙，我有一些认真的中国学生，他们让我一直很投入。在韩国，我身边没有这样的日本人。用中文为中国读者写作对我来说仍然极其重要，我在韩国寻找机会与中国学生和教授用中文交谈，并偶尔寻找机会访问中国。

我用韩文写的自传体著作《*人生是方向问题，不是速度问题*》还没有完成，我就想到应该尝试用中文出版这本书。虽然我知道这个项目会相当困难，但我在索尔桥有一位热情而聪明的学生，他叫钱梦伦，他在一开始就帮助我整理书稿。

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在断断续续地撰写中文书籍。这个项目并不简单，因为没有一个人对我的中国作品感兴趣，而且我还要养家糊口。这本书花了我不少钱。但我从在韩国卖出的书中得到了一些现金，于是我

在 2014 年印制了中文版的书，寄给了中国和其他地方的几百个我认为可能会同情我的人。这本书名为《渡海求真》（意为“漂洋过海寻找真相”），讲述了我的童年经历、与中国文化的初次接触，以及我作为美国人对中国在未来可能扮演的角色的看法。大部分材料都是原创的，尽管其中一些关于我童年的部分也出现在我的韩国著作中。

我相信，这本书为我赢得了一小批认真对待我的中文著作的人，他们人数不多，但意义重大。在某些情况下，我把书寄给的教授也是我在 2000 年网络教育工作中的合作者。我收到了一些学者的来信，也接受了一些报纸的采访，但与中国的关系并没有大的突破。我偶尔会被邀请参加一些会议，也经常与中国的朋友通信。也许最重要的是，这本书的编辑王平成了我的挚友，我们很容易协调工作。

我认为，如果我不愿意自己花大价钱把书寄给著名教授，不愿意上网搜索我认为应该写信给他们的人的联系方式，我就不可能产生这样的影响。

2016 年，我曾在韩国著名报纸《今日亚洲》（Asia Today）担任过一段时间的专栏作家。当时，《今日亚洲》刚刚与中国搜索引擎百度达成协议，通过百度在中国广泛传播它的许多文章，特别是我的文章，以及我的中文广播。就我那篇倡导“Facebook 共和国”的文章而言，它在中国获得了数十万的点击量。我被告知，百度曾考虑关闭该文章，但由于其内容很有价值，最终还是决定将其保留下来。我为百度撰写的文章，再加上为《中央日报》撰写的中文文章，使我成为了一名在很大程度上被容忍的争议性话题作家。这些文章不一定出现在主流媒体上，但读者数量很大，有时可能超过我在韩国的读者数量。

我有两篇颇有分量的文章发表在中国博客 "观潮" (意为 "观察家") 上，这是一个由共产党新锐人物 Eric Li 运营的反思性网站。我曾在上海与 Eric 见过一次面，我们进行了愉快的交谈。

第一篇文章是关于中国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 "一带一路" (Yidaiyilu) 的，我于 2016 年 9 月 28 日在观潮社发表了题为《中国梦，西化还是转型？全球经济转型和解决环境危机的钥匙可以从中国的过去中找到》。

这篇文章从可持续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角度出发，为 "一带一路" 项目提出了新的愿景。我认为，与西方灾难性的石油消费经济相比，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传统对 "一带一路" 的未来更有价值。这篇文章在中国经常被引用，比我写的任何其他文章都更能打响我的知名度。此外，这篇文章在《观潮》发表后，我的更多文章开始大量出现在网络搜索中。

第二篇文章《中国智库与其模仿西方，不如珍视自己的传统》发表于 2018 年 2 月 3 日的《观潮》，就在我在北京的一次国际智库会议上发言之后。我描述了中国发展智库的巨大潜力，如果他们能够避免美国智库所犯的 error，并充分利用中国悠久的智库传统，即可以追溯到汉代的书院（书院）。

之后，《多维新闻》也找到了我，让我成为固定专栏作家，他们还让我可以随时为中国读者发表文章（如果我愿意支付翻译费用的话）。当然，我花了那么多时间撰写和改写文章，然后在没有任何报酬的情况下发表，这似乎很不合理。但无论对错，我的假设是，如果我能够在中国获得足够的追随者，其他机会就会接踵而至。

我还努力在中国出版我的第二本书。在多次与潜在出版商会面无果后，我放弃了在中国出版这本书的想法，只是以亚洲研究所的名义印了 300 本。2018 年 11 月，我将这些书邮寄给中国的多位学者和公众人物后，得到了包括一些大人物在内的多位人士的积极回应，最终我得到了 2019 年 3 月由西安文华出版社出版的合同。最终书稿定名为《未来中国：人类与地球的命运》（Weilai Zhongguo Guanyu Renlei Yu Diqu Mingyun，意为“未来中国：人类与地球的命运”），获得了一致好评。

当时，我在中国有一个非常强大的编辑团队，包括与我共事 11 年的朋友王平和他在黑龙江的朋友蔡新。他们都是优秀的翻译和编辑，王平还能承担我的书稿的排版工作。即使没有专业出版社的帮助，这部书稿也写得非常出色。书中有许多文章对当代中国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但又不落后于西方标准。

2018 年，我应邀参加了在中国举办的几次会议，2019 年 5 月 15 日至 16 日，我应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题为“亚洲文明对话会议”的研讨会上发言，这似乎让我的地位大大提升了。我还应邀参加了 10 月和 11 月在北京举行的其他几次重要会议，遗憾的是，我未能出席。看来，虽然我没有作为重要人物出现在中国媒体上，但我还是偶尔被提及，并慢慢被视为重要人物。我仍然没有机会在中国逗留一周以上，也没有任何长期合作研究的机会。

我在《多维新闻》上发表的文章拥有广泛的读者群，我也因此成为一名评论员。然而，我从未成为中国的知名外国人，也从未在中国赚到大钱。然而，

2019 年之后，为中国撰写文章的活动逐渐减少，我与中国人的交流也减少到寥寥数人。

美国的进步

与美国的接触也有明显的局限性，即使是在我 2015 年在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举行突破性会谈之后。我确实重新建立了一些关系，但没有人邀请我参加任何会议，甚至没有人跟进我关于可能就业的询问。我似乎和以前一样受到了阻挠，但为了某种约定而破例（就像 2001 年我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时一样）。亚洲研究所确实与美国驻首尔大使馆合作开展了一个相当成功的项目，我也应邀在一些与大使馆有关的活动中发表了演讲。但我显然不会被欢迎回到俱乐部。事实上，我在 2007 年刚到耶鲁时与耶鲁的关系比 2019 年回国时还要好。

时间的流逝使我与美国大学同事以及家人的关系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如何对我撒谎、如何积极参与大规模的犯罪阴谋来污蔑我、如何同意诬告我患有精神疾病，这些痛苦的记忆会逐渐消失，这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对我来说，他们对所发生的事情只字不提的时间越长，我的感觉就越怪异。

我的家人继续回避讨论我的遭遇。经过这么长的时间，我觉得这样做太过分了，于是我发起了一场运动，试图就我的遭遇展开讨论。随着时间的推移

移，我无法忍受这种政策，我下定决心必须结束这种政策。开始写这本手稿在某种程度上是我对家人和同事对这一危机保持沉默的回应。

2014-2015 年，我开始了大规模的真相与和解运动，以解决在我之前的斗争中被家人和朋友完全忽视的问题。我的第一次真相运动是在 2004 年以一系列信件的形式写给家人和一些朋友的，在这些信件中，我用大约四页纸描述了我认为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我没有提供太多细节，但犯罪行为的规模非常清楚。

大多数家庭成员根本就没有回复过这些信件，当我们见面时也避免与我进行任何讨论。我父亲说他收到了信，但从未问过信的内容。2006 年，我确实与他以及我的哥哥进行过一次谈话，在谈话过程中，他们听我讲述了故事的某些部分。他们没有发表任何意见，也没有提出任何有意义的问题。他们也没有说应该做些什么。我母亲是唯一一个不害怕倾听的家庭成员，尽管她也很犹豫，不敢问太多。

我父亲在无数次谈话中都坚持认为（尽管我确信他并不真的相信），我缺乏资源是我选择成为一名学者的结果。这种论调令人恼火，而且显然不符合事实。但到了 2016 年，这些争论已经让我忍无可忍，我宁愿根本不见他。

但我还是继续努力让家人参与进来。当我的继母杰米认为我的妹妹安娜没有回复我的信是因为我对她的生活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兴趣时，我花了几个小时在电话里和她谈论她的生活，并对她所关心的问题表现出尽可能多的

兴趣。但这并不重要。她根本没有努力去了解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更不用说做什么了。

2017 年，当安娜和我的哥哥迈克尔开始告诉我的儿子本杰明我患有精神疾病时，我已经受够了这种明目张胆的非法和不道德的行为。

不仅没有任何精神疾病的证据，他们还把这些谎言告诉了我的儿子，不给我任何回应的机会。实际上，我的家人显然也是阴谋的一部分。我给了他们大约 16 年的时间来想办法向我传达真相，但他们就是不肯让步。

我再也没有耐心了。我的家人、朋友和同事与一个犯罪阴谋合作了大约二十年。如果有人给他们送信，告诉他们不能帮助我，甚至告诉他们必须努力破坏我，我还可以容忍。他们所需要做的就是想办法和我一起去树林里散步，告诉我这个事实。但几十年来，他们对我的态度明显是犯罪和不道德的，而且从不承认有任何异常。到了 2016 年，我觉得是时候向他们提出正式要求，以便进行历史记录，并开始整理一份完整的记录，最终形成本手稿。

2014-2015 年的运动规模远远超过了我在 2004 年的尝试。我写信给著名学者、记者以及纳奥米-克莱因 (Naomi Klein) 和康奈尔-韦斯特 (Cornell West) 等知名人士，在信中解释了我的遭遇，并明确请求他们提供帮助。我想说明的是，为了记录在案，他们故意拒绝了我的请求。

我还就我的案件写信给大赦国际等几个组织。我给这些知名人士写过信，但他们都没有给我任何回复。至于纳奥米-克莱因，她的秘书告诉我，她已经把信转给她了。尽管她具有进步的资历，但她从未试图联系过我。

我还写信给许多学者，包括伊利诺伊大学的同事，请他们提供帮助和建议。在寄出的大约 120 封此类信件中，我收到了大约六个人的答复。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收到的答复都是认真的，但他们都告诉我忘掉过去，向前看。我不会在这里复制这些信，但我对我的同事们愿意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的程度感到震惊。我收到的回信中提出的论点之荒谬，远远胜过大多数人对我不含糊的信件所保持的难看的沉默。

没有一个给我回信的同事愿意讨论我是否有权因为遭受这样的待遇而得到任何补偿，也没有一个人愿意讨论为什么会对我采取这样的行动。

我母亲曾多次坦诚地与我交谈，我觉得她至少努力倾听了我的心声。她的丈夫保罗也曾多次倾听并坦诚地与我交谈。但我觉得，考虑到情况的严重性和问题的重要性（比如对军国主义说不，要求关注气候变化），回避这个话题是不对的。我还觉得，即使在最不可能的情况下，五年或十年的游说和说服也能扭转局面。但是，我的母亲与美国整个中上层知识分子阶层几乎没有什么不同，而我正是她一手培养出来的。尽管她很爱我，但她还是陷入了那张谎言之网。

我确实有几位美国朋友，我可以坦率地与他们交谈，甚至有几位朋友曾试图帮助我，但他们为数不多。在我停止与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建立关系的努力后，我再也没有被邀请到美国演讲。2015 年之后，我也没有受邀在日本演讲，尽管我们能够通过亚洲研究所，后来又通过脑教育大学创造机会。但我与日本学术界的联系基本上被切断了。考虑到日本教员曾是我生命中的核心，这让我感到极不自然，也有些伤感。

2017 年 1 月，我父亲来首尔探亲。尽管我要求他推迟来访，但他还是来了。他不像五年前那样愿意讨论所发生的事情。他对了解我以及我妻子和孩子们所面临的困难毫无兴趣。当谈到我儿子本杰明（ Benjamin ）所承受的压力时，他不厌其烦地建议本杰明去看心理医生，却丝毫不理解他所承受的痛苦。

我已经到了极限。我的父亲显然愿意做任何事情来避免面对他对我的犯罪行为。他没有任何帮助解决问题的计划。最后，我觉得他为了避免给自己带来不便，不惜对我和我的家人做任何事情。我根本无法信任他。

我们在电话上的交流仍然极为有限。我偶尔也会和哥哥迈克尔通话。对我的孩子来说，保持某种关系是很重要的。但我的家人公然犯罪的行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让我感到不安。

我第一次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即我的家人对我采取了犯罪行为，他们应立即停止这种行为。他们因秘密法律或警告而从事此类行为的事实不再是借口，因为他们继续否认事实如此。我无意一生都生活在巨大的谎言中，看着我的家人好像我没有钱只是因为我是一个学者，而忽视了我所有真实的成就。我愿意冒险（ 比如写这篇自述 ），也愿意断绝关系，而不是沉溺于这种滑稽可笑的生活。

2018 年 11 月，父亲写信给我，问我关于家庭的各种问题，我回信给他，说我很乐意告诉他我的工作情况，但我希望他能回答我提出的问题，即他与我在伊利诺伊大学的直属上司之间的秘密交往，以及在未经我同意的情

况下与各位专家讨论我的精神疾病的过程。我父亲完全没有回应。我觉得事情已经闹大了。我将交流减少到了最低限度，并将讨论推向了公共领域。

我决定，与父亲通信是浪费时间，下一步将是把整个故事公之于众，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某种更广泛的讨论。

虽然我基本上被美国媒体拒之门外，也被排除在美国学术界的任何活动之外，但我继续为《聚焦外交政策》撰稿，其中一些文章赢得了更广泛的关注。

我与约翰-费弗（John Feffer）共同为《聚焦外交政策》撰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从太平洋支点到绿色革命”（2012年10月4日），这篇文章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我们认为，奥巴马政府最近提出的“亚洲支点”军事计划应该彻底改头换面。它只关注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甚至认为，整个军队都应退出战争领域，并进行重组，以便在全球范围内重点开展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工作。这篇文章的灵感来自于我在2012年早些时候与诺姆-乔姆斯基的通信，我在通信中建议，我们可以完全重新定义军队的角色和“安全”一词，从而从根本上改变当前的讨论和预算。乔姆斯基回答说：“也许值得一试”。

随后，我撰写了一篇文章，描述了一种新的军事概念，即空军不再使用战斗机，而是关注如何制止空气污染，海军致力于制止海洋污染，陆军关注如何保护土壤。这个概念非常新颖，我认为这篇文章尽管受众广泛，却从未被第三方引用，这绝非偶然。

我在 2013 年 3 月 7 日出版的《真相》（Truthout）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更详细的文章，题为

"在气候问题上，国防可以保存和保护，而不是杀戮和破坏"（"On Climate, Defense Could Preserve and Protect, Rather than Kill and Destroy"）。这篇文章的读者范围更广，提出的建议也更具体。军方和外交界的一些人士就这篇文章直接联系了我。他们提出了几项合作建议，但都没有实现。我有幸得到了一位名叫丹尼尔-加勒特的前外交官的善意提醒，他最终成为了亚洲研究所的成员。有趣的是，也绝非巧合，在我的文章发表后的第二天，时任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的塞缪尔-洛克利尔三世上将访问了哈佛大学和塔夫茨大学。他在接受《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采访时首次明确表示，地球变暖"可能是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将破坏安全环境，可能比我们经常谈论的其他情况更有可能"。

正如安德鲁-杜威特教授（Andrew Dewitt）所记录的那样，这份声明反映了当时军方内部正在进行的一场对话，即需要对气候变化做出有意义的回应。这份声明发表的时机，以及不久之后军国主义者哈里-哈里斯（Harry Harris）接替洛克利尔的职务，恰恰是因为人们意识到了气候变化的威胁，这表明我所写的东西（不仅用英语，还用日语、韩语和中文）正在产生广泛的影响。

另一篇获得大量读者的文章（与约翰-费弗共同撰写）是《美国本土的恐怖主义》（2014年4月7日，《聚焦外交政策》），我们在文中讨论了美国基础设施的崩溃，以及这种情况最终会使美国屈服的可能性。

然而，当我试图在美国的学术出版社出版我的两本关于亚洲古典文学的学术著作时，得到的回应却是如此的负面，以至于我放弃了。我的两本书都是在首尔国立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我再也没有尝试过在美国出版一本书。

我认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由于秘密法的原因，我不可能在美国出版一本书。

到 2014 年，我显然无法在韩国或美国管理任何事情，也无法创办公司。为了成立一个组织，我浪费了无数的时间。亚洲研究院只偶尔举办研讨会，没有其他活动，这是最好的回应。

写作是我相对自由的领域。在某些方面，我比许多人都要自由，即使是那些身居高位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写作成了我的主要活动，我在政治、安全和经济方面的许多重要文章都发表在《中央日报》上，后来又发表在《韩国时报》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努力成为一名行政人员十年之后，我发现自己的定位是作家，当然不是学术文章。

2017 年 7 月以后，《韩国时报》成为我发表文章的主要机会，他们允许我几乎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我写的东西也得到了广泛的读者群。我撰写的关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亚洲事务主任车胜元、美国前驻韩大使哈里-哈里斯、美国前国务卿迈克-蓬佩奥等人物深陷腐败的文章，都是在他们没有删节的情况下发表的。我怀疑这样的文章是否能在美国或任何地方发表。

我对美国腐败现象的分析比所谓“进步”媒体的分析系统得多，后者倾向于突出坏人，而避免分析事情的真实情况。我至今都不知道《韩国时报》是如何让我发表如此直言不讳的文章的，比如《对大屠杀和气候变化的反应之间难以令人信服的相似之处》（与亚历山大-克拉贝合著），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否认气候变化与否认 20 世纪 40 年代欧洲大屠杀进行了比较，并认为这种否认行为甚至更加罪恶；或者《如何终结美国奇特的死亡制

度》：化石燃料 "一文中，我将奴隶制和化石燃料的制度性犯罪进行了有力的类比。

我的文章《美国的精神病态》（2019年2月2日）描述了共和党和民主党广泛的政治腐败，这篇文章发表之时，正是美国政府试图将民主党软弱无力的改革当作某种革命来推销之时。美国其他进步媒体都没有提供这样的分析。老实说，我相信在韩国一定有一群非常勇敢和坚定的人，他们冒着极大的风险支持我的工作，使这些文章成为可能。

一路上，低级骚扰（如上所述）又开始了。我不知道源头，但我可以猜测。我为《朝鲜日报》（Chosun ilbo）撰写了一篇文章《美国在亚洲的新角色》（2014年1月1日），我在文章中强烈主张，美国在朝鲜的角色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如果美国的安全重点不是气候变化，那么我们的角色是不可持续的。一份保守的韩国报纸发表了这篇文章，这表明韩国人对我的观点深表同情。

然而，文章发表后，我立即收到了来自不同美国人的奇怪邮件，还有来自韩国人的颇具威胁性的评论。这一过程表明，我们正在面临另一场类似于2000年至2003年针对我的运动。2016年特朗普上台后，骚扰事件有所增多，布什时期活跃的极右派重新掌权。在特朗普执政的4年里，我对他的态度反反复复。他时而显得极度危险，时而又提出反全球化的批判。

离开庆熙大学

2017 年 11 月，当我宣布打算离开这所杰出的学府，加入几乎默默无闻的天津市脑力教育大学时，庆熙大学的许多人都感到相当震惊。

我来到这所名不见经传的大学，是庆熙大学内部长期疏离过程的顶点。

创办人去世后，庆熙大学越来越注重学费收入、在企业选定的 SSCI 期刊上发表文章以及其他扭曲的成功标志。庆熙大学变成了一家无情的公司，经济学和国际关系课程越来越像是对错误意识形态的灌输，而不是对真理的追求。从气候变化、军国主义、财富集中到技术对社会的影响，这些关键问题在他们的课堂上甚至都没有触及，更不用说在会议或教授之间的谈话中了。

就我而言，我越来越激进，因为我注意到气候变化、核战争以及美国和全球法西斯政治带来的日益严重的危险。其他知识分子对这些威胁的沉默也让我越来越反感。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又回到了 2004 年至 2006 年期间采取的更加激进的反对军国主义的态度。我重返韩国主流社会的短暂时光即将结束。但事实上，我永远不可能真正重新加入主流社会。我对这种妥协的价值持怀疑态度，而且还有机密指令限制我的活动。

我不再喜欢在庆熙大学任教，当系主任提出要关闭我的气候变化课程时，我已经受够了。我向系主任提出了一些关键问题，比如气候变化、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角色以及对教授的评估方式。我建议我们召开一次会议来讨论这些问题。系主任拒绝召开这样的会议，其他教师也保持沉默。

从 2016 年起，我开始在韩国寻找其他教职，目标是能让我开展研究的相对陌生的机构。但是，尽管我多方努力，还是没能找到一个职位。最终只有一家机构愿意为我提供职位，那就是脑教育大学。

脑教育大学由调解大师和精神领袖李一知创建。李一知是一位深思熟虑而又复杂的人物，由于他的言论违背了韩国基督教的某些重要原则，他不断受到基督教徒的攻击。他也不那么受佛教徒欢迎。他坚定地致力于通过综合方法提高社会的灵性，并且非常勤奋和富有创造力。

我并不完全同意他的做法或方法，但他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在教学和工作中完全关注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

李一知支持我，支持我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工作，支持我动员全世界人民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他很欣赏我的著作，并为我提供了全职教授的职位和同等的薪水，最重要的是，他还为我提供了一个活跃社区的真正职位。不仅没有任何其他大学或组织有兴趣聘用我，我还发现脑教育大学背后更大的伞式组织--达恩世界--具有其他地方难以找到的活力和正派。机会是真实存在的，但事情并没有那么容易解决，很可能是由于右翼势力的幕后干预。

我与李一峙相识于 2015 年，当时他邀请我到他的国家研究院（Kukhakwon）就我的著作《*韩国人无知的大韩民国*》（*A Republic of Korea of which Koreans are Ignorant*）发表演讲。他立即给了我一份工作。这在韩国几乎从未发生过。我没有忘记他说的话。

1997 年，在我结婚之前，我曾在 Dahn World 练习过瑜伽，当时他们的课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外，在我的演讲结束后，我又开始在他们位于首尔的景福宫中心练习，我发现这些练习对我非常有帮助。我妻子也重新开始锻炼，有一段时间，她甚至比我还热心。

我从 2018 年 3 月开始在脑教育大学任教，与学生们的关系非常融洽。我在研究生课程任教，第一次有机会与自己的研究生一起工作。我知道很难将这些学生安排到韩国主流大学任教，但有许多公民教育项目的提案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

我在学校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可以就各种主题（尤其是气候变化）撰写文章和发表演讲，感觉比在庆熙舒服多了。然而，这并不总是完美的匹配，因为精神启迪、体育锻炼和冥想并不一定是我的首要任务。我有与气候变化和国际关系相关的明确目标，我觉得我应该追求这些目标，即使损害我的健康（无论是身体暴力、长期骚扰还是恶劣的生活条件）也在所不惜。

问题是，我们又回到了美国极端主义政府的统治之下。世界很快失去了控制。

我不仅不再受邀参加美国大使馆的活动（在战犯哈里-哈里斯被任命为大使之后），而且也不再喜欢与美国外交官交谈。

此外，我发现与韩国的主流团体交谈越来越困难。我不想一一列举那些决定不再与我合作的中间派人士和组织，但他们的数量是相当可观的。与此同时，我自己的语气也变得更加尖锐，我觉得自己不再那么妥协了。

压力影响了我和我妻子的健康。经济和政治负担沉重，但除了表明立场，似乎别无选择。

2017 年，我又成功地写出了另一本韩国书籍《大大韩民国》，该书明确谈论了技术和韩国面临的挑战。不久之后，我开始与记者胡在贤合作撰写一本关于韩国统一的书。我们还从 2019 年 2 月开始在 YouTube 上播放节目。最后，我决定再次调查美国的就业机会。

第 7 章

去华盛顿，回韩国

2019 年 8 月，我回到美国与全家人一起生活。我的妻子和孩子们十二年前就想搬到美国去住，虽然我认为这次搬家有一定的风险，但我并不确定在首尔就一定能解决我最近遇到的问题。

我在韩国、日本和美国有一群朋友，他们帮助我组建了一家名为 "亚洲伙伴" 的咨询公司，这家公司具有生存的潜力。2018 年 8 月，日文版《亚洲

伙伴》一书出版，这是我 15 年来首次在日本获得广泛的读者。2019 年 2 月我访问华盛顿时，受到了相当热情的接待，我说服自己，这么多年过去了，也许会有一些机会。

但在韩国，我不再是《中央日报》的撰稿人，为我提供收入的各种讲座也已枯竭。我也开始相信，我的未来将超越韩国，将我的工作扩展到日本和中国。前几年日本和中国的发展让我产生了这种想法，但最终我还是错了。

我非常感谢韩国人给我提供就业机会，并努力帮助我。卢武铉身边一些进步人士的努力令我感动。但 2019 年的人群却截然不同。文在寅政府蓄意反对就气候变化（我认为这是对韩国的最大威胁）进行任何严肃的辩论，并且不喜欢像我这样质疑美国政治的人，而美国政治正是他们所拥护的。此外，日本新一代的进步人士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中国发展缓慢，但其应对气候变化的规模超过了韩国和日本，并且正在就全球治理展开真正的讨论。

气候危机是我思想转变的关键部分。2018 年底，我偶然在网上看到了一篇对罗杰-哈勒姆的采访，他是 "灭绝反叛 "组织的创始人之一。"灭绝反叛 "组织是一个积极进取的非政府组织，在英国举行了针对气候变化的有效抗议活动。

我对他的立场深表同情，并认为尽管这不是我在韩国的大多数支持者希望我做的事，但参与某种有关气候变化的直接行动是我的使命。在 Facebook 上发了几条信息后，我终于联系上了罗杰，我们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访谈，并向广大观众进行了广播。我开始与韩国的 "灭绝反叛 "组

织更紧密地合作，为他们在光化门广场组织了几次抗议活动。我开始怀疑，在“灭绝叛乱”组织中是否隐藏着我的职业生涯。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与他们合作并不是一个明智的战略选择。

灭绝叛乱组织对我的工作给予了极大的热情，但却对我退避三舍，几乎不提供任何支持。我再也联系不到他们的人了。我怀疑他们不允许与我合作，因为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许多在韩国、日本、越南和中国的朋友建议我到美国寻找机会。我开始思考，在美国待上几年，也许是以更好的状态回到亚洲的最佳途径。我心想，特朗普的混乱局面很可能为我提供一个真正的机会。

2019年8月，我们在弗吉尼亚州的McLean租了一栋房子，离可以带我去华盛顿特区的地铁不远。我妻子选择这里是因为学区。我们一家人在美国团聚了。我与老朋友们进行了一系列会面，几周内就找到了一些可能的工作线索。但这是一场赌博。我有两个韩国人给我的钱，还有我在中国出书的收入，甚至还有一些来自日本的支持，但并不多。

我的妻子在我们抵达后不久就多次精神严重崩溃，其中有一段时间她在韩国与一个萨满巫师交谈，这个巫师似乎一直在向她灌输不祥的故事，企图勒索她给钱。有一个月的时间，她非常害怕我们会因为他们所说的话而中毒。她扔掉了所有食物，只喝某种瓶装水。这些隐蔽的威胁让她非常痛苦，以至于昏倒在地，不得不住院治疗。我们不知道谁是幕后黑手。

然而，这其实与巫师无关。我的妻子根本无法承受我们所面临的巨大压力，而且情况会变得更糟。

然而，2019 年年底的情况似乎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我们举办了三场大型亚洲研究所研讨会，吸引了大量关注，其中第三场研讨会吸引的观众人数不亚于大型智库的大多数活动。

韩国大使李秀赫表示有兴趣再次聘请我到韩国大使馆工作，这次是一个待遇更好的职位。我多次与公共外交大臣洪锡仁会面，他和他的助手确认我将从 2020 年 1 月开始工作。

我的另一位朋友从汉城来到华盛顿，与我讨论我的新职位，并向我索要一份报告，说明我究竟会做些什么。我向他提交了一份长达六页的报告，并顺利通过。

一切从 12 月底开始分崩离析，恰恰是在 COVID-19 行动启动之时。现在毫无疑问，我之所以在 2020 年被赶出华盛顿特区，正是因为他们不希望身边有人能够组织起来反对全球主义议程。

即使华盛顿特区的环境从 2019 年 12 月开始变得更加不友好，我仍然坚持写文章、见人、找工作（甚至是翻译或编辑工作），并试图为美国在东亚的作用以及如何恢复华盛顿特区的治理阐述积极的愿景。但在报酬方面几乎没有任何进展。韩国大使馆和韩国经济研究所提供的机会完全枯竭了。

到 2020 年 1 月，我几乎没有任何收入，被迫背上了信用卡债务。承恩的情绪崩溃也无济于事，她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欠下了更多债务。

我的哥哥、父亲、母亲和表弟曼尼都完全了解我的情况。我花了几个小时与我的哥哥迈克尔和表弟曼尼交谈，向他们解释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听了，但没有提出任何意见，也没有提供任何支持。

亚洲研究所取得了一些进展。我们举办的研讨会非常成功，赢得了关注。安德鲁-海德（Andrew Hyde）帮我组织了几次活动，吸引了来自韩国的重要人物。智库“亚洲政策点”（Asia Policy Point）的负责人明迪-科特勒（Mindy Kotler）允许我们共用他们的办公室，并一起举办活动。

我对亲朋好友假装无知的容忍度已经大不如前。我们的斗争已经进行了二十年，我不能容忍他们不愿意讨论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情。

到2020年2月初，我们的债务堆积如山，我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任何付款来源。我应邀在首尔和东京发表演讲（2月18日至27日），并获得了旅行机票。关于COVID-19检疫的讨论已经开始了，这对我来说意味着一场世界大战的爆发。

2月12日左右，我哥哥迈克尔邀请我去喝咖啡。他告诉我，我不能在美国工作，应该回韩国找工作。他还说，我的孩子瑞秋和本杰明可以暂时和他住在一起。

这是一次奇怪的讨论。他们的假设不是我需要在美国找工作，而是我必须立即离开美国。这听起来像是政治命令，而不是真诚的建议。我告诉他，我会在亚洲之行中认真考虑此事。

如果我哥哥对我说的是那样无稽之谈，那就说明华盛顿的政治环境是那样严重，那样危险。我觉得我必须认真对待他的话，并做好准备迎接非常不愉快的情况变化。

我原定在上海举行的讲座被取消了。我到首尔是为了用韩语介绍我的新书，但因为 "COVID-19"，这次活动在前一天就被取消了。我见到了几位朋友，向他们解释了情况的严重性。

我能够顺利地前往东京，为一群日本青年发表关于环境政策的演讲。与美国和韩国相比，日本似乎更自由一些。我见到了几位日本朋友，还在涉谷一家廉价酒店见到了一位日本外交官。

我四处打听在日本就业的可能性，但没有得到任何肯定的答复。

我原定于 2020 年 2 月 22 日返回华盛顿特区，但考虑到我在美国根本没有工作机会，在日本也没有工作机会，我决定取消这次飞行，用剩下的钱返回首尔，因为我有一个朋友答应我在那里提供一个房间，我可以在那里住上几个星期。

我有一位朋友 Na Young-chol，他对韩国传统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多年来邀请我参加了多次精彩的讨论。那一刻，他是韩国唯一愿意帮助我的人。他来机场接我，开车把我送到首尔北部平昌洞山上一栋豪宅车库里的一个房间。房间旁边有一个小公寓，属于一个韩国巫师（男性），他答应我可以住在那里多久都行。房间很冷，过了一会儿才热起来。浴室就在隔壁，隔着一道冰冷的门，没有办法做饭，周围也没有商店。

不过，附近的环境还算不错，我很喜欢步行 30 分钟去火车站的感觉。我有了一些必要的独处时间来思考这场新的危机--这场危机的规模将达到 2001 年的程度。

此后，我通过与我的孩子和我的兄弟交谈，了解到我的家人在华盛顿特区遭遇的灾难。

我们欠下了两万美元的信用卡债务，而我的妻子心理一团糟，还在继续花钱。我哥哥乐于让她受苦，并威胁说如果她不立即离开家，就报警（而不是为她寻求心理帮助）。

迈克尔收留了瑞秋和本杰明，但拒绝让他们在自己家与母亲见面。最后，他通过一系列威胁，强迫她违背自己的意愿飞回韩国。不用说，迈克尔对讨论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在 COVID-19 开始时，我突然被赶出这个国家并不感兴趣。

回到韩国后，没有钱、没有财产和独处的时间让我感到耳目一新。被驱逐后的清净给了我某种清醒和自信。在我找工作的过程中，与韩国人的几次交谈表明，我的故事已经广为人知。

我通过那英哲安排的几次讲座赚了一些钱，然后把钱寄回了美国。

但这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我的妻子功能失调，离开家之前都不会打扫房间，她的行为让我们损失了三个月的房租。最后，我们的债务越来越多，因为她干脆把所有东西都刷到信用卡上。

我的孩子们住在我哥哥位于切维蔡斯富人区的宽敞住宅里。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个办法，但我没有钱，孩子们也不想来韩国。

然而，就我而言，我觉得局势非常危险，我希望他们和我在一起，这样我就可以照看他们。我并不认为韩国会更安全，而是认为尽管美国的体制正在崩溃，但至少还有机会在这里找到稳定。

我的妻子于 2021 年 3 月抵达首尔。她是被我哥哥强迫搭乘飞机的，我哥哥使用威胁和恐吓手段迫使她离开韩国。她到达韩国时，已经精疲力竭，病倒了。她没有工作，没有医疗保险，也没有人愿意和她坦诚地谈谈现状。

我还发现她变化很大，难以沟通。

看来，最好的解决办法是让她和寺庙里的一些佛教僧侣住在一起，在那里祈祷和冥想，直到她从创伤中恢复过来。佛教曾经对她起过作用。与她关系密切的僧侣告诉我，很难和她住在一起，但我还是在南部卓兰南道木浦附近的密云寺为她和我找到了住处。出乎意料的是，与周围大多数人不同的是，住持告诉我，我们想在那里住多久就住多久。

我们准备第二天坐火车去木浦。当我去看承恩时，她告诉我她不想去。她坚持要留在娘家。没有家人的帮助，我无法带她去医院治疗，现在她又拒绝和我住在一起。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决定自己先去米旺萨寺，等她来了再一起去。她在电话里说她很快就会来。此后，我又去了两次首尔，试图说服她下来。然而，她最终还是没有来。

我在寺庙里住了一个多月。在此期间，我为总统竞选撰写了更多的演讲稿，撰写了关于当代事务的文章，参加了寺庙清晨和傍晚的弥撒。我还与住持

讨论了我对未来工作的想法。最重要的是，我花了很多时间重新认识自己，以适应新的环境。

因为我一无所有，所以被同样放弃了所有财产的僧侣们包围着，这对我很有帮助。在寺庙里也很符合韩国的文化，在韩国，陷入政治困境的人物通常会在寺庙里避难。这座寺庙靠近珍岛，1590年代，李舜臣将军曾在珍岛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我在珍岛逗留期间的一次短暂旅行深深地启发了我，我开始阅读更多有关李舜臣的资料。

几个朋友给我打电话，建议我回首尔，说我还会有机会的。虽然我曾以为自己会流亡多年，但他们的话听起来更有说服力了。一位韩国朋友，也是一位萨满巫师，安排我从四月起在首尔的一个公寓里住两周。我决定回去。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我搬了九次家。有时是在别人让我住几周的房间之间，有时是在寄宿家庭的廉价房间之间。生活相当不稳定和不确定，但也有某种自由。我的妻子拒绝和我说话。我的孩子们倒是跟我说过话，但他们离我很远，我也帮不上什么忙。我所拥有的财产（有些是我哥哥从美国寄给我的，有些来自我在脑教育大学的旧办公室）都被存放在仓库里。

有一段时间，我的妻子似乎情绪稳定，和母亲住在一起，但在5月份，她开始向亲朋好友发送一些不理智的信息，这些信息对她的家人来说是一种伤害，也是一种颜面的损失，以至于他们第一次决定尝试帮助她，并克服了他们的自私和冷漠。

要把她送进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并非易事。几经辗转，她终于被送进了医院，并在那里接受了长达六个月的治疗。

毫无疑问，她的病情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她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引起的。她的病情有所好转，出院后开始与母亲同住，后来又与我同住了三个月，但我们之间的关系却发生了永久性的改变。

到 6 月份，我在这个完全不稳定的世界里达到了一个新的稳定水平。我的一位朋友 Choi Jaejeong 帮我的一家研究所（未来城市环境研究所）找到了一份工作。这份工作加上其他工作，给我提供了相当于教授的薪水（没有福利）。

我猜想，为了让我得到这个职位，还有很多人在幕后努力工作。这并不是我想要的工作，工作内容往往与我的兴趣相去甚远，但我有足够的时间做自己的工作，而且待遇也不错。

终于有了一些收入，我能够还清所有的信用卡债务，甚至在年底开始存钱。

然而，我妻子住院的费用相当可观，而她的家人却无能为力。

竞选总统及其他职位

竞选公职，甚至竞选参议员或美国总统的想法在我心中已存在多年。我第一次想到竞选公职是在 1999 年。在伊利诺伊州，我一开始感兴趣的是政治，而不是外交。

2020 年 1 月，当我观察到 COVID-19 法西斯主义和美国体制的崩溃时，我认为风险如此之高，不如试试竞选总统。

此外，我觉得，鉴于 2020 年 1 月开始的对我的明显政治迫害，竞选总统可能是唯一能拯救我的办法--如果我能得到周围人的足够关注的话。

显然，我没有机会通过像民主党或共和党这样的犯罪集团进入美国政坛，但我认为，如果我能作为候选人受到足够的关注，发表精心制作的演讲，提出其他候选人无法提出的诚实建议，我就能在美国乃至全世界崭露头角，尽管我的活动受到机密顾问的限制。

我还认为，如果当权者过分不公平地阻挠我的竞选活动，那么针对一个除了善意和承诺之外一无所有的人的行动就会适得其反。

我的这一计划取得了部分成功。

我花了很多时间起草和朗诵竞选演讲稿。毫无疑问，我是唯一认真的总统候选人。

我曾在 2017 年为《赫芬顿邮报》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宣布自己是 Facebook 总裁候选人。那篇幽默的文章提出，Facebook 应作为一个民主共和国而不是一家公司来管理，Facebook 不属于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而是属于它的用户。

二月初，当我还在华盛顿时，我写下了竞选总统的初步宣言，以及一份由十七项纲领组成的政纲。在我于 2020 年 2 月 17 日被迫前往韩国的前几天，我把这个版本发给了华盛顿特区的一些朋友。

后来，我润色了第一份演讲稿，并在韩国的 Medium（2020 年 2 月 23 日）上发表了 my 参选宣言。

在韩国呆了几个星期后，我终于能够发表一些演讲，收入足以维持生活。包括那英哲在内的一小群人对我以独立候选人身份竞选美国总统的可能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韩国民主党的一位长期政治人物文一石（Moon Il-seok）安排我在著名网站 Break News 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和视频，用英语和韩语向韩国人介绍我的总统竞选纲领。记者 Park Dae-seok 也对我进行了长时间的采访。

这次报道是我期待已久的重大突破，几个月来我有了一些真正的知名度。

本访谈于 2020 年 4 月 7 日以英语和韩语发布。该帖子在韩国吸引了大量读者。

在五个月的时间里，撰写和发表有关美国社会方方面面的演讲成为我的主要表达方式。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我的主要活动是精心制作演讲稿，然后将其制作成视频发表--而不是撰写文章或书籍。我为每篇演讲稿写了无数稿，然后自己朗读，以求措辞正确。

我为每次演讲录制视频，有时是反复录制，然后进行编辑，再发布到 YouTube 上，供广大观众观看。YouTube 只记录了演讲的 50 或 60 次观看，但这显然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

我希望演讲能够精炼、鼓舞人心，并且能够让美国普通人理解当前的危机。

我想像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亚伯拉罕-林肯、罗伯特-肯尼迪或马丁-路德-金那样讲话。尽管我的时间有限，而且完全与世隔绝，但我认为我成功地将愿景、修辞和对实际政策的关注有效地结合在一起。

美国媒体不可能对我进行报道，也从未邀请我在那里的任何团体发表演讲。不过，在谷歌上搜索，可以看到我的大部分演讲，我还收到了许多读过我文章的人给我的留言。

例如，我决定在竞选纲领中呼吁对 "9-11 "事件进行科学调查，这也使我有别于其他候选人，我拒绝接受关于 "科威德-19 "的虚假说法也是如此。我一心想成为一个异类，因为如果大选没有产生合法的总统（这将是事实），我将和其他人一样有资格成为总统。

我的理由是，如果美国陷入更深的体制衰败，我的参选宣言可能会让我成为某些人眼中的领袖。一开始有多少人支持我并不重要。

一位朋友在外交官查斯-弗里曼（Chas Freeman）主持的沙龙讨论上贴出了我最初的参选宣言。毫无疑问，华盛顿特区的许多政府官员和政策制定者都读到了这篇文章。

那英哲把我介绍给了韩国许多有兴趣在 2020 年 4 月之后帮助我竞选的人。到 5 月份，我已经拥有了一大批支持者，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将在 7 月份之后消失。

我们和八个人共进晚餐，他们将成为我的团队。不用说，这一切都没有实现。赌注太大，大多数人都跑了。

不过，其中一位名叫李春英的女士多年来一直对我不离不弃，还帮我赚了点钱。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其他新闻来源的一些文章提到了我。其中，韩联社的一篇短文阅读量最大。

6月8日，我在首尔美国大使馆前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多篇博客对此进行了报道。

6月15日，我在首尔外国记者俱乐部正式宣布参选，这是我在首尔竞选活动的高潮。为宣布参选保留这一空间并非易事，毫无疑问，这一努力得到了高层的支持。

前国民议会议长李富英在我发言前介绍了我。我尽了最大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有说服力、有决心。虽然我的声音有点高，但我认为这是一次成功的演讲。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会改进的。

演讲结束后，我参加了一个杰出小组的政策讨论，其中包括一位前内政部长。

我们为这次活动制作了海报 挂在我身后的墙上"让美国再次绿色"、"让美国第一次伟大 "和 "追求真理，保护自由"。

今年

8

月，我根据这些演讲撰写了一本书，书名是《我不怕邪恶：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位真正独立的总统候选人》（ I Shall Fear No Evil: Why we Need a Truly Independent Presidential Candidate ）。该书于 9 月通过一家在线出版商以

PDF 格式发行。在一位朋友的帮助下，我向我认为会欣赏这本书的美国读者寄送了大约 150 本。

一个朋友经营的小出版社同意出版我的韩文译本，费用由我承担。我会把几百本这本书送给我认为可能会支持我的人。

在墨西哥驻韩大使的帮助下，我还将这本书翻译成西班牙语，并在墨西哥出版。在长达三个月的时间里，墨西哥总统奥夫拉多尔似乎对我的竞选活动产生了个人兴趣--尽管后来被其他因素压倒了。

我还在 2020 年 7 月订购了该书的中文和越南文译本。

几个月来，越南人对我相当感兴趣。事实上，我唯一一次接受大报采访就是在越南。

当我有足够的资金在 2020 年 11 月出版英文版时，我寄了 80 本给美国的知名人士，我确信他们会对我的事业感兴趣。几乎没有人承认收到过这本书。

我曾帮助过的一位法国研究生里亚德（Riyad）主动将我的一篇演讲稿翻译成了完美无缺的法语，后来又将所有演讲稿都翻译成了法语。不仅如此，他还帮我开发了一个先进的竞选网站 www.emanuelprez.com，甚至找人设计网站的补充内容，并将我的演讲稿翻译成其他语言。

我决定，这场全球范围的运动将决定我的成败，于是我花了仅有的一点钱，将这本书翻译成德语、土耳其语、希伯来语、波斯语、罗马尼亚语、波兰

语、韩语、日语、越南语和法语。最后，我还为这本书定制了前言，针对特定国家的关切翻译成 38 种语言。

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运动。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有多少人读了我的演讲稿，但我可以肯定的是，人数相当可观。

从 2021 年 7 月起，我在韩国生活期间竞选美国总统的活动开始卷入韩国国内政治。一次偶然的时机，我看到一群韩国人在抗议疫苗、5G 和军国主义，我立刻加入了他们的努力。

我以前在韩国从未见过这样一个小组，我以为韩国人并不天真，不会进行这样的分析。但是，这个后来被称为 "大流行病调查委员会" 的小组里有一些聪明的思想家。

其中一位 "真相音乐家" 谢野信就 COVID-19 行动采访了我，我就正在发生的变化背后的地缘政治因素做了简短发言。

Shin 精心剪辑了这段视频，并立即在 YouTube 上疯传。不久后，该视频被删除、重新发布，然后又被删除。该视频的部分内容和视频副本被发布在许多博客上，即使在今天也能轻易找到。

当时，韩国国内还没有人对 COVID-19 进行这样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分析。

视频发布后的几天里，一些政治人士攻击我是批评文在寅政府的右翼疯子。有几个人告诉我这些帖子，但很快就消失了，我也从未见过。

显而易见的是，尽管我的批评集中在阶级问题上，但却得到了保守派和基督教团体的大力支持。这一转变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友谊，比如我应邀参加了朴槿惠支持者在平壤举行的聚会，并在会上发表了谴责疫苗的演讲。

美国大选对我来说毫无影响。不久之后，我发表了题为“我喜欢精彩的木偶戏”的演讲，呼吁在一月份举行公平的选举，并具体解释了为什么特朗普和拜登都没有资格成为总统。换句话说，我拒绝承认选举结果。

之后，我又在 2021 年 1 月 20 日就职典礼上发表演讲，谴责国际金融和超级富豪对华盛顿特区的占领，并明确表示我不会承认拜登是合法总统。起初，这些文章被忽视了，但后来它们找到了广泛的读者，包括特朗普的支持者。

从 2021 年初开始，从我详尽的《为唐纳德-特朗普辩护》开始，我的许多文章被《全球研究》（Global Research）收录，这是一个勇敢而激烈批评的博客，在另类新闻领域享有盛誉。一年来，除了我的总统竞选网站外，它成为我与世界交流的主要途径。

我在韩国与反对 Covid-19 疫苗制度的活动家合作，再加上我用英语撰写的文章，为我带来了新的受众，尽管他们又有所不同。在 2020 年 3 月的竞选活动中支持我的许多人，在 COVID-19 成为我的核心信息后都退缩了。

我在韩国可以交谈的朋友数量急剧减少，更不用说在华盛顿了。大多数教授和政府官员甚至不会回复我的电子邮件或电话。这让我感觉又回到了 2001 年。

2020 年 12 月，我通过大流行病调查委员会的朋友认识了一个名叫吴炳松（Woo Byeoksong）的有趣的人。虽然他不是政治天才，也有一些明显的局限性，但他真诚地希望在我竞选美国总统之外，还能帮助我在韩国开展一些工作。

我曾和朋友们讨论过在韩国组建一个政党，甚至还为 2020 年 10 月的 "革命党" 设计了一个党徽。然而，这只是一个概念。

不过，在吴炳松的帮助下，我们开始聚集一批人，创建一个真正的政党，致力于反对 COVID-19 的授权。我对我们取得的成就感到惊讶。

我们共同发表了一些强有力的演讲和宣言，并设计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网站。为了取悦那些对 "革命" 一词过敏的人，我们将名称改为 "更好的党"（Deo naeun dang）。

然而，从 2021 年 2 月起，这一伟大构想的上空开始乌云密布。虽然我们只需要 300 人注册成为支持者，就能通过政党注册的第一阶段，但我们只能得到大约 60 人的支持。这并没有多大意义。我越来越觉得我们被盯上了，正在遭到破坏。

这不是我第一次有这样的经历。但如果没有制度上的进步，我也不想浪费时间去讨好温和派。2021 年 3 月，吴突然失踪。我回到了我的美国竞选活动中，用英语撰写演讲稿。

不过，我听说过另一位韩国人，他的想法与我相似，很多人认为我应该见见他。虽然我参加了周六反对 COVID-19 的抗议活动，但直到 2021 年 6 月底，我都没能见到他。

他叫崔成渊，2018 年在韩国发起成立 "汗共产党"，曾引起巨大争议。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大的政治危机，但各种右翼政论家对他的攻击却非常有趣。

当我们见面时，我们发现，尽管我们有一些表面上的相似之处，但我们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也致力于行动，致力于建立真正的机构，致力于革命。他和我一样，都愿意自由交流思想，因此我们很容易就提出了成立新政党的计划。

Choi 接受了 "革命党 "这个名称，但建议在前面加上 "国际"，以区别于其他已经采用 "革命党 "一词的右翼团体。我欣然同意。

几周内，我们制作了大量视频、演讲和政策声明，并聚集了相当多的追随者。我们的做法完全不同。我们完全不接受大韩民国政府的合法性，也没有兴趣注册任何东西。这给了我们极大的自由，我认为这是最明智之举。党的核心是我们两人，后来朴京浩也加入了我们，他们一直致力于真正应对韩国的大规模犯罪活动。

2021 年 5 月 25 日，我在美国的竞选活动发生了重大转折，我宣布在韩国成立美国临时政府，由我本人担任代理总统。从我被迫离开华盛顿前往首尔的那一刻起，我的脑海中就已经有了这个概念，但这一次，我通过一系列演讲明确了自己的立场。

我在 6 月份之前建立了 USPROVGOV.ASIA 网站，并在该网站上发布了许多面向世界的政策决定。Global Research 将发表我的临时政府提案，并引用 USPROVGOV 作为他们发表的演讲的来源。

最终，我在临时政府的写作上投入的精力多于竞选总统，尽管我觉得应该继续同时进行这两项工作。随着美国在极权主义迷雾中越陷越深，我觉得临时政府是唯一的选择，我猜想会有足够多的人对我表示同情，从而让我继续坚持下去--事实也确实如此。

我没有为我的总统竞选撰写演讲稿，而是开始为 USPROGGOV 撰写和发表演讲稿，并将其发布在该网站上，这些演讲稿被《全球研究》(Global Research) 转载后，得到了广泛传播。没有人说我不是临时政府的代理总统，也没有人叫我停止。

就我而言，我认真对待 USPROVGOV，尽管我也知道，除非得到广泛的支持，否则就不可能认真对待它。然而，广泛支持意味着什么并不清楚。就我在 2001 年的活动而言，我根本没有得到直接的认可，这可能是我取得成功的原因。

在首尔的生活越来越具有挑战性。这里更加压抑，人们戴着面具，公开拥护疫苗制度。我开始想象这样一种情景：我可以消失在农村，过上几年只靠农民施舍的生活。

2021 年 6 月至 2022 年 1 月期间，这一情景变得越来越生动，成为我制定战略的基础。

从 2022 年 5 月起，我开始与妻子同居，并取得了相对的成功。但我们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的看法根本无法沟通。不过，我觉得还是有可能解决一些问题的。

不过，还有其他因素。

2021 年 7 月，我接到通知，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我被研究所解雇了。我没有了任何收入来源，几乎没有人愿意和我谈起这件事。我曾有过两次翻译工作的机会，但都在最后一刻被意外取消了。

我告诉妻子，我要去乡下找一个地方，在那里我们可以不戴口罩、不接种疫苗，必要时还可以从我们认识的农民那里获得基本食物。

她没有把我的建议当回事，最终决定如果我 8 月份去乡下，她就回盆塘（首尔南部）和母亲住在一起。这就是她最终的决定。事实上，她的姐妹们对我和我的决定颇有微词，以至于直到 2022 年 1 月，她都不愿意给我写信或与我交谈。

我已经开始与崔成莲密切协作，包括一系列概述我党立场的广播。当我建议我们搬到农村建立一个独立基地时，他完全同意。

他的朋友愿意卖给我们一辆旧面包车，我们满载物品，于 8 月 2 日启程前往全州。我的大部分衣物已经丢失，仅剩的几本书也存放在一山 Yi Yanghaeng 朋友的工厂里，因此我可以轻装上阵。

一位来自达恩的朋友为我们在全州找到了一个住了几周的地方，我们就在那里住了下来，一边考虑下一步的行动。

我们应邀来到庆尚南道的瑞岭，住在乡下的一栋老房子里，房子的主人是我朋友很熟悉的一位老人。

村庄很有吸引力，居民对我们也很热情。我们花了一天时间打扫我们将要居住的房子。

我了解到，该地区过去曾有过坚实的学习传统，但已被城市化所摧毁。

然而，就在我们打扫完新家，准备安顿下来吃晚饭的时候，当地的一名警察带着老人的儿子拜访了老人。

他被告知，如果我们要住在那个村子里，就必须戴上面具，而且我们也不合适。

我不知道他们到底讨论了什么。但突然之间，一切都变了。老人走到我们面前，告诉我们不能使用厨房，我们必须在浴室外面洗漱，而且必须一直戴着口罩。

一小时后，邻居过来告诉我们，我们不能住在我们花了两天时间打扫的房子里--几个小时前她还对我们那么友好。

对老人来说，整场演出让他颜面尽失。我看得出，第二天目送我们离开，他是多么痛苦。

对于下一站，我们真的毫无疑问。

2021年3月，我曾考虑搬到乡下，并在蒂博尔那里住了一个星期。蒂博尔是一位来自捷克的迷人男子，他和两个孩子住在乡下的一栋小房子里。蒂博尔是文善明牧师的旧统一教会的忠实信徒，也是拒绝与 COVID-19 骗局扯上任何关系的火热的独立精神者，他的勇敢和奉献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还设法养育了两个孩子，孩子们和他一起反对 COVID-19，这是我自己无法做到的。

蒂博尔与崔成允一见如故，虽然他对我们的国际革命党不感兴趣，但他支持我们的许多政策--尽管他也向我们讲授统一教会的哲学，这超出了我们的意愿。朴京浩也曾多次来访，并加入了我们的党，使我们的核心人物达到了三人。

虽然蒂博尔的房子很小，但我们还是在那里住了将近一个月，并就我们在韩国乃至全球应对 COVID-19 政权的问题进行了意义深远的讨论。

我们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寻找住处，但每次都被拒绝。突然，在九月份，我们在老城区的一栋房子里找到了一个小房间，房东很热情地把房子租给了我们。她是当地一个教会的活跃成员，该教会似乎也支持我们。

我们花了几天时间清理这所相当脏乱但价格便宜的房子。Choe Sungnyeon 住在二楼，我住在一楼。我们在稍大一些的一楼开会讨论政策和活动。

2021 年 9 月后，国际革命党和美国临时政府网站成为我与世界联系的主要途径。我失去了更多的朋友，但获得了新的支持者--其中许多人从未露面。

我可以断定，既然韩国政府官员，以及 2021 年 12 月之后的美国政府官员，都愿意与我会面，甚至对我极具批评性的文章给予积极评价，那么我已经拥有了一大批追随者。

我们用韩语正式抗议政府政策，举行集会，为疫苗致死者举行烛光守夜，并用两页纸向对丽水感兴趣的人分发了精致的新版 IRP 简介。虽然由于规模小，我们的行动受到了限制，但我们拥有了听众，部分原因是我们愿意不劳而获，而且一直在努力。

2022 年 1 月看起来非常严峻。我想象着这样一个时刻：由于我们的活动，我们将再也无法获得食物，甚至无家可归。强制疫苗制度已被接受到令人不安的程度，疫苗护照已在首尔部分地区实施，在丽水也越来越多地实施，风险不断上升。

然而，在这期间，我受邀参加了几次重要的研讨会，10 年来第一次在美国大使馆找到了真正的朋友，并找到了接触韩国和国际读者的新机会。2021 年 10 月停止发表我的文章的《全球研究》杂志，在 2021 年 1 月突然对我的文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二月份，我针对普京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讲话发表了演讲，尤其是在配有乌克兰语字幕并强调坚定致力于自决的情况下，我的演讲赢得了广泛的听众。我拒绝接受美德或俄罗斯的立场再次引起了关注。但是，世界大战的风险越来越大，法西斯主义也在蔓延，这一切都表明，与二十年前相比，现在年近 57 岁的我将面临更多的挑战。然而，斗争本质上是相同的。

这部小说的最后 20 页是在所叙述的事件发生后不久写成的，因此我没有时间去编辑掉虚假的线索和错误的信息。但为了读者的利益，我还是觉得有必要将小说写到现在。

结论

这部小说的写作和编辑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如果我有足够的资金聘请一位专业编辑，那该有多好。然而，我不确定这样做是否完全是积极的，因为这样的编辑工作可能会掩盖或合理化叙事的原始性，以及我自己态度中的矛盾，而这些是这部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过去和现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高度组织化的机构和激进的反叛之间来回穿梭，有些地方我并不理解。我怀疑自己是否完全理解其中的压力和由此产生的心理。

事实上，我一直在两种渴望之间交替，一种渴望成为体制的一部分，通过体制来实现变革；另一种渴望是，我必须反对体制中的一切，必须采取激进的行动。我并不试图掩盖我性格中的这些矛盾。

因此，尽管我很想重写整本书，并将语气和风格统一起来，但我没有这么做。十八年来，我的经历经历了许多阶段，这些阶段相互矛盾，无法解释。如果说我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激进的反叛者，并据此为我的所有行为辩护，以支持某种革命议程，那会很好。我不是这样的人。

我曾多次试图重新加入主流社会，但都被推开了。我愿意与许多我并不特别尊重或关心的人合作，因为我觉得我的参与是一种实际需要。其中一些行为显然是错误的。

也许最好把这部小说作为我对未来撰写我所经历的那段历史的贡献，特别是从 2001 年 11 月到 2020 年这一关键时期。

尽管人们可以将美国面临的问题追溯到肯尼迪遇刺事件，甚至在此之前，但我觉得美国社会各方面的重大转变始于 2000 年 12 月，因为布什新政府利用各种犯罪分子关闭了美国政府。

如果所提供的材料看起来是原始的、未经精心编辑的，那也是为了让第三方看到我的本来面目，而不是我希望别人看到的样子，也不是别人把我塑造造成的政治稻草人。

毕竟，最终的历史不能也不应该由我来书写。

这本小说到底应该写些什么也是一个问题。这本书不应该是自传，也不应该描述我在这 18 年间所做的一切。小说对我在 2000 年之前所做的事情提及得也相对较少，尽管这部分内容可能对某些人试图拼凑这段叙述有相当大的帮助。

这篇小说的重点在于，2000 年 7 月，我从东亚旅行归来，讨论在线学术合作问题，之后我遭遇了什么，以及为什么会遭遇这样的事情。

可能会有一些读者觉得小说偏离了原来的主题。还有一些读者已经抱怨说，与我之前写的四页摘要相比，小说的叙述太长了。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读者的兴趣决定了对相关内容的判断。有些人会想要更多关于背景、关于我日常生活的细节，而另一些人可能会对我前面的摘要感到满意。我意识到，有些细节会给朋友和家人带来极大的痛苦。但此时此刻，我觉得自己别无选择。我所能做的就是宣称整部小说都是虚构的。

正如我对几位读者所说，这部小说是开放式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还活着。可以说，结尾应该在死后由第三方来写。这并不是说我明天就会死，

虽然这总是有可能的，而是说故事可能不会以任何简单的方式结束。我常常觉得，气候变化和世界大战的结合可能意味着这个故事实际上永远不会讲完。

在我有生之年，整个故事仍有可能得到其他人的认真对待，我们也有可能在今后的将来找到某种解决办法，或者至少是部分的“真相与和解”。我的这种愿望是很自然的。我很想找到一种方法，与家人和朋友建立正常的关系；基本上，与我曾经亲近的每一个人建立正常的关系。

虽然我们不知道爱德华-斯诺登、切尔西-曼宁、约翰-基里亚库、杰弗里-斯特林等人的真实故事，但我们知道，我的故事完全没有记录在案，被归入了“从未发生过”的档案。

尽管成千上万的人在某种程度上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事实就是如此。电影《美丽心灵》(*A Beautiful Mind*) 中对这一故事的引用太过明显，让人无法假装它从未发生过。

我知道，从未被媒体报道过或公开讨论过的案例不止我一个。然而，我的故事也有令人震惊的一面。因此，绝对有必要写下这篇叙述。

关于我患有“精神疾病”、与系主任和院长争吵、不合群的性格以及为中央情报局工作的不实报道层出不穷。

我感到震惊的是，朋友和家人认为没有必要澄清事实，即使是在与我的私下谈话中，即使是面对所有这些明显的谎言。不知何故，许多知道这件事的人都认为，我被剥夺了所有正当程序，并受到各种破坏性谣言的影响，这对我来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这些谣言在任何其他情况下都是他们无法接受的。

选择 "虚构 "一词

使用 "小说 "一词，并声称这一叙述完全是虚构的，这一决定需要解释。

我选择以 "虚构小说 "的形式来呈现这些材料，因为我觉得这种方式在呈现真相时会给我最大的灵活性，而且我能够讲述所发生的事情，而不会受到严格要求完整和可验证证据所人为施加的限制。如果这本 "新书 "能够激励第三方参与自己的调查，那将是一种成功。

任何熟悉此案的人，或者哪怕对其中的几个事件有所了解的人，都会很快明白这本书并非虚构，而是讲述了发生在美国的事件，甚至连阴谋论博客都不会触及。

称其为虚构小说，也是为了提前应对不太可能发生的情况，即我可能被指控泄露机密材料。当然，由于我从未获得过许可，也没有人告诉过我哪些事实属于或不属于机密，因此很难在法律上立案。尽管如此，我今后仍有可能受到进一步的骚扰。因此，读者的部分负担可能是担心这些事情不应该被讨论。采取 "一切都是虚构的 "这一立场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

此外，为了使叙述有效，有必要将质量参差不齐的信息编织在一起。我必须将确凿的事实与我不知道姓名的第三方的解释和推论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整体。

这不应该是《自然》杂志上的同行评议文章。它应该引起人们对一个复杂的社会和政治现象的思考。小说是最好的方式。

为了启动这个项目，我必须在骨头上添加一些肉，就像古生物学家在恐龙骨上添加肌肉和皮肤以重建原始形态一样。这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但目的完全是科学性的。

如果我只拘泥于已经公布的文件，而且这些文件百分之百被证实是准确的，我就不可能把这些文件有效地叙述出来，尽管已经有足够多的令人信服的证据摆在那里。如果只拘泥于法庭会接受的内容，就会严重歪曲事实。

此外，由于在美国（截至 2019 年 5 月）没有人愿意以任何形式与我一起要求对联邦政府、伊利诺伊州或伊利诺伊大学的行为进行调查，因此我决定在这一进程开始时限制自己的行动。我决定，在其他相关人员打破他们对此案的不道德、虚伪和非法的沉默誓言之前，我不会要求提供文件。

一旦人们准备好这样做，我就准备好进入下一步。

什么是真理？

关于虚构与真实之间的关系，作为一名前文学教授，我可以写很多篇幅。我就不多说了。我在这里要说的是，我们在媒体、非虚构类书籍和其他地方发现的大多数所谓“真实”的故事，都是如此明目张胆地虚假，以至于滑稽可笑。我们计算经济增长和安全的整个系统也同样荒谬可笑。因此，每个人都应该以开放的心态对待真相。

让我解释一下我在这部小说中写作所依据的资料来源。

我讲述了许多有据可查的事件，而且有多名目击者。有足够多的官方记录可以证明发生了大规模的非法阴谋。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要求。我所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推迟这样的呼吁，直到有第三方愿意支持这样的调查。

这就是说，即使我们无法获得描述犯罪阴谋如何实施的文件（联邦调查局或中央情报局的内部报告），我们也可以清楚地表明，肯定进行过这样的行动，而且其限制措施至今仍在很大程度上有效。

我的精神疾病导致我休了一年的病假，这个故事漏洞百出，即使单看医疗记录，也听起来像 Monty Python 的小品。即使是最基本的关键人物访谈，也会揭示出一个协调的阴谋。

我与系里的成员关系一直很好，直到 2001 年 2 月我突然被指控患有精神疾病，被迫停止与他们的交往，然后在没有进行任何医疗评估的情况下休了病假。然后，我被勒令在休病假期间上课，并且不允许我在下学期上课，尽管在我所谓的“病假”期间，没有任何关于我教学的投诉或担忧。2004 年，当我被伊利诺伊州开除时，世界上唯一能给我提供工作的机构不是大学，也不是社区学院，甚至不是临时工作服务机构，而是中央情报局。所有这些都可以通过证明。

小说中收录的其他材料都与背景有关，需要做一些工作才能证明其重要性。此外，我保存在硬盘中的与约瑟夫-阿尔佩尔之间的那封令人震惊的信件在两年前神秘消失了。我必须依靠记忆来重建故事的某些部分。但在我的硬盘或其他公开资料中仍有大量材料，这些材料的含义很清楚，但需要认真分析才能弄明白。

小说中提到的事件都是我亲眼所见，但没有第三方可以记录或证实。这些事件在这个故事中至关重要。如果因为缺乏证据而忽略它们，将是对读者和公众的一种伤害。

伊利诺伊大学和其他地方的一些人有一些奇怪的巧合和其他奇怪的行为，只能解释为他们有计划地破坏我的事业。我试图在这篇文章中解释我所认为的这种努力是什么，但我缺乏这部分的证据。尽管如此，如果忽略这一点，读者就会失去重要的材料。

其他解释也是可能的，但我认为，任何了解事实的人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意图是明确的；唯一不确定的是确切的动机。故事的某些部分我没有亲眼目睹。这些部分是我根据我信任的其他人告诉我的故事整理出来的。但我没有看到文件记录。我之所以把这些叙述包括进去，是因为我听到这些叙述时觉得有道理。

故事中还有一些部分是我并不完全信任的其他人告诉我的，比如中情局总部的“鲍勃”。然而，这些评论的内容足以让我对阴谋的本质形成一个更加完善的模型。这些故事，有时以寓言的形式出现，在这部小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故事的某些部分，我对自己完全不了解的事件进行了猜测。例如，第三方向我暗示，对远程教育可能赚钱的贪婪是我不得不在 2001 年被彻底击垮的原因之一。为此，我描述了一次投资银行家的会议，我在会上暗示，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我必须从远程教育中永远消失。我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召开过这样一次会议，也许会议根本就没有召开过。我认为，鉴于美国历

史上银行家们的类似行为，这次会议确实发生过的可能性很大。我不指望小说的这一部分会被记录下来。但如果不提这部分内容，对读者来说就是一种伤害。

最后，在 2001 年至 2005 年期间，我非常仔细地阅读了报纸，我从报纸上读到的或没有读到的内容中，对美国当时发生的事情进行了大量的推断。我认为发生过的一些事情后来被其他人在私下谈话中证实是真的。其他部分从未得到证实，但在我看来很有可能。我们可以期待有一天，通过对那段时期发生的事件进行诚实的调查，来判断我的故事的真实性。在此之前，我们必须依靠虚构的小说。

附录

远程学习建议

伊利诺伊大学、东京大学、首尔国立大学和北京大学

2000 年 6 月

伊利诺伊大学作为一所世界大学：

东亚研究领域的高科技与文科联姻

贝一明-贝一明

伊利诺伊大学、东京大学、首尔国立大学和北京大学利用先进的计算机辅助视频会议技术和互联网通信技术，开展联合教学计划的第一步。

短期目标：

在未来两年内，伊利诺伊大学、东京大学、首尔国立大学和北京大学将利用教学资源办公室提供的先进计算机技术，向所有四所参与学校的师生开放一系列重要的人文学科课程。伊利诺伊大学将利用其世界一流的计算机工程和计算机科学课程以及先进的互联网能力，成为世界上第一所

提供这样一个项目的大学：我们的学生可以同时学习四个不同国家不同院校的英语、汉语、日语和韩语课程。

尽管这种国际联系的使用最终将改变整个大学，但我们将主要集中在人文学科，特别是在东亚研究领域开始这一计划。在短期试点计划（仅限于几个完全用英语进行的重点研讨会）之后，我们将建立一个完整的计划，提供各种课程，首先面向东亚研究专业的研究生。我们将提供许多在美国任何地方都无法获得的课程。

凭借伊利诺伊大学在计算机科学领域所拥有的压倒性优势，伊利诺伊大学的人文学科将发生巨大变化。我们的东亚研究课程将令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学校羡慕不已。因为有了东亚和其他地区大学学者的参与，我们将能够在文科和理科领域承诺培养一批首屈一指的学者，这将使我们的东亚研究课程以及随后不久的其他院系的课程能够与国内任何学术课程相媲美。

哈佛大学这样的私立大学在东亚研究的任何一个领域都可以聘请一两名优秀教师，而我们则可以提供三大东亚机构的课程，从而使自己成为一个国际中心。最终，我们在计算机科学方面的优势将使伊利诺伊大学成为全世界人文学科研究的重要中心。

此外，伊利诺伊大学不仅将与东京大学、首尔国立大学和北京大学联合开设英语课程，还将发挥转学点的作用，通过视频会议将这三所大学之间共享的课程转到伊利诺伊大学，即使是伊利诺伊大学需求量不大的课程。该大学可以承诺成为视频会议和互联网教学的中心，并最终确定国际教育的世界标准。

长期目标

美国与东亚的经济和政治联系与日俱增。美国与东亚的经济关系已经大大超过与欧洲的关系。墨西哥和加拿大基本上是美国国内经济的一部分，除此之外，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是日本、中国、德国、英国和韩国。按照目前的变化速度，中国、日本和韩国很可能在未来五年内成为前三位。此外，从电子产品、软件到日常消费品，东亚对当前的制造业和技术有着巨大的影响。我们的应用科学正越来越多地与东亚学术机构和私营企业合作。我们有大量来自东亚的研究生和教师。然而，东亚研究在我们的校园里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个强大的东亚研究项目，一个与我们的电子工程系和计算机科学系一样声誉卓著的项目，对于伊利诺伊大学的福祉至关重要。

这一国际互联网教学项目不仅将使伊利诺伊大学成为东亚研究的主要中心，还将使其在东亚地区占有一席之地。伊利诺伊大学在人文学科领域的声誉也将随之提高。随着东亚文化在美国逐渐成为主流，掌握中文、日文和韩文在高科技领域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一个杰出的东亚研究项目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多亚洲语言文字处理已经成为计算机行业的一个重要领域。

毫无疑问，我们将来不仅需要人文科学领域的专家，也需要技术领域的专家，他们必须在这些语言方面具有杰出的能力。在东亚的大学里接受原文教学将使情况大为改观。

除非 伊利诺伊大学的人文学科至少与理科一样享有盛誉，否则它作为一所国际性大学所能发挥的作用是绝对有限的。这项计划将使我们能够利用我们在计算机技术方面的优势，将我们的人文学科推向顶峰。合作还将扩展到应用科学领域，建立联合实验室，开展科技项目。

该项目与东京大学、首尔国立大学和北京大学合作，将使伊利诺伊大学成为东亚研究的主要中心。最终，伊利诺伊大学将与世界各国的大学共享课程，这样，伊利诺伊大学的学生就可以学习到其他大学无法提供的课程。同样，我们的教师也可以为不同院校的学生开设课程，否则他们将无法找到足够的受众。

本学习计划带来的益处

我们与计算机相关 的研究、与高科技公司的互动以及毕业生的未来市场， 很多都涉及东亚。虽然哈佛大学或普林斯顿大学在人文学科研究方面拥有巨大的资金支持优势，但事实上，它们的师资力量仅限于几位知名教授。通过在伊利诺伊大学、东京大学、首尔国立大学和北京大学建立一个由伊利诺伊大学管理的教学课程格子，我们将能够提供其他大学无法比拟的广泛课程。我们不仅要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还要让我们的技术优势成为我们人文学科课程的关键。

中国、日本和韩国 之间在制度层面上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敏感性，尽管这三个国家因与美国和彼此之间的经济、技术和文化联系而走到了一

起。因此，伊利诺伊大学处于一个独特的位置，能够充当这三个将主导 21 世纪经济和文化的亚洲国家之间的知识交流渠道。

对于东京大学的学生来说，通过我们的项目到北京大学学习课程，要比在日本或中国通过复杂的官僚机构进行学习容易得多。

伊利诺伊大学的国际视频会议和互联网教学计划可能会成为东亚地区的一个重要机构，随着东亚重要性的增加，伊利诺伊大学也将如此。

我们的计划还将扩展到科学领域，从而使四所院校在科学项目上的合作达到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和即时性。如果伊利诺伊大学迅速行动起来，就能在这场不可避免的高等教育革命中抢占先机。

虽然最初的教学重点是东亚，但一旦该系统投入使用，法国、德国、意大利、土耳其或其他地方的大学的课程也将得到处理。这样，以前由于对全体学生吸引力小而无法开设的专业课程就可以开设了。学生和客座教师的签证问题将不再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

伊利诺伊大学地理位置的劣势将被该项目完全抵消，而且该校参与该项目的灵活性将使其很快成为常春藤联盟主要大学的竞争对手。我们可能没有那些大学所拥有的捐赠基金，但我们有能力在课程设置、国外项目和师资力量方面与他们相媲美。伊利诺伊大学将成为这一新的国际学术交流网络的渠道，如果我们迅速行动起来，我们将有机会跃居学术界的前沿。

相关步骤

A) 由伊利诺伊大学、东京大学、首尔国立大学和北京大学参与，就既定主题举办一系列有重点的学术会议。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等主题的会议将包括来自各参与大学的学者，并允许我们使用新的媒介。这样的学术活动将使所有参与者都清楚地认识到这种新方法的力量。

B) 与东京大学、首尔国立大学和北京大学讨论试行视频会议教学计划的问题。必须确保所有四个校区在适当的时间都有视频会议设施，而且它们的软件相互兼容。首次试运行的课程将是 2000-2001 年完全用英语讲授的课程。将使用 ISDN 或 I.P.线路，或电子可视化实验室的新接入网。上课时间为：中国时间上午 8:00 - 11:30；汉城/东京上午 9:00 - 12:30；香槟-乌尔巴纳下午 6:00-9:30。

C) 为试验计划建立小型管理机构。

D)

在每所大学安排一组课程，定期通过视频会议向所有四所大学的学生开放。为这些课程的视频会议和互联网部分设置统一的格式。建立课程组织系统，使课程不仅可供伊利诺伊大学的学生学习，也可供其他三个校区的学生同时学习。例如，在伊利诺伊大学开设的日本史课程，将有来自北京、东京和首尔的学生参加。第一批课程将是各院校用英语讲授的东亚人文研究课程，然后这四所大学的学生都可以实时参与（伊利诺伊大学的课程时间为下午

6	点至	9
---	----	---

点)。其他课程将在所有四所大学录制，并通过网络提供给所有四个校区的少数学生。在线异步讨论将补充偶尔举行的视频会议。

首先，将开展一个试点项目，仅限于四次研讨会（每个校区一次），完全用英语进行。

最终，每个校区都将有一个或一系列专门配备的房间，配有真人大小的发射屏幕、同步电子写字板、每个学生的即时互动板，以及完整的互联网和电子邮件功能，可以用英语、中文、日语和韩语进行互动。

D) 建立四所大学之间的课程学分授予计划。

E) 将每个参与机构的所有教师都纳入一个数据库，以便日后随时进行调整，这样，研究类似课题的学者就可以很容易地相互交流。

F) 开设所有四所大学均可授予学分的课程。

G) 将这套课程从每所大学一门人文课程扩展到人文和科学两门课程。同时，在七所大学之间安排视频会议，作为人文和科学联合研究的一部分。

H) 在亚洲、欧洲和伊利诺伊大学之间安排使用这种视频会议来建立科学联合实验室。迅速扩大技术范围，使伊利诺伊大学在教育领域明显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基本方法

1)

将指定班级的讲座录制成视频，在其他校区播放。学生将观看讲座，然后撰写电子邮件格式的回复（或在网页上张贴），由讲座所在校区的助教回复。讲座录像将分为两类：一类是可永久存档的讲座录像带，另一类是只能放映一次后销毁的录像带。

2)

在每所大学学习类似科目的学生之间交换电子邮件地址。在一个学期中，学生们将通过电子邮件或在一个共同的网页上张贴的帖子进行长时间的对话；或许还可以共同开展项目。一个月左右后，学生之间将就先前研究的课题进行视频会议讨论。

3)

为教授和研究人员提供关于既定主题的扩展学术视频会议。研究类似课题的学者将通过视频会议讨论共同感兴趣的课题。他们首先会在一个共同的网页上（以最合适的语言，如英语、中文、日语或韩语）就设定的主题交流意见：英语、中文、日语或韩语）。由于学者们不必支付旅费，而且最终可以在家里的电脑上召开这样的学术会议，国际会议将变得非常、非常容易。

4)

通过视频会议为在所有四所大学学习类似课程的学生举行不定期会议。教师也将出席这些无学分的智力交流活动。

5)

完全通过视频会议举办选定的研讨会，包括来自所有四个校区的学生（以与主题相适应的语言进行）。这些研讨会主要通过每天在共同网站上发布信息的方式进行，每周或每两周举行一次实际的视频会议（与当地校区的学生会议交替举行）。论文将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评分，但需要一个特殊的代码来识别其是否为原创。在任何情况下，学生获得的成绩都将是其所在学校的成绩，因此不存在所修课程的学分问题。

6)

各机构管理人员之间的联合网页，只能通过代码访问。例如，各院校的校长可以在这些网页上分享有价值的信息或未来合作的建议，而不会将这些信息公之于众。例如，院长可以很容易地知道其他三所院校的同级人员是谁。

7)

相似领域学者共享的联合网页。这样，例如中国研究领域的教授们就可以很容易地访问四个机构中所有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的网页。然后，他们就可以自行安排学术交流。

8)

每所大学就一个既定主题准备 50 分钟的多媒体课堂单元，供学生通过互联网观看。每个模块包括：A) 教授的口语讲座；B) 一组与主题相关的图片；C) 一组说明相关问题的相关文字；D) 汉语发音录音。因此，一个关于中国诗歌的 50 分钟单元将由教授的专题讲座选段、中国风景和传统服装图片、中国诗歌原文和译文选段以及诗人朗诵自己作品的录音组成。在观摩了整个单元后，学生将对不同的主题做出回应，并与所在校区以及其他三个校区的学生进行电子邮件讨论。学生还必须回复助教，由助教对评论进行评分。

9)

大规模并行研究实验室。就某一专业课题（如芯片制造）开展研究的学者将通过密集的视频会议组织、复杂的共享网页、相互数据库和系统协调的规划连接起来。因此，四所大学之间可以建立大规模的并行研究实验室，将师资和设备集中在一起，并对复杂的任务进行分工和分配，以避免重复。这样做的结果是，速度和复杂性都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10)

移民已成为一个问题，韩国、日本和美国政府最近都增加了中国学生获得签证的难度。虽然这些政策往往有失公允，但移民问题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然而，如果中国学生和学者能够通过互联网和视频会议完全参与到韩国、日本和美国的大学中，他们就可以不离开中国做出充分的贡献。学成之后，他们可以留在中国，利用这些互联网、共享数据库和视频会议技术，为国际公司工作，为世界经济做出重大贡献。

11)异步专题讨论会：

异步专题讨论会将是因特网通信的一种创新形式，目的是让专业领域相近的个人之间进行知识性讨论，否则，由于文化原因，他们永远不会有任何接触。简而言之，将有四个平行的网页，代表一个基本的聊天室，参与者可以在上面发表对给定主题的答复。在第一次实验中，建议使用英语、日语、中文和韩语，但语言数量不限。学者们在四个平行网页上发表的回复将被翻译成其他三种语言，并发布给与会者阅读。第一次异步研讨会将讨论技术与全球化这一广泛问题。一旦网页制作完成，并找到翻译人员，就可以提出任何主题。

非同步专题讨论会通过四个并行网页进行。

异步研讨会将通过四个平行（但相互链接）的网页进行。英文、中文、日文和韩文网页各一个。每个网页的顶部将用四种语言张贴一组问题或主题。学者（或专家）将在为自己语言设置的网页上发表对给定主题的答复。因此，中国学者只需用中文撰写。研究生（或专业翻译人员）将每隔 12 小时从每个网页中将帖子翻译成其他三种语言。因此，学者在阅读四种语言中任何一种语言的帖子时，都可以与其他兴趣相投但无法用外语表达的人进行讨论。登录网页需要一个特殊的代码。

这种形式将支持个人之间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否则他们永远不会进行交流。即使他们见面了，也很可能会感到不自在，或者不善言辞。与举办一次国际会议的费用相比，支付研究生进行翻译的费用微不足道，尽管这

些异步交流建立起来的关系可能会带来更多的项目。此外，这种异步研讨会的成果很可能值得在杂志或报纸上发表。

中国、日本或韩国的主要知识分子或政府官员在深夜工作疲惫时，很可能会习惯性地登录这一非正式讨论。我们很可能会获得其他方式无法获得的真知灼见。

大学的基本原则

I

下一代互联网将带来更加可靠和方便用户的信息交流手段。因此，参与系统应用互联网连接的机构之间将形成一个紧密的联系组织。这意味着，一个大学的连接层次的有效性及其用户友好性，将比校园内的实际设施更能决定该大学的地位。与国外其他规模大学的互联网和视频会议联系将使大学与众不同。这一事实尚未实现，但很快就会显现出来。

II

当我们想象这所大学时，我们应该想象一面镜子被打碎成数百块碎片，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每一块碎片都闪闪发光，整体效果令人印象深刻。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如果每块玻璃碎片都稍微倾斜一下，就会产生什么

样的效果。每块碎片都不需要真正移动或移植，只需向某个方向撑起即可。一旦实现了这一过程，每块玻璃反射的光线就会汇聚到一个点；一个目标。然后，这些碎片反射出的光线将足够强大，足以蒸发掉致密的石头。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能把其他机构的碎片反射的光也加入到这束光中。

III

有一些人通过采取以下策略，在房地产领域赚得盆满钵满。他们研究了二三十年的城市地图，找出了商业和住宅中心的位置，然后推测城市在未来五到十年内将如何扩张和转型。一旦他们绘制出近期人口变化的推测图，他们就会在那些看起来会被标记为开发区域的地方购买农田。买下农田后，就可以租回给农民，等待适当的时机。我们正是应该这样规划大学。

四

在未来几年里，视频会议将使网络教学变得更加合法和令人信服。互联网技术正在迅速向“如同身临其境”的境界迈进。虽然现在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但现在正是系统地学习这项技术的时候。在此期间，视频会议也将成为互联网的核心部分。现在正是系统地进入这一领域的最佳时机。

V

时区可能是一个问题，但异步学习可能与现场教学一样有效，甚至更有效。异步讨论与现场视频会议相结合，可以实现所有要求的目标。书面回复可能比课堂评论好得多。这只是改进技术的问题。

VII

互联网连接可以被视为将各机构联系在一起的连接纤维。随着连接光纤的不断加粗，将不同大学的专家配对在一起，可以形成一个独特的国际学术团体。

概念网页：

www.staff.uiuc.edu/~epast

